

自由主義之後

After Liberalism

柏林圍牆拆毀，蘇聯分崩瓦解，
這是共產主義的傾覆，
是馬列主義作為近代世界一種意識型態力量的傾覆。
但，自由主義勝利了嗎？
不！未來其實是一個「後自由主義」的世界。

Immanuel Wallerstein ◎著
彭淮棟 ◎譯

現代名著譯叢

自由主義之後

After Liberalism



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



Immanuel Wallerstein ◎ 著

彭淮棟 ◎ 譯

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



C0174725

通識教育中心
醫學人文通識教育提昇計畫
教育部專款補助

導論

自由主義之後？

柏林圍牆倒滅，以及蘇聯隨後瓦解，有人稱之為共產主義的傾覆，以及馬列主義作為現代世界一種意識型態力量的傾覆。此見無疑是正確的。有人又稱之為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型態之終於勝利，此見卻是對現實的一種完全誤解。實情是，上述事件更標識了自由主義的崩潰，以及我們明確進入「後自由主義」世界。

本書主旨，就是要闡釋這個主題。全書由1990到1993年間所寫文章構成。諸文寫作之時，正值一段重大的意識型態混亂時期，一種廣泛、天真、初期的樂觀主義開始消退，換成對逐漸出現的世界失序的憂懼。

依照一般的分析，1989年是1945-1989年階段的結束，這一年意指蘇聯在冷戰中敗北。本書卻主張，比較有用的看法，是將1989年視為1789-1989年階段的結束，也就是說，自由主義作

為現代世界體系的全球意識型態——我所謂的地緣文化——在這個階段裡獲勝又崩潰，興起又死亡，而其崩潰與死亡之年是1989年。在這個政治—文化紀元——一個科技成就輝煌的紀元——裡，法國大革命的口號被大多數人視為反映著不可避免的歷史真理，這真理不是現在，就是在不遠的將來就要實現。我說，此一紀元終止於1989年。

自由主義從來就不是左派學說，而是最本質的中間路線學說。此說之徒都確信自己有節制、有智慧、富人性。他們反對站不住腳的特權（他們認為保守主義意識型態是特權的代表），反對魯莽而不顧美德與才能的平等主義（他們認為社會主義／激進主義意識型態是其代表）。自由主義者向來喜歡將政治界定成兩個極端，他們介乎兩極之間。1818-1848年，他們自稱反對反動派，也同樣反對共和派（或民主派）；1919-1939年，他們自稱反對法西斯主義，也反對共產主義；1945-1960年，他們自稱反對帝國主義者，也反對激進的民族主義者。1980年代，反對種族主義者。

自由主義者素喜聲稱，自由主義國家——改革主義、法律條文主義、些許宗教自由主義——是唯一能擔保自由的一種國家。在相對少數的那群自由受到保護的人看來，這話也許不假，可惜這群人永遠是少數。自由主義者向來也聲稱，只有自由主義國家能擔保一種非壓制性的秩序。右派批評家說過，自由主義國家由於不願顯出有壓制性，可能允許，甚至助長了「失序」。左派批評家則一直認為，自由主義者掌權在位，最優先關心的事其實就是秩序，因此相當致力於非常真實，欲蓋彌彰的壓制。

要點不在於爭辯自由主義作為良好社會的基礎有何優點或缺點。我們應該做的，是自由主義的歷史社會學。我們有必要分析自由主義在法國大革命後出現的歷史，它先在一些國家（最強勢的國家），然後在世界體系中竄升為支配意識型態的經過，以及它在最近幾年同樣迅速去位的經過。

論者大多主張，自由主義起源於法國大革命引發的政治動盪之中。自由主義成為世界體系地緣文化的核心信條之說，則較有爭議。分析家大多同意，自由主義到1917年仍然得勢於歐洲，有的說自由主義那時開始式微。我自己則主張，自由主義極盛於1945年以後的時期（下至1968年），即美國成為世界體系霸權的時期。此外，關於自由主義如何得勢，以及其與種族主義和歐洲中心主義的根本關連，我的看法也會有很多人不同意。

我可能挑起最大爭議的，則是我主張，共產主義崩潰，並不代表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型態大獲全勝，而是意味著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繼續扮演其歷史角色的能力遭到決定性的破壞。當今世界的右派也主張我這看法的一種版本，但他們之中很多人不是操控口號的憤世之徒，就是沒有希望的浪漫主義者，追求歷史上從來不曾存在的家庭中心烏托邦，其他則純粹被世界即將解體嚇壞了。

對自由主義的拒斥，目前正由（共和黨的競選政綱）「與美國人民的契約」（Contract with America）落實於美國，同時由國際貨幣基金（IMF）向世界各地的國家強迫推銷。這些明擺著反動的政策在美國大概會激起反彈，在東歐則已引起反彈，因為

這些政策未能改善，反而惡化大多數人口的近程經濟處境。但這反彈也不會意味回頭相信自由派的改革主義，而只會意味，一種虛假崇拜市場，加上立法不利窮人的教條——重新獲得活力的反動派今天正在推銷的東西——將無法取代落了空的改革主義。無論如何，我的論點都和他們不同。我的觀點，是我在一篇文章裡說的「解放的現代性」觀點。我認為，我們必須清醒審視自由主義的歷史，才能看出我們能從破敗之餘搶救出什麼來，並且看出我們在這些困難條件之下，在自由主義留給世界的曖昧遺產之中，能夠如何奮鬥。

我並不是下筆只知大書劫難和黑暗，但我也不是在傳播陳腐的樂觀主義。我相信自由主義之後的時期是一段政治鬥爭時期，其後果比過去五百年來其他任何政治鬥爭都更重大。我看見特權勢力，他們非常清楚「爲了一切不變，一切須變」，並且極盡技術與巧思，以遂此目的。我看見解放的力量上氣不接下氣，他們眼看著他們投入了150年奮鬥的政治計畫——由取得國家權力來實現社會轉化——在歷史上歸於徒勞。他們也非常沒有把握，除了透過取得國家權力來完成此事，另外還有沒有途徑。然而原先的計畫，即世界左派的戰略，其失敗的首要原因，在於它裡面被注入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甚至它最反自由主義的，最「革命」的一支，例如列寧主義，也是如此。除非清楚1789到1989年之間的變化，否則21世紀不可能出現任何可信的解放計畫。

但是，即使我們清楚1789到1989年間之事，即使我們一致認為今後25到50年的過渡將是一段體系失調、解體，以及爲了

應該建構什麼樣的世界體系而出現尖銳政治鬥爭的時期，關係最大多數人的問題還是：現在怎麼辦？人們現在困惑、憤怒、憂懼——有時甚至不知所措——然而並非消極被動。政治行動的意識在世界各地都仍然強烈，雖然人們同樣強烈覺得「傳統」型政治行動大概將會徒勞無功。

此中的抉擇，提法不再可以是「改革或革命」。這種非此即彼的選擇，我們已辯論一個世紀有餘，結果發現絕大多數情況下，改革者最多只是不情不願的改革者，革命者只是稍微好一點的改革者，獲得實行的那些改革，成就既比支持改革的人想要的少，也比反對改革者害怕的少。這其實是自由主義意識型態強加給我們的結構性限制所必然產生的結果。

不過，對當今發生之事，如果「解體」是比「革命」更貼切的說法，那我們的政治立場應該如何？我認為只有兩件事可做，而且兩件事必須同時著手。一方面，人人直接立即關心之事，是因應迫切的、不斷的生活問題——物質問題、社會與文化問題、道德或精神問題。另方面，比較少的人，但仍然很多人，關心比較長程的事，即轉化的戰略。過去百年，改革者與革命者都未能成功，因爲兩者都未能認知短程課題與長程課題需要同時，雖然種類相當不同(甚至分歧)的行動。

現代國家**基本上**是改革者協助人們因應問題的一個工具。這不是國家的唯一功能，甚至不是其主要功能。國家導向的行動也不是僅有的因應機制。但國家行動一直是因應過程裡一個無可避免的成分，一般人的因應舉措也持之有故地指向使國家以某些特定方式行動。在失序、混亂及持續不斷的解體之中，

依然如此。國家透過其資源配置、對權利的保護，以及對不同群體之間社會關係的干預，都能增加或減少苦難。說有誰不必再問國家在做什麼，實屬愚蠢，我也不相信有很多人今後會完全不主動關心他們國家的行動。

國家能使每個人日子好過一點(或難過一點)。國家可以選擇是要協助一般人民，還是任由上層階級更加發達。不過，這也就是國家的全部能事了。這些事情在短期內無疑關係重大，但在長期卻無關緊要。我們如果希望對整個世界體系的大規模過渡產生重大影響，使之往我們所要的方向過渡，就**不能**以國家為主要行動媒介。國家反而是一大障礙。

國家結構已經成為(向來就是?)世界體系轉化的主要障礙，即使它們由改革勢力控制時，也是如此(或者說，它們由改革勢力控制時，尤其如此)。這股意識，是第三世界、從前的社會主義國家，甚至OECD(經濟合作發展組織)那些「福利國家」發生大規模反國家行動的原因。在一片破壞聲中，「市場」口號在侵略性新近重振的(西方)保守主義專家與政治人物兜售之下，一時成為某種口語通貨。但是，由於國家政策與「市場」口號結合，造成因應問題更困難，而非減少困難，因此許多國家已出現對市場優位的政府的反彈。然而這並不是重新相信國家改變世界的的能力，只是反映了我們如果要協助人們因應，就仍然需要的一種清醒判斷。所以，今天有人既寄望國家(協助他們因應)，同時指斥國家與政策無用甚至有害(就他們想朝他們希望的方向去重構世界而言)，其間並無矛盾。

這些人會做什麼，能做什麼，來影響這場過渡的方向？這

裡另外有個欺人的口號，就是要建設、擴張、重建「公民社會」(或可說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這是同樣虛妄的。「公民社會」能夠存在，只要國家存在而且力足支撐所謂「公民社會」這東西，也就是說，將公民組織於國家架構之內，以追求國家賦予正當性的活動，並透過國家來從事間接的(即非政黨的)政治。公民社會之發展，是自由主義國家得以建立的基本工具，是國內與世界體系秩序的支柱。在自由主義國家結構尚未存在之處，公民社會也是用來號召建立這些結構的象徵。但最重要的是，公民社會在歷史上既是限制國家潛在毀滅性暴力，也是馴服危險階級的模式。

在19世紀，建構公民社會是西歐與北美國家的主要活動。20世紀前三分之二葉，建設國家仍是世界體系的要務，並且可以說有更多國家要建構公民社會，但如今國家式微，公民社會正在解體，實屬必然。當代自由主義者所扼腕，保守主義者所竊喜之事，正是公民社會之解體。

我們生活在「集團主義」(groupism)的時代裡——建構自衛性的團體，各各自樹認同，作為團結的中心，與別的團體並存又競爭。這些集團的政治課題，是不要成為只是另一個協助人們因應的媒介(這樣在政治上會很曖昧，因為它將會填補國家崩潰時正在留下的空隙，從而維持秩序)，要真正成為一個促成轉化的媒介。但是，要成為轉化的媒介，他們必須弄清楚他們的平等主義目標。爭取集團的權利，以做為鬥爭爭取平等之一例，十分不同於爭取集團的權利，以便「趕上」而搶到隊伍最前頭(這已經成為大多數集團的目標)。

在當前世界過渡期間，在地方與世界層次上著力，都有其效果，在民族國家的層次上著力，則有其局限。追求短程和長程目標也有用處，中程目標則已無效用，因為中程路線假設一種持續不斷、功能良好的歷史體系。這樣的戰略要落實，並不簡單，因為其戰術必然是頭痛醫頭的、偶然性的。但是，如果我們承認我們生活在一個自由主義價值不再當令，現存歷史體系不再能確保最起碼的人身與物質安全的世界裡，那麼，我們就能帶著合理程度的信心前進（只是，此事當然沒有必成的保證）。

自由主義意識型態家倨傲自信的時代已經過去。保守主義者自屈150年之後，如今重新浮現，提出麻木不仁的自我利益來取代自由主義，而這自我利益戴著虔敬與神秘主義的面具。這其實也禁不起考驗。保守主義居於支配地位時，往往沾沾自得，被暴露或只是受到嚴重威脅時，則橫怒而充滿復仇之心。所有被拒於當前世界體系者，都必須在所有陣線上推進。他們不再有國家這個容易的目標可以瞄準，他們的工作遠比這更複雜得多：他們必須同時在非常地方性與非常全球性的層次上行動，以創造一個新的歷史體系。這工作很困難，但並非不可能。

目次

導論 自由主義之後？	i
第一部 1990年代之後：我們能不能重新建構？	1
第一章 冷戰與第三世界：美好的舊日？	3
一	4
二	13
第二章 和平、穩定與正當性：1990-2025/2050	19
第三章 非洲有什麼希望？世界有什麼希望？	43
第二部 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的建構與勝利	67
第四章 意識型態：三個還是一個？——「現代性」的偽戰爭	69
世界觀與意識型態	71
意識型態的「主體」	76
意識型態與國家	81

幾種意識型態？	85
超越意識型態？	90
第五章 自由主義與民族國家的正當性：一個歷史詮釋	93
第六章 國家發展觀念，1917-1989年：輓歌與安魂曲	111
一	113
二	116
三	121
四	125
第三部 自由主義的歷史困境	127
第七章 什麼現代性的結束？	129
第八章 難以克服的自由主義矛盾：現代世界體系 之地緣文化中的人權與民族權利	151
第九章 「發展」的地緣文化，或我們的地緣文化的轉化？	171
第十章 美國與世界：今日，昨日，明日	187
今日	188
昨日	206
明日	212
美國擴張主義的尾聲	219
第四部 社會主義之死，或資本主義生命危險	221
第十一章 革命為戰略，轉化為戰術	223
第十二章 共產主義崩潰後的馬克思主義	233
階級鬥爭	241

兩極化	244
意識型態	245
異化	246
第十三章 自由主義的崩潰	249
一	249
二	261
第十四章 自由主義的痛苦：進步有什麼希望？	271
索引	293

第一部

1990年代之後：
我們能不能重新建構？

第一章

冷戰與第三世界： 美好的舊日？

我們這麼快就要懷舊了嗎？恐怕不得不然。我們脫離了美國在世界體系中的霸權時代，進入了一個後霸業時代。第三世界在那個時代的處境無論多麼困難，我相信它現在所處的是一個更艱難的時代。剛過去的那個時代是希望的時代，沒錯，那些希望經常落空，但究竟還是希望。即將來到的時代，則是麻煩重重的時代，鬥爭的時代，而且這些鬥爭將是出於絕望多過出於信心。不惜引喻的話，不妨借用西方的一個老象徵：眼前的時代將是煉獄的時代，其結果每每難以確定。

我將分兩部分來勾勒我的看法：一部分是簡筆速描我們剛脫離的那個時代，第二部分談我認為我們可以有什麼預期，並且就我們面臨的歷史選項提出論點。

—

1945-1990年時期的特徵，我相信可用四點陳述加以總撮：

1. 美國是一個單極世界體系裡的霸權，其強勢以1945年後壓倒性的經濟生產力優勢，以及其與西歐和日本的聯盟體系為基礎，在1967-73年達於極點；
2. 美國與蘇聯進入一場高度組織、經過仔細限制的、形式上的(而非實質上的)衝突，蘇聯充當美國的次帝國主義代理人；
3. 第三世界逼促美國、蘇聯及西歐注意，所要求的權利多於北方國家所期或所願承認，提出要求的時間也早於北方國家所期或所願。第三世界的政治力量，在於它相信並樂觀自決與國家發展可以得兼，但第三世界的終極弱點也在這裡；
4. 1970年代與1980年代是全球經濟發展停滯的時期，美國頑抗其自身即將臨頭的式微，第三世界則對其自身的戰略感到幻滅；

以下將上述四點逐一詳述。

(1) 美國在1945年的壓倒性經濟優勢——在生產與生產力上——是三項因素結合的結果：1865年以還，美國穩定地集中全國力量增進產能與科技革新；美國免於嚴重的軍事花費(至少

到1941年)、1941-1945年的有效軍事動員，及基本設施未受戰禍破壞；整個歐亞從1939至1945年，基本設施與人命方面沒有遭受重大破壞。

美國相當迅速將這個優勢制度化，亦即建立霸權，使美國能控制或支配世界政治與經濟中幾乎所有重大決定，垂25年之久。其霸權是意識型態的，甚至也是文化的。這霸權所賴以鞏固的兩大支柱，一是與世界上一些重要的，已經工業化的國家結合成一套聯盟體系，一是國內成爲一個全國統合的福利國家。這兩根支柱的安排都是經濟。給西歐和日本的經濟胡蘿蔔是經濟重建，與美國中產階級與熟練勞工階級實質所得的大幅提升相互配合。這爲美國的生產企業保證了政治滿足與巨大市場。意識型態包裹，是承諾首次充分落實政治自由主義提了兩百年的承諾：普遍選舉權與議會制度。這件事在與共產主義「極權主義」鬥爭的架構內進行，因此事實上將共產主義者排除於政治權利之外。

名義上的政治承諾，則是讓西歐與日本以國家身分、勞工階級以階級身分，參與集體決策。事實上，約20年之久，世界體系裡所有重要政治決定都出自美國一小批精英之手。此即所謂美國的領導地位。西歐與日本是威權侍從國家(client state)。勞工階級的運動則是威權侍從運動。

(2) 同理，美國與蘇聯的關係，表面是一回事，底下是一回事。表面上，蘇聯與美國互爲意識型態敵人，自1917年而非1945年即陷入冷戰。他們代表了只能二中選一的社會看法，對歷史現實也作相當分歧的解讀。兩國的結構十分有別，在某些

層面且有根本之異。此外，雙方都大大聲張彼此意識型態的歧異，各自招引所有國家與團體，說天下不歸美，即歸蘇。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那句名言就說：「中立主義是不道德的」。蘇聯領袖也有同樣的說法。

然而實情頗異於是。歐洲劃出一條線，大致是沿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美蘇部隊相遇之處劃成。美國與蘇聯之間的安排，人人都知道，也十分簡單。蘇聯在其東歐地區可以隨心所欲(亦即製造衛星政權)。「工作條件」有二。第一，東歐與西歐要絕對遵守歐洲的邦際和平，不得以任何方式企圖改變或顛覆對方區域的政府。第二，蘇聯的戰後經濟重建不必期望獲得、也不會獲得美國協助。蘇聯需要什麼，盡可取之於東歐，美國政府則將其財經資源(浩大但並非無限)投注於西歐與日本。我們知道，這套安排運作極佳。歐洲有了絕對的和平。西歐從無遭受共產主義煽動叛亂之虞(除了在希臘；蘇聯挖了希臘共產黨牆腳，並且拋棄他們)。東歐國家多次嘗試放鬆或結束蘇聯的控制，但美國從來不給支持(1953、1956、1968、1980-81)。馬歇爾計畫只行於西歐，蘇聯則建構了一個稱爲COMECON的繭(東歐經濟合作組織)。

蘇聯可以視爲屬於美國的一個次帝國主義強權，因爲蘇聯在其區域內確保秩序與穩定，所據條件其實提升了美國維持其世界霸權的能力。這場追根究柢而言並非很有意義的意識型態鬥爭，其劇烈對美國是一個很大的政治正數(當然，對蘇聯的領導地位也是一大正數)。下文還會指出，蘇聯在第三世界充當了美國的意識型態盾牌。

(3) 1945年或那年以來，從來沒有誰問第三世界喜不喜歡或同不同意美國和蘇聯串通建立的這套世界秩序。在這套世界秩序裡，第三世界當然沒有分到一個非常可欲的位置。1945年，第三世界在政治上得到的非常少，在經濟上得到的更少。年復一年，這套世界秩序提供給第三世界的東西有些改善，但總是給得不情不願，而且是因爲第三世界好戰喧囂才給。

1945年，美國、蘇聯，以及舊日的四方殖民強權，都不曾將第三世界認真視爲世界級的政治角色。他們只要聽見第三世界任何抱怨，都訝異以對，然後運用世界版「滴入理論」(trickle-down theory)，規勸抱怨者要有耐心。

美國對第三世界當然也是有其方案的。這方案在1917年由威爾遜宣布，名曰民族自決。等到時候成熟，各民族終將獲得集體政治主權，就如各國公民在政治上獲得選舉權。這些政治權利屆時將會提供民族自我改善的機會。1945年後，這自我改善有個名字，叫國家發展。

作爲意識型態，列寧主義照說應該和威爾遜主義形成二律背反。事實上，在許多方面，列寧主義卻成爲威爾遜主義的具體化身。威爾遜的第三世界方案，由列寧轉譯爲馬克思主義切口，以反帝國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的面目出現。這顯然反映出，關於應該由誰來控制世界體系邊陲世界的政治過程，列寧主義真的別有見地。但是，列寧主義的實際方案與威爾遜主義並無二致：先是政治改變以建立主權(讓殖民地首次獲得主權，讓已獨的第三世界國家首次真正獲得主權)，然後是經濟上的改變，建立有效的國家官僚體系，改善生產過程(「工業化」)，以及創造一套社會

基本設施(尤其在教育與衛生方面)。威爾遜主義者與列寧主義者承諾的，都是「趕上」，縮短富國與窮國之間的鴻溝。

第三世界國家吃威爾遜—列寧這一套，但可以理解，他們是沒有那麼耐煩的。這套方案有兩步。第三世界也挺合理，先走第一步。第一步就是殖民地進行反殖民鬥爭，次殖民地進行類似的政治革命。1945年以後，第三世界強行加快步調。中國共產黨進入上海。中南半島與印尼人民拒絕他們的殖民宗主重返。印度次大陸要立即獨立。埃及人罷黜君主，將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阿爾及利亞人拒絕承認自己是法國的一部分。1950年代，非洲出現「橫掃而下」的解放。政治革命在拉丁美洲挺進，最著名的是古巴1958年的7月26日運動獲得勝利。當然，還有1955年的萬隆會議。

這整個政治推勁的基本特徵是，打從開始，它就完全起源於本土，而且與北方對立。殖民強權強烈反對這種逼進，盡其所能阻止或拖延。當然，他們所用戰術各有不同，英國明顯比其餘強權富於彈性，葡萄牙殿後。美國理論上提倡威爾遜的反殖民主義，整個傾向卻是支持歐洲的拖延戰術，但最後也呼籲去殖民化，以達到節制第三世界步調的作用。蘇聯的態度亦無大異。列寧主義代表一種比威爾遜主義更有力、更富戰鬥性的反殖民主義，蘇聯對許多反帝國主義運動也的確給予物質和政治支持，但是在許許多多關鍵時刻，蘇聯也尋求限制第三世界的步調。蘇聯在希臘的角色，以及其對毛澤東的建議，都惡名昭彰。在全世界，凡是密切觀察過各地鬥爭的人都知道，蘇聯的支持從來不曾排在前面，而且必須辛苦爭取，蘇聯經常根本

就吝於伸援。

當然，我們知道，第三世界還是贏得基本的政治戰鬥。到1960年代末期，幾乎每個地方都已獲致去殖民化。採取第二步的時候來了。第二步即國家發展。但事實上，就在採取第二步的那一刻到來之時，世界體系也進入孔德拉季耶夫B (Kondratief B)階段。第二步在大多數地方從未完成。

(4) 1970年，美國國勢達於頂點兼極限。美國由於黃金準備降低，被迫放棄固定的黃金/美元比值。在孔德拉季耶夫B階段開始之際，西歐與日本的經濟成長追上並開始凌駕美國的生產力水平。或者應該說，全球性的生產擴張是美國極盛而衰的主源。越戰不但證明美國必須同意其自身提出的威爾遜信條，即使它不同意作此要求的集團，另外也證明，美國如果不支持威爾遜信條，代價就是美國政府在國內的正當性減弱。1968年的世界革命打破了美國建構的整個意識型態共識，包括其備用王牌蘇聯盾。

其後20年，美國忙於補綴。每一片補綻都發生了作用，亦即減緩敗象，但整個架構如今看起來還是一幅破敗。尼克森前往中國，將中國拉回世界秩序的安排之中，是精采手筆。尼克森由於承認美國在越南失敗，也減少了美國的損失。另一精采手筆是，美國默許(甚至可能曾經從中安排)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石油漲價。OPEC的行動被說成第三世界好戰的證據，作用則是造成世界盈餘(第三世界的所有盈餘)透過產油國，流進西方(主要是美國)銀行。然後，這些錢以貸款的形式回到第三世界(及蘇聯集團國家)，使這些國家暫時有能力平衡預算並

繼續進口西方產品。帳單在1980年代就會寄到。

1970年代，美國盡力要大家稍安勿躁。美國向西歐人和日本人提出三邊主義，亦即允諾在世界決策上增加與兩者磋商。對蘇聯，美國提出「低盪」(détente)，亦即降低意識型態分貝，在1968年震盪之後，此計為布里茲涅夫官僚體系帶來慰藉。在國內，美國當局以鬆弛冷戰的緊張，向民眾交代，向大眾提供一種文化消費主義，其中包括實施更多的自由派方案，以及矯正歧視行動。對第三世界，美國提供後越戰症候群，具體而言，包括邱池委員會的CIA報告，克拉克的安哥拉修正案，以及撤出對蘇慕薩(Somoza)與伊朗國王的支持。

我相信尼克森、福特、卡特政府應該視為追求同一種政策，這政策可以稱為「低姿態」，卡特總統那篇要美國民眾承認美國國力局限的著名演說，詳述了這項政策的內涵。這些政策運作效果堪稱不錯，直到第三世界又有動作。「低姿態」出乎預料，碰到何梅尼而觸礁。何梅尼不肯當傻子。美國無論低姿態不低姿態，都是頭號撒旦(蘇聯是第二號)。

何梅尼的戰略很簡單。他拒絕接受遊戲規則——美國在1945年以後建立的世界秩序規則，以及行之已有五百年的邦際體系的規則。結果也同樣簡單。美國深受羞辱，卡特敗選下台，雷根則靠每一方面都拒斥「低姿態」的政見勝選上台。雷根(布希)的戰略是以虛偽的男子氣概取代低姿態——對盟國強硬，對蘇聯強硬，對國內強硬，也對第三世界強硬。

經濟上，世界必須面對1970年代補綴工作的帳單，就是外債危機。這危機1980年首先在波蘭出現，墨西哥1982年正式承

認有此危機。結果，是整個第三世界與蘇聯集團國家經濟全面下滑，東亞新興工業國家除外，這些國家獨占因為獲利降低而從核心國家移轉到半邊陲地區的工業。OPEC既已竭盡其為下跌的世界經濟提供挹注的作用，雷根轉而依賴美國的軍事凱因斯主義，以及向先前的盟友，現在的經濟勁敵——日本與西歐——大筆舉債。1980年代中期，帳單明顯即將到期，一如第三世界的1970年代貸款。

那些補綻還有沒有剩下未破的？大概沒有。首先作此判斷的是戈巴契夫先生。蘇聯基本上是因為它與美國之間的特殊安排，亦即所謂冷戰，才成為超級強權。美國既然不再有能力扮演強權角色，冷戰即無功能，蘇聯隨之將被視為只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裡的又一個半邊陲國家。戈巴契夫欲圖挽救俄羅斯／蘇聯，使之繼續扮演世界強權(至少至少，當個強大的半邊陲國家)，於是採取一套三重方案：單方面解除冷戰(高度成功)；放掉蘇聯在東歐維持帝國的負擔，這付擔子如今既無意義，又過於沉重(高度成功)；改造蘇聯，使之能在後霸權時代有效運作(不成功)。

這是有意識地拆解美國的世界秩序，美國起初為之驚愕，繼則決定高呼美國勝利，以為粉飾。這最後一次虛張聲勢本來能使美國再得意五年，要不是第三世界又有動作。這次是伊拉克的海珊。海珊看出美國的弱點。蘇聯集團共產政權的崩潰，特別顯出美國的弱點，美國無力強使以色列接受區域和議，則格外顯出弱點。海珊判定，大膽行動的時候到了。他入侵科威特，當時並且十分可能已準備好進而長驅南進。

我相信海珊的算計考慮了四項變數。其一是外債危機。海珊知道第三世界的外債危機不會獲得真正的解脫，他則至少有個近便的解決辦法——奪下科威特累積的油田租金。第二，是以色列終止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的和議。如果和議仍在繼續談判，入侵科威特將會有損巴勒斯坦人的鬥爭，而當時巴勒斯坦之事仍然是阿拉伯民族的情緒焦點。但和議無望，海珊看起來就是巴勒斯坦人希望所寄，而能夠將阿拉伯民族的情緒握在手裡。這一點，他似乎做到了。不過，以上兩項變數到底是次要的。

共產主義崩潰是遠更重要的一個變數。由第三世界觀點視之，這件事有雙重意義。第一，海珊知道蘇聯不會支持他，他因此免於受制於美國與蘇聯對所有可能升高核戰對峙的爭執的自動解決辦法。第二，共產主義的崩潰，是「國家發展」這個意識型態的徹底崩潰。如果連能夠充分運用列寧主義模型的蘇聯都發展不來，那麼，在現有世界體系之內，伊拉克和其他任何第三世界國家當然也無法以集體自助的方式「趕上」。威爾遜主義者終於失去了列寧主義這張盾牌。列寧主義一直被用來將第三世界的不耐煩導入一種戰略，一種從世界體系支配勢力觀點看來，第三世界可能採取的戰略中對世界體系威脅最小的戰略。

確定其他替代方案都是虛幻，並且確定美國的弱點之後，海珊考慮到第四項變數。他如果出兵，將有一半成功機率，美國失敗的機率卻是百分之百。美國無路可走。美國如果讓步，就成了紙老虎，如果反制，則流血的政治輻射效應對美國一定

是負面的——在中東、在歐洲、在國內、在世界各地皆然。

二

我們正在朝何處走去？我相信世界體系正在走向比前此更大的南北兩極化，既然如此，我將先提出北方將會如何改造，以及其對南方的影響，然後提出我認為南半球將會有何政治選擇。最後，我將嘗試將之置於未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脈絡裡觀察。

世界經濟體系在1967-73年進入孔德拉季耶夫B階段至今，目前我們已到達其末端。我們正在進入最後、最戲劇性的下垂。1873至1896年有一個孔德拉季耶夫B階段，在1893-1896年下垂，目前情況與之類似。這下垂對北方各地的衝擊將會隨地而異，但對南方大多數地方的衝擊大概將會非常巨大。不過，世界經濟一旦徹底落下，將會再度脫出，我們將會再度進入一個大大的A階段。世界經濟將會如長久以來的預測，由新興先鋒產業(微晶片、生物基因工程等等)推出一個新的產品循環而獲得動力；這些產業的三大重鎮將是日本、歐洲共同市場及美國。他們之間將會出現尖銳競爭，爭取對這些產業的世界市場的準獨占性控制。這將不會是三者都得利的局面。

近來很多人說世界市場將是三分天下之勢。我不相信這種說法，因為，在這樣尖銳的競爭裡，三巨頭將會變成二元分裂。由於成敗賭注太大，三方之中最弱的一方為恐被擠出局，將會尋求與另外兩大之一聯合。今天，當然此後十年亦然，三大之

中最弱的一方——以生產效率與國家財政穩定的程度而論——將是美國。這個最弱者自然而然的聯合對象將是日本。雙方如何互通有無，亦甚明顯。日本的長處在生產過程與資本剩餘，美國強在研究與發展的能力和潛力、服務業、軍力，以及累積的消費財富。朝鮮統一，可以加入日美聯盟，加拿大也是。此外，日本與美國將會把他們在拉丁美洲與東南亞的關係拉進來。他們有強大本錢在中國找到適當的利基。

歐洲早已看出這種發展，此所以德國統一，柴契爾夫人下台後，1992年的安排不但不會出軌，反而必定更加強化。歐洲必須拿出一套詳細的戰略來，或者歐洲共同體點點滴滴擴張，或者進行大規模聯合。關鍵在俄羅斯。歐洲想要有任何力量對抗日美聯合，都必須將俄國納入。俄國解體，歐洲處境不利，由於日本、中國及美國基於其他理由，也為此過程擔心，俄國大概還會挺過風暴。

第二階段，北方兩大必須各自開發自己的主義半邊陲（一個找中國，一個找俄國），使之成為附屬基地、主要市場，以及外勞的來源。目前，核心地區想到俄國與中國人口外流，面有懼色，但是，到2005年，經濟榮景加上人口下降，外勞看來將會相當討好，只要他們「有秩序地」來。

第三世界將會是何光景？好消息不多。與北方兩大之一發生關係而受之處當然會很多，但總的說來，南方在世界生產與世界財富中所占比率將會下降，而且我相信其社會指數曲線（教育與衛生）將會倒轉；1945-90年之間，這套曲線本來是南方表現不錯之處。此外，南方1945-90年間的主要政治工具——民族

解放運動——將會被奪走。南非的非洲民族黨(ANC)將會是最後一個得以掌權的民族解放運動。這些運動都曾促成一個歷史目的，即民族自決，但在另一個歷史目的上——國家發展——全部失敗。當前有個流行的幻想，說「市場」將會為他們帶來國家領導的工業化無法帶給他們的東西。這個幻想將會熬不過未來五年的下降。馬佐維茲基(Mazowiecki)的失敗，預言著許多政權將會經驗到的巨大無力感。

那麼，還有什麼選擇？頗有一些，其中沒有一個符合威爾遜／列寧主義時期的主導世界觀。我們可以先提一項選擇，這選擇是北方的夢魘，因為他們想不出如何來回應。這就是何梅尼。何梅尼之路通常被說成是回教基本教義派對外界的威脅，其實這說法完全擺錯重點。何梅尼之路並不純是一個回教現象，也不特別是基本教義派之路，如果基本教義意指回歸古代宗教習慣的話。

基本上，何梅尼之路是對現代世界體系倒行逆施之怒的高潮，目標則對準此一體系的主要受益者與煽動者，即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西方核心，指斥西方，包括（甚至特別是）其啓蒙運動的價值觀，為邪惡的化身。這些如果只是戰術，只是動員人民的模式，就可能有辦法對付，但如果它們代表一種真正的見解，則不會有溝通或解決之道。

這種爆炸能維持多久？能行之多遠？很難說。何梅尼的伊朗似乎走上了激情逐漸平靜之路，正在重新進入世界體系的文化軌道。但是，明天如果南方其他國家爆發其他運動，而且更多同時爆發，在一個比較不那麼穩定的世界體系內爆發，它們

難道不會持續更久，更進一步？他們難道不可能在實質上推進當前世界體系的解體？

第二條路是海珊之路。我們必須弄清楚海珊之路是什麼意思。海珊之路不是全盤拒斥現代世界體系的價值。復興黨(BAATH)是典型的民族解放運動，也是徹底世俗的運動。我相信海珊之路無非俾斯麥之路，其要義是說，由於經濟不平等是政治強權關係(*rappports de forces*)的結果，經濟的轉化非軍事力量不為功。伊拉克對於美國，是第一場真正的南北戰爭。民族解放戰爭都有一個有限但十分清楚的目標：自決。由南半球觀點視之，所有這類戰爭都是北邊發動的，只要北邊別管南邊的事，這些戰爭就會結束。波斯灣危機中，戰爭是南邊發動，用意不在實現自決，而是要改變世界的強權關係。這就完全另當別論了。

海珊可能打輸這一仗，並且被摧毀，但他指出了一條新路：創造更大的國家，武裝這個國家，不是二流武裝，而是頂尖武裝，而且願冒真實戰爭之險。如果作這項選擇的時候已經到來，後果將是什麼？當然是可怕的殺戮流血，並且無疑包括使用核子武器(相當可能也使用化學與生物武器)。從北邊與南邊的觀點視之，海珊之路都比何梅尼之路可怕。你也許會想，這與南北之間的舊有戰爭是不是那麼不一樣。答曰：從道德觀點視之，是相同的現象，但是從政治與軍事觀點來看，卻十分不同。舊有的殖民戰爭在軍事上一面倒，自信滿滿的是北邊來的侵略者。新的戰爭將是雙方以軍力爭勝，但這回是北方信心缺缺。1945-1990年這段時期，可能會被後世視為南北相對和平的時期

(雖然有越戰、阿爾及利亞、多重反殖民鬥爭)，前面是歐洲擴張戰爭，後面是21世紀的南北戰爭。

第三條路，我稱為人民重陟造成的個體抵抗。在一個南北日益兩極化的世界裡，北方人口下降而南方人口擴張，在政治上如何可能遏阻大量由南而北的，未經許可的移民？我相信這是莫之可禦的。這種移民當然已在發生，但我認為其規模將會大幅上升，並且因此而改變北方社會生活的結構。指出兩點，即知此理。到2025年，北方內部的南方可能達到30%到50%。北方可能企圖不讓這些人享受政治權利。也就是說，北方對勞工階級進行整合兩百年之後，又回到19世紀初葉的情勢——大量下層職業階級沒有選舉權。這當然不是製造社會和平的妙方。

南方的以上三種選擇，在政治上無疑對世界體系的統治精英造成兩難之局。這些精英將會有所反應。但上述三種選擇對世界左派——南方與北方的反體制力量——也造成根本的兩難困境。

我們已經見得北方的左派如何陷入混亂。他們不知道如何來回應何梅尼。他們不知道如何來回應海珊。對未經許可的移民，他們從來拿不出一個清楚的立場。對上述三種選擇，他們不給予完全的支持，也不想無條件支持北方的壓制。結果是北方的左派變成沒有聲音，有聲音也言不及義。他們曾經自由自在和民族解放運動相互團結。1968年，他們高唱「胡，胡，胡志明」。但那是因為越盟和民族解放陣線合乎威爾遜/列寧主義的價值。一旦威爾遜主義與列寧主義俱死，一旦國家發展被視

為幻想(甚至有害的幻想)，一旦我們放棄了過去150年來追求的基本轉化策略，北方的左派除了雜湊補綴為事，尚復有何可為？

南方左派是不是好一點？他們是不是準備加入何梅尼或海珊的行列，以及將力量投入移民這項選擇？我認為很有問題。他們和北方一樣充滿猶豫。他們也希望撼動世界體系，他們也承認這三項選擇都會撼動世界體系，然而他們也懷疑這些選擇會不會導至平等與自由。平等與自由，南方左派和北方左派一樣擁護。

進入21世紀上半葉之際(即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陷入完全且尖銳的危機之時)，面前一個嚴肅而答案未定的問題是，具備新戰略與新議程的新的轉化運動事實上會不會浮現。相當可能，但決非確定。理由是，目前為止，還沒有人為第三世界提出新的戰略與議程來取代已經死亡的威爾遜／列寧戰略。威爾遜／列寧戰略是社會主義者與民族主義運動在19世紀用來獲取國家權力的那套戰略的延伸。

這，正是世界左派面臨的一項非常具體的挑戰。世界左派如果不嚴肅回應或從速回應，則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在今後50年崩潰後，將會由一個和它一樣壞的東西取代。無論怎麼說，從現在開始，北南對抗都將位居世界政治鬥爭的中心，因此，也將是歷史社會科學家與政治科學家分析的中心。

第二章

和平、穩定與正當性：

1990-2025/2050

1990年到2025/2050年階段，可能短缺和平，短缺穩定，短缺正當性。部分原因是美國作為世界體系霸權的力量式微，更大原因世界體系自身的危機。

世界體系中的霸權，意思是一個強權占有一種地緣政治位置，能使權力的社會分配遵守一套穩定的連鎖來進行。這帶來一個和平周期，亦即基本上沒有軍事鬥爭——不是完全沒有軍事鬥爭，而是說沒有強權之間的軍事鬥爭。這樣一個強權周期需要正當性，並且同時產生正當性。這裡說的正當性，意指主要政治角色(包括各國人民之類無定形群體)覺得當前的社會秩序是他們贊同的一種秩序，或者，世界(歷史)正穩定、迅速走向一個他們將會贊同的方向。

在現實霸權的周期裡，霸權將其意志與「秩序」課加於其他強權的能力沒有受到嚴重的挑戰。這樣的周期在現代世界體系的歷史上一直都是相當短的。據我所見，這樣的周期只有三例：17世紀中葉的聯合省，19世紀中葉的聯合王國，20世紀中葉的美國。依照上述霸權定義，三者的霸權都大約持續25到50年。¹

這類周期結束時，亦即原有霸權變成只是許多強權之一時（即使它繼續還是列強中軍力最強的），接下來很明顯就是穩定度減少，正當性連帶減少。這表示和平也會減少。在這層意義上，美國霸權之後的當前周期，基本上無異於19世紀英國霸權之後或17世紀荷蘭霸權之後的時期。

不過，1990-2025年、1990-2050年或1990-?周期的意義如果只此而已，那麼，除了視之為如何來處理一個搖搖欲墜的世界秩序的技術問題，實在不值得多費討論（已有太多討論此事的政客、外交人士、學者與記者視之為技術問題）。

世界在未來半世紀裡的重大失序，其動力其實是大有可說的。邦際的地緣政治現實，其基礎不單單在於，或基本上並不在於我們稱為強權的那些主權國家的軍事強權關係——這些國家夠大，財富也夠，具備發展嚴肅軍事能力所需的歲入基礎。

1 華勒斯坦，〈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歷史上的三個霸權例子〉(The Three Instances of Hegemony in the History of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收入《世界經濟的政治：國家、運動及文明》(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Economy: The States, the Movements, and the Civiliz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頁37-46。

首先，只有一些國家富裕到足以擁有這樣的稅基，這財富與其說是他們軍事力量的來源，不如說是其結果，雖然兩者之間是一種循環補強的過程。這些國家相對於其他國家的財富既是他們幅員的一種功能，也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軸心式勞動分工的一種功能。

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是一套不平等分配的體系，基礎是某幾種生產（因為相對壟斷而享受高度利潤的生產）集中於某些地區，這些地區因而成為最大資本累積之所。這種集中，促成國家結構之補強，經過如此補強的國家結構反過來又尋求維持相對壟斷。由於壟斷在本質上就是脆弱的，因此，在現代世界體系的整個歷史上，這些集中的中心所在一直有著斷續但持恆、有限但重大的變換。

這變換的機制就是周期循環，其中兩個周期最重要。孔德拉季耶夫周期大約50年到60年一循。其A階段基本上反映出特定經濟壟斷能夠保持的時間長度；B階段是生產的壟斷由於涸竭而在地理上變換位置的階段，以及鬥爭搶奪新壟斷的階段。比較長的霸權周期，是兩個主要國家鬥爭，爭相成為資本累積的主要所在，從而成為原先霸權的繼承者。這是一種漫長的過程，最後要靠軍事實力來贏得一場「30年戰爭」。一個新霸權一旦臨朝稱制，其維持就需要財經大手筆，這最後又無可避免導至這個霸權相對式微，以及一場接班戰爭。

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結構的這種反覆改造，以及其中心的反覆更換，過程徐緩但相當確定。強權的興衰，過程與企業的興衰多多少少相同：壟斷獨占維持一段長時間，但終於會正好自

毀於維持壟斷的那些措施。隨後的「破產」是一種清洗機制，為世界體系除掉動力已經耗盡的強權，代之以新血。整個過程裡，體系的基本結構維持不變。每個權力壟斷都維持一段時日，但就像經濟壟斷，為了維持壟斷而採取一些措施，最後即為這些措施所壞。

一切體系(物理、生物、社會體系)都靠這類循環來恢復最起碼的平衡。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顯然是一種強勁的歷史體系，至今已欣欣發達約五百年，以一個歷史體系而論，算是相當長久。但體系有其周期韻律，也有其百年趨勢，而百年趨勢往往激化矛盾(一切體系都含有矛盾)。矛盾到了一定程度的尖銳化，就導至愈來愈大的起落波動。用新科學的語言來說，就是渾沌開始。渾沌導至分叉。分叉確定會發生，唯形狀無法預測。一個新的體系秩序將由此浮現而出。

問題：我們生活其中的這個歷史體系，即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是不是已經進入或正在進入這樣的渾沌期。以下權衡各項論點，忖度這渾沌可能出現的形式，並討論我們可以採取的行動。

我不打算冗長討論可以視為孔德拉季耶夫B階段或霸權B階段之「正常」反應的那些成分，而是只加以扼要綜述。²但我

2 此處扼要綜述的各點，在過去十五年的許多論文中都有比較，長篇的評論，其中一個不錯的集子是華勒斯坦的《地緣政治與地緣文化：論一個變遷中的世界體系》(Geopolitics and Geoculture: Essays in a Changing World-Syst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要說明，一個霸權周期比一個孔德拉季耶夫周期要長很多，但一個霸權周期的迴折點和一個孔德拉季耶夫的迴折點是一致的(當然，不是個個如此)。以此處而論，那個點約當1967-73年。

一個正常的孔德拉季耶夫B階段的徵候包括：生產的成長減緩，人均世界生產可能也下降；失業率上升；利潤重點相對移轉，由從生產活動獲利轉向以操縱金融獲利；國債上升；「較舊」的產業轉向工資較低地區；軍事支出上升；正式經濟中的實質工資下降；非正式經濟逐漸擴張；低成本食物生產下降；地區之間的移民日益「非法化」。

霸權開始式微的徵候包括：「聯盟」強權的經濟力量增加；通貨失穩；在世界金融市場上的威權降低，新的決策中心崛起；霸權國家財政發生危機；世界政治兩極化與緊張——並且使之維持極化與緊張——的原則式微(此處，這原則是冷戰)；人民投入性命以維持霸權的意願降低。

前面說過，凡此種種，都是「正常」之事，從歷史觀察，是可以預料之事。以「正常」的周期循環過程而論，現在應該發生的是取代結構之興起。五至十年之內，我們應該進入一個以新的領先產品壟斷、新的集中重鎮為基礎的新的孔德拉季耶夫A階段。日本是最顯著的重鎮，西歐次之，美國第三(可能是勉強的第二)。

我們也會看到新的霸權競爭開始登場。美國的地位緩慢但明顯崩潰之際，兩個有意接班者摩拳擦掌。以當前情勢來看，兩個有志接班者只可能是日本與歐洲共同體。依照前兩次繼承的模式——英國與法國競爭繼承荷蘭、美國與德國競爭繼承英

國——我們在理論上應該預期，不是立即，而是今後50至75年內，海／空強權日本將會把原先的霸權美國轉化成其次級夥伴，並且開始與陸基強權歐洲共同體競爭，這鬥爭的極致將是一場「30年(世界)戰爭」，日本可能獲勝。

我應該立即說明，我並不預期此事發生，或者，我並不十分預期。我認為，兩個重組過程——世界生產體系的重組與國家權力的世界分配的重組——已經開始，而且是朝「傳統」(或「正常」，或原先)模式的方向開始。但我預料，由於新過程或新媒介出現，這過程將會被中斷或轉向。

爲了清楚分析這一點，我想我們需要三個時段：今後數年、其後25至30年，以及再後面的時期。

今天，也就是1990年代的情勢，相當「正常」。當前情況還不是我說的渾沌，而是孔德拉季耶夫B階段的最後尖銳小段(或頂點)，可以比擬於1932-39年、1893-97年、1842-49年或1786-1792年。全世界失業率高，獲利率低，金融市場不穩，反映著金融市場對短期波動的尖銳神經質，一種其來有自的神經緊張。社會不安增加，反映了政府在政治上沒有能力提供短程的解決，因而也沒有能力重新創造安全感。在國內尋找代罪羔羊及國與國之間以鄰爲壑，在政治上都成爲很吸引人的作法，因爲通常的調整辦法所提供的立即減痛效果似乎微乎其微。

在這過程中，許許多多企業減產、改組或破產，其中不少再也開不了業。特定的幾群工人與特定一些企業家將因此而永遠失利。所有國家都吃苦頭，但遭遇困難的程度有很大差異。過程未了，有些國家的經濟力量將會已經上升，有的已經下降。

在這些時刻，強權由於內部政治失穩、財政困難(因此不願再忍受軍事成本)，以及專注於應付立即的經濟兩難式(導至人民偏向孤立主義)，在軍事上經常陷入癱瘓。南斯拉夫崩潰而發生戰爭時，世界的反應就是這種癱瘓的典型例子。我認爲這是「正常」的，亦即，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一種可以預料的運作模式之一。

正常而論，我們應該進入一段復原期。經過浪費(奢侈的消費主義與生態上的疏失)和無效率(工會爲減少失業而要求資方額外雇人、議員相互勾串通過議案，或官僚僵化)之後，精簡而靈活的，新的獨占領先產業將會有一陣新的動力衝刺，配合新開發的購買者來加強整體需求——簡而言之，世界經濟體系重新擴張，走向一個新的「繁榮」紀元。

三個重鎮將是美國、西歐與日本。此點前文已經提過，一般也廣泛承認。這下一個孔德拉季耶夫A階段的第一個十年裡，三個中心無疑將展開激烈競爭，爲其產品爭取優勢。如布萊恩·亞瑟(Brian Arthur)所說，贏家並非勝在技術效率，而是勝在實力。³以力勝人之外，也可以理服人，但在本文所說的情

3 見亞瑟，〈科技競爭，報酬率增加，以及被歷史事件鎖定〉(Competing Technologies,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刊於《經濟期刊》(*Economic Journal*)XLIX, no. 394 (Mar. 1989)，頁116-131；亞瑟、厄莫里耶夫(Yu. M. Ermolov)及卡尼歐夫斯基(M. Kaniovski)合著，〈因搬遷程與宏觀結構之浮現〉(Path-Dependent Processes and the Emergence of Macro-Structure)，刊於《歐洲運作研究期刊》(*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 Research*)XXX (1987)，頁292-303。

況裡，理大致是力的一種功能。

這裡所說的力，基本上是經濟之力，但也以國家力量為後盾。當然，這構成一種自我補強的循環：一點點力，導至一點點理，然後又創造更多力，以此類推。一個國家將自己推到領先之勢，然後借勢使力。到某一程度，就會跨過門檻。Beta產品失勢，就有VHS的壟斷。我的看法很簡單：日本將會有比歐洲更多的VHS，美國企業則與日本企業打交道，在這個大餅裡分一塊。

美國企業家全力投入，例如在2000到2010年之間談成這樣的安排，得到的將是不至於完全落單。日本藉此安排，所獲也同樣明顯，其中三項特別值得一提：1、美國如果是夥伴，就不會是競爭對手；2、美國仍然將是最大的軍事強權，日本基於許多理由（近世歷史及其對國內政治與區域外交的衝擊，加上低度軍事支出的好處），在軍事上將會暫時寧可依賴美國，作為盾牌；3、美國仍然擁有世界經濟裡最好的研究與發展結構，即使這項優勢終必消失；日本企業利用美國這結構，將能削減成本。

歐洲共同體面對這種大聯合，將會把共同體內部之間的爭執暫置一旁。歐洲共同體正在EFTA（歐洲自由貿易協會）納入，可是**不會**納入東／中歐（除了設置有限的自由貿易區，類似墨西哥與美國之間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

歐洲（即歐洲共同體）將會構成第三個經濟巨體，成為日美集團的嚴重競爭對手。世界及其他部分則與這個雙極世界的兩極發生各種程度不一的關係。從兩大經濟權力中心的觀點看，有三個因素可供判斷這些國家的重要程度：這些國家的產業對

關鍵商品鏈的運作的重要性；這些國家是否能維持其對（兩極集團）獲利最高的生產部門的需求；這些國家滿足戰略需求的程度（地緣軍事位置與／或實力、關鍵原料等等）。

尚未被大幅或充分整合於正在創造的兩張網絡之中、但基於上述三大理由而必須整合於這些網絡之中的，是中國與俄國——中國整合於日美集團，俄國整合於歐洲共同體。這兩個國家要被整合的話，必須維持（俄國是必須先獲致）一定層次的內部穩定與正當性。這兩國能不能做到這一點，或者能不能在有利害關係的他造協助之下做到這一點，仍在未定之天，但我相信甚為可能。

假定這幅圖像正確：一個雙極世界經濟浮現，中國是日美極的一部分，俄國是歐洲極的一部分。再假定，在新的壟斷領先產業基礎上，世界經濟從2000年至2025年出現新的，甚至巨大的擴張。屆時會是何種情況？會不會是1945至1967/1973階段的重演？30年的世界繁榮、相對和平，以及最重要，對未來的高度樂觀？我不認為。

兩個階段將有好幾項明顯差異。第一，也是最明顯的差異是，我們將會進入的，是一個雙極而不是單極的世界體系。將1945至1990年之間的世界體系界定為單極世界，並不是通行的看法。單極看法抵觸這個世界有兩個超級強權在進行「冷戰」的看法。不過，由於這冷戰是以兩個彼此說通的對手之間達成的安排為基礎，亦即雙方同意凍結地緣政治強權關係；又由於這地緣政治上的凍結向來不曾被其中任何一方嚴重違反（儘管雙方不厭公開宣布彼此充滿衝突），因此，我寧可將之視為一種

兩造密切配合的(因而極為有限的)衝突。實際上,是美國的決策者在發號施令,蘇聯的決策者必定不時感受到這種現實壓力。

相形之下,在2000-2025年,我預料日美集團或歐洲共同體都不能夠單方面發號施令主控全局。雙方的經濟與地緣政治實力將會十分平衡,在邦際機構的投票這類基本而不太重要的事情上,將不會出現自動多數,甚至要形成多數也不容易。這場競爭可能不會有多少意識型態成分,競爭的基礎將可能幾乎完成是物質上的自利。但衝突未必會因此而變得比較不尖銳,甚至反而會更難用一些象徵性的動作來縫補。這衝突在形式上比較少政治化,在實質上可能變得更像黑手黨。

第二項重大差異在於,2000至2025年,世界上的投資流向,其集中於中國與俄國的程度,可能類似1945到1967/1973年往西歐與日本集中的程度。不過,2000到2025年,剩下來投入世界其他地方的數量,必定因此有別於1945至1967/73年的數量。在1945-1967/73年,持續投資的僅有「舊」地區是美國。到2000-2025年,持續投資之地將必須含及美國、西歐、日本(以及韓國與加拿大等少數地區)。問題:你在「舊」地區投資,又加上在「新」地區投資之後,還會剩下多少可以投入世界其他地方?答案:當然比1945-1967/73年階段少很多。

對「南方」(無論如何界定)國家,這將造成一種相當不同於前的情況。1945-67/73年階段,南方確實分沾世界經濟擴張之利,至少分到麵包屑,到2000-2025年,卻可能連麵包屑也分不到。當前南方大多數地方都降低投資(孔德拉季耶夫B階段),

在前面這個A階段可能也不會增加,而是接續減少。然而南方的經濟要求不會變小,而是變多。原因之一:今天南方比50年前更知覺到核心地區的繁榮,也更知道南北之間的差距。

第三項差異與人口有關。目前,世界人口跟隨著它至今已依循了將近兩百年的基本模式走。一方面,人口有世界性的增長,助長人口的基本原因是,世界人口中比較貧窮的六分之五,其死亡率一直在下降(出於科技上的理由),生殖率則沒有這麼大的下降(由於缺乏充分的社會經濟誘因)。另一方面,富裕地區所占世界人口的百分比一直在下降,因為這些地區死亡率的下降遠遠不如較不富裕地區那樣急遽,其生殖率的降低卻遠過於後面這些地區(基本上,為了使中產階級的社會經濟地位達到最適狀態)。

這樣的組合已造成一種人口差距,與經濟上的南北差距平行(或許還超過經濟差距)。當然,這差距在1945-67/73年階段已經存在,但那時沒有這麼巨大,因為當時北方仍然有些文化上的因素阻礙對生育率設限,這些因素現在大致已經消除。2000-2025年的世界人口數字,將會反映出社會行為這種尖銳的差異。

我們可以預料的反應,將是真正巨大的由南向北移民的壓力。移民北方的推力不只來自願意接受城市低薪就業的人,更來自數目大幅成長的受教育人口。接受移民的拉力也會更大,一因核心地區出現雙極,二因這雙極分裂產生尖銳壓力,促使雇主雇用移民以削減勞力成本(移民無論擔任低技術人員或中級幹部,都有此效果)。

北方內部當然會有(而且現在已經有)尖銳的社會反應——要求更具壓制性的立法，以限制入境，並且限制獲得進入者的社會政治權利。結果可能是最糟糕的事實妥協：沒有能力有效防止移民進入，但有能力使移民淪於二等政治身分。到2025年，在北美、歐洲共同體(甚至日本)，界定為「南方」身分的人口很可能達到25%至50%，在某些地區及大型都市中心，百分比甚至將會更高。但是，由於其中許多人(也許大多數人)將不會享有投票權(而且至多只享有有限的社會福利)，因此，從事最低薪城市工作者(屆時都市化將達到新高)同時也會是被政治(與社會)權利拒絕者。19世紀上半葉，英國與法國就是如此情況，造成時人擔心所謂危險階級會把國家拖垮。當時，工業化國家發明了自由主義國家來克服這種危險，擴大選舉權，並且提供福利國家措施，以安撫人民。2030年，西歐／北美／日本可能淪入1830年英國與法國的情況。「第二次就是鬧劇」？

1945-1967/73年間的繁榮，與2000至2025年階段的第四項差別，將出現在核心地區的中層。這些中間階層是1945-67/73年階段的重大受益者，他們數目巨幅增加，生活水準巨幅上升，定義上屬於「中層」職位的百分比也急速上升。中級階層成為政治體系穩定所賴的一大支柱，而且是非常大的一根支柱。此外，熟練工人，亦即中層以下的經濟階層，其夢寐以求的就是有朝一日成為這些中級階層的一部分——途徑包括由工會支持提高薪資，讓子女接受更高的教育，以及政府協助改善生活水準。

當然，這樣的擴張，整體代價就是生產成本大幅上升，通膨，以及對資本累積造成嚴重擠壓。當前的孔德拉季耶夫B階

段產生了對「競爭力」及國家財政負擔的深重擔憂。在雙極競爭成長的A階段，此憂不會減少，只會增加。可以預料，核心地區將會持續致力在生產過程中(包括服務業)絕對、相對地削減中級階層的人數。當前削減預算的作法，屆時也會持續下去，而這作法終必威脅到所有這些中級階層。

削減中級階層，政治效應將會十分嚴重。中級階層受過教育、習於舒適之後，遭到降級威脅，不會消極接受身分收入的這種倒退。1968年的全世界革命，我們已見識過他們的利齒。為了安撫他們，1970到1985年出現經濟讓步。這些國家現在正在付出代價，這些讓步以後將會很難重演，如果重演，將會影響到歐洲共同體與日／美集團的經濟鬥爭。無論如何，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都將面臨一個立即的兩難式：要限制資本累積，還是要冒中層階級政治經濟反叛之險。兩種抉擇都很苦澀。

第五項差別出在生態限制上。資本主義作為一種歷史體系，其企業家打從開始就靠成本的外部化度日。其中一大外部化成本，是更新生態基盤，供不斷擴張的全球生產之用。由於企業不會自動更新生態基盤，又沒有一個(世界)政府來充分徵稅作此用途，世界經濟的生態基盤一直都在變小。世界經濟的最後也最大一次擴張，即1945到1967/73年期間，用完了剩下的餘額，綠色運動與全球關切環境，即由此來。

因此，2000-2025年的擴張將會缺乏必要的基盤。可能的結果有三。擴張將會胎死腹中，而引起世界體系政治崩盤。生態基盤被進一步掏空，超過地球在物理上所能忍受的程度，而導至全球暖化之類災難。第三，認真接受清理的社會成本、限制

使用及重生。

上述第三個結果在功能上是立即損害最小的一個。這條路如果是集體選擇之路，將會對世界體系的運作帶來立即壓力。清理可能犧牲南方，從而加劇南北差距，並且為南北緊張提供一個焦點非常清晰的來源，或者，北方分攤大部清理成本，這樣的話，則必然有損北方的繁榮水準。此外，無論成本由何方負擔，認真在環境問題上採取行動，都無可避免會削減全球利潤幅度（儘管環境清理本身將會成為資本累積的一個來源）。基於這第二項考慮，以及日美集團與歐洲共同體之間的激烈競爭，我們可以預料清理工作將會大作其弊，因而造成清理過程的無效率——這樣，就是淪回前兩個結果之一。

第六項差異在於達到世界體系百年趨勢的兩條漸近線：地理擴張與去農業化。理論上，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在1900年已擴張到包含全球。不過，當時就邦際體系而言是如此，要到1945-67/73年，商品鍊的生產網路才擴及全球。現在，則是兩者皆然。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在過去四百年來，一直在進行著去農業化的過程（有時稱為無產階級化，但此詞不大精確），後兩百年的去農業化過程速度逐漸加快。1945-67/73年，這過程更大步一躍——西歐、北美及日本變得更充分去農業化，南方局部如此，但亦甚嚴重。這過程大概將會在2000-2025年完成。

在歷史上，資本主義世界有能力向新的地理區域擴張，是其維持獲利率與資本累積的一項關鍵要素。這可以抵掉勞工階級政治權力與職場權力結合增長而產生的勞力成本上升。現在，如果再也雇不到因為尚未獲得政治或職場權力，而無法多

爭取一點剩餘價值的勞工階層，結果將是和目前生態涸竭一樣，對資本累積構成擠壓。一旦達到地理極限，人口又去農業化，削減成本的政治過程所造成的困境將會極為重大，導至了無儲餘。實質生產成本必定會全球上升，利潤因而必定下降。

未來的孔德拉季耶夫A階段，與過去還有第七項差異。這項差別與南方國家的社會結構和政治氣候有關。1945年以來，中層階段在南方的比率大幅上升。這上升不是難事，因為其比率在1945年以前還相當小。如果比率從人口的5%增加到10%，則比率就是加倍，再考慮人口的增加，絕對數目就是增加四或六倍。由於這裡人口占世界50%到70%，這比率是非常巨大的一群人。要讓他們享有他們覺得他們起碼有資格享受的消費水準，成本極高。

此外，在1945-67/73階段，這些中級階層，或本地幹部，大致都忙著致力「去殖民化」。南方那些1945年還是殖民地的地區（幾乎包括整個非洲、南亞與東南亞、加勒比海地區及其他地方），明顯都是如此。「半殖民地」（中國大陸、中東一些地區、拉丁美洲、東歐）幾乎也是如此，這些地方出現心理上相當於去殖民化的各種「革命活動」。本文沒有必要評價這些運動的品質或存在意義，提示其兩個特徵即可：這些運動消耗相當數目人的精力，尤其中級階層的精力。這些人滿懷樂觀，恩克魯馬（Kwame Nkrumah）一語道盡他們的心情：「先尋找政治王國，一切將隨之而至」。實踐上，這表示南方的中級階層（和潛在的中層階級）願意耐心忍受他們的弱勢經濟地位：他們覺得，如果能先在大約30年內獲致政治力量，他們或他們的子女將會在接下

去的30年裡獲得經濟報酬。

2000-2025年，非但不會有「去殖民化」運動來讓這些幹部忙碌並維持他們的樂觀主義，他們的經濟狀況幾乎還確定將會更加惡化，理由已如上述（投資集中於中國／俄國、南方幹部數目擴張、全世界消滅中級階層）。這些中級階層有些會逃往北方（即移民）。這只會造成留在南方者的日子更不好過。

上一個與下一個孔德拉季耶夫A階段之間的第八項差異，也是最嚴重的差異，當然在政治：民主化上升，與自由主義式微。請記住，民主與自由主義不是雙胞胎，而是對立物。自由主義當初是爲了對付民主而問世的。催生了自由主義的課題，是如何圍堵危險階級，先圍之於核心，繼而堵之於整個世界。自由主義解決問題的辦法，是賦予勞工階級有限的政治權力，有限的經濟剩餘價值；勞工階級享受的政治權力與剩餘價值，不可以多到威脅到資本的不斷累積，或威脅到支持這種累積的國家體制。

自由主義國家與自由主義邦際體系的基本主題，是理性的改革主義，改革優先由國家經手。自由主義國家的這套公式——普遍選舉權加福利國家——在19世紀發展而來，功效神奇。20世紀，邦際體系上增加了一套可以與之並觀的公式，就是民族自決與未開發國家的經濟發展。但是，在世界層次上創造福利國家（布蘭德委員會鼓吹此事），卻沒有做到。要做到這一點，勢必損及資本累積的過程。理由相當簡單：核心國家內使用的公式，其成功有賴於一項隱而不見的變數：對南方的經濟剝削，結合反南方的種族主義。在世界層次，這變數不存在，邏輯上

也不可能存在。⁴

在政治氣候上，後果也很清楚：1945-67/73年是全球自由派改革主義的極點：去殖民化、經濟發展，以及最重要的，處處一派對未來的樂觀——西方、東方、北方、南方皆然。但是，在隨後的孔德拉季耶夫B階段，去殖民化完成之後，原本預期的經濟發展在大多數地區已成爲模糊的記憶，樂觀也消失了。再者，基於前述各項理由，我們無法預期經濟發展在未來的A階段裡重返南方，而且我們相信，樂觀之心已遭致命破壞。

同時，要求民主化的壓力一直在穩定成長。民主基本上是反權威與反威權主義的。民主，就是要求在所有層次的政治過程中擁有平等的發言權，並且平等參與社會經濟的報酬制度。對這股衝勁的最大限制一直是自由主義，自由主義承諾透過理性的改革實現必然的穩定的改善。至於民主要求平等，自由主義主張延後滿足。這不但是世界當權派裡開明那一半（即更有權力的那一半）的主題，甚至也是傳統反體制運動（「老左」）的主題。自由主義的支柱是它所提供的希望。這個夢如果萎縮（「像太陽底下一粒蘿蔔乾」），自由主義作爲一種意識型態也崩潰，那些危險的階級就會再度變得危險起來。

這似乎就是我們在下一個A階段，即2000-2025年，將會遇

4 關於這項努力及其失敗，本書另兩篇論文有所討論〈國家發展的觀念，1917-1989：輓歌與安魂曲〉（The Concept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1917-1989: Elegy and Requiem），與〈自由主義的崩潰〉（The Collapse of Liberalism）。

到的情況。這個階段在某些方面看起來可能興旺擴張，在其他方面卻將會十分不祥。此所以我預料這一階段裡，和平、穩定、正當性三者俱少。結果將是「渾沌」肇始，而這渾沌只是體系中的正常起落波動帶著累積效應擴大而成。

我相信將有一系列事情發生，而其中沒有一件是新現象。不同的是，世界體系不會有能力限制這些現象的突進，將體系帶回平衡。問題：這種無力將會達到何種程度？

(1) 國家維持內部秩序的能力大概會降低。內部秩序的程度向來有其起落，B階段則是有名的困難時刻；不過，就整個體系而論，過去四百到五百年裡，內部秩序一直在穩定增加。我們不妨稱之為國家性(stateness)上升現象。

當然，過去一百年，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內部」的帝國主義結構(大英帝國、奧匈帝國，晚近的美/俄)都已解體。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國家的歷史建構，其方式是將所有住在它們邊界以內的人變成它們的公民。大不列顛、法國、美國及芬蘭、巴西、印度皆然。黎巴嫩、索馬利亞、南斯拉夫及捷克亦然。後者的分裂或崩潰，與「帝國」的崩解大有不同。

邊陲地區國家性(stateness)的崩潰，你可以說是預料中事，也可以說在地緣政治上微不足道。然而此事與過去百年的趨勢是相反的，而且，太多國家的秩序崩潰，對邦際體系的功能也造成壓力。不過，威脅最大的，還是核心地區國家性的削弱。從自由主義在制度上的妥協——前文談過這類妥協——可見這削弱正在發生。國家面對安全與福利的要求，在政治上卻沒有能力滿足這些要求。結果是安全與福利逐漸私人化，而這正是

我們過去五百年來一直在脫離的方向。

(2) 過去數百年，邦際體系逐漸結構化與管理化，西發里亞和約、Concert of Nations，乃至聯合國，都是例子。這裡有個默識，說我們一直都在漸漸進入一個具備功能的世界政府。(前美國總統)布希帶這種陶醉的精神之中，暢談一種「新世界秩序」，不少人冷然以對。國家性所受的威脅，及改革主義樂觀心理的消失，其實已經動搖一套基礎向來脆弱的邦際體系。

核子擴散將會和由南而北的擴大移民一樣無可避免，而且將會同樣迅速。這事本身不是災難。中型強權大概不會比大型強權更不「值得信任」，他們甚至可能因為更害怕報復而更加審慎。但國家性式微而科技進步，局部的戰術核武戰爭的升高，還是不容易防堵。

意識型態逐漸無法解釋邦際衝突之際，一個虛弱的聯合國的「中立」更加令人懷疑。聯合國「維持和平」的能力本已有限，在這樣氣氛之下可能更加式微。「人道干預」可能被視為不過是19世紀西方帝國主義的20世紀版，19世紀帝國主義也是引文明以圖其說的。會不會有國家退出，許多國家，退出這種名義上普世參與的結構(如北韓退出國際原子能總署)？會不會有國家另起爐灶，另立組織別苗頭？可能性不能排除。

(3) 如果國家(與邦際體系)被認為失去功效，人們將轉向何處尋求保護？答案已經很清楚：「群體」。群體可以有許多標籤，如族裔/宗教/語言群體、性別或性取向群體，以及多種名目的「少數」。這也不是什麼新事，新的是國家本來是一座容納許多群體之家(即使各個群體地位並不平等)，如今，在作為

國家公民的身分與參與國家之外，這些群體本身成爲一種身分選擇。

問題出在信任。在一個失序的世界裡，在一個經濟充滿不確定與懸殊的世界裡，在一個未來沒有擔保的世界裡，我們要信任誰？昨日，多數的回答是國家，這是我們所謂的正當性，如果現今存在的不是國家，無論如何我們會在近期內希望成立國家！國家有廣大的，發展的形像，而群體有保衛，恐懼的形像。

同時(難處就在這裡)，這些群體也是民主化現象的產物，也就是說，人們意識到國家有負期望，因爲自由主義下的改革是海市蜃樓，因爲國家的「普遍主義」在實踐上遺忘或壓制許多比較弱勢的階層。所以，群體不單是恐懼與失望加劇後的產物，也是平等主義意識提高後的產物，因此是非常有力的號召中心。這些群體的政治角色很難想像會很快變小，但它們由於結構上自我矛盾(既是平等主義，又一心自顧自保)，這角色擴大，可能相當混亂。

(4) 那麼，我們要如何防止南方對北方的戰爭，北方的少數對北方的少數的衝突？這些戰爭與衝突是這類「群體主義」的一種衍生物。誰具備做這預防工作的道德或軍事立場？誰願意將其資源投入此事，尤其屆時北—北戰爭(日／美對歐洲共同體)可能加劇而且大致勢均力敵？偶爾將會有人努力一下，但絕大多數人將會袖手旁觀，就像伊朗與伊拉克戰爭、前南斯拉夫發生戰爭、高加索發生戰爭，或美國貧民區戰爭時的情況。許多南—南衝突同時發生時，更將如此。

更嚴重的是，誰來限制北南之間的小戰爭？這些戰爭不是由北方發動，而是南方發動。不只發動，還是蓄意發動，作爲長程軍事對抗策略的一環。波斯灣戰爭不是過程的結束，而是其開始。人人都說美國獲勝，然而其代價是什麼？代價是洩露美國即使打小型戰爭，財政上也依賴他國出錢？代價是美國必須爲自己設定一個非常有限的目標：只能向敵人要求一個離無條件投降非常遠的投降？代價是讓五角大廈討論一個「勝利、維持、勝利」未來世界的軍事戰略？

布希總統帶著美國軍方打賭，如果只追求有限勝利，就不必耗費太多人命(或金錢)。他們賭對了，但五角大廈可能本來也認爲還是不要冒進爲妙。美國，甚至北方的總合軍力，如何能應付同時發生的好幾場波斯灣「危機」，難說得很。以世界經濟的模式而論，加上前文談到的2000-2025年世界社會結構演進，誰能大膽辯說不可能同時發生好幾場波斯灣「危機」？

(5) 最後還有一項不容低估的混亂因素——一場新的黑死病。愛滋病的病源，至今仍是一大爭議。這爭議已非關緊要，因爲愛滋病可能已經發動了一個過程：愛滋病已經促成一種新型肺結核復興，這新型肺結核的傳播將是自主傳播。下一步呢？這種疾病的傳播不但會將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一個長期模式倒轉過來(與此倒轉平行的，是國家性不斷增長及邦際體系不斷增強的模式被倒轉)，並且由於增加了國家機器的負擔，刺激了不寬容的氣氛，而助長國家性的進一步崩潰。這崩潰本身又會助長新病的傳布。

必須了解的關鍵重點是，上述變數裡那一個將會受到流行

病傳播的最大影響，無法預測。流行病減少食物消費者，但也減少食物生產者；減少潛在移民的數目，但也增加勞力短缺及對移民的需求。那一個變數將會較受影響？我們事後才會知道。這是分叉結果難判的又一例。

以上就是第二個時段，即進入渾沌周期的圖像。還有第三個時段，就是進入的結果，亦即新秩序。關於這個新秩序，因為極不確定，此處只能極簡而言之。渾沌的情況是人類的刻意干預會引起最敏感反應的情況。這話聽來弔詭，其實不然。與相對有秩序(相對已決定的秩序)的周期相反，渾沌周期正是人類的干預能相當另創新局的時候。

有沒有任何具備系統性、建設性遠見的干預者？我認為有兩個。其中一個志在恢復特權與階級，就是永恆的貴族香火的守護者。由於個別有力但缺乏集體結構——「統治階級的執行委員會」從來不曾開過一次會議——他們(如果不是同時聯合，就是前後相續)在體系發生危機時行動，因為他們察覺一切都已失控。這時，他們按照藍皮杜斯(Lampedus)原則行事：「為了一切不變，一切須變」。他們會發明什麼給世界，難說得很，但我對他們的智力和穎悟有信心。他們將會祭出某種新的歷史體系，而且他們可能有能力將世界推往其體系的方向。

與他們相制的，是主張民主／平等的人(我認為這兩個觀念密不可分)。在1789-1989年階段，他們以反體制運動的形式出現(「老左」的三個變體)，他們的組織歷史是一場巨大的戰術成功史，和同樣巨大的戰略失敗史。最後，這些運動落得挖不

成體制的牆腳，反而成了體制的支柱。

問題：現在會不會出現一批新的反體制運動，這些運動有一套新戰略，堅強並且靈活，足以在2000-2025年周期造成主要衝擊，而不至於出現藍皮杜斯(Lampedus)式結果。它們可能根本不會出現，出現而無法存活，或不夠靈活而沒有贏面。

因此，在分叉之後，例如2050年或2075年之後，我們只有幾件事是可以確定的。我們將不會再生活於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之中。我們將會生活在某種新秩序或某些新秩序、某個新的歷史體系或某些新的歷史體系之中。我們大概將會再見到相對的和平、穩定及正當性。不過，那會是比我們至今所知的更好的和平、穩定和正當性嗎？還是更加不如？這一點，我們無從得知，但也取決於我們。

第三章

非洲有什麼希望？ 世界有什麼希望？

希望消退，(美國)選民心中
湧起憤怒與憤世。

《紐約時報》，1994年10月10日

1952年在達卡，我初履非洲，接觸了殖民時代末期的非洲，一個民族主義運動逐漸出現並且迅速處處滋盛的非洲。我接觸之時的這個非洲，其人民，尤其年輕人，一派樂觀，相信未來一片光明。他們憤怒於殖民主義之暴虐，小而懷疑殖民強權的承諾，大而懷疑整個西方，但對自己重塑世界的的能力甚具信心。他們渴望擺脫任何監護，渴望自作政治決定，渴望自己提供公職人選，以及充分參與世界組織。

1952年，有懷抱，並且預期自己將會依照正義得所應得者，不獨非洲人而已。當時我們開始稱為「第三世界」的所有地方都如此尋求重獲民族自主。與此相似的情懷，也瀰漫歐洲各民族。連生活空前如意的美國也沾染這普遍的樂觀，而且也許可以說特別如此。

如今，也就是1994年，世界看來卻非常不一樣。非洲之年，1960年，好像是非常久遠以前的事。聯合國協助開發的那幾個十年，現在像個蒼白的笑話，非洲的悲觀(Afro-pessimism)成爲我們字典裡一個用之不窮的新字。1994年2月，《大西洋月刊》刊登一篇談非洲的文章，流傳甚廣。文章題目是「降臨中的無政府狀態」(The Coming Anarchy)，副題是「匱乏、犯罪、人口過多、部落主義和疾病正在如何迅速摧毀我們星球的社會質地」。

1994年5月19到30日，法國《世界報》(Le Monde)頭版刊出〈被劫的奈及利亞博物館〉一文，文章開頭，撰文的特派員使用了一個醒目的比較：

假想一下，大膽竊賊偷走德爾菲的Auriga或波提切里(Botticelli)的名畫「春」。這件事將會忙破全世界的打字電報機，而且在有線電視新聞網(CNN)黃金時段至少也會得到六十秒報導。1993年4月18、19日晚上，幾個不知名人從奈及利亞的國立伊夫(Ife)博物館偷走十二件珍品：十件陶土人頭、兩件青銅人頭，都是公認的非洲雕刻傑作。事過一年餘，這些珍藏仍未追回；竊賊仍然逍遙法外，而且

除了幾位專家知道，世界上其餘的人(奈及利亞民眾更不用說)懵然不知有此竊案。

1994年6月23日，《倫敦書評》一位評論家評Basil Davidson的新作，評論中指出，Davidson雖然以黯淡之筆刻畫「落空的獨立許諾」，卻還認爲非洲是個「希望的大陸」。評論者說，「無論Davidson看到的希望標誌是什麼，那些希望可能都是……非常勉強」的。評論者接著提出他自己的評估：「對許許多多在盜賊統治、專制統治、脫軌的解放運動——有時三者俱全——之下受苦受難的非洲人」，Davidson這本書裡並沒有多少慰藉。

就是這樣。從美妙的1957年(迦納獨立)與1960年(十六個非洲國家獨立，但我們要記住剛果危機)及1963年(非洲團結組織成立)，到1994年，世界上的報紙如果說曾經提到非洲的話，我們聽到的也不外乎索馬利亞是軍頭世仇相報之地，盧安達的胡突族和突奇族互相殘殺，以及阿爾及利亞(從前自豪又英雄的阿爾及利亞)回教徒割知識分子喉嚨。當然，好消息也有一個：南非在出人意表的和平過渡中脫離種族隔離政策，成爲一個全民有投票權的國家。我們紛紛祝賀，並且肯定希望新的南非不會跌跤。但我們也都屏息，唯恐好事不久。

這30年裡發生了什麼事，一個充滿希望的大陸落得在外人(以及許多它自己的知識分子)筆下，幾乎和19世紀一樣負面？立即可提的有兩點。一是對非洲的負面地緣文化描述並不是新鮮事，而是重現歐洲人過去至少五百年來，亦即整個現代世界體系的歷史，對非洲的觀察模式。1950年代與1960年代使用的

樂觀、正面措辭是例外，因而只是一時的。第二點是，1960年代到1990年代之間，改變的不是非洲，而是整個世界體系。我們除非先分析整個世界體系過去50年來的改變，否則無法嚴肅評估非洲今天的狀態或可能的發展。

聯合王國在1870年代開始式微，德國與美國競爭繼承其霸權，這場漫長的競爭（一種「30年戰爭」）隨軸心國家1945年戰敗結束。大英帝國不再有力量單方面決定世界秩序與世界商業的規則後，出現強權相峙之局，對非洲的殖民征服是這種局面的副產品。

這場30年戰爭，美國贏得「無條件」勝利，在1945年獨霸世界體系，其巨大的生產工具不但當時舉世最有效率，也是唯一完好無損的（未遭戰爭破壞）。其後25年，是美國在世界三個地理區域鞏固霸權角色的故事，這三個地區由美國界定：蘇聯勢力範圍、西方及第三世界。

美國在經濟上毫無疑問遙遙領先競爭者，在軍事領域則不然。蘇聯是第二個超強（雖然有人說決不足與美國分庭抗禮），而且蘇聯以馬列主義的形式，以與威爾遜主義對立的意識型態化身自居。

然而，在意識型態層次，馬列主義變成不是威爾遜自由主義之外的另一條路，而是威爾遜自由主義的一個變體。兩個意識型態其實共同信奉地緣文化的基本信條。雙方至少共同遵守六大方針與世界觀，只是有時使用稍稍不同的表達方式：(1)雙方都代表民族自決原則；(2)雙方都支持所有國家的經濟發展，這經濟發展意指都市化、商業化、普羅化、工業化，彩虹盡頭

掛著繁榮與平等；(3)雙方肯定世上存在著放諸所有民族皆準的普遍價值；(4)雙方肯定科學知識（特別是牛頓式科學知識）為科技進步的唯一理性的基礎；(5)雙方相信人類無可避免而且可欲，為使這進步能夠發生，必須有強大、穩定、中央化的國家；(6)雙方表示相信民治，即民主，但他們所界定的民主，是由理性的改革專家主持所有基本政治政策。

這套下意識的意識型態協議，方便雙方依照雅爾達的條件瓜分世界權力，瓜分要義如下：(a)蘇聯對東歐（及分裂的中國、南北韓）享有事實上的宗主權，只要蘇聯將其宗主名分局限於這些地方；(b)雙方相互保證歐洲不發生戰爭；(c)雙方各自壓制激進反對現存地緣政治秩序的團體（在美區指「左派」，在蘇區指「冒進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這套安排並未造成意識型態鬥爭不可能或不可信，反而是推定必有意識型態的鬥爭，甚至助長這些鬥爭，而且大聲嚷嚷。但這意識型態鬥爭必須在嚴格限制內從事，雙方決不在各自勢力範圍以外從事規模充分的軍事介入。當然，這種安排還有一個要點，就是戰後重建中的蘇聯必須自求多福，不能指望從美國獲得任何經濟協助。

本文不是檢討冷戰歷史之處，這裡只須指出，1945到1989年，美蘇雙方基本上相當細心遵守以上勾勒的協定。每當其內容面臨不在兩大超強直接控制內的力量威脅，雙方都想辦法約束這些力量，恢復雙方這套心照不宣的協定。這件事對非洲的影響非常清楚。到1950年代末期，蘇聯與美國基於理論上對普遍價值的遵奉，形式上採取了贊成去殖民化的立場。當然，實際情形則是兩強經常對特定國家裡不同的政治運動給予或明或

暗的政治與財務支持。然而，有個事實是，非洲屬於美區而不是屬於蘇區。因此，蘇聯每每嚴重自我限制介入的程度，1960至1965年剛果危機，1975年以後非洲南部出現獨立後失穩，都可見此點。反正，非洲的解放運動往往必須先自力求存，然後才能希望蘇聯甚至只是精神上的支持，美國更無論。

美國對其主要盟友——西歐與日本——的政策相當直截了當。美國大力協助這些盟友的經濟重建（主要通過馬歇爾計畫）。這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對美國都關係重大。經濟上的關係不難理解。產品如果沒有顧客，則製造世界經濟中最有效率的經濟機制，並無多大意義。美國需要西歐與日本經濟復原，作為美國產品的主要出口地。戰後時期，除開西歐與日本，其他沒有任何地區能扮演這角色。政治方面，兩大軍事聯盟，即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與美日協防條約，確保美國獲得兩項關鍵要素，加強其為了維持其世界秩序而建立的結構：軍事基地遍布世界，以及一套自動運作而且力量強大的政治聯盟。

這套聯盟結構對非洲當然有其影響。西歐國家不只是美國的盟友，也是非洲主要的殖民強權。這些殖民國家對美國介入他們所謂「內政」，一律採取敵視。美國因此小心避免得罪這些盟友，在1945-60年間尤其如此，當時美國大致與殖民政府所見略同，認為遽爾去殖民化是危險的。但非洲解放運動仍然兼程前進。1960年，「橫掃而下的非洲解放」已完成一半。1960年標誌著一個轉捩點，因為這「橫掃而下」已到達剛果，到達政治與經濟上抵抗去殖民化的核心地區，即屯墾採礦的重鎮，南部非洲。所謂剛果危機就此爆發。一年之內，不但剛果境內，不

但獨立的非洲國家之間，連同整個世界，都有了兩邊（其實是兩邊半）。結果如何，人人知道。魯孟巴（Lumumba）被暗殺，部眾被鎮壓。沖柏（Tshombe）和卡坦加（Katanga）也被壓平。莫布圖上校（Mobutu）主宰薩伊，至今在位。剛果危機也改變了美國在非洲的地緣政治立場，促使美國從此在非洲扮演直接角色，在一切重要問題上都不再遷就（前）殖民強權。

美國希望1945年以後的殖民世界（大體而言，非歐洲世界）出現的，是徐緩、溫和的政治變化，以利所謂具備民族主義資歷但立場溫和的領袖掌權，這樣的領袖將會繼續使其國家參與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商品鏈，並且下工夫加強這種參與。蘇聯的官方立場則是贊成進步而「社會主義」導向的勢力掌權。實際上，前面提過，蘇聯對這些勢力的支持是半冷不熱的，他們1945年對中國共產黨慢半拍協助，遲遲不支持阿爾及利亞獨立運動，以及古巴共產黨支持巴提斯塔（Batista）到1959年，都是例子。

美國與蘇聯都沒有料到歐洲以外世界的民族解放運動如此強烈。所有激進的民族主義起事都被鎮壓——在馬來亞、菲律賓、伊朗、馬達加斯加、喀麥隆，以及美洲多個國家，一一如此，但是，這些運動即使被壓平，也仍然推動了去殖民化提前發生。

解放戰爭極為強大，終而勝利的，有四個國家，即中國、越南、阿爾及利亞與古巴。這四處的解放運動都拒絕接受美國維護而蘇聯默認的遊戲規則。

這四個案例的細節各有不同，因為他們的地理、歷史及社

會力量的分布各各有別，但四者都有以下共同特徵：(1)他們勇猛追求政治自主，掌權而逼使世界體系的強權接受他們；(2)他們宣布他們對現代性與國家發展有信念；(3)他們尋求掌握國家權力，作為社會轉化的先決條件，一旦掌權，則建立強大的國家，使人民充分承認他們的正當性；(4)他們相信自己騎在歷史進步的浪頭上。

到1965年，萬隆精神似乎已經征服世界。除了非洲南部，民族解放運動處處掌權，南部非洲也開始出現武裝鬥爭。這是個奇怪的情況。美國從來不曾像此時這樣主控局勢，主宰一切，然而反體制運動也從來不曾像此時這般壯盛。那是暴風眼那種平靜。非洲早初已見警兆。1965年，所謂卡薩布蘭加集團，亦即那群較為黷武好戰的國家，一些象徵人物傾覆：迦納的恩克魯馬(Nkrumah)，和阿爾及利亞的班·貝拉(Ben Bella)。同年，羅德西亞屯民宣布UPI(單邊獨立宣言)。在美國，大學教授首度為抗議越南政策而接力演講。1966年，中國文化大革命開始。驚天動地的1968年已經在望。

1968年初，奠邊攻勢成為美國無力贏得越戰之兆。2月，馬丁路德遇刺喪生。4月，1968年世界革命開始。其後三年，世界處處革命：北美、歐洲、日本、共產世界、拉丁美洲、非洲、南亞。各地的革命表現當然各有不同，但有兩個共通主題，使這些起事成為一個世界事件。第一個共通主題是反對美國霸權(主要象徵是反對美國在越南的角色)。第二個共通主題是對所謂「老左」發生深刻的幻滅，對其三大變體都幻滅：西方的社會民主黨、共產黨、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運動。1968年的革命

派看出「老左」的反體制既不充分，也沒有效果。甚至可以說，在1968年革命分子眼裡，首要惡棍不是美國，而是老左。

作為政治事件，1968年的世界革命可說是暴起暴熄。到1970年，只剩餘燼——大多是毛派革命黨。到1975年，連餘燼也被踩熄。然而革命留下了久遠的衝擊。高踞地緣文化意識型態王位的改革主義的、中間路線的自由主義，被這場革命除去正當性，這場革命將自由主義貶為只是眾多彼此競爭的意識型態之一，左邊右邊都有強大的力量。這場革命使各地世人不復寄望國家為社會轉化的工具，並且摧毀所謂進步是必然之事的樂觀主義。這樂觀主義的最後化身——它自己如彗星般竄起的歷史——也逐漸熄滅。

1968年事件發生之時，正值世界經濟進入我們至今尚在其中的孔德拉季耶夫B階段。就像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整個歷史上一再發生的情況，領先部門的高獲利再度結束，基本原因則是由少數公司相對獨占的局面被打破，被高獲利率吸引的新生產者不斷進入市場，而且通常都獲有半邊陲國家政府支持；全世界獲利率劇降，本來就是可以預料之事，原因包括：領先部門的重鎮減產及裁員，因而減少從邊陲地區進口原料；進一步將產業移向半邊陲地區，以降低勞力成本；核心地區的國家之間發生尖銳競爭，爭相把負面負擔轉到對方身上；加上一個重大轉變，就是投資者從在生產上追求利潤，轉為在金融(投機)活動中獲利。

在這個B階段裡，引起世人注意到經濟停滯(但決不能說引起這停滯)的兩大事件，是1970年代OPEC(石油輸出國家組織)

石油漲價，及1980年代的外債危機。這兩件事對南方的影響當然特別負面，對非洲尤然。其中牽涉的政治／經濟調整機制，值得討論。

1973年，過去十多年一直沉睡，沒有多少人知其存在的OPEC突然宣布油價大幅上漲。這件事有幾個層面必須一提，整個孔德拉季耶夫A階段，即世界生產不斷擴張期間，油價一直都相當的低。就在世界經濟開始陷入麻煩，各地生產者都想辦法削減價格或降低成本以便產品在緊俏的市場上能夠賣出之際，產油國漲價，而且不是小漲，效應當然就是全世界幾乎所有生產過程的成本都跟著提高，因為石油是所有生產的間接或直接要素。

這漲價行動，道理何在？有人會說，這是石油輸出國家聯合行動，利用西方世界經濟削弱之勢，使世界剩餘價值的分配改變成對他們有利。此說可以解釋OPEC當時政府激進的會員國，如阿爾及利亞或伊拉克，何以推動這項行動。但是，產油區面美國兩個最親密的盟友——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為什麼非但不是只跟著走，反而帶頭促成OPEC聯手漲價？再說，如果行動目的是要撥正世界剩餘價值的分配，其立即結果為什麼卻是造成世界剩餘價值更多跑進美國公司手裡？

我們且來看看，油價突然劇漲，會發生什麼事情。由於對石油的需求很難迅速減少，這就會產生好幾件事。產油者的營收上升，而且大大上升。售出的石油即使減少，營收也上升，因為價格很高。石油售量減少，意指世界現下生產減少，但這其實是個正數，因為1960年代的領先部門曾經生產過量，解雇

產業工人變成更正當。

對邊陲地區的非產油國——例如大多數非洲國家——油價上升是很沉重的打整，進口石油漲價，生產過程裡石油扮演重要角色的工業產品——前面說過，這幾乎指一切生產而言——的進口價格也上升。與此同時，出口量，以及出口單位價格卻下降。非洲國家（少數例外）的國際收支平衡當然受到嚴重擠壓，人民面臨生活水準降低及政府服務惡化。他們十多年前在辛苦奮鬥之後獲得獨立，獨立的結果卻是如此，他們自然不會滿意，於是起而反對他們先前那麼堅強支持的那麼運動，目睹精英分子腐敗又享受高度生活水準的話，特別不能容忍。

油價當然不是針對非洲人上漲；石油處處漲價，包括在美國。這是長期通膨過程的一環，通膨自有許多其餘肇因。石油漲價（本身是世界經濟停滯的結果而非原因）的作用，是創造一個大漏斗，將世界剩餘價值一大部分漏入其收銀機。這營收作何用途？一部分由產油國當作租金收入，供少數人奢侈消費之用。這筆營收也暫時改善了一部分公民的所得水準，並且使這些國家能改善基本設施及從事大規模軍事採購。後一用途的社會用益不如前一用途，例如它在1980年代使伊朗與伊拉克能夠交戰，虛耗人命與資本。但兩種開支——基本設施與軍事採購——都幫北方國家能決部分經濟困境，因為這些東西是從北方國家進口。

不過，產油國內部花用只占漲價營收的一部分。另外一大部分歸於「七姊妹」（Seven Sisters），此即西方那些石油公司，這些公司不復控制石油生產，但繼續控制全世界石油的提煉與

配銷。這些公司如何運用這一大筆暴利橫財？由於缺乏有利可得的生產出口點，他們將這筆錢的一大部分投入世界金融市場，推動了過去20年裡令人難以置信的通貨雲霄飛車。

以上種種，還用不完大筆集中的世界剩餘價值。剩下的，放到銀行裡，美國銀行吸收最多，而歐洲銀行也不少。銀行用這筆錢放貸圖利。現在，這些銀行有了大筆額外之財存進來——就在新的生產企業放慢步調之時。銀行放貸，貸給誰？答案一索即得：國際收支平衡陷入困境的政府——幾乎所有非洲國家、拉丁美洲與亞洲多數國家，以及幾乎整個所謂社會主義集團（從波蘭、羅馬尼亞、蘇聯到北韓）。1970年代中期，世界上的銀行將這些貸款塞給這些政府，這些政府抓住這機會平衡收支，稍稍減緩不快樂的老百姓帶來的立即政治壓力。類似的貸款連產油國也利用，他們沒有收支平衡之困，但急著花錢，追求所謂國家「發展」。西方國家正苦於世界各國無力購買他們的出口貨，就此這解決了難題。

要分析西方國家的情況，必須小心。評估1970年代發生並持續至1980年代的情況，方式有三。一是觀察全球各國的處境。全球諸國的成長率，較1945到1970年的孔德拉季耶夫A階段頗有下降，顯然絕對值持續增長。第二個方式，是評估各國相對的升降。美國使出渾身解數（而且由於依賴進口石油的程度不如西歐與日本，受OPEC行動影響較小，因此初期占了優勢），雖然有不斷的短期好轉，其經濟整體相對於西歐，尤其相對於日本，都是下降的。

第三個方式，是評估西方國家的內部剩餘價值分配。A階

段的模式雖然可以說是所得水平整體改善及極端稍見收合，B階段的模式卻是所得兩極化大幅增加。微小百分比的人情況甚佳，至少長期如此，我們甚至發明了一個新詞來形容他們——雅痞。但是，在這一小群人以外，國內貧窮卻顯著增加，相當大群中產階級掉落，中間階層其餘大多數人的實質所得也下降。這內部兩極化在美國與英國特別明顯，但西歐大致亦然，甚至日本也是。

談到這裡，應該提一提東亞，尤其因為東亞老是被說成成功開發的模範，說是值得非洲人取法。每當世界經濟發生停滯，整體利潤及生產活動的利潤受到擠壓，就有一個地理區，先前獲利能力並非頂尖的地區，情況特別好，成為全球生產大幅轉移的對象，使這地區受益於整個世界經濟的困境。1970年代以來，這個地區就是東亞——日本居首，其次是作為日本環帶的所謂四小龍，再其次（較為晚近）是東南亞國家。東亞何以成為受益地區，這裡不擬討論，只提兩點。政府扮演關鍵角色，建造必要的經濟架構，並由國家出面保護國內市場，此外，不可能有兩個地區同時獲致同樣的經濟報酬。東亞之外，另外某個地區可能也有此成長，但不可能由東亞與第二個地區同時共享。所以，在任何最近的未來，東亞都不可能是非洲可以學習的模範。

OPEC油價上漲，我談了這麼多，並非因為它是經濟困境的一個關鍵肇因。它不是經濟困境的關鍵肇因，只是世界經濟停滯產生效應的一段過程。此事非常明顯，將這機制細看一下，這過程就愈看得清楚。這件事也有助照見1980年代的情況，其

時油價已再度下跌，雖然沒有十分跌回1950年的水平，但世界又忘了油價牽動之廣。借貸的政府在1980年代嘗到苦果。貸款解決眼前的收支平衡問題，卻造成日後的收支平衡問題，因為償債支出在全國所得稅中所占比率上升了。1980年代以所謂外債危機為始，以所謂共產主義之崩潰為終，終始之間並非沒有關連。

「外債危機」出現於1982年，當時墨西哥——一個生產石油的國家——宣布無力償付債務，尋求重新談判其債務。實際上，外債危機是1980年首先浮現於波蘭。波蘭在1970年代大筆舉債，吉列克(Gierek)政府在1980年面臨償債問題，試圖以降低薪資水平，以求局部脫困。結果是團結工聯興起。波蘭共黨政府不待IMF開口，就使用IMF的藥方，反而深陷困境。IMF給所有類似處境的國家的建議(包括給非洲國家的建議)，是要他們削減支出(減少進口，減少人民的福利)，增加出口(壓低或降低工資，生產則由內需轉為生產一切在世界市場立即賣得出去的東西)。IMF逼人吞下這帖苦藥的武器是，對不能落實IMF政策的國家，所有西方政府都不給短期援助；債務危機之中的國家遭此處置，就面臨政府破產的下場。非洲國家一個一個向這壓力屈服。屈服最徹底的，則是1980年代唯一充分償還一大筆債的國家，那就是西奧塞古(Ceausescu)治下的羅馬尼亞。IMF大悅，羅馬尼亞人民則大怒。

非洲的「債務危機」演變成很多不堪的東西：饑荒、失業、基本設施大量惡化、內戰，以及國家機制解體。在非洲南部，由於南非的種族隔離政權實施種種不利穩定的方案，情況尤其

險惡。南非的種族隔離政權抗拒橫掃而下的非洲解放運動，且戰且走，使非洲解放運動1994年才打進約翰尼斯堡。不過，我們如果不將非洲在1980年代的嚴重困境放在更大幅的世界經濟圖像裡觀察，將會扭曲我們對這困境的了解。債務危機當然在別處也發生，而且，以總額而論，最顯著的是在拉丁美洲。第三世界(加上社會主義集團)的債務危機，意指這些國家再也借不到新的錢。的確，1980年代的金錢流向明明白白是從南向北流，而不是由北往南。

但是，為剩餘價值找個有利可得的用場，仍是問題，因為生產性的投資仍無充分有利的去處。1970年代的借貸者(包括非洲國家)崩潰，對這些借貸者無疑構成難題，但對放貸者也構成嚴重難題，因為錢總得借出去才行，1980年代出現了兩個重要的借貸者：世界上的主要企業，以及美國政府。

在企業世界，1980年代將會以垃圾債券與企業購併的時代留名。詳情如何？基本而言，是大筆金錢被投資於收購一些公司，收購之後，將那些公司大卸八塊，出售其有利可得者，其餘任其銹爛(並且在過程中解雇員工)。結果，這些公司不是增加生產，而是債台高築。許多企業公司與銀行因此破產。這些公司與銀行如果夠大，破產逼近之際，國家出面「拯救」他們，以免他們破產造成負面的政治與經驗後果。由美國的儲貸機構醜聞可以見得，最後是垃圾債券捐客平白拿走暴利，由美國納稅人支付巨額帳單。以美國的情形來說，公司債務產生的巨額帳單，又因為贖武的凱因斯主義造成的巨大債務，而更為惡化。雷根政府滿口華詞，實際正好相反，是擴大國家對美國經濟的

干預，以及擴大官僚體系。在經濟上，雷根削減較富有階層的稅賦（結果是國內貧富進一步兩極化），同時巨幅增加軍事支出（降低失業率）。但是，深入1980年代，美國向外舉債的結果，也陷入第三世界舉債而遭遇的同樣問題。但其中有個差別：IMF無力逼迫美國採行其政策，而在政治上，美國也不願採行IMF的政策。不過，在這過程中，美國的經濟地位相對於其如今壯大起來的競爭者（西歐與日本），已不斷降低，原因是美國的投資都以軍事為焦點。

在這關口上，發生了所謂共產主義的崩潰。前面已經指出，這崩潰的起點，即團結工聯在波蘭興起，是外債危機的一個直接結果。基本上，在世界經濟停滯之中，社會主義國家面臨的負面後果和非洲國家一樣：A階段的可觀成長率結束；實質生活水準下降，1970年代即使未降，1980年代也降；基本設施惡化，政府的服務下降；最重要的是，對當權政府的幻滅。這幻滅主要是針對政治壓制，但推動這幻滅的，是「發展」的承諾未能兌現。

就蘇聯而言，社會主義國家的問題因雅爾達的矛盾而變得更為複雜。前面說過，雅爾達協定是一種十分精密的安排。這協定讓人盡情就遙遠的未來作詞藻之爭，對當前卻有一套各方必須嚴格遵守的安排。要落實這種安排，雙方都必須強大足以控制各自的衛星國與盟國。1980年代的經濟困局，加上1956年第20屆黨大會之後，意識型態的凝聚力敗壞至今，蘇聯貫徹上述安排的能力已告折損。美國的軍事凱因斯主義構成壓力，逼使蘇聯囊中已空卻繼續開銷，情況更為不堪。然而，最大的兩

難困境不來自美國的軍事力量，而來自美國在經濟與政治上持續較弱。美／蘇關係有如一條拉緊的橡皮筋，美國這一頭的拉力一旦變弱，這關係就撐不下去。結果就是戈巴契夫為了救急，強行結束冷戰，脫離東歐，並使蘇聯在內部重新出發。結果事不可為——至少第三點不可為，蘇聯也就此不存於世。

蘇聯崩解，為美國造成巨大而且可能無望克服的困難。這件事取消了美國對其經濟勁敵西歐與日本僅剩的政治控制，而且雖然使美國因結束軍事凱因斯主義而不再增加外債，結果卻是使美國一直無法妥善因應的經濟發展問題變得更加巨大。國家主控的改革能夠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邊陲與半邊陲地區帶來大幅經濟發展之說，也因馬列主義崩潰而喪失最後的憑證。我所以主張所謂共產主義的崩潰其實是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的崩潰，道理在此。但自由主義作為地緣文化的支配意識型態（1968年已經受損，到1989年加上致命傷），一直是世界體系的一根政治支柱，是「馴服」「危險階級」（先是19世紀的歐洲勞工階級，然後是20世紀第三世界的人民陣線階級）的主要工具。對民族解放加上馬列主義這帖藥方的功效喪失信念之後，第三世界的人民階級沒有多少理由保持耐心，而且將會失去耐心。

最後，軍事凱因斯主義結束，對日本與東亞帶來非常壞的經濟後果，日本與東亞在1980年代的擴張，主要靠的是有能力借錢給美國政府，以及有能力參與企業購併的過程。因此，東亞奇蹟相對於美國仍然存在，但在絕對條件上已陷入麻煩。

1980年代末期這些戲劇化轉變，在非洲（在拉丁美洲與東歐亦然）有兩個特徵主題：市場與民主化。我們必須先解析這兩

點，才能觀察未來。對國家幻滅之後，「市場」相應而起，大受歡迎。問題是市場傳達兩個不同的信息。對某些人，尤其比較年輕的精英分子、原有的官僚及／或社會主義政客，市場代表1848年以前在法國響起的巨大吶喊——「先生，讓我們富有吧！」而由過去五百年的情況可知，使某些人成為「新富」，一直是可能的。

但是，就絕大多數人而言，他們轉向「市場」，目的並沒有任何改變。過去十年，非洲人(和其他地方的人)乞靈於「市場」，所追求的東西和他們先前乞靈於「國家」完全一樣。他們希望得到的，是彩虹盡頭那個金色的東西——「發展」。他們說的「發展」，實際上指的當然就是平等，生活像北邊那麼富足舒適，特別像美國電影裡那些人。然而這是個大大的幻覺。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裡，「國家」和「市場」都沒有辦法促進平等主義的「發展」。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指導原則是不斷的資本累積，而這累積的前提與後果都是實質所得更加兩極化。由於大多數人起碼的智力和知覺，「市場」的所謂神效不必太久就會被看破。

「民主化」和與之相連的口號「人權」，跟市場有沒有什麼重大差別？有，也沒有。首先，我們必須弄清楚何謂「民主化」。1945年以來，可以說沒有任何國家的立法機構不曾在幾近普遍選舉權的基礎上舉行定期選舉。我們都承認，這些程序可能毫無意義。我們希望的還更多。這更多是什麼？多黨競爭的選舉？真正而非名義上的競爭，正確計票而不作弊的競爭，公平而且結果不被宣布無效的競爭？如果增加這些條件才算是朝向「民主化」，我想我們是有一點進步的。不過，《紐約時報》透露，

日本過去四十幾年的執政黨，自民黨，一直定期收受中央情報局(CIA)補貼。睹此消息，我們大可懷疑，自由競爭的選舉，舉行起來徒具形式，是否可言民主化。

問題出在，民主化和市場一樣，有兩種十分不同的意思，一種與市場為富源之所相類，一種與平等主義的發展相類，「民主」的第一種意思投合一小群權勢之人，第二種意思投合數目較大但政治上較為弱勢的人。晚近這些年，多哥、奈及利亞、薩伊民主化的情況並不令人萬分振奮。也許有真正的發展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化，而發展在當前世界體系內既然是幻相，民主化可能也不會好多少。

那麼，我是不是在宣揚無望論？決不是！不過，我們必須先做明澈的分析，才能享有有用的希望。世界體系已經散了架。非洲散了架，但並不真的比世界其他地方嚴重。非洲從誇大的樂觀主義走進悲觀主義。世界也是如此。從1945年到1960年末，世界所有地方似乎都一天比一天好。196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幾年各地都開始轉壞，人們至少都開始三思他們先前失之輕易的樂觀主義。今天，我們驚恐、憤怒、對真實情況沒有把握，失去條理章法，這純粹是我們現有世界體系裡的深刻危機在集體意識中的反映。在這危機裡，傳統上用以解決正常周期性下滑的機制不再那麼有效，世界體系的走向已將體系「遠遠帶離均衡」。我們因此接近一個分叉(bifurcation)(借新科學的用語)，其結果本質上不確定，可能將我們推向好幾種彼此十分不同的方向。

我們如果要正視非洲的困境，則第一件事必須明白這些困

境何以並不是非洲專有。我們可以看看論者經常討論的非洲四種困境，然後將各個困境置於更廣大的脈絡裡觀察。首先是民族解放運動的崩潰。幾乎在每個國家，殖民時代都出現一個運動，這運動體現非洲人自主控制自身命運的要求，並且領導政治鬥爭實現這目標。這些運動是一股整合國族的力量，動員人民追求一個更好的生活和更平等的世界。它們反對國家內部分裂，但在世界體系內肯定民族與非洲文化。這些是現代化與民主化的運動，它們傳達著希望。

昨天，這些運動獲致它們民族獨立的基本目標。今天，這些運動無一完好存在，而且大多數根本沒有活下來。唯一真實的例外是南非的ANC（非洲民族議會），它在1994年達成其基本目標。這些運動在後獨立時代崩潰之後，並沒有其他政治力量來填補真空，也沒有任何其他政治力量有能力像早先那樣動員民族意識，而且放眼未來還看不出會有這種力量出現。

這話說來喪氣，然而是否唯獨非洲如此？民族解放運動在南亞與東南亞，在阿拉伯世界，在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地區的遭遇是不是強一點？一點也沒錯，地理上從易北河到鴨綠江，掌權的共產主義運動似乎並沒有絲毫好一點。再看看西歐，以及歐洲以外的白人屯殖區，又是不是真有差異？這些地方與非洲民族解放運動可以相擬的，是社會民主運動，這些運動也動員人民走上現代化與民主化的方向，在數十年鬥爭之後，大多也上台掌權。然而這些運動如今不也散了架，拒斥昔日的口號，不確定自己代表什麼，而且無力獲得它們曾經擁有的大眾情感支持？據我個人見解，這些運動的下場並無多大差異。

非洲的第二個困境有一部分導源於這些運動的崩潰。我們說它們崩潰，意思是它們喪失了群眾的支持。它們不再能夠動員任何人。動員者情況如何？他們是這些運動的幹部，是拜這些運動成功之賜而往上流動的階層——政客、官僚、知識分子。他們推廣民族解放大計，在許多方面，他們也是由此大計獲得最多利益的人。

運動開始崩潰，運動奮鬥爭取的目標似乎退到地平線以外之際，這些幹部似乎爭先上了岸，尋求了個人的救贖。意識型態上的奉獻已經消褪，民族主義鬥爭時期的無私已被拋棄，許多人競相搶食，誰有正當性，誰無正當性，難以分辨。

1990年代的非洲無疑就是如此。但是，已經失去理想的精英的這種金權貪腐是非洲獨有的嗎？我懷疑。拉丁美洲與亞洲可以看見同樣這種現象，在前共產主義世界也昭昭可指。只要看看報紙，就可以知道，非洲的貪腐比起義大利與日本、法國和美國天天出現的貪腐，真是相形失色。

造成這種亂象的不是高層貪腐，而是那些在中層階級1945-1970年間的世界性擴張中獲益的人裡，有極大比率在摩天輪1970年以後往下轉時從輪子上摔下來。這群社會上與經濟上先上升，然後往下掉的人，是造成政治劇烈失穩的一股力量，他們心情深刻的怨恨，訴諸各種反國家、道德主義及道德化運動來保障他們的身家，並且抒發他們的侵略性。然而這一點也不是非洲獨有的。比起在非洲，這問題在歐洲與北美遠更嚴重。

論者常說非洲面臨的第三個困局，是國家結構解體。賴比瑞亞與索馬利亞當然是這現象的最明顯例子。但我們必須從這

些刺目的例子更進一步，才能了解問題。民族解放運動崩潰而導致國家喪失正當性，是問題的第一個部分。原先的運動幹部因面臨向下流動的威脅而產生反國家情緒，是另一部分。然而最根本的問題還在於，民主化的要求不斷增長，而結構上沒有能力提供平等主義的發展。上文討論過，世界經濟停滯，造成國家資源緊繃。國家愈來愈連它們早先提供的那些不夠水準的服務也無力提供。一個惡性循環由此開始。國家歲入愈來愈無處籌措，維持秩序的能力日益下降。維持秩序的能力下降，人民轉向其他結構以求安全與福利，這轉向則使國家進一步削弱。

然而此事在非洲這麼明顯，唯一原因是國家建立之後，其國家性(stateness)這麼快就敗壞。看看全世界的情況，我們知道，過去五百多年來一直有個強化國家結構的大勢，這大勢在1960年代達於極頂，然後開始往相反方向移動。在北方，這件事的討論有各種標題：國家的財政危機；都市犯罪上升及自衛結構興起；國家無力防止外人流入；福利國家的結構受到裁撤的壓力。

最後，許多人指出非洲物質基本設施崩潰與危險的流行病趨勢。這當然是實情。公路系統、教育體系、醫院不成樣子而且繼續惡化，欲待補救，而錢無著落。愛滋病到處肆虐，是人皆知之事。此病即使被遏阻，也還有已生出抗藥性的細菌與病毒繼續傳播新疾病之虞。

這問題在非洲很嚴重，但也不限於非洲。國家結構的加強在大約25年前達於極頂，兩百年來全世界對傳染病的攻擊似乎

也已達於頂點，開始物極而反。某些解決之方可能也連帶破壞了具有保護作用的生態機制，某些前所未有的可怕新傳染病從而趁機滋長。物質基本設施之崩潰，對解決問題自無助益。新型結核病正在美國出現，因此這不能視為非洲獨有的問題。

不過，問題如果不是非洲獨有，而是整個世界體系的問題，那麼，非洲是不是就注定要在一場世界危機中做個旁觀者，受苦受難但無能為力？我相信正好相反。世界體系的危機，大可視為世界體系的機會，小則可視為非洲的機會。我們在理論上雖然可以預料我們當前世界體系的各種過程將會惡化而非消除危機，但我們知道這是失序，是一段25到30年的世界大失序，從這大失序之中，將會有一種新秩序產生。

我們在這段過渡期裡怎麼個作法，將決定這段過程結束時會浮現的那個歷史體系或那些歷史體系事實上會不會強過我們正在目睹其死亡的這個現代世界體系。這段時期，我們不是只有在地方層次採取行動的餘地；地方層次的行動是決定我們將如何脫離這場危機的關鍵變數。

這裡面沒有什麼簡單的公式可循。我們必須更清晰地分析現存的世界體系，並且在心智上唾棄那些造成我們眼光封閉，看不見現存世界體系之外有何真實歷史路途可走的範疇與觀念，我們必須組織並重振地方性的團結力量，外拓而非內鬥的力量。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十分清楚，保護己群而犧牲別人，無異自毀。

我想，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緊盯著球。我們必須以財物、服務及權力的更平等分配，作為創造新歷史體系的基礎。在我

們的資源——自然與人力資源——的運用上，我們的時間地平線必須更長一點。在這種重建中，非洲相當具備領航之利。非洲一直是被現代世界體系排斥之地，我們可以預料，此去25至30年，這個世界體系的政治、經濟及文化機制將會更加排斥非洲與非洲人。

非洲人如果繼續自陷於聲稱有資格被納入當前定義下的世界體系，他們無異向風車挑戰。非洲人如果結合短程的改善與中程的價值和結構轉化而開出一條路來，則他們將不只有助非洲，也會有助我們大家。請不要叫我或其他不是非洲人的人研擬一套特定的行動時程。我們做不來這件事。球在非洲那邊。

最後，容我再說明一點。我不是說非洲必將成功。非洲——我們亦然——有一半機會在脫離這場過渡之後拿出更好的東西來。歷史不必然在我們這邊，我們如果以為歷史必然站在我們這邊，將會自誤於這信念。但我們是這過程裡一個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部分。我們如果以確當之道介入這過程，就的確可能獲致我們想要的那種世界體系。我們必須以此認知為籽軸來組織我們的集體努力，雖然路途艱難，成果不定，還是值得一爭。

第二部

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的 建構與勝利

第四章

意識型態：三個還是一個？ ——「現代性」的偽戰爭

現代故事的主線，以觀念史或政治哲學史來談，大家都很熟悉。其情節可以簡述如下：19世紀出現三大政治意識型態——保守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它們出現以來，（在外貌不斷改變之中）一直彼此鬥爭。

關於這些意識型態鬥爭，有兩項概論可以說是人人都會同意的。第一項是，法國大革命之後，形成了新的集體世界觀，使人覺得有必要以新的政治策略來因應新形勢，上述上這個意識型態各自代表了對此事實的一種反應。第二項是，三個意識型態無一曾經鑄成一種明確的定版。正好相反，有多少意識型態家，三者似乎就有多少形態。

大多數人無疑相信這些意識型態之間有某種本質之異。但

是，無論以這些意識型態的理論陳述而言，或以實際的政治鬥爭而論，愈加細看，你就發現，這些所謂本質之異到底何在，實在言人人殊。

連這三種意識型態，是不是三種，各方也所見不一。頗有一些理論家、頗有一些政治領袖說過，這些意識型態其實不是三種，而是兩種，顯然是哪兩種還有爭議。有保守主義者說，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並無本質之別，有社會主義者說，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並無本質之別，甚至有自由主義者說，保守主義與社會主義認真看來並無差別。

這一點本身就很奇怪，但怪事還不止於此。意識型態(ideology)一詞有許多意思，而無論什麼意思，都從來沒有人或集團喜歡把此詞用在自己身上。意識型態者向來否認自己是意識型態者——除了據說發明這個字的德斯都·德·特雷西(Destutt de Tracy)。但拿破崙還治其人，說政治現實主義比意識型態(拿破崙使用此詞，意思是理論教條)可取。當時及以來，頗有一些人甚然此言。

半世紀後，馬克思在其《德意志意識型態》中，以此詞形容一種片面且自利的世界觀，亦即一個階級(資產階級)的世界觀。馬克思說，意識型態注定要被科學取代(他說，科學反映工人階級的觀點，工人階級是普遍性階級)。到了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曼罕(Mannheim)更進一步。關於意識型態的片面與自利本質，他同意馬克思之見，但認為馬克思主義也是這麼一種意識型態。曼罕以烏托邦取代意識型態，說烏托邦是無階級知識分子所造。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貝爾(Daniel Bell)表現了曼罕筆下

的知識分子對意識型態與烏托邦的疲厭。貝爾宣布意識型態終結，則指的是馬克思主義，他認為代之而起的將是一種溫和、非意識型態，對政治的局限有其知覺的自由主義。

所以，意識型態這觀會存在兩百年以來，一直被視為負面之物，是必須拒斥，或者終必被取代的東西。不過，我們由這段經過，是不是就能了解什麼是意識型態，以及人希望用意識型態來達成什麼事情？關於這一點，以下提出五問，對這五問，我都不會全盤回答，但各問都有助了解「現代性」這個觀念，以及其與「意識型態」這個觀念的關係：

1. 意識型態與世界觀有何差異？
2. 意識型態的「主體」是誰？
3. 意識型態與國家的關係如何？
4. 意識型態到底真有幾種？
5. 有什麼能取代意識型態嗎？亦即，我們能不能沒有意識型態而運作？

世界觀與意識型態

有一則新聞，可能是杜撰，說路易十六聽里安寇公爵(Duc de Liancourt)報告人群攻擊巴士底獄，問道：「是不是暴動？」答曰：「不是，陛下，是革命」(Brunot, 1937: 617)。這裡無法再度討論法國大革命的詮釋問題，只擬指出，法國大革命對世界體系的主要結果之一，是世人歷來首度承認改變、新奇、轉

化，甚至革命，是「正常」的，亦即，不是政治上的格外、例外現象，至少在現代政治上不是例外現象。統計上看來正常之事，很快在道德上也成為正常之事。拉布羅斯(Labrousse)說第二年(Year II)是「一個決定性的轉捩點」，過了這一點之後，「大革命扮演一種預言的、預告的角色，裡面帶著一整個後來將會完全浮現的意識型態」(1949:29)就是這個意思。或者，借華森(Watson)的話說，「大革命是整個19世紀俯仰其下的陰影」(1973:45)。我要加一句：20世紀也俯仰於其下。大革命標誌著17世紀牛頓科學與18世紀進步觀念的極頂；簡而言之，即我們今天說的「現代性」。

現代性由一種特定的社會現實與一種特定的世界觀結合而成，這社會現實與世界觀取代，甚至埋葬了另一種社會現實與世界觀，為了表示那社會現實與世界觀多麼過時，我們現在稱之為「舊制」(Ancien Régime)。對新的現實與新的世界觀，並非人人反應相同，有人歡迎，有人拒斥，有人不曉得要如何反應，但極少人不知道這改變多麼深重。上述路易十六的典故非常生動說明了這一點。

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內的人對這「轉捩點」的反應，以及他們如何處理法國大革命震盪產生的巨大變局——政治變動「正常化」，規律地發生，被視為某種無可避免的事情——已是世界體系文化史的一個本質要素。因此，將「意識型態」視為人們因應這種新形勢的方式之一，可能會有用處吧？作此看法的話，意識型態本身就不是世界觀，而是人對所謂「現代性」這

個新世界觀的反應之一。¹

很明顯的一點是，第一個意識型態反應，幾乎直接立即的反應，必定來自被現代性最深震動，甚至被現代性深深排斥的人。他們深深震驚於現代性、對「變」與進步的崇拜、對一切「舊」事物的堅定拒斥。柏克、邁斯特(Maistre)及波納德(Bonald)於是發明我們今天稱為「保守主義」的意識型態。英國保守主義大家塞西爾(Lord Cecil)在1912年寫過一本小書，作為保守主義立場的通行陳述，書中極言法國大革命在意識型態的誕生中扮演的角色。他說，歷史上向來就存在著一種「自然而然的保守主義」，但1790年前「素無有意識地執持的保守主義體系」(1912:39)。

據保守主義者之見，法國大革命無非原子化這個歷史過程的極點，溯其源流，這過程起於唯名論、宗教異議、科學理性主義，以及對中世紀基礎團體、建制、思想定論的毀壞。(Nisbet, 1952: 168-169)

所以，保守主義意識型態是「反動」的，取其直接意義，就是指保守主義是對現代性的一個反動，目的在於(強硬一路)

1 意識型態只是三種因應途徑之一。另外兩個是社會科學與反體制運動。我曾詳細討論此點，並嘗試陳明這三種模式之間的關係，見〈法國大革命作為世界歷史事件〉(The French Revolution or World-historical event)，收入《重新思考社會科學：19世紀典範的局限》(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 The Limits of Nineteenth-Century Paradigm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頁7-22。

完全逆轉形勢，或(較為精細的一路)限制改變，盡可能固拒改變。

和一切意識型態一樣，保守主義基本上是一種政治方案。保守主義者深知他們必須固執或重新征服國家權力，國家各種制度是他們達成目標的關鍵工具。法國保守主義者1815年重新掌權，名之為「王權復興」。但我們知道，局勢並未回復革命以前的樣子。路易十八必須頒行「欽定憲法」，查理十世意圖將反動制度化，即被罷黜，國會改立路易·腓力，他使用比較現代的頭銜——「法國人民之王」。²

故事的下一個階段，就是自由主義的建構。自由主義自命為保守主義的反面，其基礎我們可以稱它為「現代之自覺」(Minogue, 1963: 3)。自由主義素來以政治競技場的中心自居，而自稱為普遍主義者。³自由主義者自信滿滿，對「現代性」世界觀之真理信之不疑，極力推廣他們的觀點，將其邏輯刺入所有社會建制，務期世界脫棄過去的「非理性」殘餘。為了達成這目標，他們力戰保守主義意識型態家，認為後者為對「自由

2 路易十八頒布欽定憲法，在政治上是他得以復辟的重要原因。在其聖烏恩(St.-Ouen)宣言中，這位未來的國王宣布他將「採行一部自由憲法」，他稱之為“Charter”。Bastid (1953:163-164)認為，“Charter”一詞，先前的用法多重多變，最重要的是令人想起共同體的自由。他又說：「對有自由傾向的人，此字自然而然使他們想到1215年的英格蘭大憲章。」據Bastid之見，「路易十八如果沒有以某種方式滿足這些對自由的渴望，他不可能贏得大眾的接受。」路易腓力1830年也宣布“Charter”的時候，這“Charter”已經必須獲得同意(consentie)，而非由他賜頒(octroyée)。

3 「自由主義者向全人類致語，其中並無重大例外」(Manning, 1976: 80)。

人」之恐懼所執。⁴自由人者，就是從虛偽的傳統偶像裡面解脫出來的意思。易言之，自由主義者認為進步無可避免，但不經相當努力，或者沒有一套政治方略，仍難獲致。因此，自由主義意識型態者相信，為使得歷史依循其自然進程而行，必須致力於有意識的、持續不輟的、明智的改革主義，但他們十分自信「時間是普遍之友，必然為愈來愈大多數人帶來更大的幸福」(Schapiro, 1949: 13)。

社會主義是三個意識型態中最後一個完成表述的。1848年以前，社會主義還很難說明顯自成意識型態。基本原因，則是1789年以後以「社會主義者」自稱的那些人處處以法國大革命的傳人與黨人自居，造成他們與開始自稱「自由主義者」的另外一些人不容易有真正的區分。⁵英國一片撻伐法國大革命之聲，其「自由主義者」自謂另有歷史起源，而即使在英國，「激進主義者」(多多少少就是未來的「社會主義者」)基本上似乎也不過是比較強硬的自由主義者。

事實上，作為一種政治方略，連帶地，作為一種意識型態，社會主義特別有異於自由主義之處，是它相信「進步」需要一隻很大的手來協助才能獲致，無此大手協助，進步將會是個非

4 在《帕瑪修道院》(The Charterhouse of Parma)裡，革命分子Ferrante Palla達人自稱「自由人」。

5 Plamenatz主張，反對7月主政者中，雖然有四個派系可以視為「左」派，他們後來也支持1848年革命，但向來用以集體形容他們的語詞不是Socialists(社會主義者)，而是共和主義者(republicans)(1952, 頁47及別處)。

常緩慢的過程。一言以蔽之，社會主義方案之心，在於加速歷史的進程。基於此理，「革命」一詞投合社會主義者，甚於「改革」一詞，他們覺得改革只能從事耐心——雖然盡心——的政治活動，是一種靜觀其變的態度。

總而言之，對現代性、對變的「正常化」，以上是三種對應姿勢：盡可能繞過這危險；盡可能理性地實現人類的幸福；力鬥強大的反抗勢力，加速那股爭取進步的衝力。**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及社會主義**三詞開始被用來指稱這三種姿勢，是在1815到1848年這段時期。

每個姿勢都有其對立的對象。保守主義反對法國大革命，自由主義者反對保守主義（以及保守主義被認為試圖重振的舊制），社會主義者排斥自由主義。這些意識型態的定義之中根本上帶著這種批判、負面的語調，可以解釋這每個意識型態為什麼都各各有那麼多版本。以它們代表什麼而言，每個陣營都提出許多說法，甚至自相矛盾的說法。各個意識型態實施僅有的一致之處，在於它們**反對**什麼。這不是細枝末節，因為三個陣營都靠這種負面性，方得維繫150年左右，至少到1968年是如此。1968年的意義，下文將會再談。

意識型態的「主體」

既然意識型態其實是用來處理現代性的政治方略，各個意識型態就需要一個「主體」，或一個主要的政治行動者。在現代世界的術語裡，這叫做主權問題。法國大革命在這件事上樹立

了一個非常清楚的立場：針對專制君主的主權，宣布主權在民。

主權在民的新語言是現代性的重大成就之一。即使其後一百年間對這新偶像——人民——仍有繼續不斷的打擊，以來卻沒有誰能將之從寶座上推下來。然而這勝利是空洞的。普世可能都同意主權在人民，但「人民」是誰，自始即無一致之見。再者，對這個微妙的問題，三個意識型態從無任何明確立場，但三者也都不承認自身立場之含糊。

看起來似乎最不模稜兩可的立場，是自由主義者的立場。對自由主義者，「人民」是所有「個人」的總和，每個個人是政治、經濟及文化權利的終極擁有者。個體是現代性的「主體」。此處不可能檢討有關個人主義的浩瀚文獻，我只提其歷來引起爭辯的三點。

1. 所有個人都平等。此語能名副其實看嗎？顯然不能，如果其中說的是作自主決定的權利的話。沒有人會授權一個新出生的嬰兒去作自主的決定。那麼，一個人必須多大，才有此權利？答案歷來都有很多個。如果我們以其判斷力不成熟為由，同意將「兒童」（無論如何界定）排除於這些權利的行使之外，那麼，一個自主的個體就是他人認為有能力自主的人。一旦可以由別人來判斷一個個體是否有能力行使他的／她的權利，別的範疇就可能被定為無此能力：衰老的人、低能者、精神病患、被囚的罪犯、危險階級的成員、窮人等等。這張單子不是幻想。我這話不是採取立場，說這些群體應該或不應該有資格——例如投票——而是只想指出，並沒有一條不證自明的界線可以說，一邊的人應該有資格享有其權利，另一邊的人不應該有資

格享受權利。

2. 即使只談社會承認「能負責任」而有正當資格充分行使其權利的人，也可能有一種情形，就是一個個人行使他／她的權利，可能妨礙另一個個人行使其權利。這個可能性要如何處理？說他們不得過社會生活，這是社會生活的必然後果？還是說這等於傷害那第二個人的權利，我們必須防止或懲罰？這個非常糾結的問題，無論在政治實踐層次或在政治哲學層次，歷來一直只有片面不全的回答。

3. 即使所有有資格充分行使權利的個體（「公民」）都從不侵犯其餘公民的權利，他們對某項集體決策仍然可能不是一致同意。怎麼辦？我們如何調和這些不同的立場？這是政治民主上的一大爭論。

主權在個人，這「個人」是誰，自由主義者至少曾作深入辯論。保守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原則上對此問題也應該辯論，因為這兩方各各提出相當有別於「個人」的「主體」，然而他們對此事的討論甚欠清楚。「主體」如果不是個人，那麼是誰？他們的意思有點不易捉摸。柏克在《對法國大革命的省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裡的說法就是一例：

人性錯綜，社會的目標則複雜之至；因此，沒有任何簡單的權力配置或方向能適合人性或其事務之特質。（White 引述，1950: 28）

讀這段文字的人如果不知道柏克是在抨擊法國革命分子，

可能會以為此言是指斥專制君主。看看柏克早此十年的《經濟改革講話》（*Speech on Economic Reform*），則比較清楚一點：「個人消逝如影子，國家則固定而穩定」（Lukes引述，1973: 3）。

波納德的取徑又十分不同，因為他堅持教會的關鍵角色。但他的觀點和所有保守主義意識型態一樣，萬變不離其宗：強調家庭、法人、教會、傳統階級等社會群體，以之為政治行動權利的「主體」。換句話說，保守主義者強調所有可能被視為「傳統」的群體（以之為連續性的化身），但拒絕將保守主義等同於其中任一群體。保守主義思想從來不曾說清楚，要如何來決定哪個群體是連續性的化身。彼此相爭的王室世系裡誰是龍種，就是向來頗有爭論之事。⁶

波納德認為，盧梭與孟德斯鳩之大謬，在於「想像……有一個先於社會的純粹自然狀態……」。波納德認為實情正好相反，「社會——公眾社會——當下的實然，就是社會的真質所在」（1988 [1802]: 87）。然而這定義也為波納德自己設下陷阱，因為當下經過如此正當化，無異禁止「復原」。不過，邏輯精確從來不是保守主義的長處，保守主義對邏輯精確也無甚大興趣。他們關心的是一張張個人選票加起來形成的多數所可能出現的行為，念念不忘警告要慎加提防。他們提出的主權主體遠遠不如自由主義者所提主體那麼主動。他們認為良好的決策都是徐

6 Tudesq指出(1964: 235):「法統主義者反對七月主政，是貴族反對固有權威……」由此看來，法統主義者可不是和波納德之論互為矛盾嗎？波納德說：「社會——公眾社會——當下的實然，就是社會的真質所在。」

徐圖之，而且罕見，而且大致都已由前人作成。

保守主義者拒絕以個人為歷史的主體，而偏愛小型的，所謂傳統的群體，社會主義者拒絕以個人為歷史主體，偏愛的則是大型群體，亦即整個人民。G.D.H. Cole分析初期的社會主義思想，有此評語：

當時流行強調個人，社會主義者與之相反，側重人類關係中的社會成本，在法國大革命及伴隨而來的經濟革命引發的，關於人權的大辯論中，他們力圖優先思考社會問題。(1953: 2)

但是，如果很難知道哪些個人構成問題，而且更難知道哪些「群體」構成「人民」，那麼，最難的事還是究竟要如何來界定整個人民的普遍意志。我們如何來得知整個人民的普遍意志是什麼？首先，應該將誰的觀點納入考慮——公民的，還是這個國家的居民的？為什麼要作此限制？為什麼不將全人類的觀點都納入考慮？有什麼邏輯可以支持任何限制？在實踐上，普遍意志與全體意志之間是什麼關係？社會主義運動一旦掌權執政，所碰到的所有難題，來源都是這套複雜糾結的問題。

簡而言之，三個意識型態提供給我們的，不是對「誰是適當的歷史主體」這個問題的回應，而是三個起點，以供追索誰是主權在民的化身：自由主義提出所謂自由的個人，保守主義提出所謂傳統群體，社會主義提的是「社會」的全體成員。

意識型態與國家

人民作為「主體」，其基本「客體」是國家。人民在國家裡行使其意志，享有主權。不過，19世紀以來，又說人民形成一個「社會」。國家與社會形成「現代性」思想上的重大二律背反，我們如何來調和兩者？

最令人驚異的一點是，看看三個意識型態這方面的論述，三者似乎都站在社會這邊與國家對立。他們的論點耳熟能詳。堅定的自由主義者不容國家干預經濟生活，並且將國家在一般事情上的角色減到最小：「此即放任政策(Laissez-faire)，國家的角色最多只如守夜人」(Watson, 1973: 68)。保守主義者則認為，法國大革命可怕之處不僅在其個人主義，其國家主權論更是特別可怖。中間群體——家庭、教會、法人——是人民的優先效忠對象，國家質疑這些中間群體的角色，就變成暴政。⁷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裡對國家所作的形容，我們也挺熟悉：

自從現代工業和世界市場建立以來，資產階級終於在現代的代議制國家裡奪得獨占性的政治控制。現代國家的行政部門只不過是一個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

7 見Nisbet對波納德觀點的討論(1944: 318-319)。Nisbet使用「法人」一詞，意指「以職業或行業為基礎的組合」。

員會。(1973 [1848]: 69)

三個意識型態對國家如此負面批判，卻也個個埋怨，說國家不歸他們控制，說國家被另外兩個意識型態控制。就事實而論，三種意識型態要推動它們的方案，都非常需要借重國家。我們不要忘了，意識型態首先是一種政治戰略。社會主義者就很早就招言行不一之譏；大多數社會主義者喜作反國家之論，卻為了促進他們的短程計畫，向來致力增加國家的活動。無政府主義在社會主義者之間一向是屬於少數派觀點。

不過，保守主義者當然比較認真反國家吧？他們不是一直反對靠國家行動來達成改革嗎？完全不然。我們必須考慮「價值式微」的問題。為了扭轉社會的當前頹敗，為了復原社會的原樣，他們需要國家。1840年代的英國保守主義名人皮爾(Sir Robert Peel)，有人說「他認為，他生活的無政府時代根本上需要一部能產生強大政府的憲法」(Gash, 1951: 52)。此語其實可以移用於其他保守主義者。關於19世紀初葉英國「托利反動」期間，保守主義對國家問題所持立場演進，Halévy有此說明：

1688年以及其後那些年代，國王自視為主權者，公眾意見也視他為主權者。國王常有伸張其主權成為絕對主權之虞，國家所有權力部門所享有的，獨立於他之外的地位，就構成了對國王特權的巧妙限制，是一套防止君主專制的憲法保障。19世紀初，美國、法國，甚至英國人民，不是已經聲稱自己是最高主權者，就是將要作此聲稱；因此，

三權這時是為了防杜人民而維持其獨立。現在，支持這些形式仍舊而意義已變的建制的，不再是輝格黨，而是托利黨。現在，三權聯合而由國王領銜，共同維護他們的自主，對抗這新的主權聲稱者。(1949: 42-43)

這段分析堪稱明澈。為了控制那些推動變革的人民勢力，保守主義者向來都準備強化國家結構。西塞爾1912年一段話其實即隱含此意：「只要國家的行動不涉及不義或壓迫，保守主義的原則就不能說是與之敵對的。」(1912: 192)那麼，至少還有自由主義者——個人自由與自由市場的捍衛者——在敵視國家吧？根本不然！自由主義者打一開始就陷入一種根本矛盾。自由主義者既然說要維護個人及其權利不受國家侵犯，於是不得不走上普遍選舉權之路，這是民主的僅有擔保。但是接下來，自由主義者推動改革，要解放個人，使之掙脫過去留傳下來的束縛，卻以國家為這一切改革的主要媒介。這導致自由主義者起意，使實證法為效益主義的目的服務。

其後果，Halévy也有清楚的說明：

「效益主義」哲學不只是，或許根本就不是一種自由主義體系；它同時是一種權威學說，指向一種精細的，在某層次上可說是科學的，政府干預，以產生各種利益之間的和諧。邊沁年輕時代支持「開明專制」，他的觀念逐漸發展之後，他改信民主。但他可以說是以「跳遠」到達這一立場的。他這麼遠遠一跳，越過了幾種他原本可能會抱

持的學說，如貴族政治、混合體制、權力平衡，以及政治家的目標應該是削減政府權威，並且盡可能使政府權力分立，以期解放個人。邊沁認為，經過普遍選舉權，或者非常廣泛的選舉權，而造成國家權威與多數人的利益相互調和之後，我們沒有理由繼續懷疑國家的權威，因為這時國家已是福不是禍。

於是，保守主義者

如今成為純正自由主義傳統的支柱，維持著那個由沒有薪俸的官員構成的貴族自治固有體制，對抗由領薪水的官員管理的官僚專制新體制。(Halévy, 1950: 100, 99)

有人可能以為邊沁主義其實是從自由主義產生的偏鋒，自由主義之最佳表述，應該求之於古典經濟學家，那些放任主義理論家。針對這一想法，我們不妨記住，「工廠法」首度在英國通過的時候，當時地位重要的所有古典經濟學家都支持這項立法，Alfred Marshall說之甚詳，而且支持(1921: 763-764)。那時以來，官僚國家持續成長，歷任自由派政府也支持其擴張。霍布豪斯(Hobhouse)論自由主義，答覆西塞爾的保守主義論，如此為官僚國家的擴張辯護：「國家的強制，功能是要克服個人的強制，以及，國家之內任何由個人構成的組合所行的強制。」(1911: 146)。

各個意識型態都有其尷尬的國家主義，它們自圓其說的方

式無疑各有不同。社會主義者要用國家來落實普遍意志，保守主義者說國家能保障傳統權利不受普遍意志之害，自由主義者要用國家來創造使個人權利欣欣向榮的條件。然而根本上，三種意識型態口口聲聲標舉社會對抗國家，實際則正好相反，都在強化國家。

幾種意識型態？

思想界在國家與社會應該是何關係這個主題上的種種混淆，可以說明我們為什麼從來就無法完全確定19世紀到底有幾種意識型態產生。三種？兩種？只有一種？上文檢視了主張有三種的傳統論點。現在我們來看，三種能不能化成兩種。

法國大革命到1848年革命之間，當代人顯然認為「只有一種清楚的分裂」；一邊認為進步必然且可欲，因而「全面贊成」法國大革命，另一邊是反革命，反對價值破壞，認為這破壞大錯特錯(Agulhon, 1992: 7)。因此，這場政治鬥爭是自由主義者與保守主義者之間的鬥爭，自稱激進派、雅各賓分子、共和派或社會主義者都被視為不過是自由派一種比較好戰的變體。在巴爾札克小說《鄉村牧師》(Village Cure)裡，一位主教感嘆：

我們在一個製造業小鎮表演奇蹟，是逼不得已的。在這小鎮裡，煽動反對宗教與君主原則的精神已經深深扎根。密切細察的觀念，當初由新教產生出來，如今叫作自由主義，明天又不知道要隨意自由換成什麼名堂，這觀念習染

了一切事情。(1898:103)。

Tudesq 告訴我們，1840年，一份名叫《紐奧良人》(*l'Orléanais*)的報紙指斥另一家報紙《羅瓦列報》(*Le Journal de Loiret*)為「自由派、新教、聖西門派、拉蒙納派(Lamennais)的報紙」(1964:125-126)。這指斥並非完全無的放矢。Simon指出：「進步觀念其實構成聖西門整個思想哲學的核心與中心靈感」(1956: 330, Manning, 1976: 83-84)。

此外，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的這種聯合，其根在18世紀的自由主義與平等主義思想之中，在對君主專制的鬥爭裡(見 Meyssonier, 1989: 137-156)。在19世紀，由於兩個意識型態對生產力都愈來愈感興趣，這聯合關係繼續滋長。兩個意識型態都認為，在現代國家的社會政策裡，生產力是基本條件。⁸

效益主義興起之後，這聯合看起來更成為聯姻。保守主義者即持此論：

托利黨要破壞效益主義的名譽，即斥之為一種不愛國的哲學，由外國觀念，尤其法國觀念，啓發的玩意。邊沁主義者的政治原理難道不就是雅各賓黨的民主原則？他們的倫理學和法律哲學不是取源於赫爾維修(Helvétius)與貝卡利亞(Beccaria)，他們的心理學不是來源於龔底雅

8 「聖西蒙主義與經濟自由主義都朝我們今天所謂經濟理性主義的方向演化」(Mason, 1931:681)。

(Condillac)，他們的歷史哲學和他們的政治經濟學不是源出康多塞(Condorcet)和塞伊(Jean-Baptiste Say)嗎？他們難道不是不信神的伏爾泰信徒？邊沁的《立法論》(*Traité de Legislation*)不是用法文寫的，而且在巴黎出版的嗎？效益主義者可以根據實情回答說，你指控效益主義者輸入這些所謂法國觀念，這些觀念其實都是暫時旅居海外的英國觀念。(1949: 583)

保守主義者上述看法並沒有看走眼。Brebner對邊沁的「集體主義」一面頗致同情，說：「費邊主義者如果不是邊沁主義者的後裔，是什麼？」他並指出，穆勒在1830年「就已經可以稱為自由派社會主義者」(1948: 66)。

從另一方面來說，1830年以後，自由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之間開始出現一個明顯的分別，這分別在1848年以後變得相當深刻。同時，1848年標識著自由主義者與保守主義者之間開始調和。霍布斯邦(Hobsbawm)認為，1830年的重大結果，是一種「溫和」的自由主義，在法國、英國，尤其在比利時(甚至局部的瑞士、西班牙及葡萄牙)獲得政治勝利，「使溫和派與激進派分裂」，而促成群眾政治之產生(1962: 117)。Cantimori由義大利角度分析此事，則認為兩派到1848年仍未確定離婚。到這年為止，「自由主義運動……並未拒絕任何路線：既不排斥煽動造反，也不排斥改革主義或政治行動」(1948: 288)。1848年以後，這兩種戰術才完成離婚。

很重要的一點，1848年之後，社會主義者再也不提聖西門。

社會主義運動開始以馬克思主義為樞紐。問題不再是可以用改革來彌補的貧窮，而是資本主義引起的非人化，只有完全推翻資本主義，問題才能解決(Kolakowski, 1978: 222)。

就在此時，保守主義者開始意識到改革主義可以用來表達保守主義的目的。1832年的「改革法案」通過之後，皮爾立即發表選舉宣言，〈唐沃斯宣言〉(Tamworth Manifesto)，轟動一時，當代人認為宣言中的立場「近乎革命」。其革命性在於宣布承認「改革法案」「為一個重大憲法問題找到了一個最後、無可改變的解決之道」，更在於這立場是向人民宣布，而不是對國會宣布(Halévy, 1950: 178)。⁹

保守主義者留意到，在保障財產這件事上，他們與自由主義者也是合流的，雖然保守主義者所以致力保護財產，基本原因是財產代表法統的存續，財產是家庭生活、教會及其他社會團結的基礎(Nisbet, 1966: 26)。除了這一點思想上的合流，保守主義者也和自由主義者一樣擔心革命，一個很具體的威脅。西塞爾說：「要有效抵抗雅各賓主義，保守主義一定要採納溫和改革的路線」(1912: 64)。

三種意識型態減為兩種，第三個可能的減法也不宜完全忽

9 Halévy引述《季刊評論》(Quarterly Review)1835年4月號(Vol. LIII, p.265)的一篇文章〈皮爾的演說〉(Sir Robert Peel's Address)「從來沒有一個首相這樣通權達變，不但向『人民』宣布他接受這個職位，而且向他們宣布他的原則，甚至他打算提出的措施的細節，並且要求——不是要求國會，而是要求人民——保持國王的特權，保持的方式不是默認國王所選大臣，而是讓他們獲得公平的審判。」

略，就是保守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聯手對付自由主義者，雖然這在理論上似乎極不可能。聖西門社會主義的「保守主義」性格，以及其發源自波納德觀念，是經常有人提起的事(Manuel, 1956: 320, Iggers, 1958: 99)。兩個陣營都反個人主義，成為其聯合的契機。另一方面，自由主義者海耶克曾經指責保守主義者卡萊爾思想中的「社會主義」性格。保守主義思想被發現有其「社會」的一面。西塞爾其實也毫不猶豫，表明保守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這個親和關係！

論者經常以為保守主義與社會主義是直接對立的。其實並不盡然。現代保守主義繼承了托利黨一些支持國家的活動與權威的傳統。史賓塞(Herbert Spencer)先生就曾抨擊社會主義是托利黨復興。(1912: 169)

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聯合，結果出現一種社會主義自由主義。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聯合。結果是一種保守主義自由主義。簡而言之，自由主義的兩種變體。保守主義／社會主義組比較難以想像，當初也只是一種短暫的戰術運用。不過，我們可以想想，20世紀各種「極權主義」可能是兩者比較持久的社會形態，也就是說，他們建立了一種既民粹、又社會的極權主義。果然如此的話，這些極權主義就是自由主義留在舞台中央的又一途徑。這些極權主義政權門面上激烈反對自由主義，然而門面背後，所有這些政權都有一個共通要素，就是崇信生產力帶來進步，而生產力帶來進步正是自由主義宣傳的福音，這麼看

來，我們可以下個結論：連社會主義保守主義（或保守主義社會主義）也可以視為自由主義的一個變體。若是這樣，我們難道不能論定，1789年以來只有一種真正的意識型態，即自由主義？只是它有三大變體而已。

這樣的陳述，當然必須從歷史角度來說明其詳。1789-1848年階段，是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重大意識型態鬥爭的階段，保守主義後來未能造達其完足形態，自由主義則尋求文化霸權。1848-1941（或1917）年階段，自由主義支配局面，沒有嚴重的對立者，馬克思主義試圖建構一套社會主義意識型態，自樹一極，但未能完全成功。因此，我們可以說（此說可能最惹爭議），1917-1968（或1989）年階段，代表了自由主義當令於世界的時期，據此觀點，列寧主義儘管自稱是一個與自由主義尖銳對立的意識型態，其實卻是自由主義的體現之一。¹⁰

超越意識型態？

現在，是不是終於可能超越意識型態了，也就是說，超越屬於支配地位的自由主義意識型態？1968年革命以來，這問題被明白提出來，而且經常提出。1968年世界革命所攻擊的，可

¹⁰ 列寧主義自我重建，由一種主張把勞工階級組織起來革命推翻政府的方案，變成一種主張先獲得民族解放，繼而追求國家發展（當然，是社會主義式國家發展）的方案，這重建其實是倚傍威爾遜主義，而威爾遜主義是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的官方版。見本書〈自由主義與民族國家的正當性：一個歷史詮釋〉。

不就是自由主義，三個意識型態之中作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意識型態的自由主義？

1968年從事抗爭的許多人不是披著毛派外衣，就是代表馬克思主義的某種變體。然而這作法無礙他們將馬克思主義者置於自由主義爐中而治之，既拒斥蘇聯官方的馬克思主義，也拒斥工業化世界的共產黨。1968年後，最「保守」的分子想要表達他們對1968年革命的反應的時候，他們還自稱「新自由派」。

《出版家周刊》(Publisher's Weekly)最近刊出文章評論柯拉科夫斯基(Kolakowski)的一本書，如此總撮他的思想：『『保守主義』、『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已經不再是互不相容的政治立場(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arch 7, 1991, 20: advertisement)。但是，如果我們前面的分析正確，這些意識型態從來就不會互不相容。自由主義，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這個霸權意識型態，它的意思是什麼，效力如何，從來沒有人說得清楚，這一點並無新意。新意在於，自由主義作為1848年以來居於支配地位的一個意識型態，首度受到根本質疑。我們應該由此得出什麼結論，並非本文所能處理，但我相信，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有效的政治方案的日子已經結束，它正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結構性危機衝擊之下崩潰。

這可能並非一切意識型態的結束。但是，既然現在相信政治改變這麼清清楚楚是必要、必然，因此而正常的，我們就不再需要一個意識型態來處理這信念的後果。我們正在進入一個過渡階段，這階段可能持續50年，而且可能描述成一個後果並不確定的重大「分叉」(見Prigogine)。從我們當前體系的廢墟

裡浮現而出的體系，其世界觀將是什麼樣子，我們無法預測。屆時如果有意識型態生出的話，將會是什麼樣的意識型態，以及會有幾種意識型態，我們也無法預測。

第五章

自由主義與 民族國家的正當性： 一個歷史詮釋

1789至1989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意識型態黏合劑是自由主義(連同其對應夥伴，雖然不是衍生夥伴，科學主義)。這兩個年代相當精確。法國大革命標誌著自由主義進入世界政治場景，成爲一種意義可觀的意識型態選擇。1989年共產主義垮台，則標誌著自由主義離開世界政治。

上述陳述可不可信，當然繫於我們認爲自由主義本質何在。想判定自由主義的本質，字典無甚幫助，有關自由主義的充棟書海也幫不了多少忙，因爲**自由主義**一詞彈性太大，它有許許多多定義：在任何重要的政治觀念，這也正常。問題不只

如此，還有，這些定義差異太大，造成「自由主義」一詞有些意思彼此完全相反。這裡只舉一個最近也最明顯的例子，雷根總統和布希總統在政治上撻伐自由主義，歐洲人寫文章卻經常稱兩人是「新自由派」。

當然有人會說，造成這種顛倒的原因在於政治自由主義與經濟自由主義是兩個分開的思想立場，甚至是兩種分開的思想。那麼，我們為什麼一直一詞兩用？文化自由主義這個範疇要如何處理？反文化的嬉皮是不是自由主義者？宗教自由分子是不是自由主義者？問題可以提個沒完，而終無要領，以此解釋語言上的混淆，太過簡易，因為自由主義實際上表現於人類所有活動領域。使用「自由主義」一詞而希望人家了解的話，必須先解其核心。

自由主義必須放在它的歷史脈絡裡來觀察。我認為，這脈絡始於1789年，終於1989年。我對自由主義的興趣，是視之為一種意識型態，我說的意識型態，指一種全面性的、長程的，以動員巨大數目的人為宗旨的政治議程而言。我先前說過，¹就此意思而論，在法國大革命及其拿破崙後遺症帶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地緣文化轉化以前，意識型態既無必要，也無可能。

法國大革命以前，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主導世界觀，和其他歷史體系的世界觀一樣，說政治穩定是正常的。主權寓於統治者，統治者理國治民的權利來自一套有關權力之獲得的規

1 特別請看〈法國大革命作為世界歷史事件〉一文，收於《重新思考社會科學》(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頁7-22。

矩，通常是繼承。統治者當然頻頻受到挑戰，甚至被推翻，但取代而上台的統治者總是宣揚穩定才是正常。政治變化是例外，必須另尋例外的理據；政治變化即使發生，也不能引為先例而進一步求變。

法國大革命引發的動盪，一場傳遍歐洲及歐洲以外的動盪，改變了這種心態，人民成為主權者。1815到1848年所有「反動派」的努力都動搖不了新的心態。1848年以後，至少直到今天，都不再有人認真試圖動搖這新心態。²變，一切種類的變，包括政治之變，都成為「正常」。這種世界觀迅速當令，正是意識型態興起之因。在政治改變是正常事，以及與此相應的主權在民的信念觀照之下，意識型態成為典型的政治議程。

保守主義是新心態引起的第一個反應，十分合乎邏輯。邁斯特 (Joseph de Maistre) 1789年的《對法國的省思》(*Considérations sur la France*)，和柏克1790年的《對法國大革命的省思》，今天被視為保守主義思想的鼻祖，兩部經典之作都

2 「到1830年代，浪漫的革命分子幾乎個個言必稱人民“le peuple”，“das Volk”，“il popolo”或“lud”，視之為人類歷史中一種重生的力量。1830年革命後繼位的新君主，路易腓力和李奧帕德一世(Leopold I)，尋求人民認可，要當「法國人民」或「比利時人民」的王，而不是法國國王或比利時王。甚至反動的沙皇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在粉碎1830-1831年波蘭起事之後三年，也宣稱他的權威基礎是「民族性」(以及君主專制和正教)——他用的民族(narodnost)一詞，另一意思是「人民或民族的精神」，襲自波蘭文narodowosc。James H. Billington, 《人心裡的火：革命信仰的起源》(*Fire in the Minds of Men: Origins of Revolutionary Faith*; London: Temple Smith, 1980), 160。

是在大革命初期熾熱階段落筆。大體上，反對法國大革命者主張，以變為正常而加以正當化，結果只可能是社會疾苦。但他們很快就明白，強硬不妥協是一個不可能的立場。1789到1848年，保守主義立場從全盤拒斥新世界觀，演進成其後150年裡保守主義意識型態的主導立場：「正常」的改變應該盡可能緩慢，而且值得鼓勵的唯一理由必須是爲了防止社會秩序進一步崩潰。

自由主義是對保守主義的意識型態回應。“Liberal”一詞（名詞），到19世紀第一個十年才出現。大致而言，1848年以前，有一批人公開（在英國是暗中）支持法國大革命的理想。這批人包羅甚雜，彼此差異頗大的共和派、激進派、雅各賓分子、社會改革者、社會主義者、自由主義者，都在其中。³

在1848年的革命世界裡，其實只有兩個陣營，即秩序黨與運動黨，分別代表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意識型態，如果使用起源於法國大革命的術語，則是左派與右派。1848年以後，社會主義才出現，作爲一種真正有別於或對立於自由主義的意識型態。世界體系至此進入我們今天熟悉的三合式意識型態光譜階段，自由主義代表了政治半圓的中心，因而占有舞台中央。

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於改變（或進步）是否可欲或無可避免。事實上，這是兩者共通之處。它們之間的差異

3 法國七月王政的情況，John Plamenatz有極佳討論，見《法國的革命運動，1815-1879》（*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France, 1815-1879*, London: Longman Green, 1952），頁35-62。

在於意識型態；亦即，政治議程之異。自由主義者認爲，社會改良的進程是、應該是穩定的，其基礎則是由專家就現存問題進行理性的評估，政治領袖根據這評估，繼續不斷有意識地嘗試引進明智的社會改革。社會主義者懷疑，改革主義者透過明智的善意，並且大致上獨立作爲，到底有沒有辦法完成重大變革。社會主義者希望腳程快一點，認爲如果沒有相當的人民壓力，不會帶來進步。進步所以無可避免，完全因爲人民的壓力無可避免。沒有這股助力，專家自己是無能爲力的。

1848年的世界革命，對三個意識型態的政治戰略都是一個轉捩點。1848年的失敗，使社會主義懷疑，靠自發性的政治起事，到底能成什麼大事。國家結構太強，壓制太容易，太有效。1848年以後，社會主義者才開始認真組織政黨、工會及其他工人組織，以期對國家結構完成長期政治征服。後1848時期，發生了兩階段式社會主義戰略。社會主義運動稍後出現的兩大翼，即第二國際與第三國際，都採用這套戰略。所謂兩階段很簡單：第一階段，取得國家權力；第二階段，利用國家權力改造社會（或到達社會主義）。

保守主義者也從1848學到教訓。工人叛亂在政治上已經成爲真正可能之事，這些叛亂在1848年雖然可算輕易收平，未來則甚不可知。此外，保守主義留意到，社會主義革命與民族主義革命雖然不盡是同一回事，卻可能發展出危險的重疊趨勢，並且在世界體系的舞台上彼此相援。由此可知，必須採取措施，以防患於未然。這措施或可稱爲建構更加統合的國族社會。

細看社會主義與保守主義這些新戰略，兩者其實都愈來愈

接近自由主義所持，變應該穩定前進、妥善管理、理性正常的概念。當是時也，自由主義的戰略如何？自由主義者正在摸索兩個主要理念，作為達成經過管理的、理性的正常之變的關鍵。當時的主要問題人人都看得出來，就是西歐與北美的工業化牽動了必然的都市化過程，以及將原先的鄉村人口轉變成都市無產階級⁴。社會主義者有志組織無產階級。由1830年代與1840年代之事視之，無產階級是可以組織的。

對社會秩序及理性的社會發展所面臨的這種危險，自由主義能夠提供的解決之道是向勞工階級讓步：讓勞工階級參與一些政治權力，以及分享一些剩餘價值。難題在於，如何給予勞工階級夠多的參與和分享，使他們在製造紛亂前三思，但這參與和分享不能多到嚴重危及資本的不斷累積。持續不斷而且不斷擴張的資本累積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存在的理由(*raison d'être*)，也是統治階層的首要考慮。

1848年到1914年，資本家自由派(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的政治化身)終日遲疑，不曉得應該多大膽，不知道讓步多少是太多或太少。遲疑的結果，是政治的球被從資本家自由派手中搶走，自由主義明確成為世界體系的支配意識型態。⁵

1848至1914年間的演變，堪稱雙重怪異。其一，三個意識

4 「到1840年，工業化特有的社會問題——新的無產階級，失控的劇烈都市化產生的種種恐怖結果——已是西歐嚴肅討論的常見主題，也是政客與行政部門的夢魘。」Eric J. Hobsbawm,《革命的時代, 1789-1848》(*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 New York: World, 1962), 頁207。

5 我另有評論，見本書〈意識型態：三個還是一個？——現代性的偽戰爭〉。

型態的實踐者都從理論上的反國家立場，轉為實際上尋求以各種途徑強化國家結構。其二，自由主義的戰略實際上是由保守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聯合努力實踐。

理論上的主權所有者從統治者轉移到人民之後，打開了究竟有沒有任何國家能反映人民意志的問題。19世紀政治理論的最大問題，即國家vs.社會這項古典的二律背反，其存在基礎就在這裡。主權在民的邏輯，意思是說，在任何衝突裡，你都有義務重社會而輕國家。社會與人民意志實質上是同義詞。三個意識型態都(或明或暗)接受主權在民論，因此三者都聲稱以維護社會的利益為首務，並且從而挑動對國家的敵意。

關於對國家的敵視，三派思想所提解釋當然各有不同。在保守主義者，國家是當前一個行動者，這行動者如果採取任何革新立場，將會打擊到社會與社會秩序的傳統堡壘——家庭、共同體、教會，當然，以及君主制度。這張名單裡出現君主制度，等於無形中承認當時主權在民觀念之盛大；國王如果是真正的主權者，當前立法的就會是他。法統主義者反對路易十八，更無論反對路易腓力，其根據就在這裡。⁶這兩個國王接受立憲觀念，就是屈服於國家可以立法與傳統作對之說。所以，法統主義者以維護國君傳統權威為名，反對當代現實上的國王與國家的權威。

6 「法統主義者反對七月王政，是貴族反對固有權威……」見André-Jean Tudesq,《法國的大貴族(1840-1849)》(*Les grands notables en France [1840-1849]*)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1964), 頁1, 235。

自由主義理論上對國家的敵意直指根本，因此論者大多認為自由主義的最大特徵在於主張國家應如守夜人。其標準口號，則是放任主義。自由主義思想之士與政客也言必稱應該將國家的手從市場拿開，以及應該防止國家侵擾社會的決策。個人之神化，以及主權人民是由擁有「不可讓渡的權利」的個人組成的看法，構成了對國家的這股深刻疑忌的基礎。

最後，我們都知道，社會主義自稱立足於社會的需求與意志，對抗他們所說的，國家的壓迫性（和以階級偏見為根據）的行動。然而這裡必須指出，三個意識型態在實踐上的推進方向，都是增加國家的決策權力與效能，以及其對社會的侵擾力，這是現代世界體系在19與20世紀的軌線。

社會主義意識型態實際上導致國家結構增強，已是人人皆知之事。《共產黨宣言》於此說之甚為明確：

我們已經看到……工人階級革命的第一步，是將無產階級升上統治階級的位置，建立民主。

無產階級將利用其政治統治地位，一步一步從資產階級奪取全部資本，將所有生產工具集中於國家手裡，即組成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裡，而盡可能快速地增加總生產力。

此外，在走向「第一步」的路上，「共產黨人鬥爭爭取立即目標，以加強工人階級的當前利益」。這句話不但化成馬克思主

義社會民主政黨的行動，也化成非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者的行動（例如工黨）：不斷施壓，由國家干預管制工作場所的條件，由國家建立所得移轉結構，以及由國家經手，將勞工階級的組織活動合法化與正當化。

保守主義者在實際上是不是沒有那麼支持國家角色的擴張？保守的政治勢力與地主素有歷史關連，並且維護國家來保障從前代繼承下來的農業利益。這層關係可以暫置不論。保守主義者面對新興的工業主義及其社會後果，視之為社會解體，他們是不是認為國家不必扮演任何反制角色？當然不是。西塞爾以審慎的筆法表達了保守主義意識型態對國家的立場，一語得其神髓：「只要國家的行動不涉及不義或壓迫，保守主義的原則就不能說是與之敵對的」⁷。保守主義的課題非常簡單：為了使社會趨近他們偏愛的社會秩序，他們需要國家干預，加上1789年以後社會結構的迅速演進，他們更需要國家出面。⁸

至於自由主義者，他們曾有一刻沒有光說不練，真的將國家當成守夜人嗎？他們不是打從開始就以國家為促進理性的最

7 Lord Hugh Cecil,《保守主義》(Conservatism, London: Williams and Northgate, 1911), 頁192。

8 這個困境, Philippe Beneton說之相當精確：「傳統主義其實是保守主義最大弱點所在。保守主義者維護一個傳統，每當這傳統被中斷一段長時間而／或讓路給別的（非保守主義）傳統時，他們就面臨種種矛盾……。」「這些矛盾可以說明保守主義政治思想的某些依違搖擺……時而宿命主義，時而主張激進的改革主義，有時希望一個有限國家，有時又要國家強大。」《保守主義》(Le conservatisme, Paris: Presses Univ. de France, 1988), 頁115-116。

適工具嗎？這不就是邊沁哲學激進主義本質所在嗎？⁹ 穆勒，自由主義思想的典型，其主張與此有沒有什麼差異？在英國，自由派想盡辦法要國家放棄農業保護主義，同時又想盡辦法要國家著手制定工廠法。自由主義者對國家的實際立場，我認為說得最好的是霍布豪斯(L.T.Hobhouse)：

看起來，真正的識別不在於自我管制與他人管制之別，而在於強制與非強制之別。國家強制的功能是要克服個人強制，以及任何個人組合在國家內部行使的強制。¹⁰

9 像邊沁那樣一貫的自由主義者很少，但Brebner說明，從個人主義的反國家立場出發，還是會到達集體主義立場。其中關鍵是社會如何得知個體利益的總和。Brebner的解釋是，邊沁認為答案在「個體利益必須由一個全能的立法者『用人為手段』加以歸同或歸一，方法是運用『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這種幸福微積分。」Brebner結論「費邊主義者如果不是邊沁主義者的後裔，是什麼？」J. Bartlett Brebner, 〈19世紀英國的放任主義與國家干預〉(Laissez-Faire and State Interven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收於《經濟史的工作》(The Tasks of Economic History)(Supplement VIII, 1968), 頁61, 66。

10 霍布豪斯(L.T. Hobhouse), 《自由主義》(Liberalis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1), 頁146。意識型態的這個邊沁／霍布豪斯式結論可以解釋，雷根事實上宣稱信奉一種自由派意識型態，卻又怒斥「自由主義」。邊沁與霍布豪斯是不是此種典型？他們比其他自由主義意識型態家接近自由主義者的實踐。如Watson所言：「沒有哪個19世紀美國政黨可以說相信〔以國家為守夜人的理論〕，也沒有一個可以說曾經嘗試將之付諸實踐。」George Watson, 《英國的意識型態：維多利亞時代政治語言研究》(The English Ideology: Studies in the Language of Victorian Politics, London: Allan Lane,

三個意識型態全流於強化國家結構。19世紀下半葉，保守主義者變成自由主義—保守主義者，社會主義者成為自由主義—社會主義者。自由主義—自由主義者何在？

這種政治現實不但可見於詞藻，也可見於政治過程本身。自由主義增加勞工階級政治參與的目標，指向普遍選舉權。自由主義讓工人參與分配剩餘價值的目標，則指向福利國家。然而這兩個領域——整個歐洲引為模範的兩個領域——最大的突破出自兩個「開明保守主義者」之手：狄斯雷里(Disraeli)與俾斯麥。這兩人做了自由派敢說不敢做的巨大一躍。

當然，開明的保守主義者是在社會主義者壓力之下，做此一躍。勞工階級要求普遍選舉權，而且要求我們今天說的福利國家的福利。他們如果不曾提出這些要求，保守主義者不可能讓步。為了馴服勞工階級，開明的保守派推動適時的讓步，因為此舉能整合無產階級，去掉無產階級的激進性。開明的保守主義者如此審時度勢，切中要害，社會主義的戰術也正好為其所用，實是一大歷史反諷。

自由主義者的最後一個主題，也由其敵手落實。嘗試以建設民族精神來實現主權在民的，自由主義者是第一個。保守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在理論上較為頑執。民族並不是傳統保守主義的共同體範疇，社會主義者則陽奉其反民族主義的國際主義。理論上，只有自由主義者視民族為個人意志的適當總和。

然而深入19世紀之際，奪得愛國主義與帝國主義旗幟的，

是保守主義者，首先，並且最有效地將邊遠地區整合於其各自的民族國家的，則是社會主義者。英國工黨在威爾斯與蘇格蘭的力量，法國社會主義者在歐希達尼亞(Occitania)的勢力，以及義大利社會主義者在南方的強勢，可證此說。最後，社會主義政黨在1914年8月響應國旗號召，坦承並證實了他們的民族主義。歐洲的勞工階級輸誠效忠，回報向他們讓步的自由主義國家。他們給了他們的國家正當性。

Schapiro有言，「19世紀在歷史上結束於1914年時，自由主義已成爲歐洲通行的政治生活方式」¹¹。但自由主義政黨逐漸消滅。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核心國家在事實上都走向一場意識態分裂：一邊是自由主義—保守主義者，一邊是自由主義—社會主義者。這分裂之勢，通常多多少少直接反映於政黨的結構之中。

自由主義的議程獲致重大成功。核心國家的勞工階級已被整合於國家政治過程裡，已不復對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功能構成威脅。當然，只有核心國家的勞工階級是如此。第一世界在世界規模上重新打開整個問題，整套劇本又在世界規模上重演。

在世界規模上，保守主義回到了1848年以前的位置。帝國統治他人土地，被視爲當地人的福益，對世界社會與當地會有好處。帝國統治沒有結束的理由。依保守主義之見，帝國是永

11 J. Salwyn Schapiro, 《自由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挑戰》(Liberalism and the Challenge of Fascism, New York: McGraw Hill, 1969), 頁vii。

恆的，至少對野蠻地區是永恆的。誰要是懷疑這一點，只要看看國際聯盟裡的C級託管觀念，即知道理。社會主義作爲反自由主義的意識型態，在俄國大革命及馬列主義建構一套新的政治議程之後，有獲得更新之勢。列寧主義的要義，是指斥其他社會民主派已經成爲自由主義式社會主義者，因而不再是反體制的。我們說過，列寧主義此見相當正確。所以，列寧主義基本上是一種號召，號召重返原初的社會主義議程，並且運用人民的壓力來促成無可避免的社會改變。這項號召直接具體轉變成第三國際支持的一套革命戰術，「二十一條要求」(Twenty-One Demands)即其化身。

自由主義失去了形成自主政治集團的政治功能之後，更新角色，變成一套處理非核心國家(我們今天稱之爲南方)的議程。其先鋒是威爾遜，其次是富蘭克林·羅斯福。威爾遜與羅斯福採取19世紀中期自由主義者的兩大計畫，即普遍選舉權與福利國家，轉用於世界層次。

威爾遜的民族自決論，就是國內普遍選舉權在世界層次上的運用。每一位個人在其國內應該擁有平等的投票權，每個國家在世界體中應該享有主權並且地位平等。羅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重新發出這項號召，但加上以「技術協助」與「援助」來促進「未開發國家的經濟發展」。這是福利國家在世界層次上的轉用；福利國家的原意，是要達成局部且有限的剩餘價值重分配，現在則變成世界剩餘價值的局部且有限的重分配。

現在，歷史多多少少開始重演。自由主義者宣布議程，然後遲疑不決。終於落實自由主義議程的，是社會主義的人民壓

力(基本上,指民族解放運動),以及開明保守派——例如戴高樂——的大膽躍進。從1917年到1960年代的這段過程裡,保守主義者在世界層次上轉化成自由主義式保守主義者。他們擁抱去殖民化和「發展」。1960年在南非國會演講,要南非當局順著「改變的風」走的,是麥米倫(Harold Macmillan)。同時,列寧主義者變成自由主義社會主義者,這過程至戈巴契夫而達於極點,但從史大林和毛澤東就開始了。列寧主義的去激進化有兩項關鍵要素:一是接受一國社會主義論,定義是趕上工業化;二是在邦際體系內部尋求國家權力與優勢。

所以,保守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都接受了自由主義的世界層次議程,即自決(又名民族解放)與經濟發展(有時稱為建設社會主義)。但是,在世界層次上,自由主義的議程不可能像1848至1914年階段在核心國家的國家層次上那麼成功。理由有二。

第一,自由主義議程的第三個要素,即全國層次的「歷史性的妥協」——全國團結——曾經抑制了階級鬥爭,然而這項要素不可能在世界層次上出現。在西歐與北美,這第三要素是國家層次的自由主義方案繼普遍選舉權與福利國家之後的最後一封印。「世界民族主義」在理論上是不可能的東西,因為人宣示一種主義,必有對抗的對象,而世界民族主義無此對象。¹²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點:實施福利國家,牽涉到所得移轉,核心

12 我曾在我一篇文章裡詳細討論此事。〈國族與宇宙:可不可能有所謂世界文化?〉(The National and the Universal: Can There Be Such a Thing as World Culture?),收入《地緣政治與地緣文化》(Geopolitics and Geo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頁184-199。

國家能夠實施福利國家,是因為其所得移轉的總量不會大到威脅到世界層次的資本累積。在世界層次複製所得移轉,就不是如此,再考慮資本主義式累積那種製造兩極化的本質,此理尤明。

世人也是經過相當時日,才充分意識到,要在世界層次上消除北南差距是不可能的事。1945年以後的階段,起初曾造成一股令人非常鼓舞的樂觀氣氛。世界各地紛紛去殖民化,加上世界經濟令人難以置信的擴張及其滴澤效應,導致一片玫瑰色的改革主義憧憬(革命詞藻粉飾著改革主義戰術,看起來更甜美有加)。這段時期,所謂的社會主義集團形同充當世界資本主義的遮羞布,防堵過度的不滿,以及,用赫魯雪夫那句令人難忘的話說,矢言「我們將埋葬你們」。

1960年代,勝利主義仍然使人不能清醒地評估資本主義的現實。1968年的世界革命在陶醉之餘,則彈出了第一個現實主義的音符。我主張1968年世界革命持續了20年,高潮是共產主義1989年崩潰。在世界歷史的舞台上,1968年與1989年構成一個宏偉事件¹³。這事件的意義在於自由主義意識型態之解體,一個為期兩百年的紀元在此終結。

1968年彈出的是什麼樣的現實主義音符?正是我們此文一直在提出的主題,亦即世界體系過去一百多年來的歷史是自由

13 G. Arrighi, T.K. Hopkins和華勒斯坦持此立場,見〈一九八九:一九六八的延續〉(1989: The Continuation of 1968), Review 15, no. 2 (Spring 1992), 頁221-242。

主義意識型態勝利的歷史，老左的反體系運動都變成我所說的「自由主義—社會主義者」。1968年的革命首次向保守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三合一的意識型態模型提出嚴肅的思想挑戰，堅定指出其中只有自由主義獲得宣揚，自由主義是「問題」所在。

說來諷刺，自由主義共識的正當性被打破，結果似乎是保守主義與社會主義意識型態的復興。突然之間，新保守主義的理論家似乎吸引了為數甚夥的聽眾，新社會主義者也是（例如1970年代的許許多多毛派運動）。1968年的沸騰很快平息並被壓制。然而自由主義共識已無可能復全。此外，自由主義的樂觀主義也時不我予。世界經濟進入漫長停滯的B階段。這B階段在1967-1973年開始，至今尚未走完。世界體系在1970年代與1980年代的經濟歷史——石油震盪及其造成的資本再度中央化，第三世界（與社會主義集團）首先出現的外債危機，美國繼之浮現的外債危機，以及資本從生產性的企業轉向金融投機，這裡無法詳述。

1968年革命震盪的累積效應，加上世界經濟長期下降在世界三分之二國家帶來的負面後果，對世界各民族的心理造成重大衝擊。1960年代，樂觀主義高唱入雲，聯合國宣布1970年代將是「發展的十年」。事實正好相反。對第三世界大多數國家，那是倒退的十年。一個接一個國家認清現實，知道他們的落後差距在任何可預見的未來都無法消除。國家政策致力於借入、借出及偷騙，維持預算不要崩潰。

這是普遍的經濟困境，在經濟上與政治上是一大打擊，在

意識型態上甚至是個更大的打擊。受創最重的，是最大聲宣揚自由主義改革主義意識型態的——先是那些激進的民族解放運動，然後是所謂的共產政權。今天在許多（也許大多數）這些國家裡，自由市場的口號掛在人人嘴巴上。然而這是絕望的口號。極少人真的相信（或者說，極少人會長久相信）這些口號會帶來什麼不同，而且這些少數人可能會失望。這些國家其實自認應該獲得世界的同情與施捨，而我們都知道，這些同情與施捨極少產生真正的歷史結果。

核心國家的政客與政論家自鳴得意，以至於相信共產主義已經崩潰，而昧於崩潰的其實是自由主義的許諾。其後果不必太過多久，就會降臨，因為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型態，有賴於一種「開明的」（對立於「狹隘的」）上層階級利益觀。上層階級對其利益的看法能開明，有賴人民的力量以既強烈又馴抑的形式表達壓力。要能抑制人民的壓力，則有賴於為下層階級所設程序可信。這幾點是犬牙交錯的。你失去可信性，那些壓力就不會以馴抑的形式表達。那些壓力不以馴抑的方式表現，上層階級就不願讓步。

在法國大革命創造的新心態的基礎上，形成一組意識型態。1848年世界革命啟動一個歷史過程，這過程導致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的勝利及勞工階級被整合。一次世界大戰在世界規模上更新問題，歷史過程重演而無法完成。1968年世界革命瓦解了意識型態共識，其後20年目睹自由主義信用毀壞，這場毀壞到共產主義1989年崩潰而達於極頂。

在心態上，我們已進入一個新紀元。一方面，有對民主的

熱烈呼喚。這呼喚不是自由主義的實現，而是對自由主義的拒斥，說當前世界體系不民主，因為經濟福利並未平等分享，因為政治權力實際上並未平等分享。社會解體，而非進步的改變，正在被視為正常。而社會解體，人們就尋求保護。

從前，人們轉向國家以確保改變，現在，人們轉向集團的團結（一切種類的集團）以尋求保護。這是一種完全不同的球賽。未來50年這場球怎麼打法，非常不確定，一來因為我們沒有過這種球賽，二來因為一個解體中的世界體系的波動可能非常巨大。過去兩百年來主宰我們的行動的那些意識型態——政治行動的議程——在即將來到的這個階段都不會非常有用場。我們如果不能認清這項事實，要渡過這個階段就不會非常順利。

波斯灣危機標誌著新的世界失序的開始。失序未必糟過（或好過）秩序，但它需要一種不同的行動與反動模式，稱之為秩序，或稱之為自由主義的勝利，是同一回事，也同樣不高明。

第六章

國家發展的觀念，1917-1989年： 輓歌與安魂曲

至少自16世紀以降，歐洲的思想家就一直在討論如何增加一個國家的財富，政府們也想辦法，或者，被勸促想辦法，維持並提升財富。所有關於重商主義的辯論，中心主題都是如何確保一個國家進來的財富比出去的多。亞當斯密1776年寫《原富》，抨擊政府可用限制對外貿易來增加國家財富的觀念。他倡揚另一種觀念，說盡量擴大個人企業家以他們認為最明智的方式在世界市場上行動的能力，其實才是提升國家財富的最適途徑。

在19世紀，基本上屬於保護主義的立場，與自由貿易立場之間的這種緊張關係，成為世界體系國家的決策主題。在那些國家的主要政治勢力之間造成分歧的議題中，這往往是最重大

的一個。當時，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很明顯有一個中心意識型態主題，說每個國家都能到達，而且大概終於都會到達一個相當高的全國所得水平，辦法則是採取有意識的、理性的行動。這種看法，配合啓蒙運動的人類必然進步論，以及體現此論的，人類歷史有其目的的看法，十分搭調。

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西歐一系列國家，以及世界其他由白人屯墾建立的那些國家，顯然的確已經達到——用我們當代的話說——「開發」之境，或者，至少已經相當接近這境地。當然，以1990年的標準衡量，這些國家（甚至大不列顛）遠遠不如他們後來那麼「現代」或富裕，但是以當時的標準去看，他們是甚為輝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一個震驚，因為它似乎直接威脅到我們今天所說世界經濟核心地區的普遍繁榮。

1917這一年往往被視為現代世界體系歷史上的一個意識型態轉捩點。我同意它是個轉捩點，不過，不是通常所主張的那種轉捩點。1917年4月2日，威爾遜總統對美國國會演說，呼籲對德國宣戰。他說：「世界必須成為民主制度安全之地」。同年11月7日，布爾什維克以工人革命之名攻打冬宮。20世紀一大意識型態二律背反，即威爾遜主義與列寧主義之背反，可以說誕生於1917年。我主張這二律背反死於1989年。我將進一步主張，這兩個意識型態雙雙視為己任的關鍵課題都是如何在政治上整合世界體系的邊陲。最後，我還將說明，威爾遜主義與列寧主義進行這種整合，所用機制都是「國家發展」，兩者之間的基本爭執只不過在於如何才是走向這發展之路而已。

威爾遜主義立基於古典自由主義前提之上。它是普遍主義的，聲稱其箴規放之四海皆準，認為人人都根據理性的自利做事，因此人人都是講求合理的。所以，和平與改革主義的行事是信而有徵的。這種主義也十分強調合法與形式。

當然，這些金科玉律沒有一樣是新東西。在1917年，它們其實已經是老掉牙的東西，威爾遜的革新（不是發明，而是革新）是說，這些箴規不但適用於國家之內的個人，也適用於國際範圍內的民族國家或人民。威爾遜主義的核心要目，即民族自決，不過是將個人自由的原則移用於邦際體系的層次。

將一個原意只適用於個人層次的理論轉用於群體層次，是非常複雜的事。Ivor Jennings對威爾遜的自決論有此嚴厲批評：「表面上，這事似乎合理；讓人民決定吧。其實卻很可笑，因為人民是無法決定的，除非有人先決定人民是誰」。¹ 真是一語中的。

不過，有一點還是很明顯，即威爾遜談民族自決的時候，並非擔心法國或瑞典。他談的是清算奧匈帝國、鄂圖曼帝國和俄羅斯帝國。一個世代之後，羅斯福重拾這個主題，談的則是清算大英、法國、荷蘭及其餘當時剩下的帝國結構。他們談的

¹ Sir W. Ivor Jennings, 《自治之道》(The Approach to Self-Government;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56), p. 56.

自決，是世界體系邊陲與半邊陲地區的自決。

列寧使用十分不同的口號，即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與反帝國主義，卻追求非常相似的政策目標。他的觀點，當然另外有其前提。他的國際主義是世界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工人階級據說意義獨特，將會成為「人民」的同義詞。民族在馬克思主義裡並沒有長程地位，因為據說民族最後將會消失。不過，民族究竟是個短程，甚至中程的現實，馬克思主義政黨不但不能忽視，戰術上甚至可以利用來追求這些政黨的目的。

俄國大革命理論上宣斥俄羅斯帝國，而且和威爾遜主義一樣倡言民族自決。「帝國」大部保存了下來，布爾什維克也有顧慮，堅稱這回是各共和國自願加入聯邦——就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U.S.S.R.)——聯邦裡的民族享有很大的形式自主餘地，連各共和國內部各民族也是。放棄德國革命的一切希望之後，列寧在巴庫宣布重點轉向「東方」。馬列主義本來是一種鼓吹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造反的理論，經此轉變之後，實質上成為反帝國主義的理論。這個重點的轉移，久而久之，方才形成。其後數十年，讀列寧《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Imperialism: The Last Stage of Capitalism)的人，可能多過讀《共產黨宣言》的人。

因此，威爾遜主義與列寧主義成為互為競敵的理論，彼此爭取世界體系邊陲地區的人民。由於互為競敵，兩者在宣傳上極力強調彼此的差異。當然，真實的差異是有的。然而我們不可盲目不見兩者的相似之處。兩個意識型態不但共享民族自決這個主題，還共同認為這主題對邊陲地區的政治生活具有直接

的(雖然不盡然迫切的)意義。也就是說，雙方都支持後來所謂的「去殖民化」。此外，談到誰是應該享有自決權的民族，雙方提出的名單也非常近似。在有關世界強權關係的一些次要考慮上，雙方當然有其戰術上的小爭執，但兩者並沒有根本歧異。雙方的名單上都有以色列，都沒有庫德族。班圖斯坦人(Bantustans)在理論上的正當性，雙方都不接受。至於巴基斯坦與孟加拉，雙方在理論上都不認為有理由反對。在判斷正當性的尺度上，雙方說不上有何根本差別。

關於走向自決之路，雙方的確有些分歧。威爾遜派主張「憲法」之路，亦即由一個帝國強權與自決民族的合適代表協商，達成漸進的、有秩序的權力轉移。就像法國人後來所言，去殖民化應該是殖民者給殖民地的。列寧主義根據其「革命」傳統，支持一條偏向造反的「民族解放」之路，說獨立不能由人家給你，要你自己去拿。這觀念後來化身為毛澤東的拖延鬥爭(protracted struggle)，學樣者很多，更重要的是，成為運動的基本戰略之一。

但是，這分歧不宜誇大。依照列寧主義，和平的去殖民化並非不能接受——只是不大可能。革命的民族主義亦非本質上就不能與威爾遜主義的理念相連，只是威爾遜主義認為它危險，應該盡可能避免。不過，其中的爭辯還是真實的，因為這辯論底下是另一項爭辯：要由誰來領導自決的鬥爭。這一點很要緊，因為它可能決定著「後獨立」的政策。威爾遜派認為民族運動的天然領導者是知識階層與資產階級，他們受過教育、體面而謹慎，其可能的作法是說服傳統領導階層裡較為「現代」

的分子參加政治改革並接受通情達理的議會模式，用以組織新獨立的國家。列寧主義者則認為領導地位應該交給一個布爾什維克黨模式的黨運動，即使這民族運動並不接受整個列寧主義意識型態。領導者是「小資產階級」，亦無不可，只要是「革命的」小資產階級。黨／運動掌權之後，會成為黨／國。關於自決由誰來領導的差異，也不能說得太大。所謂體面的知識階層／資產階級，和所謂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其實是同一批人，或者，至少也是稱兄道弟之誼。再者，黨／運動雖是列寧主義運動的公式，卻也是威爾遜主義運動一樣常用的公式。至於一個民族的「後獨立」政策將會是什麼，威爾遜派和列寧派都不大擔心，先看自決鬥爭再說。

二

那麼，後獨立政策是何情況？威爾遜主義與列寧主義的二律背反在這裡應該顯出其重要性了吧。在一個重要層面上，兩條獨立之路的確形成彼此相反的后獨立政策。這個重要層面是外交政策。冷戰期間，在美國與蘇聯交手的所有世界議題上，核心地區外的國家不偏美，則偏蘇。有些國家被視為或自視為「親西方」，其他國家則自視屬於包括蘇聯在內的世界進步陣營。

立場當然不一而足，而且並非所有國家都長期一致。不結盟就是一個重大運動。不過，在不算重要的事情上，例如聯合國大會的決議案投票，有許多票是很容易預測的。美國及其盟

國，和蘇聯及所謂社會主義集團，都花費相當多外交精力，將舉棋不定的國家往他們所要的方向推擠。威爾遜主義和列寧主義的宣傳，直接是透過政府媒體，間接是透過學術討論行之。

但是，細看不同國家的內部現實，即可見得，在政治和經濟上，他們的差異都不像理論或宣傳說的那麼多。在實際的政治結構上，大多國家大多時候是一黨國家（事實上或法律上），或者軍事獨裁。即使形式上是多黨制度，實際上也往往是一黨支配，沒有政權改變這回事，除非發生軍事政變。

經濟方面也沒有太多差別。私人地方企業獲得容許的程度有其變化，但幾乎所有第三世界國家都有大批國營企業，而沒有一個國家以國有制為唯一財產形式。外來投資獲得容許的程度無疑變化更大。比較「親西方」的國家鼓勵，甚至招引外人投資，雖然經常是由一家國營公司與外人合資。比較激進或「進步」的國家，對外資較為慎防，雖然很少全盤拒斥。反而是OECD國家來的投資者比較不願在這些地方投資，因為他們認為在這些地方投資，政治風險較高。

最後，外援的情況也沒有太大差異。幾乎所有第三世界國家都主動尋求外援，有的直接獲得贈款，有的是貸款。伸援者通常考慮潛在受援者在外交政策上互為配合。基本上接受OCED國家援助的國家，名單甚長。基本上接受社會主義集團國家的，名單短一點。少數國家自覺地側重向北歐國家（加上荷蘭與加拿大）求助。為數很多的國家尋求多來源的援助。最後，外援大多出以同樣的形式：人事援助與附帶著條件的經援，既用於支持軍事結構，也用於資助所謂的發展計畫。

所有這些國家之間，最類似的是他們全都相信「國家發展」的可能性與迫切性。在運作上，國家發展的定義一律是「趕上」。當然，與之有關的每個人都視之為一件漫長又艱難的工作，但人人也都認為這件事是可以做成的，只要追求正確的國家政策，就能做到。意識型態上，這些政策包括促進資金、商品及勞動自由流動，不受國界限制（一個極端），到由國家在大致封閉的疆內全盤控制生產與交換（另一極端）。當然，兩極之間是相當不少的各種變化。

聯合國所有非核心的會員國，從蘇聯到阿根廷，從印度到奈及利亞，從阿爾巴尼亞到聖露西亞，還有個共通之處，就是國家目標都是要增加全國的財富，以及將其基本設施「現代化」，並且對這目標抱持樂觀主義。另一共通之處是，追求這目標的上策是充分參與邦際體系。任何一個國家被排除在外，即使是部分的被排除，就像多年前的中共，都會非常努力的取回其不可質疑的完全會員地位。

簡而言之，威爾遜主義與列寧主義的民族自決意識型態，其抽象的民族平等，以及兩個意識型態所體現的發展主義與典範，壓倒性地、孜孜不輟地被接受為世界體系邊陲與半邊陲地區政治運動的運作綱領。

在此意義上，這分析有沒有效力，以及這些建議不可行，第一個測試案子是蘇聯。在蘇聯後革命國家的形式結構——一個聯邦，各邦又包含自治的次單位——就是要回應自決論的法律公式。列寧提出「共產主義等於蘇維埃加電氣」這個口號，就是將國家（經濟）發展當作首要的國家政策目標。數十年後，

赫魯雪夫說，蘇聯將在西元2000年前「埋葬」美國，他也就是在發抒對「趕上」的樂觀主義。

這些主題在兩次大戰之間一年比一年強烈——在中歐、拉丁美洲、印度，以及一切地方²。蘇聯本來的大話是說，在1930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之時，蘇聯非但沒有失業，反而有一套迅速工業化的方案。

1945年以後，國家發展的世界大合唱更大聲。西歐與日本（基本設施經過大規模的戰爭破壞）相對迅速重建，似乎證實，加以意志與投資，可得而迅速提升科技，從而提高總體生活水準。突然之間，經濟發展的主題無人不唱——政客、新聞業者、學者人人皆然。工業化國家那些被遺忘的角落（美國的南方、義大利南部，等等）被列為「發展」的標的。第三世界也要發展——部分透過自助，部分由比較先進的「已開發」國家協助。聯合國也正式宣告1970年代為「發展的十年」。在世界各大學，發展成為新興思想主題。一個自由主義典範，「現代化理論」，在1950年代大受闡揚，在1960年代有馬克思這個反典範與之相對。本質上，這當然就是威爾遜主義，列寧主義二律背反的最新版。實踐上，給國家政策的建議可能是兩極對立，但兩套理論也有其對國家政策的一套建議。兩套理論的實踐者擔任政府們的顧

2 文獻甚多。總論有二，一是Joseph L. Love,〈將低度開發理論化：拉丁美洲與羅馬尼亞，1860-1950〉(Theorizing Underdevelopment: Latin America and Romania, 1860-1950), *Review* 11, no. 4 (Fall 1988), 頁453-496。二是Bipan Chandra,〈殖民地印度：美國與印度的開發觀〉(Colonial India: British versus Indian Views of Development), *Review* 14, no.1 (Winter 1991), 頁81-167。

問，都滿懷自信說，他們的建言如果獲得落實，國家發展就會隨之而至，這些國家就會趕上。

現實世界情況如何，我們已經知道了。1945到1970年，全世界都努力擴展生產手段與水平。這段期間，GNP與平均GNP成爲衡量經濟成長的主要工具，經濟成長則是經濟發展的主要指標。

這是一個孔德拉季耶夫A式的格外擴大階段。成長的數額世界各地頗有差異，但大體上，每個地方的數字都上升，所謂社會主義國家亦然。同一時期，第三世界許多運動在政治上獲得勝利。這些運動追求鬥爭爭取國家權力的戰略，以便運用國家權力落實能夠保證國家發展的政策。所以，一切似乎都朝正面方向走：舉世經濟擴張；威爾遜主義／列寧主義的眼光一國一國實現；成長率幾乎普世上升。發展主義當令；全世界的共識是，發展是正當的，而且無可避免。

但是，這共識遭遇兩場震盪，至今尚未恢復，而且我認爲今後也不會恢復。第一場震盪是1968年世界革命。第二場震盪是1970-1990年的世界經濟停滯，邊陲與半邊陲地區幾乎所有政府遭到經濟失敗，以及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權崩潰。1968年打破了意識型態的殼，1970與1980年代將剩下的意識型態外表拿掉。北南兩極化的痛處被揭開而暴露出來。當時，世界在情急之下，齊唱市場可用，彷彿市場是萬靈丹。然而市場只是含汞紅藥水，無法防止情況進一步惡化。目前拋棄「社會主義」口號而轉向「市場」口號的大多數國家，在1990年代很不可能看到生活水準大幅改善。畢竟，1980年代緊抱市場口號的大多

數非核心國家是收穫寒儉的。論者總是提出罕見的幾個「成功」故事(目前的英雄是南韓)，忽略更多數的失敗例子，以及巴西等早先所謂成功故事的逐漸褪色。

主要的問題不是某些國家政策有沒有導致經濟開發，而是會不會繼續有風靡天下的信念，說經濟發展可能將會是任何國家政策的結果。

三

1968年世界革命產生於意識到國家發展並未發生；這場革命還不是感覺到這目標是個幻象的結果。一切起事(東、西、南、北)，無論地方性的差異如何，都有兩大共通主題。第一個主題是抗議美國在世界體系中的霸權(以及蘇聯與此霸權的勾結)。第二個主題是抗議所謂老左運動上台掌權後了無作用。這些運動在全世界以各種版本上台掌權——西歐是社會民主，東歐是共產黨，在南方是民族解放運動。這些運動在動員的歲月裡承諾要轉化世界，上台執政之後卻沒有做到，而被攻擊過度深入參與世界體系，太不反體制。³

各地參加1968年起事的人告訴「老左」政治運動說，他們的組織活動在形式上達成了他們歷史性地給自己設下的政治目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取得了國家權力，但取得國家權力的

3 我有一文有更詳細的討論，〈法國大革命作為世界歷史事件〉，收於《重新思考社會科學》(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頁7-22。

理由應該是帶來更大的人類平等，而這一點他們明顯沒有做到。這段時期，毛主義風靡世界，原因是它的最有力的方式表達了這雙重拒斥：拒斥美國霸權（及蘇聯與此霸權的勾結），和拒斥「老左」運動的無效。不過，毛主義代表的論點是說，此事之過，在於「老左」運動的領導階層無能；用毛主義的術語來說，這些領導階層是「資本主義同路人」。言下之意，運動如果現在能拒斥這些「資本主義同路人」，來一場「文化大革命」，最後將能達成國家發展的目標。

1968年世界革命的意義不在其所帶來的政治改變。到1970年，各處的起事不是已被壓制，就是逐漸熄滅。這場革命的意義也不在其所發動的新理念。毛主義在1970年代短暫風發，在1970年中期已經解體，而且首先在中國解體。新的社會運動的主題——「少數」的文化民族主義、女性主義、生態學——比毛主義更具持久力，但至今有待找到一個堅穩的意識型態立足點。1968的意義在於它戳破威爾遜主義／列寧主義的共識，質疑發展主義事實上是不是曾經達成任何可長可久的目標。它播下意識型態之疑的種子，從而腐壞了信仰。

信仰一旦動搖，共識觀點一旦被貶為只是許多觀點之一（即使仍是多数人抱持的觀點），日常現實就可能產生將這意識型態剝光的效果。1970年代與1980年代就出現這效果。世界經濟停滯，也就是孔德拉季耶夫B階段，有兩場連台大戲。一台是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在1970年代的石油漲價，一台是1980年代的債務危機。

OPEC的石油漲價最初被視為將會重新使人相信國家發展

的可能性。此事似乎證明，南方的初級生產者如果協同行動，就能相當影響貿易條件。西方輿論開始歇斯底里，煽動這樣的詮釋。但沒有多久，就出現了比較清醒的評估。實情是怎麼回事？OPEC國家在伊朗王室與沙烏地阿拉伯（這裡不妨指出，兩者都是美國在OPEC國家中最重要的朋友）將石油大幅漲價，使相當大比率的世界剩餘價值流入他們手裡。這代表所有不產油的第三世界與社會主義國家國庫大量流失，而當時他們本身出口品的世界市場正在減弱。工業化大國的國庫流失亦自不小，但所占百分比遠遠沒有這麼可觀，而且是較為暫時性的，因為這些國家比較容易採取措施來重新調整其能源消費的結構。

流經產油國的世界盈餘又作何用場？其中一部分當然用於一些產油國的「國家發展」方案，諸如奈及利亞、阿爾及利亞、伊拉克、墨西哥、委內瑞拉及蘇聯。有些在產油國裡流入大手筆的奢侈消耗，也就是說，轉入OECD國家——諸如採購商品、投資，或者，以資金逃竄的方式轉入。其餘的錢，則擺進美國與歐洲銀行。擺在這些銀行裡的錢然後又以國家貸款的方式流入第三世界與社會主義國家（甚至包括產油國）。這些國家獲得貸款，能解決國際收支的立即問題。這些國家正是由於石油漲價，收支平衡問題特別嚴重。這些國家有了貸款，用這些錢維持進口（即使出口在下降），而能暫時擋住政治反對勢力的打擊。這反過來又為OECD國家的製造品維持了需求，而減低世界經濟停滯對這些OECD國家的影響。

但是，在1970年代，一批第三世界國家仍然開始感受到成長率下跌加上貨幣準備與社會準備枯竭的影響。到1980年代，

世界無處不感受到它的影響(東亞除外)。外債危機首度公開，是1980年在波蘭。吉列克(Gierek)政府在1970年代和每個政府一樣借錢花用。但帳單到期，波蘭政府思謀應付，辦法是提高國內物價，讓波蘭的勞工階級來扛擔子。結果就是格但斯克造船廠風潮和團結工聯。

1980年代，邊陲與半邊陲國家陷入經濟困局。這些國家的困境都有兩項共通要素。其一是人民對執政的政權普遍不滿，繼之以政治幻滅。即使政權被推翻，無論是以暴力推翻，或政權自腐而崩潰，無論是軍事獨裁、共產黨或非洲的一黨政權，這政治轉化的壓力也是負面多於正面。其二是OECD國家冷面無情。OECD面臨自己的經濟困局，對第三世界與社會主義政府的財經困境沒有多大耐心。後者被IMF限令滿足一些嚴苛的條件，得到一些可笑的協助，聆聽市場與私有化之美的說教。1950年代與1960年代凱因斯主義的寬貸已一去不返。

1980年代初期，拉丁美洲國家一連串發展主義的軍事獨裁政權被拆解；這些國家發現了「民主」。在阿拉伯世界，發展主義的世俗政權受到伊斯蘭主義者尖銳攻擊。在黑色非洲，一黨專政曾經為發展主義支撐希望之地，如今神話破滅。東歐與中歐1989年的戲劇性轉化令世人大為訝異，雖然這些轉化在波蘭1980年那些事件裡已明露跡象。

在發展主義之路已經開始的蘇聯，我們目睹了蘇聯共產黨及蘇聯本身的解體。發展主義在巴西或阿根廷失敗的時候，有人還可以說是因為他們未能追隨蘇聯的政治道路所致。但發展主義在蘇聯失敗，又怎麼說？

四

1917-1989年的故事宜有輓歌，也宜有安魂曲。輓歌所輓，是威爾遜列寧主義民族自決的勝利。這七十年裡，世界大致已去殖民化。歐洲以外的世界被整合於邦際體系的政治建制形式之中。

這去殖民化部分是人家給的，部分是自己爭取的。整個過程需要難以置信的政治動員，而這動員在各地都喚醒意識。自此以後，要將精怪放回盒子裡，將非常困難。的確，愈來愈小的實體紛紛尋求民族身分，從而要求自決權，自此以後的主要難題，是如何來堵住這個體民族主義病毒的擴散。然而，打從開始就很明顯，人人都要自決，而其首要目的是為了走向繁榮。當事人一開始也知道走向繁榮之路是一條艱辛的路。前面說過，他們追求繁榮的方式是追求國家發展。有很長一段時間，與這追求比較合契的是列寧主義，而不是威爾遜主義。與去殖民化比較投合的則是威爾遜主義。

由於這過程有兩個步驟——先是去殖民化(或與之相當的政治改變)，然後是經濟發展——因此，其中威爾遜主義這一半總是等著列寧主義這一半實現。國家發展的前景將世界體系的整個結構正當化。就此意義而言，威爾遜主義意識型態的命運取決於列寧主義意識型態的命運。粗糙而且比較不客氣的說，列寧主義意識型態是威爾遜主義意識型態的遮羞布。

今天，這遮羞布已經掉落，皇帝赤條條的。1989年全世界

及民主勝利的高喊，難掩邊陲國家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架構內的經濟轉化並無任何真正寄望的前景。因此，為列寧主義唱安魂曲的將不會是列寧主義者，而是威爾遜主義者。威爾遜主義者進退維谷，別無可信的政治選擇。由布希總統在波斯灣危機中進退皆輸的兩難困境，可見一斑。而波斯灣危機還只是故事的開始。

未來數十年裡，北—南對抗行將出現更戲劇性（與更暴力）的形式，我們已看見世人多麼懷念威爾遜主義／列寧主義意識型態二律背反這個意識型態黏合劑。它代表了一場理念、希望及人類精力雖然光榮但在歷史上只能燦爛一時的華麗展現。輝煌一場，後繼為難。但是，唯有找到一種新的，而且遠更紮實牢靠的烏托邦眼光，我們才能超越即將到臨的艱難時代。

第三部

自由主義的歷史困境

第七章

什麼現代性的結束？

我在1940年代末期上大學之時，所學無非**現代**之美及其現實。將近半世紀後的今天，則入耳無非**後現代**之美及其現實。現代性不復是我們得救之道，而是惡鬼了，怎麼回事？那時候說的現代性是不是我們現在談的現代性？我們處於其結束的，是哪個現代性？

首先照例要翻牛津英語字典(OED)。字典告訴我們，“modern”這個字的字義裡有一個是歷史性的：「通常指(對照區別於古代與中古)中世紀之後的時代」。OED舉出一個早在1585年就使用此義的例子。此外，OED說，modern也意指「屬於或源自當前時代或時期」，如此則“postmodern”(後現代)是個矛盾修辭，有待解構。

大約50年前，modern有兩個清楚的涵義。其中一個正面而前瞻。據此涵義，modern意指最先進的科技。此種用法，其觀

念架構推斷科技的進步沒有止境，創新也不斷而無止境。結果，這種現代性是一種稍縱即逝的現代性——今天現代之物，明天就過時。這種現代性在形式上相當物質：飛機、空調、電視、電腦，這種現代性的吸引力尚未涸竭。新時代無疑有數以百萬計子民表明拒斥這種對速度、對控制環境的不斷追求，說這種追求不健康，根本有害。但是在亞洲與非洲，在東歐與拉丁美洲，在西歐與北美的貧民區，有數以十億計人，不是數以百萬計人，渴望充分享受這種現代性。

現代這個觀念另外還有一大涵意，是偏向反對什麼，而比較不是肯定什麼。這涵意比較不是前瞻，而是好戰（而且以自我滿足為主），物質層面少，意識型態成分多。據此涵意，現代意指反中古，與中古形成二律背反，**中世紀**一詞在此是心智狹隘、教條獨斷，以及權威對人的限制的化身。這種「現代性」就是伏爾泰高喊「消滅無恥」，就是米爾頓在《失樂園》裡頌讚魯西弗（Lucifer），就是所有大寫的「大革命」——英國、美國、法國當然屬之，但俄國與中國的也屬之。在美國，可言者有政教分離，美國憲法前十項增補條款，解放黑奴宣言，史克普斯案（*Scopes*）裡的達洛（Clarence Darrow），布朗對教育委員會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以及羅伊對韋德案（*Roe v. Wade*）。

簡言之，此即所謂人類自由對邪惡與無知勢力的勝利。這條軌線之必然進步，一如科技之前進。但這不是人類對自然的勝利，而是人類對本身的勝利，或者說，對特權者的勝利。其路徑不是思想上的發現之路，而是社會衝突之路。這種現代性

不是科技的現代性，不是鬆綁的普羅米修斯的現代性，不是無限財富的現代性，而是解放的現代性，實質民主的現代性（人民主治，對立於貴族統治或精英統治），人類的實現的現代性，以及節制的現代性。這種現代性不是稍縱即逝的現代性，而是永恆的現代性。這種現代性一旦獲得，就再不出讓。

兩個故事，兩種論述，兩種追求，兩種現代性，十分不同，甚至彼此相反。但是，在歷史層次，它們彼此深深交纏，產生了深刻的混亂、不確定的結果，以及相當多失望與幻滅。這象徵性的配對，形成我們現代世界體系，即歷史資本主義體系的核心文化矛盾。這矛盾之尖銳，以今日為最，而導致建制上與道德上的危機。

我們可以從我們現代世界體系的歷史，來追溯兩種現代性——科技的現代性與解放的現代性——這種混亂共生關係的歷史。我要將故事分成三部分：現代世界體系自15世紀中葉起源，到18世紀末之間的300至350年；19世紀到20世紀大部分，或者，用象徵性的年代來說，1789年到1968年；後1968階段。

現代世界體系與**現代性**這個理念從來不曾充分契合，但不能充分契合的原因在上述三個階段各有不同。第一階段裡，全球只有部分（基本上是歐洲大部與美洲）構成這歷史體系；這體系，我們不妨稱為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我們可以用此名稱，因為當時的體系已經具備一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三項定義特徵：在體系邊界內軸心式勞動分工，核心經濟活動與邊陲經濟活動形成兩極化；主要的政治結構，即國家，在一套邦際體系之內互成環節，而且受這邦際體系限制；這體系的邊緣與軸心

勞動分工的一致；追求資本不斷累積的佔優勢國家凌掩那些作此追求的國家。

不過，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地緣文化在這第一階段尚未堅實就緒。這個階段裡，世界上坐落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之內的地區還沒有清晰的地緣文化規範。關於一些根本問題，諸如國家是否應該世俗化，主權在道德上應該在誰身上，知識分子的局部法人自主性，以及社會是否容許多種宗教，都還沒有社會共識。這些故事，如今大家都已熟知。這些故事說的是擁有權力與特權者試圖圍堵進步的力量，他們仍然控制著主要的政治與社會建制。

有必要指出的關鍵是，在這段漫長的時期裡，維護科技的現代性與維護解放的現代性的人，在政治上往往面對同樣一批強勢的敵人。這兩種現代性似乎相互連帶，很少人會用心遣詞用字，在兩者之間作個區分。伽利略被迫屈服於教會，但喃喃自語（大概是出於僞託）「但地球就是在動」（*Eppur si muove*），論者即認為他既是在為科技進步而爭，也是在為人類的解放而爭。要為啓蒙運動的思想作一總撮的話，可以說它相信科技的現代性與解放的現代性是同一回事。

如果說這裡有文化矛盾，那就是經濟上與政治上，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是在一個架構內運作，而這架構缺乏能夠支撐並加強這種經濟的地緣文化。於是，整套體系與它自身的能動衝勁並不搭調，可以視為缺少協調，也可以視為它在鬥爭自己。這套體系持續不斷的這種困局，是地緣文化問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如果要依循其內在邏輯來欣欣向榮並且擴張，非作重大調

整不可。

法國大革命逼出問題，不但使法國，也使整個現代世界體系逃無可逃。法國大革命不是孤立事件，而是類似颱風眼。它之前、之後的事件有美洲的去殖民化——英屬北美、西屬美洲及巴西的去殖民化；海地革命；美洲土著失敗的起事，如秘魯的圖帕克·阿馬魯（Tupac Amaru）。法國大革命關連到，並且刺激了各種解放，以及整個歐洲與其邊陲的新生民族主義——從愛爾蘭到俄羅斯，從西班牙到埃及。法國大革命不但激起這些國家對法國革命學理的共鳴，也激起他們對假借革命學理名義而行的法國帝國主義（即拿破崙帝國主義）的反動。

在好幾方面，法國大革命首度顯示科技的現代性與解放的現代性完全不是同一回事。甚至可以說，基本上只要科技現代性者一旦目睹鼓吹解放的現代性者力量壯大，多突然滿懷驚懼。

1815年，拿破崙落敗，法國出現「王政復辟」。歐洲列強成立“Concert of Nations”，有人以為能夠維持反動現狀，事實上卻證明不可能。從1815至1848年，出現一種地緣文化，其設計用意變成促進科技現代性，同時圍堵解放的現代性。

由於這兩種現代性本來有其深厚的共生關係，要局部解開兩者之間的連結，並不容易，結果卻做到了，並且由此造成一個持久的地緣文化基礎，使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運作獲得正當性。此計至少成功了150年左右。其關鍵作法，則是經營自由主義意識型態，並且使之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代表意識型

態。

意識型態這東西，本身是一個從法國大革命所造成的新文化形勢裡浮現出來的革新¹。1815年自認為在重新樹立秩序與傳統的那些人，發現為時已晚：人的心態已經大大改變，在歷史上已不可能反轉。兩個全新的理念被視為不證自明之理，風靡遐爾：第一個理念說，政治上的改變是正常之事，而不是例外。第二個理念說，主權在「人民」這個實體裡。

這兩個理念都是爆炸性的理念。「神聖同盟」當然全盤拒斥這些觀念。英國的托利黨政府，也就是世界體系裡這個新霸權的政府，立場則相當模稜，法國復辟的路易十八君主體制亦然。這兩國的政府在本能上是保守的，但在權力的行使上很聰明，他們依違兩可，因為他們曉得公眾意見這場颱風的威力，於是決定順風使舵，以免粉身碎骨。

於是出現了意識型態。這些意識型態，質言之，就是長程政治戰略，用來因應視政治改變為正常事及道德上主權在民的新信仰。有三大意識型態出現。第一是保守主義，抱持者頗不以新觀念為然，認為新觀念在道德上錯誤，亦即他們以現代性有害而拒斥之。

自由主義對應保守主義而起，抱持者尋求以方法井然之道，用最少的尖銳紛擾，最大的控制操縱，促成現代性充分興旺。美國最高法院1954年裁定種族隔離非法，就說自由主義者

1 我有一文有更詳細的討論，〈法國大革命作為世界歷史事件〉，收於《重新思考社會科學》(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頁7-22。

相信變革應「以極審慎之速度」為之，真正的意思是「不太快，但也不太慢」。自由主義者完全信奉科技的現代性，對解放的現代性則謹小慎微。他們認為，解放對科技人是相當不錯的事，一般人獲得解放，卻充滿危險。

第三大意識型態，社會主義，在19世紀最晚出。社會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一樣，認為進步必然且可欲。但和自由主義不一樣的是，他們對自上而下的改革投以疑心。他們等不及要看到現代性的所有好處——科技現代性的好處不用說，但他們更想實現解放的現代性的益處。他們疑心自由主義者有意限定「自由主義」的應用範圍，並且限定哪些人才可以享受「自由主義」。他們的疑心不是無的放矢。

三個意識型態裡，自由主義位居政治中心。自由主義者一邊想法使國家——尤其君主政府——不能插手許多領域的決策，一面卻同樣堅持理性的改革主義必須由國家來扮演核心要角。例如在英國，國家以穀物法保護國內市場以抗拒外國競爭，此法之廢除，無疑是長期努力使國家不再扮演這種角色的結果。然而就在同一個十年裡，同一屆國會通過了「工廠法」，開始了（不是結束了）一段努力要國家介入管理工作條件與就業條件的漫長過程。

自由主義本來就不是一種反國家的學理，後來更成為強化國家機器功能的核心理據²。所以如此，是因為自由主義者視國

2 本書〈自由主義與民族國家的正當性：一個歷史詮釋〉一文對此有進一步討論。

家為達成他們核心目標的基本必要條件。他們的核心目標是促進科技的現代性，同時明智安撫那些「危險的階級」。他們以此作法，希望能牽制解放的現代性衍生出來的主權在民觀念，使之不造成過激的影響。

在19世紀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核心地區，自由主義化成三大政治目標——選舉權、福利國家及國家認同。自由主義者希望，結合這三大目標，就能安撫「危險的階級」，同時確保科技的現代性。

關於選舉權的爭辯，終19世紀不斷，持續至20世紀。實踐上，選舉權的擴大顯示一種穩定上升的曲線。在大多數地方，其走勢如下：先給小財產的擁有者，其次給無產的男子，其次給年輕人，其次是婦女。自由主義者押的注是，先前被排除的人一旦獲得選舉權，將會承認定期選舉代表，他們已充分享受政治權利，他們並且將會因此放棄他們必須實質參與集體決策的激進觀念。

福利國家的爭辯，爭的其實是剩餘價值重分配的問題。這場爭辯也持續不斷，並且顯出當局不斷讓步的上行曲線——至少在曲線1980年代開始下降以前是如此。福利國家基本上牽涉到社會工資，亦即薪資勞工的所得有一部分（愈來愈大部分）不是直接由雇主交給工人，而是透過政府機構來運用到工人身上。這套制度局部使所得脫離就業，不分技術水平與薪資等級，都獲得些許平等，而且將勞資之間的一部分談判轉移到政治競技場，在這裡，勞工因為有選舉權，手中的籌碼多一點。但是，福利國家對薪級底層工人的照顧比不上對中層的照顧。這個中

層的規模愈來愈大，中間主義政府致力積極強化自由主義意識型態之際，這中層階級的政治核心性成為其強大支持。

如果沒有加入第三個關鍵變數，則選舉權或福利國家（或兩者加起來）都不足以馴服危險的階級。加上這項變數，危險階級就不會太仔細檢查選舉權與福利國家到底是多大的讓步。狄斯雷里（Benjamin Disraeli），即第一代畢根菲德伯爵，大不列顛未來的「開明的保守主義」首相，在1845年出版一本小說，取名《西比爾，或兩國記》（*Sybil, or the Two Nations*）。在他的「廣告」裡，狄斯雷里告訴我們，此書主題是「人民的狀況」，那年的人民狀況極為不堪，因此，為免讀者指他誇大其詞，他認為「絕對有必要將許多真事實情按下不表」。小說將當時強大的民憲運動融入情節之中。小說寫的是「兩個英國，即貧國與富國」的事，這兩國出自兩個族群，即諾曼人與撒克遜人。³

小說近尾，狄斯雷里嚴抨形式上的政治改革，即古典自由主義，指其對「人民」意義有限。小說原文如下：

我國過去十朝載諸文籍的歷史無非一場幻影，為大眾交易的起源與結果安上每一層面都與其自然形式和色澤不相符的性格與色彩。這場大玄虛裡，一切思想與事物都被上與其真實性質和風格相反的面貌與稱呼：寡頭統治被稱為自由；一批排他性的教士被尊為國教；有主權之名者並

3 畢根菲德伯爵狄斯雷里，《西比爾，或兩國記》（1845；London重印：John Lane, The Bodley Head, 1927）。

無主治之實，自號人民的僕人者卻享用絕對的權力。在宗派的自私鬥爭中，兩大存在已被從英國歷史抹除，就是君主與人群；王權縮減，人民的特權也消失，卒至那枝權杖成為虛飾，其臣民則再度淪為農奴。

然而，時間，帶來一切的時間，已在英國帶來疑心，說他們拜了這麼久的那些偶像，以及欺惑了他們這麼久的那些神諭，並不是真的神和真的神諭。這個國家裡正在沸揚著竊竊私語，說忠忱不是空文，信仰不是欺惑，人民的自由則比政治階級對主權之神聖權利的汙瀆更廣布，更實質。⁴

英國(與法國，的確，所有國家)若是兩國國家，即貧者與富者，則狄斯雷里的解決之道很明顯是想法化二為一——一於情操，一於忠忱，一於自制。此「一」即我們說的國家認同。也就是說，自由主義的大計是將國界之內的人——先前是國王/主權者的「臣民」，如今是主權所在的「人民」——變成「公民」，認同於他們的國家。

這件大計做成了，是靠各種制度上的規定來完成的。第一項規定，是在法律上清楚界定國體成員的資格。這方面的規則有其變化，但每每傾向於排斥(標準寬嚴不一)新來的人(「移民」)，同時納入被視為「正常」居住的人。將後面這群人統於一的方式，通常是走向語文上的一致：全國同文，而且同樣重

4 同上，頁641。

要的是，此文必須有別於鄰國之文。完成這一步的方式，則是規定國家一切活動以單一語文為之，方法是在學術上統一語言(例如設置國立學會、翰林院控制字典的編修)，以及強制語言上的少數族類學會這種語言。

教育制度與武裝部隊發揮了統一人民的巨大作用。至少在所有核心國家，國民教育都是強制教育，許多國家並且規定國民教育包含軍事訓練。學校與部隊教導語言、公民德目及效忠國族。一個世紀之內，曾經是兩國——貧與富、諾曼人與撒克遜人——的那些國家都自視為一國，例如「英國」。

國家認同之創造，最後有一關鍵要素不可略過不提，就是種族主義。種族主義能將被認為比較優越的種族定於一，使這個種族在一國之內團結一致，而不讓少數族裔充分或局部享受公民權利。種族主義統一民族國家裡的「民族」，以面對世界；不僅面對鄰國，甚至更為了面對邊陲地區。在19世紀，核心國家成為民族國家，同時成為帝國主義國家，以「文明化使命」為名，建立殖民地。

選舉權、福利國家及國家認同構成的這個自由主義包裹，為核心國家的危險階級提供的最重要東西是「希望」——希望自由派政客與技術官僚承諾的漸進但穩定的改革終將會史危險階級處境改善、報酬平等化，狄斯雷里說的「兩國」消失。這希望當然是直接提供，但也以較為微妙的方式提供，亦即透過一種歷史理論來提供。這種歷史理論主張人類的自由是莫之可禦的衝力，因此人類處境的改善將是必然之事。16到18世紀無論怎麼看這場政治/文化鬥爭，19世紀回顧這兩種鬥爭——爭

取科技的現代性與解放的現代性——都將之視為以個人這個社會英雄為核心的單一鬥爭。這是輝格式(Whig)歷史詮釋的靈魂。19世紀有一個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上強加一種支配性地緣文化的過程，這回顧式詮釋是這過程的一部分，而且是主要部分。

因此，就在支配階層認為兩種現代性分歧逾恆，甚至相互衝突的那個歷史時刻上，官方意識型態(主導地緣文化)宣告兩者是一回事。支配階層大舉進行一場教育運動(透過學校系統與武裝部隊)，使他們國內的危險階級相信兩者是一回事。其用意，則是促使危險階級按捺他們對解放的現代性的要求，將精力轉向，投入科技的現代化。

在意識型態層次，這就是19世紀階級鬥爭的主題。工人與社會主義運動承認科技的現代性是核心、首務之後，就算是輸掉了這場階級鬥爭。他們向國家輸誠，換來不算多(雖然真實)的讓步，作為解放的現代性的一點成就。第一次世界大戰到來時，解放的現代性鬥爭優位的意識已經噤聲，每個歐洲國家的工人都響應神聖的國旗與國家榮譽的號召。

第一次世界大戰標誌著自由主義意識型態在世界體系核心——歐洲與北美——的勝利，但也標示著世界體系核心與邊陲的政治分裂。歐洲列強正待實現他們在19世紀最後30年對世界的最後征服，西方的退卻已經開始。

在整個東亞、南亞、中東(在非洲拖延到後來，在名義上獨立的拉丁美洲並有迴響)，民族解放運動開始出現——面貌不一，成功的程度也個個有別。從1900到1917年這段時期，各種

形式的民族主義起事與革命發生於墨西哥與中國、愛爾蘭與印度、巴爾幹與土耳其、阿富汗、波斯，以及阿拉伯世界。新的「危險階級」抬起頭來，揮舞著解放的現代性的旗幟。也不是說他們反對科技的現代性，而是說，他們將科技現代性的希望繫於先獲得解放。

1914年到1945年，主要標誌是核心地區一場漫長的鬥爭，基本上是德國與美國競爭世界體系的霸權。我們知道，這場鬥爭由美國獲勝。然而這些年代及其之後，更根本的鬥爭是北南鬥爭。支配階層(坐落北方)再度設法要新的危險階級相信兩種現代性是同一回事。威爾遜提出民族自決，羅斯福、杜魯門及甘迺迪提出未開發國家的經濟發展。以結構而言，這是核心國家將國內的普遍選舉權與福利國家外推到世界層次。

這些讓步的確不算多大。支配階層另外也提倡自由世界一致「認同」於對抗共產世界。對此認同，第三世界報以相當大的懷疑(這裡的第三世界，指邊陲與半邊陲地區減去所謂蘇聯集團地區)。第三世界認為所謂第二世界是第三世界的一部分，因而兩者客觀上是同一陣營。不過，面對美國勢力加上蘇聯象徵性與美國對立的角色(大部而言，只是象徵性)，第三世界大體上選擇了不結盟，也就是說，他們不會像核心國家的勞工階級認同支配階級的民族主義與種族主義那樣地，認同核心地區。自由主義地緣文化20世紀在世界層次上的運作，不如它19世紀在核心國家層上的運作那麼順利。

但是，自由主義猶未至於負隅退守。威爾遜自由主義還有本事誘拐並馴服列寧社會主義，一如歐洲自由主義在19世紀誘

拐並馴服社會主義民主⁵。列寧主義的方案變成不是世界革命，而是反帝國主義加社會主義建設，細審之下，這與威爾遜／羅斯福民族自決和未開發國家經濟發展的觀念，只是詞藻之別而已。在列寧主義的現實中，科技的現代化再度優先於解放的現代化。就像占據支配地位的自由主義者，照說應該反體系的列寧主義者也辯稱兩種現代性其實是同一回事。在列寧主義者協助之下，北方的自由主義者勸促南方的民族解放運動相信兩種現代性是同一回事，頗有進展。

兩種現代這種方便的觀念混淆，受到1968年世界革命大聲且有力的挑戰。1968年世界革命基本上以學生起事的形式出現，但不是只出以這種形式。美國、法國、捷克、中國、墨西哥、突尼西亞、德國及日本都發生動亂（有時還出人命），這些動亂無論各地有何不同，都有幾個根本的共通主題：解放的現代性是一切，卻尚未達成。科技的現代性是個欺人的陷阱。所有種類的自由主義者——自由派自由主義者、保守派自由主義者，尤其社會主義自由主義者（亦即老左）——都不能信任，的確，都是解放的障礙。⁶

我自己躬逢美國鬥爭的核心地點，也就是哥倫比亞大學。⁷

5 見本書〈國家發展的觀念，1917-1989〉一文。

6 對1968年革命的更充分分析，請看我的論文〈1968，世界體系革命〉，收於《地緣政治與地緣文化集：改變中的世界體系》（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91），頁65-83。

7 有一優異的說明，是Jerry L. Avorn等著《反抗長春藤牆：哥倫比亞大學危機

那場「革命」，有兩件事我記得無比清楚。一件是學生們由衷的欣奮；透過集體解放的實踐，他們體驗到個人解放的過程。第二件是這股解放情懷在教授與行政單位心中喚起的恐懼，最恐懼的又數那些以自由主義與現代性的使徒自居者，他們認為這場動亂是非理性地拒斥科技現代性的種種明顯益處。

1968年世界革命熊熊燃起，然後減弱，應該說是被壓制。到1970年，革命差不多已處處結束。但這場革命對地緣文化產生了深遠的衝擊。1968年動搖自由主義意識型態在世界體系地緣文化中的支配性，從而重新打開了自由主義在19世紀勝利後封起來或被貶降到辯論邊緣的那些問題。世界右派與世界左派再度離開自由主義中心。所謂的新保守主義，在許多方面都是19世紀上半葉的老保守主義的復活。新左則許多方面都是19世紀初葉激進主義的復活——我要提醒各位，那時的激進主義仍然以「民主」一詞為象徵，此詞後來被中間主義的意識型態家竊用。

自由主義並沒有在1968年消失，但它不再是地緣文化的定義意識型態。1970年代，意識型態光譜恢復為真正三個意識型態，這三個意識型態不再混淆，也就是不再像1850到1960年代那樣事實上成為只是自由主義的三種變體。辯論好像退回了150多年，只是世界已經前進。世界之前進，有兩層意思：一是科技的現代性轉化了世界社會結構，其轉化的程度已經危及資本

史》（*Up Against the Ivy Wall: A History of the Columbia Crisis*; New York: Atheneum, 1968）。

主義世界經濟的社會與經濟基礎的穩定。二是世界體系的意識型態歷史現在是一個記憶，這記憶影響到支配階層當前在世界體系中維持政治穩定的能力。

我們先看第二項改變。有些讀者可能訝異我這麼強調1968年作為轉捩點的重要性。你們可能心想：1989年是共產主義崩潰的一年，充滿象徵意義，這一年在現代世界體系的歷史裡不是更重大的年代嗎？1989年事實上不是代表了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的挑戰的崩潰，因此，這一年難道不是代表了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目標的達成，危險階級的馴服，以及科技的現代性獲得普世接受嗎？我說：不是！我告訴各位，1989年是1968年的延續，1989年標識的不是自由主義的勝利或資本主義的永久性，而是正好相反，1989年標識了自由主義的崩潰，是有心維持資本主義世界經濟者的巨大政治挫敗。

1970年代與1980年代的經濟情勢是，世界經濟在一個孔德拉季耶夫B階段下降或停滯的結果，幾乎每個地方的國家預算都受到嚴重擠壓，對福利的影響負面效應在世界經濟的邊陲與半邊陲地區又特別痛苦。1980年代東亞大部分地區無此情況，不過，在這類下降階段，每每會有一個相對小型的地區因為整個體系下降而發達，所以東亞在1980年代的成長決不構成對整體模式的反駁。

這類下降，在現代世界體系的歷史裡當然已一再發生。但這個孔德拉季耶夫B階段的政治後果比前此任何一次都更嚴重，只因為上個A階段，即1945至1970年，似乎標誌著民族解放運動及其他反體制運動在全世界都獲得政治勝利。易言之，

正因為自由主義從1945到1970年在全世界都那麼得志（自決與經濟發展），1970年代與1980年代的下降才更加嚴重。希望被出賣，幻想被粉碎，邊陲與半邊陲地區尤然，但不只是這些地區。1968年的口號似乎更有道理了。理性的改革主義看來是個苦澀的騙局（更何況它曾經滿口「革命」詞藻）。

所謂第三世界裡，一個國家接著一個國家的人民否棄老左運動，指責這些運動騙人。這些人民或許不知道丟掉這些運動之後，要用什麼來取代——有的只能暴動，有的走宗教上的基本教義路線，有的走向反政治——但他們確信老左的假激進主義其實是一種只對一小群精英有利的冒牌自由主義。這些國家的人民相方設法驅除這些精英。他們已不再相信他們的國家能作為帶來解放的現代性的媒介。我們必須清楚指出：他們並未喪失對解放的欲求，只是不再相信舊有的實現解放之道。

據此視之，共產主義在1989-91年的崩潰，只是一長串崩潰的最後一個，這是一個發現，說即使最激進的詞藻也不是解放的現代性將會獲得實現的擔保，而且大概也難以擔保科技的現代性⁸。當然，在病急亂投醫之下，這些人民暫時接受了重新得勢的世界右派的口號，即「自由市場」神話（一種甚至在美國與西歐也無從得見的自由市場），但這只是個稍現即逝的海市蜃樓。我們已看到立陶宛、波蘭、匈牙利等地的政治反彈。

同理，東歐與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也不可能再相信列寧主義版的理性改革主義諾言（披著社會主義革命外衣）。這對世界

8 見第5章註13。

資本主義當然十分不妙，因為過去至少50年來，新列寧主義的信念對世界體系裡的危險階級一直是個重大的抑制力量。列寧主義實際上是一種非常保守的影響力，宣揚著人民必然勝利（因此無形中就是宣揚人民要有耐心）。列寧主義的保護斗篷已經輸給現代世界體系中的支配階層。⁹現在，危險階級可能再度危險起來。政治上，世界體系已經失穩。

與此同時，世界體系的社會經濟基底一直在嚴重變弱。這裡我只舉出其中四個趨勢，但結構轉化的趨勢並不只此四者。第一，廉價勞動的來源已嚴重縮減。四個世紀以來，城市的工資勞動者一再能夠運用其談判力量提升他們從他們的勞動中獲得的剩餘價值比率。資本家也能夠抵消此事對利潤率的負面影響，方法是一再擴大勞動來源，因而將先前的非工資勞動者帶進工資勞動市場，這些新的非工資勞動者初期願意接受非常低的工資。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在19世紀末葉進行最後一場擴張，包舉全球，強迫加速了世界勞動力去農業化的過程，這過程已相當深入，可能在最近的未來完成¹⁰。這無可避免意指世界勞動成本將會劇漲，亦即全球生產的整體成本劇增。

第二個結構問題是對中層階級的擠壓。中層階級一直被視為現有世界體系的支柱，此見甚當，但他們對雇主與國家

9 更長篇的討論，請看本書〈自由主義的崩潰〉一文。

10 見R. Kasaba與F. Tabak, 〈世界農業之重組, 1873-1990〉(The Restructuring of World Agriculture, 1873-1990), 收於《世界經濟中的糧食與農業體系》(Food and Agricultural Systems in the World-Economy), P. McMichael編(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94), 頁79-93。

的要求不斷擴大，而且他們本身也不斷擴大，全世界支持這麼一個階層的每人成本不斷上升，逐漸變成不是雇主與國庫所能忍受。過去十年裡，許多國家試圖縮減福利國家措施，背後原因在此。但這件事有兩種情況，其中必有一種發生。一是這些成本沒有縮減，這樣的話，國家與企業都會陷入嚴重困境，而且頻頻破產。一是這些成本有了縮減，這樣的話，這個為當前世界體系提供了最強支撐的階級將會心生相當可觀的政治不滿。

第三個結構問題是生態危機。這危機對世界體系構成一個尖銳的經濟難題。五個世紀以來的資本累積，基礎是企業將成本外部化。基本上，意思是企業以巨大的集體成本對世界資源進行過度利用，但企業本身幾近毫無成本負擔。到了某一程度，世界資源被用光，對環境的毒化則達到難以為繼的地步。今天，我們必須注入重大的投資來清理環境，而且我們必須減少利用，以免重蹈覆轍。企業界一直叫嚷這類行動將會降低全球獲利率。這是實情。

最後是人口差距使南北經濟差距加倍，有增無減。這造成由南向北移民的巨大壓力，而這種走向又在北方產生同樣強大的反自由主義政治反應。接下去將會是怎麼個發展，不難預測。北方雖然增加移民障礙，但非法移民在北方還是將會到處增加，而愈來愈多類似「不知道黨」的運動(Know-nothing movements)也會相應而起。北方國家內部的人口平衡將出現根本改變，尖銳的社會衝突可以預期。於是，今天，世界體系置身尖銳的道德與制度危機之中，未來50年亦將如是。本章開頭

討論兩種現代性。現在的情況是，科技的現代性與解放的現代性終於出現明顯而公開的衝突。1500到1800年，兩種現代性似乎彼此連帶。1789到1968年，自由主義意識型態成功假裝兩種現代性是同一回事，從而抑制了兩者之間的潛在衝突。1968年以降，面具脫落了，兩種現代性進入公開鬥爭。

對兩種現代性的衝突的這個認知，在文化上有兩大徵象。一是「新科學」，即講複雜性的科學。過去十年，突然有大批物理學家與數學家起而反對牛頓／培根／笛卡兒意識型態。過去至少五百年來，這意識型態自稱是科學唯一可能的表達。自由主義意識型態在19世紀獲勝，牛頓科學被供奉為普遍真理。

新科學家不是挑戰牛頓科學的效力，而是挑戰其普遍性。基本上，他們主張，牛頓科學的定律是「真實」的一個有限特例的定律，如欲科學地了解真實，必須大幅擴大我們的參考架構與分析工具。於是，今天我們聽到的風行字眼是渾沌、分叉、模糊邏輯、不規則線條(fractal)，最根本的，則是「時間之箭」(the arrow of time)。自然界及其所有現象也都歷史化了¹¹。新科學很明顯不是直線的。科技的現代性正是建立在線性支柱上。所以，新科學對科技的現代性，至少對這現代性的古典闡釋方式，提出了根本質疑。

對兩種現代性之間有衝突的認識，另一文化徵象是後現代

11 這一點對社會分析的意義，請看〈「新科學」與歷史社會科學〉(The "New Science" and the 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s), *Review* 15, no.1 (Winter 1992).

主義，基本上，是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上的後現代主義。我希望我已說清楚，後現代主義根本不是後現代的。它是為解放的現代性而拒斥科技現代性的一個模式。它所以用這麼怪異的語言形式出現，是因為後現代主義者想打破自由主義意識型態在語言上對我們的論述所形成的控制。作為一種解釋性的觀念，後現代主義令人困惑。作為一種預告性的學理，則後現代主義無疑有其先見，因為我們的確正在走向一種新的歷史體系。現代世界體系正在走向盡頭。不過，至少還需要再50年的末期危機，亦即「渾沌」，我們才有希望冒出頭來，進入一個新的社會秩序。今天，以及往後50年，我們的課題是烏托邦式課題，這課題就是想像，並且努力創造這新的社會秩序。一個不平等的歷史體系結束，並不能打包票說由此產生的將會是一個比較好的歷史體系。這場奮鬥，結果頗未可知。今天，我們必須界定一些具體建制，使人類的解放能透過這些建制來充分表達。我們在我們現有的世界體系裡經歷了僭冒的表達，自由主義意識型態企圖要我們相信自由主義者其實也不相信的現實——平等與民主逐漸增加的現實。我們經歷了落空的反體制運動的幻滅，這些運動是解決之道的一部分，但自己也是問題的一部分。

我們必須從事一場巨大的世界性的多邊談話(multilogue)，因為解決之道決非十分明顯，而且希望在其他偽裝之下長此以往者的勢力非常強大。哪個現代性的結束？讓虛偽的現代性結束，讓真正的解放的現代性破天荒頭一遭開始吧。

第八章

難以克服的自由主義矛盾： 現代世界體系之地緣文化中的 人權與民族權利

1789年8月26日，法國「國民會議」發表〈人與公民的權利宣言〉¹。自此以降，這篇宣言一直是對我們今天所謂人權的最

1 關於宣言通過時的辯論，可看Marcel Gauchet，〈人的權利〉(Rights of Man)，收於《法國大革命詞典》(A Critical Dictiona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F. Furet與M. Ozouf編(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Belknap Press, 1989)，818-828。宣言原文可見J. Tulard等《法國大革命歷史事典，1789-1799》(Histoire et dictionna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789-1799; Paris: Robert Laffont, 1987)，頁770-771。英文版有I. Brownlie編《人權基本文獻》(Basic Documents on Human Righ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1)，頁8-10，但沒有前言。

大象徵性肯定。宣言在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中獲得再度肯定與更新。1948年12月10日，聯合國在少數國家缺席而出席者無一反對之下，通過〈世界人權宣言〉²。但是，「民族」的權利從未獲得象徵性的肯定，至少到1960年12月4日聯合國通過〈賦予殖民地國家與民族獨立宣言〉之前沒有。³

1789年宣言的序文說「無知、疏忽、對人的權利的鄙視，是公眾不幸與政府腐化的僅有肇因……」，一個啓蒙運動以無知為問題之源，相當自然，而其含意是，只要克服無知，就不會再有公眾的不幸。

法國大革命為什麼援此例子，提出民族權利宣言？其實在1793年，修道院長葛雷卦赫(Abbe Gregoire)曾建議制憲會議(Convention)將有關「諸國之權利與相互之義務、民族之權利」的法律製成法典。但墨林·德·杜埃(Merlin de Douai)主張「本案不應向法國人民的制憲會議提出，應向一個由歐洲諸民族組成的大會提出」，⁴其議就此作罷。

歐洲民族大會之說亦屬中肯，但當時當然沒有這麼一種大會。這麼一種大會後來終於產生(多多少少)，先是國際聯盟，後來是聯合國，也都沒有立即作成這麼一篇宣言。1945年，殖

2 聯合國大會決議案217A(III)。

3 聯合國大會決議案1514(XV)。關於後1945世界體系的「去殖民化規範」，可看G. Goertz與P.F. Diehl, 〈朝向一個國際規範的理論〉(Towards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Norms), 刊《衝突化解期刊》(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6, no. 4(Dec. 1992), p. 648-651.

4 前引J. Tulard事典“Adroit des gens”條，頁770。

民強權為他們自己的自由而戰而獲勝之後，仍然不承認殖民主義沒有正當性。直到1960年，在殖民地世界一大部分已獲得獨立之後，聯合國才在宣言中重新肯定「人的根本權利、人的尊嚴與價值、男人與女人及大小國家權利平等」，因此「嚴肅宣布必須快速且無條件結束一切形式與表現的殖民主義」。

我不打算討論人權或民族權利是否銘刻於自然法之中，也不擬檢討這些理念作為思想建構的歷史。我想分析這些理念作為自由主義意識型態關鍵要素的角色，以及這意識型態如何成為19與20世紀現代世界體系的地緣文化。我還要論證，這地緣文化結構不但在邏輯上自我矛盾，而且這無可克服的矛盾本身就是這地緣文化的本質部分。

世界體系都有其地緣文化，雖然一種地緣文化可能要費相當時間，才在一個特定的歷史體系中就緒。我的「文化」一詞，用的是人類學家傳統上的意思，指一套價值與基本規則，這些價值與基本規則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在體系內部成為報酬的標準，從而造成一套幻覺，使體制成員接受體制的正當性。任何世界體系裡，都有一些個人或群體整個或局部拒斥這些地緣文化的價值，甚至從事反對這些價值的鬥爭。但是，只要體系的幹部多數主動接受這些價值，而一般人民多數並未主動懷疑，我們就可以說這地緣文化存在，其價值是主導的價值。

此外，基本價值、宇宙及目的論，以及落實它們的政治之間有其區別，不可不辨。一些群體在政治上積極造反，未必表示他們不贊同(也許在潛意識裡贊同)體系的基本價值、宇宙論及目的論。他們可能只是認為這些價值沒有被公平地落實。最

後，我們必須記住歷史過程。地緣文化存在於一時，然後可能不復當令。以現代世界歷史體系而論，我主張其地緣文化產生於法國大革命，隨1968年世界革命而開始喪失其廣泛的可接受性。

現代世界體系——資本主義世界經濟——自漫長的16世紀以還就存在了。但它發揮功能三個世紀，其地緣文化卻從未就位安頓。也就是說，自16世紀迄18世紀，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之內並沒有一套可以說多數幹部主動接受而且多數一般人至少被動地接受的價值與基本規則。法國大革命改變了這種情況。法國大革命樹立兩項原則：政治改變是常態，以及主權在民。⁵這兩項原則迅速深深紮根於一般人意識之中，熱月反動與威爾遜都趕不走它。因此，法國的王政復辟(世界體系內的所有王政復辟)無論在何種意義上，都從來不是真正的舊制復辟。

關於這兩項原則，應該提示的關鍵要點是，它們本身對世界體系的含意是革命性的。它們並不確保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正當性，長程而言，反而可能將之去正當化。在此意義之下，我先前曾主張「法國大革命代表了對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第一場反體制革命」。⁶所以，為了圍堵這些理念，將之淹死在一個

5 這個論點，我先前已有詳述，此處不擬重複。關於以政治變革為正常，見〈法國大革命作為世界歷史事件〉，收於《重新思考社會科學》(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頁7-22。關於主權在民，見〈自由主義與民族國家的正當性〉一個歷史詮釋，利於《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19, No.1 (Spring 1992):22-23。

6 《現代世界體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卷三，《神聖的資本主義世界

更大的整體之中，世界體系的幹部覺得刻不容緩，要經營並強行一種更大規模的地緣文化。

這更大規模地緣文化的經營，以意識型態辯論的形式出現。我這裡的**意識型態**一詞，採取十分特殊的用法。我相信19世紀發展出來的三個意識型態——保守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其實是對單單一個問題的回應：改變是常態及主權在民這兩個觀念遐邇流行，什麼政治方案最能確保良好的社會？

三個意識型態提出的解答極為簡單。保守主義者驚怖於這些觀念，並且基本上憎惡這些觀念，主張公共行動應該極度審慎。他們說，只有其益處是壓倒性的，政治上的改變才應該實施，即使如此，實施起來也應該力求不生滋擾。至於主權在民，他們主張，最明智運用此理之道，是將實質權力交給傳統上行使權力，作為傳統延續不斷之智慧的代表的那些人。

社會主義者(或激進主義者)看法相反。他們歡迎改變，並號召人民充分且直接行使其主權，用最大速度促成改變，以實現一個更平等主義的社會。

保守主義立場與社會主義立場都很分明，容易了解：盡量慢對盡量快！盡量反制平等化的趨勢，對盡量拆掉不平等的結構！一邊認為真正可能的改變非常少，一邊認為只要克服刻意的社會障礙，則無事不可為！這些是右派對左派的對立形式，

經濟大擴張時代，1730-1840s》(The Sacred Era of Great Expansion of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1730-1840s,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1989)，頁52。

我們耳熟能詳，「左」「右」二詞都直接源出法國大革命。

但既對立於保守主義，又對立於社會主義的自由主義究是何物？答案形式上清楚而內容曖昧。正式的說，自由主義是中間道路(*Via media*)，是「生機中心」(借用20世紀的一個自我描述)。⁷ 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改變的速度要適中！實質上，這是什麼意思？這一點，自由主義者自己其實莫衷一是，同一時地的自由主義者之間不一致，不同時地的自由主義者當然也極少一致。

所以，界定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的，不是其方案的清晰性，而是其對過程的強調。當然，自由主義者相信政治上的改變是無可避免的，但他們認為改變的過程必須理性，也就是說，社會決策必須是仔細的思想分析之後的產物，才會導致良好的社會。因此，關鍵在於實際政策必須由最有能力作成這類理性決策的人——即技術人員或專家——來構思並落實。最有能力斟酌這些必要的改革的人，才能、才會使他們生活的制度臻於完美。自由主義者在定義上就不是激進的，他們志在使制度盡善，而不是盡變制度，因為據他們之見，19世紀的世界已是人類進步的極點，或者，用最近復活的一句話來說，是「歷史的終結」。如果我們生活的是人類歷史的最後一紀，那麼，我們的首要課題(應該說唯一可能的工作)就是使制度完善，亦即，致力於理性的改革主義。

7 見Arthur Schlesinger Jr.,《生命中心：自由政治》(*The Vital Center: The Politics of Freedo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49).

因此，現代這三個意識型態是三個政治策略，其目的是要因應1789年以來支配現代世界的流行信念。關於這三個意識型態，有兩點極有意思。第一點是，三個意識型態在形式上都反國家，其實都致力於強化國家結構。第二點是，三者之中，自由主義迅速浮現，明顯勝出，由兩項政治發展可以見得：保守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長期下來，都將其實際方案往自由主義中心靠攏，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以及，落實自由主義政治方案的，大致上其實是保守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而不是資本自由派自己。自由主義意識型態勝利，自由主義政黨卻往往因此消失，道理在此。⁸

在勝利的自由主義意識型態架構內，人權何物，來自何處？答案當然紛然雜陳。總的來說，自由主義者的回答是，人權寓於自然法。這樣的答案給了人權一個相當能抵抗反對說法的有力基礎。但是，一旦肯定這一點，一旦開列一張人權單子，其他大多問題仍然有待回答：誰有道德(與法律)權利來開列這些權利？如果一套權利與另一套權利發生衝突，哪一套為主，由誰決定哪一套為主？權利是絕對的嗎？還是應該受限於對其運用後果的理性考慮？(美國大法官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那個著名的宣示，反映了這種兩難式；言論自由不包括有權利在坐滿人的戲院裡亂喊「火災！」)最後，什麼人有權

8 我曾在別處評論這兩個主題。特別請看本書〈意識型態：三個還是一個？——「現代性」的偽戰爭〉一文。這些主題，我在這裡只作撮要，以便討論手邊這個主題：人權觀念與民族權利的觀念在現代世界政治裡的角色。

利行使這些權利？

這一問似乎奇怪。正確答案難道不是「人人」？的確不是。事實上，絕對從來沒有人這麼答過。天下幾乎無不同意嬰兒沒有這些權利；至少不是每個嬰兒都有。理由很明顯，就是一個嬰兒沒有心智能力來明智地為其自身或他人行使這些權利。然而，如果嬰兒沒有權利行使這些權利，那麼衰老之人、幼童、社會型病態(Sociopath)、重罪犯又如何？這名單可以無限開下去：年輕人、精神官能症患者、士兵、異族、未受教育者、窮人、婦女如何？有能力與無能力之間，不證自明的界線何在？這麼一條不證自明的界線當然是沒有的，從自然法的確推不出這麼一條界線來。於是，如何來界定誰有權利行使這些人權，就必然成為不斷重現的、時時都在的政治問題。

如何界定誰有人權的問題，與誰有權利行使人民的權利，密切相連。這牽涉到法國大革命衍生出來的另一觀念，即公民觀念。最明顯能有權利行使人民主權者是「公民」。公民是誰？論者說，公民這個群體此「國王」、「貴族」，甚至「有產者」都大，但比「人人」要小，甚至小於「一個主權國家疆界內的每一居民」。

這就有個故事了。主權者對誰有權威？封建制度內，權威分割。一個人可能而且的確受轄於好幾個領主。因此，一個領主不能認為他對其臣屬的權威不受爭議。現代世界體系創造了一個與此根本有別的法律與道德結構，主權國家置身一個邦際體系之內，受此體系約束，而對所有置身其領土之內的人，獨享管轄權。此外，所有這些領土都有其地理界線，亦即土地測

量員測定的界線，因而明白有別於其他領土。再者，邦際體系內沒有任何區域是無主的。

「臣民」變成「公民」之後，現有居住者立即被區分成「公民」與「非公民」(或外人)。外人有許多形式：從長期(甚至終身)移民，到過境的訪客，不一而足。在任何情況下，這些外人都不是公民。一方面，由於國家是「區域」與「地方」聚集而成，在19世紀初葉，實際上的公民，無論定義為何，通常都是背景十分繁雜不一的人——操不同語言，有不同的習俗，帶著不同的歷史記憶。臣民一旦變成公民，公民就必須被變成國民。國民也者，效忠對象以國家為首，其次才是其他社會對象。這件事不容易，但公民必須轉化成國民，主權在民才不會演成非理性的群際衝突。

在大不列顛、法國及美國培養公民的國族主義之際⁹，德國與義大利之類前國家的國族主義者努力創造國家，以便培養國族主義。在19世紀大多數國家裡，主要由兩種建制負責促進這樣的國族認同意識：小學與軍隊。這件事，做得最好的國家，後來最欣欣向榮。麥克尼爾(Milliam McNeil)說：

9 文獻甚夥。見Raphael Samuel編《愛國主義：英國國家認同之成敗》(Patriotism: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British National Identity)，三卷(London: Routledge, 1989)；Eugen Weber,《農民變法國人：法國鄉村的現代化, 1870-1914》(Peasants into Frenchmen: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France, 1870-1914;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 Press, 1976)；Seymour Martin Lipset,《第一個新國家：從歷史與比較的角度看美國》(The First New Nation: The United States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3)。

在這些條件之下，族群一統於各國族管轄範圍的虛構之說在近數世紀生了根，歐洲一些領先的國家武斷挑選蠻族，加以理想化，奉之為祖先。（說來有趣，法國人與英國人選擇高盧人與不列顛人為祖先，恬然置後來的征服者與侵略者於不顧；法國人和英國人的國家語言是從這些征服者與侵略者繼承來的。）虛構的族群一統說逐漸興盛，1789年以後尤然。由此生出的新蠻族國體，全國所有成年男子都受過武器訓練，在國族團結中統合為一，忠順於領袖。這樣的國體有其實用優勢，勝過那些將戰爭動員局限於少部分人口的政府。¹⁰

細思之下，即知小學與軍隊的名聲都不在於實踐人權。兩者都是聽令於上，相當威權主義的結構。將一般人民變成公民／選民與公民／士兵，可能非常有利於確保國家凝聚，以對付其他國家或減少國內的人民暴力或階級鬥爭，然而對人權之促進與實現有何意義？

19世紀自由主義給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核心國家的政治目標，是馴服危險階級，方法則為提供三項理性改革方案：選舉權、福利國家及國族認同。此舉的希望與假定，是一般人民將會安足於這有限的報償，因此而不會要求充分的「人權」。人權、

10 William McNeill, 〈史評引論〉(Introductory Historical Commentary), 收於 Geir Lundestad 編《強權的頹廢：和平、穩定與正當性》(The Fall of Great Powers: Peace, Stability, and Legitimacy, Oslo: Scandinavian Univ. Press, 1994), 頁6-7。

自由或民主口號之宣揚，本身是馴服危險階級過程的一環。對危險階級的這些社會讓步堪稱稀薄，要不是出現兩項事實，這稀薄可能更為突出。第一項事實是，剩餘價值從邊陲地帶轉移到核心國家，核心國家的整體生活水準因而受益。各個核心國家自身的民族主義又與「文明」國家們——對立於「蠻人」——的集體民族主義相輔相成，構成我們今天稱為種族主義的東西。種族主義就是這段時期在這些國家裡明白成為典章，並且終於深深瀰漫於所有社會建制與所有公共論述。至少在納粹以前是如此。納粹將種族主義的邏輯推到極致，使西方世界恥其所為而正式（但也只是局部）在理論上拒斥種族主義。誰是「蠻人」？當然，就是殖民地那些民族，黑人和黃種人，對白人。「東方」對「西方」。東歐的「非歷史」民族對西歐的「歷史」民族。猶太人對基督徒。打從開始，「文明」國族的人權，其前提認定就說這些國族是「文明」的。帝國主義的論述與此一體兩面。自稱尊重人權的國家，有義務將不尊重人權的國家「文明化」，這些國家習俗「野蠻」，故而必須帶到城裡來教導，像兒童一樣教導。

所以，任何談「民族權利」者，其民族權利都是少數一些特定民族所獨專，根本不是談所有的民族的權利。當時還認為，賦予「野蠻人」以其作為民族的權利，實際上會造成這些民族的個人無法享受「人權」。因此，這兩套權利在19世紀是被視為彼此直接衝突的。兩者不可得兼。

19世紀自由主義要解決這問題。在一個改變是常態與主權

在民這些學理當令的世界體系裡，一個由有理性、善意、能力及財產構成的上層階級如何防止「危險階級」搗翻棋局？辦法是落實適量的理性改革。在實踐上，這意指將可以行使人權者局限於人民中的一些人，並且更嚴格地將可以行使主權的民族局限於「一些」民族。不過，由於依照自由主義的邏輯，權利在理論上是普遍性的，這些限制就必須以歪理與華辭來圖說。所以，理論上權利普世皆同，自由主義者最不希望的卻是這些自由主義原則名符其實，亦即真的普遍應用。爲了不要這些原則被名符其實應用，自由主義需要一種限制力量。這限制力量就是種族主義加性別主義。但自由主義者當然不會發誓說他們就是如此，因爲種族主義與性別主義在定義上就是反普遍且反自由主義的。自由主義的這第二張面孔及其後果，薩依德(Edward Said)有一針見血之論：

和被稱為落後、墮落、不文明、智障等名目不一的民族一樣，東方人被放在一個以生物決定論及政治／道德警告做成的架構裡看待。因此，東方人被和西方社會一些分子(少年犯、精神病、婦女、貧民)連在一起，其身分的最佳描述，都是可悲的非我族類。東方人極少被看見或注視；他們被透過其他事物來觀看，被分析，不是作為公民或人民來分析，而是作為有待解決、控制，或在殖民強權貪圖其領土時接管的問題……

我的要點是，一個相對無害的哲學上的副專題〔東方主

義〕變成管理政治運動、管理殖民地的手腕，大作幾近啟示錄之論，陳說白人布施文明的使命多麼艱鉅——凡此種種，都在一個以自由主義自稱，對其所標榜的寬容、多元、心胸開放等規範充滿關心的文化裡發生。事實上發生之事，與自由主義之說天南地北：學說與意義沾巧「科學」，硬化成「真理」。這樣的真理如果自認有權利如我所言，將東方評斷為顛撲不易的那種東方，則自由主義不過是一種壓迫與心態成見的形式。¹¹

在20世紀，受種族主義與性別主義壓迫者堅持要享有自由主義者說他們理論上應該有的人權與民族權利。第一次世界大戰標誌了政治上的一個休止符。核心國家之間的秩序崩潰，1914到1945年的「30年戰爭」，打開了新運動的空間。

由於世界場景上最直接的問題是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亦即亞洲、非洲及加勒比海大部分在法律上被歐洲國家控制(也被美國與日本控制)，因此最緊迫的要求是民族權利，而不是人權。以最壯觀的方式承認這項要求的正當性的，是威爾遜，他以「民族自決」爲全球自由主義的核心主題。當然，威爾遜之意，是在各民族準備好的時候，將自決這東西明智、方法井然、理性地布施於他們。在這之前，可以先將這些民族「託管」(1945年〈聯合國憲章〉用語)。

¹¹ Edward Said, 《東方主義》(Orientalism, New York: Pantheon, 1978), 頁207, 254。

保守主義者可想而知，較為審慎，認為如果有「準備好」這回事，可能也在無限遙遠的未來。20世紀上半葉，保守主義者經常依據人權這個主題來反對民族權利。他們辯說這些殖民地人口並不是真的「民族」，只是許多個人聚集而成之物，個人接受過充足教育，充分採取西方生活風格而顯示他——極少說「她」——已達到一個「文明人」的身分之後，其個人的人權就可以獲得承認。這是一些殖民強權（例如法國、比利時與葡萄牙）的同化主義邏輯，但其他殖民強權的作法雖然比較非正式，其模式還是與此類似，並即範疇化，以及點點滴滴布施人權。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激進反體制與反自由主義的社會主義者，亦即布爾什維克（或列寧主義者）與第三國際，起初對人權之說十分疑心，認為人權說與歐洲中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運動兩兩相連。他們公開敵視人權觀念，為時甚久。然後突然在1920年，他們根本改變路線。在巴庫舉行的「東方民族大會」上¹²，在歐洲／北美進行階級鬥爭的戰術優先性被悄悄擱置，改為以反帝國主義為當務之急，希望藉此主題，在大多位於歐洲的共產黨與亞洲（及邊陲地區其他部分）一些較為激進的民族解放運動之間營造政治聯合。然而列寧主義者這麼做，其實就是加入自由主義者，追求威爾遜揭示的民族自決。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蘇聯積極追求在一系列與它政治關係多多少少較為密切的國家裡培養「社會主義建設」的政策，其實也就是加入世界自由主

義行列，追求未開發國家的經濟發展。

因此我們可以說，從1945到1970年，自由主義出現第二個鼎盛期。1914年以前數十年，自由主義揚威歐洲，1945到1970年，自由主義在全世界勝利。美國，世界自由主義的發言人，是最大霸權。其理論上的唯一對手，蘇聯，在戰術上處理民族權利的方式，與美國並無實質之異，因此實際上是在協助美國馴服世界體系的危險階級。此外，這自由主義政策實際上似乎也讓這些危險階級頗有所獲。整個第三世界裡，民族解放運動不是已經執政，就是即將掌權。在別的地方，他們似乎也相當掌握了權力（至少部分權利），蘇聯集團的共產政權，以及社會民主政黨在西歐及白人國協國家裡扮演強勢角色，都是例子。另外，在1945到1970年令人難以置信的全球經濟擴張裡，幾乎所有邊陲國家的經濟成長率都達到相當高度。這些年代是樂觀主義的年代，在鬥爭似乎十分凶猛且相當毀滅性的地方（像越南），也是如此。

回顧這些看起來像黃金時代的年代，令人驚覺其中對人權的關心不可得見。從東歐的整肅審判，到第三世界國家的各式獨裁（但我們也不能忘記美國的麥卡錫主義，及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禁止開業令），這很難說是人權勝利的時代。更有必要指出的是，這段時期，世界上的政治運動對人權的口惠關懷也沒有非常多。在冷戰的鬥爭中，鼓吹人權者處處被視為對民族團結構成威脅。第三世界裡，與西方關係最密切的國家順應人權的程度，並不大於與蘇聯集團關係最密切者。此外，美國／蘇聯對各自勢力範圍內的人權所表現的關心，都是宣傳廣播之用，

¹² 見《東方民族大會》（*The Congress of the Peoples of the East*），Brian Pearce 譯並註（London: New Park Publishers, 1977）。

對實際政策也沒有多大影響。

彼時以來，情況如何？主要發生了兩件事：一是宣告性兼宣斥性的1968年世界革命，向自由主義地緣文化挑戰；一是1970年開始的證據，即自由主義的整批神蹟是無效的。1968年，世界各地的學生及其盟友——在西方國家、共產集團及邊陲地區——說，自由主義意識型態（包括口頭有別但實似相似的蘇聯版）是一套欺人的承諾，這套承諾對世界人口的大部分都是負面的。當然，各地的革命分子談的大多是各自國家的特殊情況，而美國、德國、捷克、中國、墨西哥、葡萄牙、印度、日本的具體細節各各有別，但同樣的主題一再出現。¹³

1968年世界革命沒有拆掉世界體系。還差得遠。但這場革命的確使自由主義不再是世界體系的定義意識型態。保守主義與激進主義都離開站在中央的自由主義，多多少少回到19世紀上半葉的分布形勢。自由主義一直試圖建立一種微妙的平衡，用以限制人權與民族權利的革命含意。1968年的革命打翻了這種平衡。

這平衡如何打翻的？看看第二個主要變局，即世界體系的社會經濟結構變化，可知大概。1967/73以來，世界經濟進入孔德拉季耶夫B階段，即停滯階段。這停滯實質上抵消了大部分邊陲地區的經濟成長，東亞一角例外，因為孔德拉季耶夫B階段有個正常特徵，就是將生產轉移到世界經濟一個局部地帶。此外，停滯造成（程度不一）北方勞工階級實質所得下降。玫瑰

¹³ 見第6章註3。

已失顏色。謊言變成瞞天大謊。世界自由主義勢力（及其事實上的盟友，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提出的，生活遠景穩定、秩序井然地改善的希望，已經崩潰。這希望崩潰之時，民族權利事實上獲得如何有意義的實現，也受到那些被視為受益的民族質疑。

民族權利在1945年以後被視為已經實現，現在其實現的程度受到質疑，這質疑在政治上有兩個後果。一方面，許多人轉而追求新族類的權利。他們認為，他們族類的權利未獲承認。於是，新而較為好戰的族裔、分離主義、現有國家內的「少數」族類，與婦女、男女同性戀、殘障、老人等群體或擬族群的要求一時並興。另一方面，如果民族權利未有所獲，那麼，何必為了獲致民族權利而自抑人權？於是，蘇聯集團、第三世界的一黨國家或軍事獨裁裡，突然高漲起立即落實人權的要求。此即所謂民主化運動。但是，在西方世界內部，此時也逐漸拆解先前那些嚴重限制人權的結構，並且產生新的權利，例如美國出現「隱私權」。

此外，不但人人似乎開始談自己國家裡的人權情況，大家還開始為別人的國家談人權。卡特宣布人權是美國外交政策要目、赫爾辛基協定、國際特赦與「醫師無國界」之類運動，以及第三世界知識分子願意將人權視為一般問題甚至優先議題來討論，都是例子。

過去10到20年的這兩個運動，即尋找其權利必須獲得肯定的新族類，以及關於「人權」的更緊切要求，都是對1945-1970年階段的欺誑而起的反動，這些欺誑引起1968年世界革命，1968年世界革命的主題，正是指斥全球自由主義所提希望之虛妄，

以及世界自由主義向世界提供其理性改革主義方案之有害用心。兩個反應乍看是一個，肯定新族群的權利者，也是那些要求更大人權的人。

但是，1980年代末期，尤其隨著美國霸權體系發生地緣政治動盪（標誌是共產主義崩潰），兩個運動開始分道，甚至對立。到1990年代，有些運動（再度）利用人權主題來反制「新」族類的權利。在美國國內的新保守主義反「政治正確」的運動裡，可以看見這種發展。然而在「醫師無國界」組織及主張干預權（*droit d'ingérance*）的法國知識分子的宣告之中¹⁴，也可以看到——干預也者，就是今天干預波士尼亞與索馬利亞，明天干預中國與伊朗，後天（有何不可？）干預美國國內由黑人主導的市政府。

自由主義今天被它自己的邏輯所困。它仍然肯定人權的正當性，也繼續——沒有那麼大聲——肯定民族權利。然而它有口無心。它肯定權利，是爲了權利不要被充分落實。這愈來愈難。自由主義進退維谷而露出了真面目，大多數一變而成保守主義者，只偶爾再做激進主義者。

就拿一件簡單非常重要、非常具有迫切意義的問題來說：移民。移民問題的政治經濟學極爲簡單。世界經濟在兩方面已比歷來更兩極化：社會經濟方面和人口方面。北南鴻溝很大，而且各種跡象都顯示差距在未來數十年還會更加擴大。後果一

¹⁴ 的確，世界醫學（*Médecins du monde*）在1993年還出版一份政治期刊《干預：人道的願望》（*Ingérences: Le Désir d'Humanitaire*）。

眼可見，就是有一股由南向北移民的壓力。從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的角度來看這問題吧。人權觀念顯然包括遷移的權利。依照自由主義邏輯，護照和簽證是不應該有的東西。人人應該能自由隨處工作安居，就像在美國內部和大多數主權國家內部的情形——任何自稱自由國家的國家都不用說。

實際上，北方的人絕大多數聽見開放疆界，當然驚怖其言。過去20年的政策，方向也正好與開放相反。英國很早就設置新障礙阻止其原有殖民地的子民入境。單是1993年就有三大動作。法國國會面對現在真的能來的東歐人，已嚴格取消對「難民」的歡迎。（從前譴責邪惡的共產黨不讓他們的人民走，十分風光，可是如今邪惡的共產黨不在其位，不能限制移民了，結果又如何。）法國政府通過法律，不但對其原有殖民地百姓向法國移民多所限制，還使移民在法國出生的子女更難成爲法國公民。1993年在美國，我們最大的州，加州（加上不無關係的一項事實——此州不久就會有一個非白人多數），州長要求修正美國憲法，以便廢掉我們一個極受尊敬的傳統，*jus soli*——任何人在美國土地上出生，就是美國公民。

英國、德國、法國、美國這些動作，論點何在？論點是，我們（北方）不能一肩挑起整個世界的擔子（經濟負擔）。好說好說，爲什麼不能？不過一個世紀前，北方自承「白人的負擔」，自稱負有使野蠻人「文明化」的使命。現在，野蠻人——危險階級——說，多謝，不用你們來把我們變文明了，讓我們有一些人權就得了，譬如自由遷移的權利，以及哪裡找得到工作，就上哪兒去。

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的自相矛盾是全盤性的。如果所有人都權利平等，所有民族也權利平等，我們就不能維持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向來維持，未來也會維持的不平等體系。如果公開承認這一點，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在危險階級（亦即被剝奪的階級）眼中就不會有正當性。一個體系沒有正當性，就不會能夠活下去。

這危機是全盤性的，這兩難困境也是全盤性的。我們將會在今後半世紀經歷其後果。無論我們如何集體解決這危機，無論我們建出何種新體系，無論新體系更好或更壞，無論人權與民族權利增加或減少，有一點是確定的：那將不會是一個以我們見識兩百年於今的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為基礎的體系。

第九章

「發展」的地緣文化， 或我們的地緣文化的轉化？

發展一詞，1950年代以來在社會科學與公共政策領域廣為流行。**文化**一詞，在1970年代大張聲勢，被浩浩蕩蕩重新引入這些領域。

這段術語歷史不難解釋。**發展**一詞出人頭地，是所謂第三世界在後1945時代的政治上浮現的直接結果。世界體系邊陲地區的民族有效地組織，以期達成兩個主要目標：世界體系的更大的經濟自主，以及更大的財富。更大的自主，意思是曾淪為殖民地的人民在政治上獲得獨立，已是主權國的國家則成立民族主義立場更強的政府。大體而言，從1945到1970年期間，所有邊陲地區都以某種形式達成此一目標。此一目標的正當性不但在聯合國的結構裡獲得背書，「民族自決」觀念廣為流行，以

及帝國主義被去正當化，也都是一種背書。

更大的財富這個目標也同樣獲得正當化。但是，比起更大的政治自主這個目標，要落實更大的財富，遠更困難得多。不過，在這方面，1945到1970年這個階段似乎也收成不錯。世界經濟出現可觀的擴張，這段期間，世界幾乎所有地方都過得比1920-1945年好。樂觀主義遍布遐邇，看好財富將會進一步增加。「工業化」國家與「農業化」國家之間還有嚴重差距（有人說是「已開發」國家與「未開發」國家的差距，後來的說法則是「北」「南」差距），而且早在1950年代就有人指出這差距愈來愈大，但一般仍然相信，無論如何，邊陲地區的絕對（與相對）貧窮反正會有辦法克服。克服這差距的過程，就是所謂「發展」。

所有國家都有（經濟）發展的遠景，變成一種普世信仰，保守主義者、自由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一致信奉。如何達成這發展，他們之間有劇烈爭辯，對這遠景本身卻無異辭。發展觀念成爲世界體系的地緣文化基礎的一個根本要素。聯合國全體一致決議指定1970年代爲「發展的十年」，就是其化身。

這決議真是再不巧也沒有了。世界經濟的擴張，也就是孔德拉季耶夫A階段，這時已到極頂。世界經濟正在進入孔德拉季耶夫B階段，即經濟停滯階段。停滯未必表示人人的絕對財富都下降；B階段是大多數人的財富下降，而不是所有人的財富都下降。有些人，有些地方，B階段其實是個人或地方大獲其利之時。

但是，對在1970-1990年階段（以及之後）吃到苦頭的大多數人，這B階段是一個大幻滅的時刻。尤其因爲大多數人對發展

的可能性投下了那麼多地緣文化信心，這幻滅更深刻有加。「發展」曾經是指示方向的北極星，如今卻成了幻覺。¹

這時候，「文化」這個觀念出現了。1945-1970年階段關於發展的辯論中，當然曾經討論到文化。但在當時的討論裡，文化被視爲一種「障礙」。在許多理論家的看法裡，尤其（但不限於）在自由派意識型態家的看法裡，文化代表「傳統」，與「現代」對立。他們說，邊陲地區那些民族一直相信許多傳統價值，以至不能從事各種將會使他們達成最快速發展的活動。因此，他們有必要使他們自己「現代化」。這件事不容易，但其政府經過啓蒙而開明，加上國際機構及已「開發」國家協助，可能實行「改革」而加速現代化。對這改革工作的外來支持，基本形態是「技術援助」。「技術」一詞據說有兩個基本特徵：這援助在科學已是不證自明的，而且是不偏不倚，不涉伸援者利害關係的。「技術」意指「純屬技術性」，因此意指「非政治性」。

到了1970年，技術援助與國家改革似乎都沒有成果。大多數國家的經濟情況明顯惡化。「援助」只是移轉科學智慧的觀念從此走了味，援助不涉利害關係的說法則結滿苦果，許多國家陷入巨額外債、資金流竄及負面投資的循環。

其中一個結果是，對發展觀念最忠心的許多人開始反過來攻擊他們的意識型態家。他們說：你們（政客、社會科學家）告訴我們；經濟發展是普遍都有可能的，獲致經濟發展的道路是

¹ 見我的論文〈開發：北極星或幻象〉(Development: Lodestar or Illusion?)，收於《重新思考社會科學》(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頁104-124。

政治變革(自由主義式改革主義，或者革命)。但這條道路證明根本不通。曾經相信這條路的人覺得被剝奪，被斷絕希望。這時候，來了一個新希望！如果改變政治經濟不再是一條有未來的路，甚至不再是一條可信的路；換句話說，如果1945-1970年宣揚的「發展」的確是個騙局；那麼，文化上的重新自我肯定可能是得救之路。1945-1970那些年裡，「文化」被視為必須盡快除去的「障礙」，現在變成一道壁壘，用來防制隨一切被商品化之後，一個國家經濟與政治地位的淪落、解體及惡化。文化不是惡棍，而是英雄了。

於是而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籌辦的「文化與發展」會議，不是只談發展，而是要「永續發展」。1953年，UNESCO出版過一篇報告，是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為「世界心理衛生總會」撰作的，其思考方向與現在大有不同。該篇報告是承UNESCO兩項決議案而產生。²這兩項決議案值得引述一番。第一項，就是1951年的第3.231號決議案，責成UNESCO「研究可能的方法，以便舒解現代技術引入非工業化國家及工業化過程中之國家而造成的緊張」。第二項決議案，就是1952年的3.24號決議案，責成UNESCO「鼓勵研究，尋求方法來使現代科技能夠和諧引入正在工業化過程中的國家，如何尊重這些國家的文化價值，以確保這些民族之社會進步」。

這些決議案相當有意思。決議文的意思是說：現代科技正

2 順便指出，就我所知，七人編輯群與十八人顧問委員會(兩者有些重疊)完全由美國學者組成——1953年的世界社會科學可見一斑。

在進入邊陲地區。這當然是好事，但這件事在文化和個人方面(研究報告的焦點擺在個人的心理衛生上)都造成緊張。必須有人來使之「和諧」。決議案的文法很要命，因為議案原文「和諧化」(harmonize)之後沒有with，讓人搞不清現代科技要跟什麼和諧化。但是，我們可以推定，其用意是要這些人民稍安勿躁。「文化價值」是可疑的東西，雖然話說值得「尊重」。UNESCO最大的希望，是「這些民族的社會進步」，無論這話是什麼意思。

然而今天，文化不再是徒然乞靈於一時，然後置之不理的東西，而是戰鬥口號。這成為戰鬥口號的「文化」是何物？我們為什麼在「發展」上面加上「永續」這個形容詞？發展可以不永續嗎？這些問題並沒有科學上不證自明的答案，當然也不是已有普遍共識的事情，目前的答案事實上差別甚大，依照你是什麼立場而定。

第一個問題是，我們談的是誰的「文化」，或哪些文化？「文化」一詞，有兩種筆直相反的用法。文化指兩個或更多個體共同的事物而言，但也意指兩個或更多個體之間「不」共通的事物而言。易言之，文化是使人結合，也是使人之間有所區分的東西³。今天，我們在相對於「發展」的關係上提「文化」，使用的是用文化來區分人的用法。我們是在說朝鮮「文化」有別於中國「文化」，也有別於英國「文化」。

3 我一篇論文對此有詳細討論，〈文化作為現代世界體系的意識型態戰場〉(Culture as the Ideological Battleground of the Modern World-System)，收於《地緣政治與地緣文化》(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91)，頁158-183。另見Section II, Geoculture: The Underside of Geopolitics。

那麼，什麼是朝鮮、中國或英國文化？是1983年朝鮮、中國或英國大多數人遵守的那套價值與風俗嗎？還是1993年和1793年朝鮮、中國、英國大多數人遵守的那套價值與風俗，還是1993和1993這兩年的？「朝鮮」、「中國」或「英國」這些字眼什麼意思，也完全不清楚。此外，「朝鮮」、「中國」或「英國」並非自明地指涉單一種文化。文化與時而變，這些國名所指疆界內又各分地區，當然，還有階級之異。因此，我們如果學瑪格麗特·米德說，我們必須尊重文化價值，我們就有必要知道我們談的是誰的文化價值，或哪些文化價值。否則，我們意何所指，實在太模糊。

同理，說「永續發展」，也不知所指。我們說韓國、中國或大不列顛在「發展」，真正的意思是南韓、中國南方或大不列顛南方諸郡，還是說整個國家？在1993年，以上三例的經濟都是南邊比北邊好，而且南北差距在過去20年不但一直擴大，至少今後25年看來還會繼續擴大，只是原因在三個例子裡各有不同。

「發展」的地緣文化由三項信念構成：(a). 目前是聯合國會員的國家，或可望成為聯合國會員國者，在政治上是主權國家，而且經濟至少潛在上是自主的；(b). 這些國家各有其民族「文化」，只有一種民族文化，或者，其基本、原初的民族文化只有一種；(c). 假以時日，這些國家各個都會「發展」（可能意指接近OECD國家的生活水準）。

我認為(a)和(b)不十分是實情，(c)則全然虛妄。獨立國家

的政治主權大多是虛構之物，軍事上相當強大者亦然；經濟自主則是玄虛之說。至於第二點，即民族文化，每個國家是一種文化，有個東西可以稱為一個國家的文化，這是無疑的，然而這些民族「文化」決不是連貫、定義分明、相當永無改變的行為模式，而是建構出來，而且一再重新建構的神話。在韓國、中國及大不列顛的人，其信念與行為當然大有差別，但是，說每個國家只有單一種民族文化，這文化的歷史源流不會間斷，以及說各個國家內部的文化之間的差異可以置之不顧，卻不容易令人同意。

至於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架構內尋求發展，則根本不可能所有國家都做到。資本累積的過程需要一套階層體系，在此體系之內，剩餘價值的分配無論就空間而言或以階級而論，都不平等。此外，資本主義的生產已導致——甚至可以說需要——世界人口在社會經濟上日益兩極化，加上人口學上的極化。所以，某種所謂的國家發展的確是可能的，而且是這個體系內一再出現的過程，但另一方面，由於全面的不平等分配在歷史上與理論上都是個常數，世界經濟裡一個部分的任何「發展」，其反面就是世界經濟另外某個地方的「沒落」、「去發展」或「低度發展」。1993年如此，1893年亦然，的確，1593年也是如此。因此，我並不是說國家不可能「發展」（今天、昨天，或明天）。我是說，在我們當前的體系架構之內，不可能所有國家（甚至不可能許多國家）同時「發展」。

我並不是說，不可能所有國家都引進新的機械化生產形式，先進的資訊科技，高樓大廈，或現代化的其他任何外在表

徵。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做得到的，但這並不必然表示這個國家或至少其多數人民的日子會更好過。在表面的「發展」之下，這國家及其人民事實上可能更難過。我們現在談「永續發展」，真實且持久的發展，而不是統計上的海市蜃樓，原因在此。我們現在所以會談文化，原因當然也在這裡。這裡的意思是，並非所有「發展」都是好的。某些地方價值，我們認為是積極價值，保存這些價值不但對地方群體，對整個世界也是很大的正數——能維持，甚至補強這些價值的「發展」，才是好的「發展」。

我以一個問題做本章標題，道理在此：「發展」的地緣文化，還是地緣文化的轉化？發展的地緣文化——建構一股文化壓力，迫使所有國家追求「現代化」或「發展」——將我們導入今天這個死胡同，我們從1945-1970年宣揚的「發展」裡醒過來，知道它是沒有前途的。

於是，我們窮則變，但變出來的往往還是各種走向「國家發展」之路，昨天是國家計畫和進口替代，今天搞結構調整(或震盪療法)和出口導向。有些地方則弄出什麼語焉不詳的第三條路。我們一個名堂換一個名堂，瘋狂的換，絕望的換，有時為換而換。過程之中，有人得利，但大多數人沒有得到好處。我們是不是要在這樣一支旋轉籠子裡度過今後50年？我希望不會，因為我們會發瘋，鬧脾氣。的確，我們已經相當在鬧脾氣了——從塞拉耶佛到摩加迪舒(Mogadishu)，從洛杉磯到羅斯托克(Rostock)，從阿爾及爾到平壤，都是。

與其為發展的地緣文化造成的無解兩難困局尋找行不通的解決之道，我們不如留意已經在我們眼前進行的地緣文化轉

化，並且提出這個問題：我們正在朝何處走？我們想往何處去？

對發展的地緣文化的幻滅，產生了對國家信心的喪失，人們不再相信國家是改革的管道或個人安全的屏障。這又形成一種惡性循環。國家愈得不到正當性，就愈難維持秩序或保證最起碼的社會福利。國家勝任這些功能，是大多數人認為國家存在的理由，國家愈不勝任這些功能，就愈得不到正當性。

這樣的前景令人心驚。國家結構的權力與正當性經過五百年穩定增加(以至於大多數人棄絕安全與福利的其他保證者)，現在，國家忽然開始褪失國家的氛圍。(當然，並不是全世界所有地方都是五百年，因為許多地區比較晚近才被納入現代世界體系，不過，以它們被納入現代世界體系以來而論，上述陳述是適用的)。人害怕，就求保護。他們向「集團」尋求保護——族裔集團、宗教集團、種族集團，體現「傳統」價值的集團。

同時，對國家領導、國家背書或國家支持的改革主義幻滅之後，出現「民主化」浪潮，也就是說，要求遠遠超過區區投票權之外的政治平等，這「民主化」的要求不只是對威權主義的國家提出，也對自由主義國家提出，因為自由主義國家這個觀念當初問世，其實不是為了促進民主化，而是為了預防民主化。

過去25年，「民主化」的要求，其形式是為群體爭取權利——為任何不是自由主義國家的國家內部的「多數」爭權，更兇的，是在任何自稱自由主義國家裡為「少數」爭權。「少數」當然是相對的觀念。「少數」在數目上可能超過一國人口一半以上。南

非的黑人，瓜地馬拉的印地安人、世上任何國家的女性，都屬於「少數」，因為無論統計數字如何，他們是在政治和經濟上受壓迫的一群。不過，美國的黑人，德國的土耳其人，土耳其的庫德族，日本的韓國人，當然也是「少數」的例子（在社會上與統計上皆然）。

因此，向群體尋求保護，有兩個十分不同，幾乎彼此矛盾的原因。一方面，是恐懼，即害怕解體，以及害怕進一步解體。另一方面，被壓迫者自我肯定，積極要求世界真正平等。倚靠群體的這個雙重原因，能導致重大的糾結。最好的證明，就是南斯拉夫崩解之後的情況。我們不要忘了，沒有許多年以前，南斯拉夫還被視為避免群際衝突有方的模範。今天，世界和南斯拉夫那些民族卻好像命中注定，眼看著大屠殺不斷蔓延，不斷惡化。

人們現在寄以信心的這些群體，不就是我們談「文化」時所指的那些實體嗎？我們肯定自己的文化，而獲解放。我們以之維護自己，保障我們的權利，要求受到平等的對待。然而，每當我們肯定自己的特性，就開始侵犯到別人的自我肯定。再以南斯拉夫為例。這個國家的政治解體始於幾年前塞爾維亞取消科索伏的自治地位。關於科索伏，有兩項清楚的事實。事實一：今天科索伏人口在宗教上信仰回教，以阿爾巴尼亞語為首要語言。事實二：大多數塞爾維亞人認為：在歷史上，科索伏是塞爾維亞文化的心臟。沒有了科索伏，塞爾維亞就沒有了文化歷史。要同時滿足由這兩項事實產生的主張，並不容易。

對塞爾維亞人，塞爾維亞沒有科索伏，就如以色列沒有耶

路撒冷。對了，還有一個例子！這些「文化」要求，和伊拉克對科威特的主張其實有何不同？如有不同，不同何在？主張和反主張互陷泥淖，化成永無休止的暴力，我們要如何掙脫這泥淖？以一種金玉其外的普遍主義為基礎，來宣揚和平主義，的確將會徒勞，而且偽善，因為這樣其實是要求忍受現狀。支撐這現狀的，是世界上的火力分配。

事實是，我們生活在一個極不平等的世界裡。道德上，我們沒有權利要求任何人不要設法使世界變得沒有這麼不平等。因此，我們必須讓所有人都獲得「永續發展」，我們必須承認各個群體、各個國家有權要求其「文化」完整。今天，這些要求造成問題，不是因為有人提出這些要求，而是因為世界體系的壓迫機制正在減弱。我們進入世界的重大失序。引起這失序的，不是被壓迫者挺身奮鬥，而是壓迫他們的這個結構本身的危機。

在世界重大失序，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發生危機的這個時期，我們必須清楚眼觀全局，才能脫困前進。這個時期，將是雙重鬥爭的時期：一個鬥爭是求存，一個是塑造那個將從當前體系危機中浮現的新歷史體系。有人將會想辦法創造一套新的結構，重複現有結構的關鍵特徵——階級性的不平等，這些人將會盡其所能，使我們只顧當前求存，使我們無法以歷史眼光在他們的計畫之外另尋道路——他們的計畫是進行虛假的轉化，表面的轉化，而讓目前的種種不平等完好無損。

一套歷史體系出現危機，並不表示人們不會日復一日繼續或企圖繼續做他們一直做著的事情（或其中許多事情）。為市場而生產商品，將會繼續。國家將會繼續保有軍隊並從事戰爭。

政府將會繼續使用警力來支持其政策。資本的累積將會繼續，雖然愈來愈困難，世界體系的社會經濟兩極化也會繼續加深。國家與個人也仍然會尋求促進他們在體系裡的向上流動，至少，防止自己往下流動。

但是，和過去五百年將會有一大不同！體系內的波動起伏將會愈來愈瘋狂，愈來愈尖銳。歷史體系相對穩定之時，大規模的行動（諸如所謂的革命）對體系運作的衝擊也相對輕微，但如今，甚至小規模行動也可能產生相對巨大的衝擊——這衝擊比較不在於改革現有體系，而在於決定終將出現的取代體系的輪廓。因此，人類行動的潛在報酬是非常巨大的，不作爲或方向錯誤的行動，懲罰同等巨大。

我們且來看看對現有體系及其五百年來的地緣文化的反體系文化批判。過去25年，反體系的批判集中於四個核心議題：物質主義、個人主義、族群中心主義，以及普羅米修斯式衝動的毀滅性。四項批判都非常有力，但實際上不容易令人信服。

(1) 對物質主義的批判，道理很淺顯。對財富、舒適及物質的追求，導致——可以說迫使——人忽略其他價值。這些其他價值有時稱爲精神價值。這是國家世俗化及一切主要社會建制世俗化的結果。世俗化是國家體制的根本支柱，國家體制提供架構，使人在其中從事無休無止的資本累積。無止境的資本累積——我們的歷史體系的定義特徵——是物質主義價值的精義所在。

以歷史而論，這項批判有兩個問題。第一，這項批判似乎

是爲了正在被新特權階層取代的舊特權階層的利益而提出，因此往往不是那麼誠實的批判。這不是真正反物質主義的批判，而且被用來不是批判有權有勢者，而是用來批判弱勢者，弱勢者的抗議以有點無政府的形態出現。所以，這批判是在責備受害者。

第二，反物質主義的批判要有意義的話，只能說這物質主義已經過度。滿足「基本需求」（及其他一些需求）並不是物質主義，而是生存和人性尊嚴的問題。反物質主義對窮人向來不是很有說服力。而在一個獲取資本的機會充滿不平等差別的階級體系裡，反物質主義對中層幹部也不是很有說服力，他們對上層是什麼樣子，看得相當清楚。

(2) 對個人主義的批判，出自對物質主義的批判。一個重視物質主義價值的體系，會造成人人對人人競爭的局面，終而導致一種全盤自我中心的世界觀，最多是因爲對核心家庭的忠誠而有些節制。批評者捨個人主義而揄揚「社會」、「群體」、「共同體」、「家庭」。有的批評者則談全人類優先。

對個人主義的批評則比較成功一點，也就是說，能使不少人以個人爲後，某些群體目標爲先。但對集體的這個奉獻已證明是脆弱的。集體凡是達成目標，都試圖謀取某種政治權力，以便將它們追求集體利益的能力制度化。它們這麼做，就重新進入了現代世界體系的運作過程。這體系證明極爲強大，並非個人決心所能抵擋，尤其不是群體領袖所能抵擋；誠如艾克頓爵士(Lord Acton)所言：權力令人腐化。然而並非任何權力皆然；有此作用的，是當前歷史體系內的權力，它給人巨大的機

會來操控資本累積的管道。

腐化有個不可避免的影響，是使人對集體產生幻滅。那些犧牲個人目標的人發現別人代替他們獲利，他們到頭來並沒有好太多(的確，往往更糟)。

(3) 第三個批判是對族群主義的批判，特別是在其歷史體系內出現的最惡毒形式，即歐洲中心主義。歐洲中心主義的另一面是種族主義。批評者指出，歐洲中心主義的粗糙形式是種族主義，種族主義導致對被標上「劣等」字樣的群體的社會歧視與隔離。但批評者也更進一步。他們說，歐洲中心主義有其世故的臉孔，一張比較「自由」的臉孔：普遍主義的臉孔。

歐洲人將他們的價值界定為普遍價值，然後將這些價值強加於全世界，而且其作法促進了他們自己的支配地位與物質價值。的確，族群中心的普遍主義的最精密形式，就是才能政治(meritocracy)的觀念，這觀念規定賽跑必須公平，卻置一個事實於不顧，亦即參加賽跑的人的起跑點頗有差異。起跑點並非決定於遺傳，而是決定於社會性的因素。

這項批判非常有力，但強勢者運用一套非常基本的分而治之(*divide et impera*)策略，破壞了這種批判的力量。對族群中心主義的抨擊逐漸蓄積力量之際，誰優越、誰低劣之間的界線不斷移轉，包括最有力的抗議者的上層之間也有這種情況，造成這些上層有人改變路線。由於世界體系內不斷出現人口學上的兩極化，改變這分界線一直很容易，其作用就是使頂層的人所占百分比大致保持穩定。在政治上，這表示每一世代的抗議者都必須重新開始。

(4) 最近，對普羅米修斯式衝動的批判是最晚出的一種批判，但在許多方面最發人深省。資本累積的壓力不只導致科技先進(這進步最下是中性，最上是有其用益)，也導致巨大的破壞性。歷史資本主義在社會心理上有其腐蝕性，也就是「異化」與「失範」(*anomie*)，在地球物理上也有其腐蝕性，就是破壞生態。

今天，歷史資本主義的巨大自我毀滅性，以及這自我毀滅正在迅速增長，都已被承認。但這項批判也有其局限，也就是難以為繼。異化與失範被轉變成心理治療的商品。生態學被變成清理和再生的商品。我們沒有能夠拔除破壞之根，而是在設法修補一塊破布。

在這個朝一個新的歷史體系過渡的時代，我們面前的課題，是拿上述對歷史資本主義的四大批判——這四大批判很深刻，但表述的方式不足以令人信服——將之轉化成一種積極的模型，在不墜入過去(片面)的批評者陷入的陷阱之下，鑄造新的社會秩序。我們必須激進——也就是說，直指問題之根。我們必須提供真正根本的重建。這是至少50年的大計。這是一項世界性的大計，不能局部或片面地做，雖然局部行動必須是這項建設的一大主要部分。這件大計也需要充分運用人類的想像力。但這件大計是可能的。

可能，但決非確定有成。勝利主義將是大忌。我們必須尋求清醒與狂想的適當結合。在最不可思議的地方，在世界每個角落，都可能找到這樣的結合。

第十章

美國與世界： 今日，昨日，明日

上帝似乎給了美國三重福佑：現在，過去，和未來。我說似乎，因為上帝之道神秘幽奧，我們不能強稱有把握了解。我說的福是這樣的：上帝現在給美國繁榮，過去給自由，未來給平等。

談美國之福，向來都要連帶拿世界的尺度來衡量美國。美國雖然長久自認為遠離世界，而且和歐洲特別有些距離，但其自我定義其實向來是針對世界而作成。過去大約兩百年來，美國以外的世界也一直以美國為注意力的焦點。

上帝降福於人，是有代價的。這代價就是要我們行得正，做得直。每個福份都有與之矛盾的東西，受福的人往往也不大看得出來有沒有付出代價。我們從今天走向明天之際，理當再

一次算算我們所受的福份，所造的罪孽，端詳端詳我們的帳簿。

今日

我說的今日，始於1945年，終於1990年。在這段時期內，就在這段時期內，過了不算，美國是我們世界體系的霸權。這霸權的來源是我們的繁榮；這霸權的結果是我們的繁榮；這霸權的標誌是我們的繁榮。我們何德何能，而享此獨特、罕有的特權？是不是我們生來偉大？我們有沒有造就偉大？偉大是誰硬塞給我們的東西？

我說的現在，從1945年開始。世界剛從一場漫長恐怖的世界大戰裡冒出頭來。這場大戰，戰場是整個歐亞地塊，從西邊的島嶼（英國）接到東邊的島嶼（日本、菲律賓及太平洋諸島），北起歐亞的北境，南迄北非、東南亞及美拉尼西亞。偌大區域，人命傷亡無算，世界生產的物質骨幹基礎毀損無數。有些地區受害程度較別地嚴重，但幾乎可說沒有絲毫無損之地。主要工業區裡，設備與全國基本設施維持完好者，唯有美國。美國的工廠非但沒有遭受轟炸，甚至反而由於戰時的計畫與動員，而上升到全新的效率水平。

美國參戰時，其生產機器已經（至少）相當於世界上其他所有國家，因此，所有國家的機器在戰爭中毀滅，更造成他們的產能與生產效率和美國出現巨大差距。這差距造成美國企業在其後25年形成前所未見的欣欣向榮。這差距也說明，這些企業欣欣向榮的唯一途徑，是大幅增加其員工的實質工資。實質工

資的這種上升——化為擁有住宅、汽車、家庭耐久財，以及教育機會巨幅擴增——則構成美國人所享受並且令世界驚奇的繁榮。

繁榮最主要的是一種機會，享受的機會，創造的機會，分享的機會。但繁榮也是負擔。第一個負擔是，擁有繁榮者有維持繁榮的壓力。誰願意放棄人生的美好事物？世界上向來有少數苦行者，也有另外少數人出於羞恥心或罪惡感而願意脫棄特權。但在絕大多數人心目中，棄絕生活享受者非聖即瘋，而且無論多麼可佩，都不是他們做得來的事。從1945到1990年，美國的行爲挺正常。美國繁榮，而且想辦法維持繁榮。

我們的國家——其領導者，以及其公民——所追求的國家目標，很明顯不是幸福（傑佛遜在我們的「獨立宣言」裡刻畫的那種烏托邦和浪漫意像），而是繁榮。美國花了什麼樣的工夫來維持手裡的繁榮？從後1945年的角度看來，美國需要的事情有三樣：其巨大的工業生產需要顧客；必須維持世界秩序，以使用最低成本從事商業；確保生產過程不被擾亂。

在1945年，這三件事都不是很容易掌握。世界大戰的破壞，使世界上許多較為富裕的國家淪為赤貧，使美國占到極大的便宜。歐洲和亞洲處處饑餓，其人民買不起底特律生產的汽車。大戰結束，也留下許許多多民族問題，不但在歐洲和亞洲，在戰區以外，我們後來稱為第三世界的那些國家，也是如此。社會安定似乎相當遙遠。在美國國內，美國人也等著重演他們在1930年代造成亂象的社會衝突。那些衝突因為戰時講求全國政治統一而延後，但並未解決。

美國要繁榮，也希望有更大繁榮，爲了消除對其繁榮的威脅，美國拿出必要的手段來，而且不像原先預料的那麼猶豫不決。美國祭起理想主義，以促進其國家利益。美國相信自己，相信美國善良，並尋求以自己認爲正義且智慧的方式服務和領導世界。在這過程中，美國獲得許多人的掌聲，引起許人的憤怒，見人發怒則覺得尊嚴受損，聽到掌聲則覺得心中溫暖，但無論如何，美國都覺得不能不追循它爲自己設計的道路，它認爲正義的一條路。

美國回顧戰後世界，往往認爲有四大成就可喜可賀，而且認爲大致功在自己。第一件成就，是重建劫餘的歐亞陸塊，將之重新鑲進世界經濟的生產活動之中。第二成就，是在世界體系內維持和平，容易防止核子戰爭和軍事侵略。第三件成就，是前殖民世界大致都在和平之中完成去殖民化，並且獲得可觀的援助以追求經濟發展。第四件大事，是將美國勞工階級整合於經濟福利及充分的政治參與之中，以及結束美國國內的種族隔離與歧視。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亨利·魯斯(Henry Luce)宣布本世界是「美國世紀」，指的就是達成這四件事的希望而言。的確是美國世紀。以上這些成就是真實的成就，但各項成就也各自有其代價，以及始料未及的後果。正確的資產負債表，在道德上和分析上都比我們願意承認的要更複雜。

美國協助重建歐亞陸塊，這當然是實情。美國在1945年當年立即提供救援，集體方面是參加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RRA)的計畫，個別方面是自行成立「美國全球救援」

(CARE)，並且接著很快就採取一些更爲實質的長期措施，最著名的就是「馬歇爾計畫」。1945到1960年，美國爲了西歐與日本的重建，投入大量金錢與政治精力。這些行動的目的很清楚：重建戰禍破壞的工廠與基本設施；重新創造具備功能，通貨穩定，整合於國際分工之中的市場體系；以及，確保充足的就業機會。美國也沒有自限於直接的經濟協助，它鼓勵歐洲內部成立一些結構，來預防與兩次大戰期間那些國際緊張相當有關係的保護主義壁壘重新得勢。

當然，這些作法不純出於利他之心。美國的生產企業如果想有效率地生產，並且獲利，就需相當大量的海外消費者。重建後的西歐與日本正好能夠提供這必要的基盤。此外，美國需要一些可靠的盟友，在世界競技場上和美國作政治唱合；西歐和日本是最可能扮演這個角色的國家。這聯盟關係成制度，就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及美日防衛條約，而這些國家彼此之間在美國「領導」下持續不斷的政治協調，更是這層關係的密切表達。這件事的結果是，至少在初期，國際生活的所有重要決策都出自華府，一批強大的威權侍從國家(client-state)則大致加以毫無疑問的默認與支持。

在世界政治競技場上，美國感覺到的唯一障礙是蘇聯。蘇聯追求的政治目標似乎和美國大有不同，甚至和美國對立。蘇聯是後1945世界的僅有另一軍事強權，也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而且話說是以世界革命爲志。

我們討論美國和蘇聯在戰後時期的關係時，往往用雅爾達和圍堵兩字代表美國的政策。這兩個字好像是相當不同的事

情。雅爾達即使不是西方的一次出賣，如今也頗有冷血協定之名。圍堵則象徵美國決心遏阻蘇聯擴張。然而實際上，雅爾達和圍堵並不是兩個分開的政策，更不是彼此相反的政策，而是完全同一回事。這裡面的主要交易是圍堵。和大多數交易一樣，圍堵基本上是由比較強的一方（美國）向比較弱的一方提出，結果一拍即合，因為符合雙方的共同利益。

一次大戰結束，蘇聯軍隊占領歐洲東半部，美國軍隊占領西半部。雙方以易北河為界，或者從斯德丁到特里斯特這條線，也就是邱吉爾在1946年說的「鐵幕」。表面上，這交易的用意只是要維持歐洲的軍事現狀與和平，美國和蘇聯在各自屬區內可以作任何政治安排，唯其所欲。從1945到1990年，這軍事現狀——稱之為雅爾達或圍堵，都可以——雙方都悉心遵守。這現狀有一天將會被稱為「偉大的美國和平」，像一個黃金時代一樣被後人帶著懷念之情回顧。

但是，這筆交易有三項附款，比較沒有人討論。第一條附款與世界經濟的運作有關。蘇聯不必開口要求美國協助重建，開口也不會得到。美國讓蘇聯，應該說是要求蘇聯縮進一種擬自給自足的殼子裡。這麼做，對美國有幾個好處。蘇區的重建成本可想而知會很巨大，美國單是協助西歐和日本重建，已經忙得不可開交。此外，蘇聯（和中國）重建之後，會不會很快成為美國出口的可觀市場，也不是挺清楚，可以確定的是一定比不上西歐和日本。所以，投資於蘇區重建，利益回收將會不夠充足。雅爾達代表了美國在短期之內的經濟淨得。

第二個附款是在意識型態方面。雙方容許，甚至鼓勵對方

提高彼此譴責的分貝。杜勒斯一唱，史大林一和，說中立主義「不道德」。所謂的共產主義世界與自由世界一邊彼此鬥爭，一邊嚴密控制各自陣營內部：西方有反共的麥卡錫主義，東歐是間諜審判與整肅清洗。真正被控制的，是「左」，我說的「左」，指所有有心激進地對現存世界秩序加以質疑的人，現存世界秩序則指在美國霸權與其次帝國主義工具——蘇聯——勾串之下復振並且滋盛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

第三個附款是，歐洲以外的世界，即後來所說的第三世界，亦即更晚近以來所說的南方，誰都不許質疑歐洲的「大美和平」，以及其制度基礎，也就是雅爾達／圍堵。雙方都矢言維持這基礎，並且對之尊重到底。但這條附款不容易詮釋，後來證明執行更難。

1945年，美國不曾料到第三世界會變成這麼多波折動盪。美國秉持威爾遜主義世界觀處理第三世界的問題，但不是十分帶勁兒。美國贊成民族自決，支持改善第三世界的經濟福祉，但並不認為這些事情有多麼迫切。（蘇聯雖然滿嘴詞藻，其實也沒有認為這是急事）。大體上，美國優先重視它與蘇聯和西歐的關係。1945年，歐洲國家在非洲，在亞洲相當多地區，以及在加勒比海仍是殖民強權，它們鐵了心，認定這些殖民地如果要有什麼改變，都得依照他們設定的步調，按照他們的作風來改。因此，美國干預其他地方，甚至干預他們的內政，他們都可以忍受，但美國干預他們的殖民地，他們決不默認。（這裡應該指出，蘇聯和它與西歐共產黨的關係也有這些問題。）

歐洲的拖延和蘇聯的遲疑，意指美國的立場是盡量不介入

第三世界的政治鬥爭。然而其實，西歐在殖民地的政治地位比原先所想的要虛弱得多，於是蘇聯不得不變得比它自己原先希望的積極一點，因為它受到壓力，行為必須符合它的列寧主義意識型態詞藻。這麼一來，美國也被迫扮演稍微積極一點的角色。杜魯門總統宣布「四點」方案，也就是協助第三世界經濟發展的計畫。這四點在他那次演說裡只算末節，但我們記得的就是這四點。美國開始對西歐國家施加相當溫和的壓力，要它們加速去殖民化的過程，並且要它們承認這過程的結果將是殖民獨立。此外，美國開始在這些殖民地培養「溫和派」民族主義領袖。回顧之下，「溫和」一詞的定義非常清楚。所謂「溫和」，指一個民族主義運動追求政治獨立，但願意接受其國家被整合於世界經濟的生產程序之中，包括跨國投資，而且甚至願意擴大參與這程序。總之，美國自認其政策是要維持並實現其反殖民主義的歷史承諾，因為美國作為一個國家，當初就是殖民地出身。

最後，不要忽略了美國國內的情況。今天，我們經常忘記美國國內在1930年代的衝突有多嚴重。那時候，我們忙著辯論我們在世界事務上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是要孤立主義，還是要走干預主義。勞資之間也有尖銳的階級鬥爭。戰後的民間英雄之一，魯瑟(Walter Reuther)，1937年在底特律一座橋上靜坐罷工，頭被撞擊。在美國南方，三K黨勢力非常強大，黑人還常遭私刑。世界大戰那幾年，社會休戰，但許多人擔心美國國內的社會衝突將隨大戰結束而復燃。美國如果繼續像它在1930年代那樣分裂，就很難在世界上成為霸權。如果生產總是

不斷被罷工和勞資衝突干擾，美國也很難憑其經濟優勢賺取充足的利潤。

美國似乎在非常短時間內，就把家裡整理得秩序井然。參議員范登堡(Vandenberg)原是孤立主義健將，後來改變立場，雖然是象徵性的，但關係重大。他首倡「兩黨外交政策」觀念，表示美國已準備好在世界上「負起其責任」。1945年的通用汽車大罷工，由前面提到的那位魯瑟領導，後來達成妥協而圓滿收場，為其後25年所有工會化的重要產業創下先例：工資大幅增加，誓言不再罷工，生產力上升，以及終端產品價格上升。當局採取兩項根本措施，結束後重建時期的黑白種族隔離政策：一是杜魯門總統1948年實施武裝部隊黑白融合，二是最高法院1954年在布朗對教育委員會案(*Brown vs. the Board of Education*)推翻普雷西對佛格森案(*Plessy vs. Ferguson*)，一致裁定種族分離違憲。美國非常自豪，「美國之音」也不吝大談我們對自由的實際承諾。

到1960年，美國追求其目標，成果看來極佳。繁榮的新景舉目可見。郊區欣欣向榮。高等教育和醫療機構巨幅擴張。全國無遠弗屆的空中交通與公路網興建起來。西歐和日本也再度站了起來。蘇聯被好好地圍堵著。美國的勞工運動被拿掉了左翼之後，獲得承認為華府當權派的一支。1960年也是「非洲年」，十六個非洲國家，原本是四個歐洲國家的殖民地，宣布獨立，加入聯合國。甘迺迪那年當選總統，似乎更是美國新境界的極致。他說，權力已經傳到一個在本世紀出生的世代，言下之意，可以充分擺脫舊有的猶豫與不足，充分奉獻於一個永遠繁

榮的世界，以及自由不斷在擴大的世界。

但是，就在這時，繁榮的代價開始顯現，其始料未及的後果開始可以感覺到，其制度結構則即使不是開始崩潰，至少也是開始動搖，甚至開始顛危危的。隨美國的繁榮，甚至世界的繁榮俱至的，是世界開始明白，在國際上以及在美國國內，貧富之間、核心與邊陲之間、被接納者與被排斥者之間的鴻溝愈來愈大。1960年代，這鴻溝只是相對性的，但到1970年代已變成絕對，在1980年代更甚。然而即使是相對性的鴻溝，也是問題之兆。也許可以說，相對性的鴻溝特別是問題之兆。這問題是世界性的。

在西歐與日本，問題似乎相對輕微。到1960年代，這些國家逐漸「趕上」美國，先在生產力上趕上，然後是生活水準。到1980年代，他們的生產力已經超過美國，生活水準則追平美國。這問題可以說輕微，因為它產生一種靜靜的，對美國霸權的拒斥。但這種拒斥唯其安靜，所以更有效，因為它很沈靜，對未來充滿自信。當然，美國這些盟友因為對美國心存感激，所以尚知克制，但是他們一點一滴，開始脫離他們在政治上受美國監護的狀態，在世界體系裡爭取自成角色。美國在制度上和意識型態上使出渾身解數來約束他們，到1980年代尚稱部分成功。

但是在別處，問題沒有這麼好處理。東歐國家的人，無論左派右派，大多拒絕接受雅爾達的正當性。冷戰初期的嚴密意識型態控制，無論在美國或在蘇聯，都無法維持。美國國會參議院1954年申誡麥卡錫，赫魯雪夫1956年在20屆黨大會揭發並

指斥史大林的罪行。東歐各國人民利用每一個意識型態放鬆的機會爭取行動自由，最著名的是1956年在波蘭和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以及1980年再度發生於波蘭。這所有政治起事都不是針對美國，而是直接針對蘇聯，因此美國樂得不作任何干預。美國不干預，就是忠實執行其與蘇聯的安排，後者則便宜行事，採取一切必要措施救平起事。

情況最失控的地方是第三世界，而且自始就不可收拾。史大林逼迫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妥協，中共不理逼迫，在1949年長驅而入上海。美國真正擔心的不是中國將會成為蘇聯的傀儡，而是中國不成為蘇聯的傀儡。美國擔心的事發生了。不到一年，美國為了保住現狀而用兵朝鮮，時間既長，代價又昂。中南半島的去殖民化也沒有和平又溫和。先是法國，然後美國，被捲入一場甚至更漫長，更費血本的戰爭。這場戰爭，美國後來在軍事上輸掉。中東的劇情原本平淡，保守的阿拉伯國家，連同以色列，都是穩穩親西方的，但納瑟與納瑟主義崛起，打破悶局，而且從北非到伊拉克，引起各種迴響。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導至法國第四共和垮台，造成對美國最沒有好感的戴高樂在法國掌權。在拉丁美洲，卡斯楚得勢古巴，長期不斷的政治紛亂出現更激進的轉折。

第三世界這些起事基本上不是針對蘇聯，而是針對美國（不同於東歐的情形），因此美國放心干預，而且用力干預。過去四十五年結算之下，在軍事層次，美國似乎有贏有輸，在政治層次，美國有贏有輸。美國的主要實力在經濟層次，在這方面能夠懲罰它認為對他有敵意的國家（越南、古巴、尼加拉瓜）。我

認為有一個要點必須指出，就是在種種這些行情上，蘇聯扮演的是次要的全球角色。一方面，第三世界的運動是向美國的世界秩序挑戰，而蘇聯是這世界秩序的一部分。挑戰的衝力來自地方。第三世界民族認為「大美和平」並不符合他們的利益。另一方面，這些起事雖然逼使美國在軍事上和政治上往第三世界投入1945年難以想像的心力，這些運動沒有一個能夠，集體合起來也沒有能夠，打破「大美和平」或直接威脅到美國的繁榮。不過，美國付出的代價還是愈來愈高。

美國在國內也付出代價。在第三世界維持秩序，得付成本，最大筆的是越戰。人命代價，以及這場戰爭對政府財政穩定的影響，都非常重大。然而最高的代價當推國家的正當性遭到折損。總統這個職位的威信如果不是已經被越戰破壞，水門案決無本事逼一個總統辭職。

另一個代價是相對剝削。工會被整合於政治當權派，熟練工人和中產階級實質所得提高，正好突顯有人受到排斥。美國已從人口裡少數部分富庶的前1945年階段進到多數人覺得富庶或至少中度富庶的後1945年階段。這觸發被排斥者起而行動，新意識的行動，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黑人意識、婦女意識以及後來的少數族類意識。

1968年，以上各種挑戰聚合於一個大鎔爐：對美國帝國主義的不滿，對蘇聯次帝國主義及其與美國的勾結的不滿，對老左運動被整合於體制而從反對立場淪為共犯的不滿，對被壓迫階層與婦女（延及其他所有群體如殘障、同性戀、原住民）被排斥的不滿。1968年的世界爆炸——在美國與西歐、在捷克與中

國、在墨西哥與印度——多多少少持續了三年，直到熊熊烈火被支持世界體系的勢力控制。烈火變成餘燼，但過程中嚴重破壞了「大美和平」的意識型態支柱。這和平結束只是時間問題。

「大美和平」的本源在美國的經濟力量，成果則是美國的繁榮，而在美國的成功裡開始解體。西歐與日本重建，大約到1967年，這些國家已到了足與美國競爭的程度。此外，由此帶來的世界生產總額引起世界經濟長期下降之勢——這下降之勢開始腐蝕美國的繁榮，而且我們一直生活在這下降之勢裡。1967到1990年，美國曾想辦法阻住這下降之勢，但經過20多年，終於不勝其力。阻住這下降之勢，美國使用了兩種模式，一是尼克森、福特及卡特的「低姿態」，結果此計遇到伊朗而出岔。第二模式是雷根與布希的假大男人姿態，結束此計為伊拉克所破。

爲了化解美國喪失霸權之虞，美國所用的「低姿態」辦法有三大支柱：三邊主義、OPEC石油漲價，以及後越戰症候群。三邊主義也者，是讓西歐與日本在決策上扮演次要的參與角色，以防止他們在政治上營造自主性。三邊主義成功之處，是使OECD國家在軍事政策、政治策略及世界金融的安排上不至於和美國各唱各的調。西歐與日本在形式上繼續尊重美國的領導。然而實際上，他們老實不客氣，不斷設法改善他們在世界生產過程中相對於美國的地位。他們知道，美國的霸權地位終有一天將會由於缺乏經濟基盤而崩潰。

OPEC石油由美國在中東的主要代理人（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王室）領頭漲價。這項行動的基本設計宗旨，是要將世界剩餘

資本打入一個中央基金，這些錢將會以國家貸款的形式回流第三世界與社會主義國家，為這些國家提供短程的穩定，並以人為方式為工業生產維持世界市場。OPEC石油漲價的第二個好處，是西歐與日本因此遭到的困難比美國遭到的困難要大，於是而能減緩他們和美國競爭的力量。第三個結果是，石油漲價刺激OPEC國家通膨，特別是刺激美國通膨，因而降低實質工資。1970年代，OPEC石油漲價的確會對世界經濟造成漲價所欲的效果：減慢美國經濟優勢沒落的速度。

「低姿態」反應的第三層面是後越戰症候群。後越戰症候群不是對尼克森的反動，而是尼克森戰略的實現：對中國開放，以及從中南半島撤退，這兩件事之後的必然發展，則是克拉克的安哥拉修正案，撤消對尼加拉瓜總統蘇慕薩的支持，以及撤消對伊朗王室的支持。甚至蘇聯入侵阿富汗，也促進了這樣的發展，因為蘇聯的政治精力從此陷入難以脫身的泥沼之中，蘇聯因此沒有餘力在伊斯蘭世界爭取優勢，並且給了美國口實，在情勢日蹙的西歐重新煽起意識型態之火。

美國很明顯沒有算準的，則是何梅尼領導的運動完全不同於戰前第三世界那些民族解放運動。中國共產黨、越共、納瑟主義者、阿爾及利亞的民族解放陣線黨(FLN)、古巴的7月26日運動，以及安哥拉的「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勞動黨」(MPLA)，全都反對美國霸權與現存世界體系，但是也都在這套世界體系的18世紀啟蒙運動世界觀架構內運作。它們反對這套體系，同時是這套體系的一部分。它們一旦當權，不用太費周章就融入這套體系的現有結構之內，道理在此。

何梅尼不來這一套。他知道誰是撒旦。頭號撒旦是美國，第二號撒旦是蘇聯。何梅尼不接受對兩大撒旦有利的遊戲規則。美國面對這根本不同的東西，束手無策。此所以何梅尼能夠那樣大大羞辱美國，而且比1968年世界革命、新左以及其他被排斥的人更有效地破壞美國霸權。何梅尼將卡特拉下總統寶座，也打垮「低姿態」。美國打出它最後一張牌：雷根的假大男人主義。雷根說，最大的敵人不是何梅尼，而是卡特(言下之意，以及尼克森和福特)。解決之道是胡吹大氣。對盟國，不用再玩三邊主義，要再講意識型態。盟國的反應是繼續他們對美國的「低姿態」。對第三世界，是入侵格蘭納達，轟炸利比亞(一次)，最後，在巴拿馬拿掉背叛美國的諾利加。第三世界的反應是以自殺汽車炸彈奪走美國二百名海軍陸戰隊的性命，逼得美國撤出黎巴嫩。對國內老百姓，降低實質工資，方法不是通膨，而是修理工會(首先對付航空塔台管制員)，將全國所得重新配置給富人，以及利用尖銳的景氣衰退，把許多中級所得者變成低所得。對世界經濟裡的債務危機(OPEC石油漲價騙局的直接後果)，則解決方法是實施軍事凱因斯主義，利用美國的如山債務，將美國財產賣給盟國，而這作法的長程效應是造成美國通貨緊縮。最後，當然是指斥蘇聯為「邪惡帝國」。

雷根可能相信，蘇聯被他這麼一嚇，就產生了戈巴契夫。然而蘇聯所以會出現戈巴契夫，實是因為雷根證明美國的力量已經不再足以維持它和蘇聯的特殊安排。蘇聯現在被迫自求多福，而失掉了與美國的冷戰安排，蘇聯處境不堪。在世界經濟大幅擴張的1950與1960年代，蘇聯的經濟尚能維持，甚至出現

相當的成長，但其結構太缺乏彈性，無法因應1970與1980年代的世界經濟大停滯。它的意識型態後勁已完全用老。列寧式發展主義證明和過去50年來其他所有品牌的發展主義（無論是社會主義版或自由市場版）一樣無效。

爲了在21世紀維持可觀的強勢，戈巴契夫追求了蘇聯（也許應該說俄羅斯）能夠選擇的唯一政策：他必須停止假帝國的角色繼續使蘇聯資源流失。因此，他加快清算冷戰軍事門面的步調（既然冷戰的政治功用已經結束），方法是進行半單方面的裁軍（從阿富汗撤軍、拆除飛彈等等），從而迫使美國跟進。另外，他必須擺脫蘇聯在東歐愈來愈難處理的帝國負擔。東歐人當然樂得恭敬不如從命，他們過去至少25年來，朝思暮想的正是如何擺脫蘇聯。但是，1989奇蹟所以可能，並非因爲美國改變其傳統立場，而是因爲蘇聯改變其傳統立場。蘇聯改變其傳統立場，則並非因爲美國強勢，而是因爲美國積弱。戈巴契夫的第三件工作，是爲蘇聯恢復一套可以活命的內部結束，包括處理如今被鬆綁的民族主義。這件工作，他失敗了。

1989年奇蹟（以及1991年蘇聯政變未成），無疑是東歐和中歐人民之福，對蘇聯各民族也是。雖然並非純是福氣，但此事至少打開更新的可能。但這事對美國不是好消息。美國並沒有贏得冷戰，而是輸掉了冷戰，因爲冷戰本來就不是一場輸贏的比賽，而是一段小步舞曲。小步舞曲變成比賽，就有了輸贏，而贏者只可能是慘勝。冷戰的結束，其實拿掉了美國霸權與美國繁榮的最後一根大柱，就是蘇聯這面盾牌。

結果就是伊拉克與波斯灣危機。伊拉克並不是突然發現它

對科威特的主權資格，而是在那之前至少30年就一直提出這項主權聲稱。伊拉克爲什麼早不做晚不做，挑了這個時候入侵？其直接動機似乎相當清楚。伊拉克和其他上百國家一樣，飽嘗OPEC石油漲價騙局的慘重後果，以及隨後而至的外債危機之苦。伊拉克的情況特別嚴重，因爲它和伊朗打了一場所費不貲又徒勞無功的戰爭，那場戰爭裡，伊拉克以爲有美國、法國、沙烏地阿拉伯及蘇聯撐腰，勇往直前。這些國家和伊拉克站在一起，乍看奇怪，其實不奇怪，因爲他們都想削弱何梅尼的伊朗。1990年，伊拉克下定決心不想滅頂，把科威特的石油營收搶過來（附帶還掉大筆外債）似乎是個辦法。

然而海珊爲什麼敢動手？我不相信他是失算。我認爲他算得很準。他在孤注一擲（*va banque*）。他有兩張好牌。一張是他知道蘇聯「不會」站在他這邊。他如果早五年入侵科威特，這侵略行動將會很快激起美蘇對抗，挑動核子毀滅的可能性，而且可能很快就走上美蘇安排的老路。如此則伊拉克除了退卻，別無他途，一如1962年之古巴。伊拉克能夠對外用兵，是因爲它已經從蘇聯的束縛裡解脫。

海珊的第二張好牌是區域性的。在戈巴契夫實施新外交之後，美國與蘇聯進入一段解決所謂區域衝突的過程，也就是說，不再在他們1970年代和1980年代最強力進行對抗性衝突的四個區域繼續這種衝突。這四個區域是中南半島、南部非洲、中美洲，以及中東。在前三個地區，雙方繼續不斷協商，談判破裂的只有中東。以色列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的談判陷入僵局，而美國的政治強勢明顯不足以迫使以色列繼續談判的時

候，伊拉克就從舞台兩廂登上了舞台中央。只要以色列與PLO的談判持續，海珊就一籌莫展，因為他不願意冒險被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世界指為破壞談判的禍首。一旦以色列搞砸了協商，海珊就可以擺起巴勒斯坦解放者的姿態來。

伊拉克的計算裡，還有一項因素。無論海珊用兵結果如何，美國都將是輸家。美國如果袖手旁觀，海珊就要一路順風，成為阿拉伯世界的俾斯麥。美國如果反應（它果然起反應），並且以美國部隊為核心，和他們組織軍事聯盟對付伊拉克，海珊可能倒台，但美國也不會有贏面。這戰爭從第一天起就無可避免，因為海珊和布希都不可能接受真槍實彈對決以外的結果。在軍事上，伊拉克後來當然慘敗，人命及基本設施方面也慘重折損。但是，要說伊拉克在政治上也失敗，為時尚早。

美國向世人證明，它的確是世上第一軍事強權。但是我們指出，1945年以來，美國碰到蓄意的軍事挑釁，頭一遭必須證明它是世界第一軍事強權。如此被逼之下贏得戰爭，已經是輸了一半。有了一個挑戰者敢動手，就可能有第二個挑戰者開始秣馬厲兵。了得如喬路易，也有疲倦之時。

美國證明軍事實力，卻突顯其經濟弱點。大家都留意到，美國打這場戰爭，得靠別國融資，因為美國自己拿不出錢來。美國大聲嚷嚷它如今是世界外交掙客，但它演起這個角色，不像個令人尊重的長者，而是一個手舞巨大棍子，卻露出經濟馬腳的強權。

能夠產生可長可久的結果，當掙客才是有利的事。於是美國被迫自行在中東開始孤注一擲。美國如果有辦法為以色列與

PLO撮合一紙可觀的協議，人人都會鼓掌叫好。但這麼一紙協議似乎並無可能。在未來兩年或三年裡，我們在中東如果陷入更多戰爭，而且可能是要用到核子武器的戰爭，則美國將被打成罪魁，其保守的阿拉伯盟友將會垮台，歐洲則出面收拾一個可能不可收拾的局面。這些事情發生之時，海珊難道不可能還在那裡自在得意喔喔叫？波斯灣戰爭沒有產生任何對美國正面之事。

1980年的伊朗危機與1990年的伊拉克危機十分不同。它們是第三世界對「大美和平」的兩個不同的反應模型。伊朗模型是根本拒斥西方價值，伊拉克則頗有不同。在伊拉克執政的是復興黨，而復興黨是阿拉伯世界最世俗化的運動。伊拉克式反應是一種軍事反應，嘗試運用足夠的現代軍事實力來建構巨大的第三世界國家，以便塑造一種新的北南強權關係。這些也是未來的兩種面貌。美國的「低姿態」被何梅尼打破，美國的「假大男人」則被海珊打倒。

美國繁榮的極盛期已經過去了，整個架子正在被拆掉。地基正在崩塌。我們應該如何評估1945到1990年的美國霸權？一方面，這段時期是「大美和平」和巨大物質繁榮的階段。用比較歷史的標準來說，這也是個寬容的階段，至少大部分是如此，雖然其間出現過許多衝突，或者，由於這些衝突以某種形式出現，而造成寬容。然而這「大美和平」與繁榮由於排斥太多東西，難以持久，現在終於結束。

我們此刻正在進入美國的未來，這個未來，我們一則感到絕望，一則帶著希望。不過，除非先看清美國的過去，否則無

法看清未來的風將會怎麼吹。

昨日

美國的過去：這故事應該從何說起？我要打破成例，從1791年說起，而且從兩個重要事件著手，一是「權利法案」通過，一是「佛蒙特共和國」加入聯邦。

關於美國的自由，沒有比「權利法案」更偉大的象徵、更具體的基礎。我們為此法案歡呼，自有道理，但我們往往忘了，這法案是1791年才通過的，作為前十項憲法增補條款。也就是說，我們應該提示，1787年憲法原文裡沒有這些條文。1787年憲法所以沒有這些條文，是因為有人強烈反對這些條文入憲。所幸，反對這些條文的人後來失利，但我們最好記住，美國對基本人權的承諾，在開國諸賢心目中決非不證自明之理。我們當然也知道，這部憲法認可奴隸制度，並將土著排除於政治之外。這部憲法是白人墾民之作，他們有很多人，但不是全部，都有心將基本人權放進他們的政治結構裡，至少給他們自己用。

佛蒙特加入聯邦，事情更加複雜。我們知道，佛蒙特不在發表獨立宣言十三州之列，因為佛蒙特在1777年才宣布為自治體，到1784年才獲大陸會議承認，事實上到1791年才加入聯邦，紐約撤回異議。佛蒙特爭取加入聯邦的過程，說明了美國獨立戰爭許多曖昧之處。十三個殖民地奮鬥爭取從英國獨立，佛蒙特奮鬥爭取從紐約（以及從新漢普夏）獨立。佛蒙特對英國的態

度很複雜。佛蒙特經常站在大陸會議這邊，但是，從1776到1791年，其歷任領袖不時和英國處於半談判狀態。

佛蒙特和其他殖民地的爭執何在？從一方面來說，事關人權。佛蒙特1777年通過其本身憲法時，首開廢止蓄奴並實施所有男子年滿21歲即享選舉權之先河。佛蒙特當時堪稱前衛，而且似乎一直努力保持前衛。佛蒙特的憲法，的確和紐約在前一年通過的寡頭憲法形成尖銳對照。紐約嚴格限制選舉權，蓄奴是重要制度，到1827年才廢止。

但從另一方面看，這場爭執只不過是許多群土地投機者之間的爭吵，沒有誰的道德比別人高。1777到1791年，紐約州阻擋佛蒙特加入聯邦，為的是維護紐約州自身土地投機者的利益。紐約州在1791年撤回異議，則是因為肯德基州申請加入聯邦，紐約州算一算國會參議院的票數，決定讓佛蒙特加入聯邦，為「北方」增加一州，以抵消「南方」增加的一州。1791年可以說是1961年的前身。

在何種意義上，對什麼人，美國是「自由之地」？不同的群體參加獨立戰爭，背後各有不同動機，是很正常的事。農場主，大商人，城市薪資工人，以及小農，各謀其利，其中只有一些動機和追求人權及平等拉得上關係。許多人遠更關心的，是維護他們的財產權，抵抗英國政府抽稅及北美激進主義。例如，白人墾民有權利沒收北美土著的土地，生怕英國政府不支持他們這項權利。

不過，美國革命到底是一場以自由為名的革命。「獨立宣言」的作者們也向世界宣白這一點。這畢竟是一場革命，也就是說，

它不但以無比有力的形式重新肯定「一切人生而平等」，也重新肯定人設置政府是為了保障「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任何政府如果「破壞這些目的」，則「人民有權更廢之」。因此，革命不僅是正當的，更是義務，即使「明慎思之，成立已久的政府不應該為了輕微且一時的原因而更易」。

新的美利堅合眾國，產生於對母國的造反，由一部成文憲法賦予正當性，這部憲法聲稱是一件有意識地建構的社會契約，據此契約創造一個「獲得人民同意」的政府，後來並且以「權利法案」加強這份契約，保障人民不受這個政府之害。對美國本身，對歐洲，這樣的美國都似乎是希望、理性主義、人類可能境界的象徵。它宣揚的自由似乎是三重自由：個人自由於國家，自由於任何、所有社會建制（最值一提的是言論自由）；這群人自由於其他更強勢的群體（最值一提的是自由於宗教）；以及人民整體自由於外來控制（亦即獨立）。

這些權利在當時並非別的地方所不知的權利，但在美國似乎比在別處都更有保障，也更廣泛，在法國大革命似乎走偏之後，尤其如此。法國大革命1815年終結於王政復辟。對覺得在自己國家裡受到壓迫的歐洲人，美國招著手，是個人機會的國度，這裡實現著法國大革命人盡其才（*la carrière ouverte aux talents*）的座右銘。這是一個開放的國度，一塊人口不足的大地，美國需要移民，並且給予移民子女立即的公民身分（國籍出生地主義）。這個地方巨大，新鮮，全新（沒有封建歷史拖累）。

我們是這麼說的，當時以至今日都這麼說。此地的人和別地的人當時以至今日也這麼相信。事實上，前面所說也是實情，

只要我們記住只對白人是實情，基本上對白人男性，而且很長一段時間只對西歐新教白種男性是實情。歐洲白人的這種政治地位，並非美國獨有，我要指出的是，美國宣稱普遍平等，但美國在這方面和別的國家並無不同。這個特權群體，從整個美國歷史上受用甚多。邊界不斷擴張，所謂的西部不斷屯墾，移民被同化，這個國家本身則如喬治·華盛頓所說，「免於外來影響的詭誘……」。美國因此不只是機會之地，也是逃難之地。

林肯在1858年說過一句非常有名的話，說「我相信這個政府無法永久挺過一半奴隸一半自由的情況」。回顧之下，他說對了嗎？經過「解放宣言」，經過第十三、十四、十五條憲法增補條款，甚至經過「布朗對教育委員會案」，我們不是一直挺過一半奴隸一半自由的情況嗎？我們歷史上可曾有個一時一刻不是有些人，甚至許多人，只因為膚色或其他細微無關緊要的差異，就受苦或被剝削？

我們必須冷眼端詳我們的歷史，然後問一問，其中一半人口非常真實的自由，代價是不是另一半人口非常真實缺乏自由。奴役（寬鬆定義）只是美國基於其歷史使命必將克服的一種時代倒錯，還是美國夢（*American Dream*）的結構基礎兼共生生物？美國這個兩難式是個將會被智慧與理性克服的矛盾，還是建造美國體制的材料？

事實是，在我們從我們的過去進入我們的現在（即1945年）之際，我們的紀錄在某些方面是光榮的，但在其他一些方面極為難看。種族隔離不但南方有，北方的大城市和著名大學也有。甚至直到1970年代，我們才願意承認並廣泛討論我們陰暗的這

一面。就是到了今天，很多討論也還不肯就事論事。

古希臘人發展出一套制度，那套制度讓公民享有自由及平等的政治參與，(外來)農奴則照做奴隸。我們自己也有一套以對比為基礎的政治意象，一邊是暴政、專制或君主專制，一邊是共和式民主或民主共和國。我們忘了，我們的政治傳統的歷史泉源之一，也就是1215年的「大憲章」，當初是貴族強迫英格蘭王接受的，目的是保障他們這些貴族的權利，而不是要保障農奴的權利。

我們認為專制體制指頂端一個人，或一批非常少數的人，統治並剝削所有其他人。其實，頂上非常少數的一批人，他們在政治上剝削底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他們也不必剝削那麼多才能過舒服日子。但是，頂上這群人的規模擴大，他們之間的政治權利也愈來愈平等，就可能向底下人抽取更多東西，他們並且必須從底下多抽一點，才能滿足需求。一種上半部享受完全自由的政治結構，可以成為對下半部最具壓迫性的結構。在許多方面來說，可能也是最穩定的一種結構。一個一半人口自由、一半人口是奴隸的國家，也許真的能夠長久維持。

美國這個國家是個人向上流動的先驅，而且將個人向上流動的這種可能性加以制度化，為世界各地所取法。要維持社會一半自由，一半奴隸，個人向上流動的可能性可能是最有效的工具。向上流動使社會兩極化變得理直氣壯。它除掉許多潛在的下層抗議領袖，並且以潛在上進出頭機會的海市蜃樓吸引還沒有掙出頭的人，從而將騷動減到最小。上進的追尋，變成和其他人的競爭。每當有一個階層多多少少往上移，底層總是馬上

有人補進。

然而這件事有其另一面。這個講自由和潛在上進的意識型態，是一種普遍主義的學說。它為了使一半人自由而要求另一半人當奴隸，這樣會助長不安。莫爾達(Myrdal)談美國的兩難式，歷史將會佐證他所言不假。我們用力和魔鬼博鬥，我們犯了罪，不能不時時害怕上帝發怒。驕傲和深刻的喀爾文式罪疚的這種混合，整個美國歷史上無日無之，不論出身，不論信仰。

因此，在某一層次上，我們的過去，從1791(或1776，或1607)到1945年，是走向我們當前處境的一段漫長序曲。我們宣告這是一個自由的國度，我們努力轉化大自然，努力成為1945年的經濟巨人。我們運用我們的自由來獲致我們的繁榮。我們為世界立下範例。當然，這是一個不可取的範例。我們這個國家一半自由，一半奴隸，世界亦然。如果自由的代價是奴役，如果被納入的代價是被排斥，如果繁榮的代價是慘苦，那麼，怎麼可能人人達到美國所代表的境界？甚至，怎麼可能每個美國人都達到？這是我們的歷史兩難式，我們的歷史命運，我們的歷史之牢。

據傳對蓄奴制度最早提出抗議的是日耳曼鎮(Germantown)的門諾宗信徒。他們問道：「你們有權利把這些可憐的黑人當奴隸，難道他們沒有權利為爭取自由而戰？」未能在美國充分享受到應有的自由的人，給那些門諾信徒的回答當然一直都是「有」。他有此權利，而且盡力爭取這權利。他們只要特別努力爭取，每每能夠爭到一些讓步，然而從來不會有不要求而能獲得讓步的，那些讓步也從來都配合政治而給，不多半分慷慨。

自由是一種真正的福氣，但也是一付道德負擔，因為它向來都是，而且至今不得不是，只有某些人享有的福分，即使這「某些」是許多人，更可以說，特別是這某些人是指很多人的時候，這自由才最是道德負擔。

1791到1945年，我們過了西奈山，安穩走上天主的道路，而在1945到1990年抵達奶和蜜的國度。現在，我們會不會被趕出這塊應許之地？

明日

式微有這麼可怕嗎？也許是所有福氣中最大的福氣呢。林肯曾經發出這句道德之音：「就如我不想當奴隸，我也不想當主人」。我們一直在當世界的主人，或許是良性、善心的主人（我們有些人說自己是這樣的主人），但終究是在當主人。這樣的日子已經結束了。這日子結束，有這麼糟糕嗎？我們扮演主人，我們被愛，但是也被恨。我們愛我們自己，但也恨自己。現在，我們能不能採取一種較為持衡的眼光？也許能，但我恐怕我們還做不到。我相信我們正在走向我們歷史軌線的第三部分，大概將是最顛簸，最令人興奮，也最可怖的一部分。

我們不是第一個沒落的霸權。大不列顛沒落。聯合省沒落。威尼斯沒落，至少就地中海的世界經濟而言。上述沒落都是慢慢沒落，在物質上也相對舒適。當個霸權，油水不少，坐吃這些油水，夠活50到100年。當然不能過得太奢侈，但這個國家還不會被丟到什麼垃圾筒去。

單說一點：有相當一段時日，我們還會是世界上最大的軍事強權，雖然我們已經積弱，阻擋不了伊拉克之類暴發國家逼我們作戰，或者，我們已經弱到做任何事情都不能不付出非常昂貴的政治代價。再說，我們的經濟雖然有點搖搖晃晃，美元也在瓦解，但是，世界經濟下一次重大擴張可能在今後五到十年發生，我們將會大發利市。而在終將形成的日美經濟聯盟裡，美國雖然會居於次要地位，但全球回收將會很高。政治上，則美國也還會是重量級強權，雖然已經只是好幾個強權裡的一個。

然而，在心理上，這式微將會很可怕。這個國家一直高高在上，而現在必須走下來。我們花了30年，才學會優雅、有效地履行世界領導者的責任，無疑也將花費至少30年來學會優雅、有效地接受分量大減的角色。由於全球收益將會減少，一個問題將會立即且迫切出現，就是我們的生活水準下降之後，即使只是些微下降，這擔子由誰來扛。眼前，爲了應該由誰出錢來清除有毒廢棄物，解決儲貸機構倒閉的爛攤子，以及支付外債，我們已經爭論不休。我們的生態問題急速增加之際（而且無疑將會繼續急速增加），艾克森石油（Exxon）在阿拉斯加外洩，愛河（Love Canals），以及我們在未來數十年裡一定會照顧不來的種種更大的危險的垃圾堆，由誰付錢清理善後？凡此種種，的確是巫毒經濟。巫毒經濟不只雷根時代才有。最令人神志一醒的，莫過於來了一張大帳單，沒錢付，而貨源又已涸竭。除貸就是信用，而美國的經濟信用正在迅速下滑。我們無疑可以靠過去霸權的油水過日子，歐洲、日本想到「大美和平」和

我們過去表現，甚至會施捨一點給我們度日，但久而久之，這屈辱將有過於何梅尼囚禁整個美國大使館。

作為一個國家，我們會怎麼做？根本上，我們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社會衝突劇烈但被壓抑之路，騷動不安的下層階級被殘酷和成見強制鎮壓下去：這是一種新法西斯之路。另一條路是全國團結之路，全體共同回應人人都受到的社會壓力。走後面這條路的話，我們將會超越自由與繁榮之福，走向平等之福，也許不是那麼完美的平等，但仍是真的平等，而且沒有大量排斥。

我個人採取樂觀路線，就是認為美國走新法西斯主義之路的可能性很低。我倒不是認為新法西斯主義沒有可能，而是說，美國的傳統裡有相當多成分不會讓新法西斯主義得逞。此外，我認為我們不會荒不擇路到索性這麼一跳的地步，因為走新法西斯主義的確是一跳，往下跳。我想，我們會實現一種比我們過去夢想的更大的平等，而且比任何國家所知的更大的平等。這將是上帝給人的第三福。和前兩福一樣，此福也會有代價和始料未及的後果。

今後30年，我們的生活機會與生活報酬將會朝愈來愈平等的方向前進。所以會如此，理由非常一清二楚。那樣的平等，將是我們前兩福——自由與繁榮——的直接結果。由於我們長期在意識型態與建制上投注於自由，實際作法可能相當有欠完美，但我們已由此發展出一些政治結構，我們只要有意志、有能力，這些結構就非常有利從事民主決策。看看分配不平等的四大領域——性別、種族與族裔、年齡以及階級，就可以清楚

看出，未能獲得公平分量的人加起來，占了選民的大多數，如果他們對事物作這樣的定義的話。

繁榮時代的作用也就在這裡。美國的繁榮，加強有人自覺落後以及被排斥。用那個時代發展出來的語言來說，這種自覺產生了「意識」。這股意識的第一場爆發，是1968年。但1968年的爆發，只是這股意識今後十年可能出現的第二場爆發的預演。這股意識提供了意志，繁榮則將提供能力。當今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在美國這樣，失利階級在物質上這麼強大，強到有財力足以在任何情況下進行其政治鬥爭。最後，國家歲入無可避免的削減，將會提供他們進行政治鬥爭的誘因。引線將會被點燃。

國會挨了一拳，將會不曉得拳頭來自何方。要求將會從四面八方同時提出。據我的看法，美國可能非常快速從保守主義、維持現狀、自由市場經濟學的世界領袖，變成世界上最社會福利導向的國家，也就是具有最先進重分配結構的國家。要不是近來人人都在告訴我們說社會主義是個已經一命嗚乎的觀念，我們甚至可以設想——這話不可說，我們就輕聲說吧——美國將會成爲一個準社會主義國家。誰知道。帶頭的甚至也許會是共和黨呢，19世紀的狄斯雷里和俾斯麥就是先例。想到這個前景，可能有人驚怖，有人興奮，不過，暫且不要激動。

我還要提出兩項推斷。第一項是，我們的自由傳統不會絲毫受損於這個新的平等主義：最高法院將會繼續延伸民權的定義；國家警力成長，但不會犧牲個人權利；文化與政治的多樣化將會繼續興旺。第二項推斷是，這新的平等主義對我們的生

產效率不會帶來負面衝擊。基於前面討論過的理由，我們的人均國民生產總額(GNP)可能降低，但新的平等主義將會是其反應，而不是其肇因。反正，我們的人均GNP還是會高高在上。

屆時，我們是不是就到了烏托邦了？當然不是。烏托邦的代價非常高，種種難以預料的後果也非常可怕。根本的代價是排斥。我們除掉了國內的排斥之後，將會在世界層次上加強排斥。也許美國將會有史以來頭一遭不再一半自由，一半奴隸，但結果將是世界變得更尖銳地一半自由，一半奴隸。從1945到1990年，我們要國內一半人口支撐另一半人口的高所得，那麼，想像一下，什麼條件才能支撐我們90%人口的高所得。條件將是更多剝削，基本上是剝削第三世界民族。

20年後將會發生什麼事情，不難猜想。首先，前往美國的壓力將會達到有史以來最大的程度。美國在19世紀令人欣羨，在1945年以後的時期更令人欣羨，那麼，我的兩項預測——美國成爲一個所得相當高，又高度平等的國家，世界則淪於經濟兩極化——如果正確，請想像一下美國在21世紀的吸引力。對移民潮的推拒都將達到最高點。未經授權的移民數以百萬計，甚至數以千萬計而來，美國阻止得了嗎？答案是，阻止不了。

同時，沒有外移，仍然留在南方國內的人，由於實質上被北方——不僅美國，還加上歐洲及北亞——的繁榮排斥得更厲害，他們當然會開始學伊朗或伊拉克的樣。爲恐此事成全球性的燒夷彈，美國將會想辦法防制(歐洲與日本也會)。請記住，巴西和阿根廷、以色列和伊拉克、南非和巴基斯坦都在秘密研發核子武器，可能已有充分發展，其他許多國家也會走上這條

路。「大美和平」時期，我們擔心核子浩劫，其實由於美蘇之間的交易，發生核子浩劫的可能性非常低。今後50年，核子戰爭的機率才遠更真實，也許只是區域性的核子戰爭(但也夠可怕了)。

面對大量未經授權的移民湧入，以及南方發生區域核子戰爭的威脅，美國將會怎麼做？一個準社會主義的美國很有可能變成一座「美國堡壘」。美國可能想把自己孤立起來，絕緣於第三世界戰爭的無望與代價，回頭保護自己的財富和財產。未能擋住移民巨潮後，美國可能傾向於在公民權利和非公民之間構築一道防波堤。轉眼之間，美國下層30%，甚至50%的工資勞動力可能是「非公民」，沒有選舉權，享受的社會福利也有限。果真發生這種情況的話，我們就是倒退150到200年。美國和西方世界從1800到1950年的整個歷史，正是陸續使勞工階級得以享受各種政治、經濟及社會權利。如果變成只有公民能享受這些權利，我們就是回到當初的起點，大批居住人口被排斥於政治、經濟及社會權利的時代。

我們的問題也不會只有這些而已。我們會發現(我們現在就已發現)，要創造一個生態乾淨的美國，最快、最不花費的途徑是把垃圾倒到別地去：倒到第三世界、外海，甚至太空。這當然只是我們的問題推後50年，而且代價是在那50年裡、在那50年之後爲別人增加問題。不過，人被逼急了，把問題往50年以後推，不是太令人心動了嗎？到時候，今天的成年選民已經死得差不多了。

這麼看來，美國的第三福，也就是平等，最多將能爲美國

買到25到50年的時間。這樣走下去，從2025到2050年之間，算帳的日子將會到來。那時，世界將會面臨美國今天面臨的同樣選擇。世界體系若非走向一種更具壓制性的結構重整，就是走向一種平等主義的重整。不過，世界規模的平等主義重整，物質和勞務必須重新配置的程度，將會遠大於今天美國國內的平等主義重分配。

當然，到了這一點，我們談的已經是我們現存世界體系死亡，並且被一套根本不同的體系取代。而結果將會如何，本質上是無從預測的。我們會到達一個分叉點，其隨機起伏波動的影響將會非常巨大。我們能做的，是眼光清明，積極主動，因為我們的行動將會是那些起落波的一部分，而且對結果將會有深遠的影響。

走筆至此，我一直試圖陳明我對未來50年的看法：一方面，北方愈來愈富裕，內在相對平等（公民之間平等），美國在經濟上不再領先，甚至在地緣政治上也不再領頭，但在社會平等上領先；另一方面，南方愈來愈不利，不惜訴諸軍事力量，愈來愈想打亂世界體系，經常和西方重視的所有價值作對，其大部分人口採取個人移民北方的途徑，從而在北方內部創造了南方。

有人會說，此見未免悲觀。我答說，這看法不但切乎現實，而且是樂觀的，因為它為意志打開大門。我們當前的世界體系死亡之後，我們的確可以創造一個好得很多的體系，問題只在我們並不是歷史注定將會這麼做。我們一定要抓住機會，奮鬥求救。我的現實主義有一部分是認定，美國無法獨力得救。美國試過，從1791到1945年，後來又用另外的方法試過，從1945

到1990年。我預測，從1990到——比如——2025年，美國還會嘗試其他方法。但是，除非醒悟凡是得救，只能是全人類得救，否則美國和世界都不會能夠克服當前世界體系的結構危機。

美國擴張主義的尾聲

美國一向認為自己是例外。我以上帝給美國的三種福分為分析的焦點，可能正中這種看法的下懷。然而，不但美國不是例外，美國自認的例外主義也不是例外。近代史上，試圖證明自己在歷史上獨一無二，和世上其他國家一概不同者，並非只有美國。我見識過法國例外主義者，也見識過俄羅斯例外主義者，還有印度、日本、義大利、葡萄牙、猶太、希臘、英國及匈牙利例外主義者。例外主義也是埃及和中國民族性格裡的一個明確特徵。波蘭例外主義也和其他國家的例外主義不相上下。例外主義是有史以來幾乎所有文明的骨髓。

前文說過，美國精神一直是由驕傲和喀爾文式罪惡感結合而成。我們也許不妨記住，希臘人說的驕傲(*hybris*)，意指人妄圖當神；喀爾文神學的一個要點，則說如果我們相信上帝萬能，則我們在邏輯上不能說有什麼事是宿定的，因為如果有任何事情是宿定的，就表示上帝力量有其限制。

也許，新耶路撒冷不在這裡，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其他任何地方。也許，應許之地就是我們的地球、我們的家、我們這個世界。也許，上帝的唯一選民是人類。也許，我們如果肯試，就能得到救贖。

第四部

社會主義之死，
或資本主義生命危險

第十一章

革命為戰略，轉化為戰術

法國大革命失敗了嗎？俄國大革命失敗了嗎？這兩個問題，一度看來可能荒謬，但現在已不荒謬。不過，我們要如何回答這些問題？

革命是個奇怪的用語。當初的用法，是取其字源上的意思，指一種循環運動，這運動會回到起點。今天，這個字還是可以此用法。不過，這個字後來被引申，意指轉向、轉動，然後又意指倒轉、推翻。牛津英文字典(OED)著錄一個1600年的詞條，用法就是一個政府被其臣民推翻。不過，一個政府被推翻，和回到起點的觀念當然未必難以連貫。許許多多被支持者稱為「革命」的政治事件，就說要復原遭到違反的權利，也就是說，要回到一個早先的，更好的制度去。

但是，馬克思主義傳統把革命放在一種直線進步的理論裡。我認為基爾南(Victor Kiernan)說得最好，他說，革命意指

從一種生產模式作「劇變式的一躍」(cataclysmic leap)，躍向另一種生產模式。¹不過，像許多觀念一樣，單單界定它，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拿它來和某種對立的觀念並看。我們知道，依馬克思主義傳統(但不只是馬克思主義傳統)，「革命」之外的另一條路是「改革」。

在19世紀末葉到20世紀的辯論裡，改革對革命，意指徐緩累聚的改變對急速的改變，小規模的改變對大規模的改變，可以反轉的改變對不可逆轉的改變，改善式的改變(因此是親體制的)對轉化式的改變(因此是反體制的)，有效的改變對無效的改變。當然，在上述各項二律背反裡，我都依照革命論述的作法來說明各項立場。

此外，馬克思主義傳統本身內在也有曖昧之處。馬克思主義者喜歡作個區分，說有政治革命(政治革命可能是表面現象)，有社會革命(社會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也不討厭用**革命**一詞來說明**工業革命**之類觀念，甚至說「工業革命」比「法國大革命」更重要或更根本。這種講法，和歷史唯物論的哲學偏見當然十分合轍，卻未必能幫唯意志論政治行動的大忙。因此，在各黨派的馬克思主義傳統裡，尤其在布爾什維克傳統裡，革命愈來愈意指無產階級以暴力推翻資產階級政府，或者至少，意指一個反動政府被人民的、進步的力量

1 V.G. Kiernan, 〈革命〉(Revolution), 收於《馬克思主義思想字典》(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 修訂2版, T. Bottomore 編(Oxford: Blackwell, 1991), 頁476。

以暴力推翻。

曖昧沒完沒了。「暴力推翻」這個觀念並不是一個自明的觀念。自發的起事，或者現有權力結構解體，構不構成革命？或者，自發的起事是不是唯有經過一個革命黨帶領，才算是革命？法國大革命什麼時候發生的——民眾攻擊巴士底獄就算是法國大革命開始，還是到了雅各賓黨掌權才算是革命？以俄國(十月)革命而論，傳統上認為冬宮被攻擊，是十月革命開始，但後來有人說革命在實際奪得國家權力以前就算開始了。也就是說，基本條件是先有漫長的游擊戰，這些游擊戰最後導至實際奪得國家權力。整個過程即毛澤東說的拖延(protracted)鬥爭。這拖延(protracted)鬥爭被視為革命過程的基本要素，不但進行於奪取國家機關以前很久，而且進行於奪取國家機關之後(「文化大革命」)。

最後一項曖昧也有必要指出。巴庫大會之後，反帝國主義的鬥爭被稱為「革命」活動，然而這類反帝革命對社會主義的理論關係如何，從來沒有人完全說清楚。沒有人說個清楚，是因為這件事向來沒有任何共識。阿爾及利亞革命和越南革命是同一範疇，還是大不相同？實際的革命其實很多。在古巴，**革命**在奪權之前不是馬克思主義革命，甚至不是社會主義式革命，奪權後才是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式革命。在辛巴威，則倒過來。

無論採取何種革命之路，我們現在都可以清楚看到，它們的結果都難說得很。今天看來，墨西哥革命不大像產生過什麼革命性的成果。中國呢？俄國那些革命，如今已成歷史回憶，

目前也不是俄國人非常引以為榮的一段往事。因此，一個合理的問題是，所謂革命之路，比起改革之路，是更有效，還是比較無效。當然，對社會民主式改革，我們也可以同樣存疑。工黨多麼根本地改變了大不列顛？瑞典的社會民主黨呢？1990年代，從中國而瑞典而墨西哥，人大談「市場」，不禁令人納悶，150到200年的革命傳統到底革了什麼。

我們甚至可以追問，革命活動和改革主義活動之間的區分到底多大。被視為漫長且巨大的「革命」事件的某些政黨、社會運動及錯綜複雜的社會活動，都可以（可能沒有例外）視為戰術轉移，這些戰術轉移使它們看起來有時候像革命（或起事、或激進，或志在轉化社會），有時候卻明顯不是這樣。

現實存在的革命領袖往往依違於「出賣」和「冒進」之間，試圖採取中間路線。當然，一個人「冒進主義」之事，另一人視為「真正的革命奉獻」，所謂「出賣」，有人稱之為「進一步，退兩步」。

時至今日，也許不應再互相丟石頭了，而應該清醒審視過去兩百年來全世界左派政治活動所受的束縛，以及地下要求轉化的壓力的強度。我們且從已知事物說起。我們生活在一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裡，這體系十分不平等，十分具有壓迫性。這體系擴張了世界生產。世界生產擴張後，使相當可觀的經濟實力流入這套世界體系的主要受益者手中。我們可以假定，受益者會希望這套體系多多少少維持不變，而且會投入相當大的政治精力來維持現狀。我們能不能假定未曾受益的人會同樣熱切希望轉化這套體系呢？不能，原因有好幾個：無知、恐懼、冷

漠。此外，個人的向上流動性，為受壓迫者中一批聰明的少數人提供了出路。此外，比起受益者，非受益者是弱勢，在經濟上和軍事上都是弱勢。

政治實力的這種不對稱，和社會心理勢態的不對稱，是世界左派自19世紀有意識地組織以來就面對的基本困境。改革與革命之間的爭辯，辯的就是我們應該如何來應對這種不對稱。各方對問題所提的答案，如今回顧，看起來彼此十分近似。集體的教育將能克服無知；集體的自我組織將能克服恐懼與冷漠。一種有組織的階級文化，將能縛住那些可能被個人的社會流動性所誘而離隊的潛在變節者，方法是在眼前的運動裡為他們提供領導角色，並且承諾以後組成政府時也讓他們擔任領導角色。至於受益者與非受益者之間在社會力量上的不平衡，克服的方法是拿掉受益者對國家機器的控制。

主要的運動一直這麼做，至今已做了150年。以三個知名的運動為例，中國共產黨、南非「非洲民族黨」、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歷史環境雖然頗有不同，三者的戰略與戰術卻極為相似。這三個運動都可以稱為輝煌的成功，也可以稱為慘重的失敗。給三個運動三個不同的成功評等，我覺得很難接受。說他們輝煌成功，是指他們的大眾動員能力，以及他們在各自的國家獲致可觀的改革，使他們國家的情況極為有別於——例如——1900年的情況，而且某些人、某些層面在根本上比1900年好過。說他們是慘重的失敗，意思則是說我們至今還是生活在一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裡，這個體系比1900年更加不平等。這三個國家裡仍然有多重形式的壓迫，而且這些運動都以各種方式限制而

非促進當前對這些壓迫形式的抗議。

這是杯子半滿還是半空？問題這樣提法，也許不對。問題是，在19和20世紀，這些運動的戰略有沒有如今回顧之下可能較為可取，而且成就可能會多一點的替代品？我認為沒有。根據摹擬情況來重寫歷史，往往愚不可及。不過，我的確認為，實際出現的替代品所以沒有被採取，是因為，根據體系的非受益者的觀點，它們明顯比較沒有那麼有效，而主要運動實際獲致的改革的總和也值得，即使這三個國家都沒有後資本主義烏托邦。正好相反。

雖然如此，從20(和19)世紀投入革命活動的難以置信的社會精力而論，實際獲致的改革的總和非常令人失望。1968年的革命分子意識到所有版本的「老左」那時都已成為「問題的一部分」，我有同感。不過，那時以來，世界的老左已經繼續往前走。1968年的世界革命對各地自認反體制的力量都產生了巨大衝擊。我們的分析模式可以從中找出六大結果，以下加以略述：

1. 兩階段戰略——先取得國家權力，然後轉化社會——已經從不證自明的真理(對大多數人而言)變成一個可疑的命題。
2. 組織的原有認定，也就是政治活動透過一個凝聚於一的黨來進行最為有效，已不再廣獲接受。
3. 原有的觀念，即資本主義內部唯一根本的衝突是勞資衝突——其他所有以性別、種族、族裔、性取向為基礎的衝突都是次要、衍生、返祖的——已不再廣獲相信。

4. 民主是一種阻礙革命活動的資產階級觀念的想法，已逐漸改變成認為民主可能是一種深刻反資本主義、深含革命性的觀念。
5. 生產力增加是社會主義建議基本先決條件的這個想法已被取代變成考慮關切生產主義造成的後果，如生態和生活品質，及關切一切都被商品化的後果。
6. 以科學為建構烏托邦之基石的信念，已變成對古典科學及普及科學的懷疑，願意斟酌決定論與自由意志、秩序與混亂之間的複雜關係來思考。進步不再是不證自明的。

對以上前提的這六大修正都不是新出現的修正，但1968年的革命動搖了老左的正當性之後，將原來只有少數人抱持的這些懷疑轉化成傳遍遐邇的修正主義，一種真正的「文化大革命」。各項修正都很複雜，可以詳細討論，只是此處不容深入。我只能談談這些修正對反體制政治活動的影響，尤其對「革命」戰略與戰術的影響。

第一個而且最根本的影響是，革命——取馬列主義運動的用法——不再是可行的觀念。這種革命的觀念已無意義，至少現在沒有意義。「革命」一詞，當初用來描述黨的活動，諸如鬥爭取得國家權力，在資本主義勞資衝突中擔任勞方旗手，鄙斥民主為不過是「資產階級權利」，專志增加生產力，以及自稱「科學」。如今還有符合這些描述並吸引到可觀支持力量的黨存在嗎？即使有，我看也不是非常多。

我們只看到兩個東西。一個是「老左」黨，經常是換了名字，掙扎著靠他們看起來也不大像強烈擁抱的折衷中間綱領，在選舉中求生存，算是模糊的社會正義情操的傳人（就像「激進社會黨」在法國的第三共和成爲世俗傳統的化身）。第二是大批政黨和運動，這些政黨和運動是1968年革命經過稀釋的嫡裔，諸如綠黨、女性主義運動、受壓迫的少數族裔與種族運動、男同性戀和女同性戀運動，以及基層社區運動。

1980年代，美國有人提倡這些運動結合成「彩虹聯盟」（Rainbow Coalition），但最後沒有下文。進入1990年代，我們看見世界上的反體制運動有兩大政治困境。

第一，從1968年革命中浮現的新興反體制運動，在抨擊老左的基本前提方面相當成功，但在尋求替代戰略方面蹉跎無成。取得國家權力還要不要緊？運動之間若想構成任何可長可久的聯合，這聯合可以用什麼當基礎？時間一天天過去，他們給這些問題的答案愈來愈像如今十分折衷的老左運動給的答案。

第二，1990年代，我們看到1980年代發動的種族主義和民粹主義運動擴展其力量，但他們使用的一些主題和腔調經常同上述新興反體制運動重疊。這裡出現重大政治混淆的問題。

所以，現在的情況是：「老左」黨只剩下疲憊的，折衷主義的殼子；沒有可行的「革命」觀念；新興反體制運動精力充沛，卻沒有清晰的戰略見地；新興種族主義/民粹主義運動力量漸強。四面楚歌的現存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維護者並沒有繳械，反而追求一種彈性拖延矛盾的政策，他們等待時機，追求他們自

身的激進轉化，他們會脫離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走向一種新的，但同樣不平等的、不民主的世界體系。

我們早就必須以相當清晰的眼光界定一套新戰略，來取代已經死亡失靈的「革命」戰略了。我認爲，這重新定義是一件世界集體的課題。我只能建議一些行動路線，作爲這麼一套戰略的可能要素，但我提的這些路線並不足以作爲全盤戰略。

第一個，是重返傳統戰術。在每個地方，在每個工作場所，我們都應該提出更多要求，也就是要求由勞工階級保有更多剩餘價值。這個道理曾經非常明顯，但出於各種理由，後來被忽視了：黨顧忌工會主義與經濟主義；高薪勞工實施保護主義戰術；運動支配國家結構之後，按照雇主的邏輯行事。同時，我們必須推促一切企業充分實現成本內部化。從地方層次不斷施壓要求這種內部化，以及要求更多——在底特律、在格但斯克、在聖保羅、在斐濟——將能深深搖撼資本累積的模式。

第二，在所有地方的所有政治結構的每一層次，要求更多民主，亦即要求更多人民參與，以及更公開的決策過程。這個道理也是一思即得的，但左派運動對大眾心理極不信任（這是左派以先鋒隊自任的根源），當權之後限制這些參與。這種限制在19世紀可能有正當性，但是，除非獲得人民真正的支持，否則當前世界體系不可能轉化成一種更好的體系。如今創造並開發這種支持的途徑，是更多民主。

第三，世界左派已放棄解決其普遍主義和特殊主義的矛盾困局。受老左影響的拿破崙帝國普遍主義並無可取，但無限標榜愈來愈小的特殊主義，也不可取。我們必須尋求建構一種新

的普遍主義，這普遍主義以無數群體為基礎，而不是以神秘的原子般的個體為基礎。要做到這一點，需要我們目前還不願意接受的一種全球社會自由主義。桑戈爾(Senghor)說的「取予之間的約會」，我們應該賦予運作意義(而非只是浮誇吹噓)，並且在無數地方層次上嘗試。

第四，我們必須將國家權力視為一種戰術，隨時運用，以滿足一切立即需求，既不在其上投資，也不強化它。最重要的是，我們一定要避免變成在任何層次上管理當前體制。我們在政治上必須不再害怕體制崩潰。

這樣會不會轉化體系？我不知道。以上所述，是一套使當前體系「不勝負荷」的戰略，也就是一反自由主義者向來的作法，把自由主義的意識型態口號真的當一回事。例如，有什麼事情比人的自由遷移更能壓垮體系？配合這套壓垮體系的，是「保留我們的選項」這個戰略，立即直接追求更好的境界，全力專注於在地方和世界層次創造一種新的社會性，而將管理當前世界體系的全副責任留給這個體系的受益者。

簡而言之，我們必須成為葡萄園裡務實、求果、持恆的工人，討論我們的烏托邦，並且往前推進。當前世界體系在今後50年裡途窮崩塌之時，我們必須提出一套相當實質的，集體創造的變通之道。唯有如此，我們才有機會獲致一種葛蘭西(Gramsci)式的世界公民社會霸權，從而有機會贏得對企圖改變一切以求一切不變的那些人的鬥爭。

第十二章

共產主義崩潰後的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無可避免地勢必殞滅，或遲或早，其作為理論的形式亦然……回顧之下(只有在回顧之下)，將可能根據它殞滅的方式，說馬克思主義是什麼材料做的。

巴利巴爾(Balibar)，1991: 154

馬克思歷來都定期被宣布死亡，也定期被宣布復活。就像任何如此地位的思想家，他值得在當前現實的觀照之下一讀再讀。今天，再度死亡的不僅是馬克思，還有整串自稱馬克思／列寧主義而正在崩潰的國家。這件事，有人快樂，有人難過，卻很少人嘗試就這場經驗擬出一張細心而公允的資產負債表

來。

開頭我們不妨記住，馬克思主義並不是馬克思觀念和著述的總集，而是一套被變成獨斷教條的政治行動理論、分析及指示（無疑都受馬克思的推理啓發）。這種馬克思主義是屬於支配地位的馬克思主義，是兩個歷史政黨的產物，這兩個政黨先後、聯合但不是合作建構了這種馬克思主義：德國社會民主黨（尤其1914年前），與布爾什維克黨（即後來的蘇聯共產黨）。

這支配地位版的「馬克思主義」不是唯一的馬克思主義，但別的版本馬克思主義只獲得非常有限的聽眾，至少到很晚近都是如此。馬克思主義「爆發」的真正起源，如勒費佛（Lefebvre）1980年所述，是在1968年世界革命裡。這個事件，時間上多多少少相當於蘇聯布里茲涅夫停滯時期的開始，以及所謂社會主義集團隨後逐漸增加的混亂和解體。

這種巧合有點打斷分析，因為我們這就不得不在「黨的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自己的論點之間作個困難的區分。「黨的馬克思主義」（屬於支配地位的馬克思主義版本）被「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的崩潰所拖累，雖然並未因此而變成完全不能成立。馬克思自己的論點（或者，至少他思想的某些層面及馬克思主義實踐的某些層面）則沒有被這場歷史經驗涉及，或者說，至少本質上沒有涉及。我的論點十分簡單。死的是，作為現代性的理論的馬克思主義，這理論和自由主義作為現代性的理論並行，甚至是由自由主義啓發。尚未死亡的是作為對現代性及其歷史體現——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一種批判的馬克思主義。死的是作為一種改革主義策略的馬列主義，未死的是作為反體制

力量的馬克思主義，這力量屬於人民，使用馬克思式語言，激發真正的社會力量。

我認為屬於支配地位的馬克思主義，即後來的馬列主義，是根據五大主要命題而來，這五大命題不是馬克思學者提出的，而是出自馬克思主義好戰派之手，在黨的多年實踐中具顯出來。

* 共產社會是人類的終極目標，為了獲致這個目標，必要的第一步是盡快取得國家權力，只有革命才可能盡快取得國家權力。

這項命題並不像看起來那麼不證自明。什麼叫「取得國家權力」？更難的是，什麼叫「革命」？這些戰術問題的黨內辯論往往熾熱，而從來沒有明確的結論。實際的政治決定每每相當分歧，而且每每看來機會主義，道理在此。

不過，最重要的有兩個意象：人民造反，或選舉獲得壓倒大勝，兩者都被視為能在權力結構中帶來不可能回頭的根本上、持久改變。

失權的黨都希望以任何手段達到這麼一個轉捩點。獲得權力的黨（即使以理論沒有預見的途徑獲得）則試圖以任何手段保持權力，以便證明「革命」的確是這麼一個不能逆轉的轉捩點。就此意義而言，黨之得權有如基督之降臨人間，並不代表時間結束，而是歷史在那一刻被轉化。1989-91年的事件天搖地動，對馬列主義者尤然，原因是一個不可逆轉的歷史轉化的觀念被

證明是虛妄的。那些事件是深刻的失望，更代表了政治行動基本前提的崩潰。

* 為了取得並保有國家權力，所謂進步力量與／或工人階級應該創造一個有組織的、普遍的黨。

無論是德國社會民主黨鼓吹的大眾政黨，還是布爾什維克鼓吹的先鋒黨，都視黨為其領袖與黨員的精神歸宿，要他們奉獻整個生命來獲取並保有國家權力。

因此，他們以黨為黨員生命的核心焦點（甚至唯一焦點）。和別的組織的任何關係，甚至在黨的綱領以外的任何興趣，都被視為對黨的嚴重威脅。黨對宗教深懷疑忌，最大原因在此，而不在於黨義把持無神論。黨敵視民族主義者、少數族裔、女性主義等運動，原因也在這裡。

簡而言之，黨認定階級衝突是最重要的衝突，其他一切衝突都是副現象。因此，黨再三聲稱其他這些鬥爭使黨員從核心要務上分心，除非這些鬥爭能被整合於黨的當前綱領，而且只能是基於暫時、次要、戰術的理由被整合。黨最害怕的是黨員做不到時時刻刻忠於黨。黨掌了權，是不是就造成真正的極權國家，可以置疑，但這樣的黨是極權黨，並無可疑。

這兩件事之間有個根本的矛盾。關於黨的結構的說法是為取得權力所需的動員而構思，而且十分適合這種動員，然而一旦黨當了權，卻完全不是一條適用的原則。當權的黨，角色相當曖昧。以其功能而言，當權的黨不過是個決策體，裡面由小

小一群人解決一切議題。領導階層的權力相當繫於人身，包在一種共謀而成的不透明之中。對大多數黨員，黨變成只是個人在日常生活中謀求往上流動的工具。

到此地步，黨已經變成什麼都是，只不是精神歸宿。在外面的人看來，黨好像是一個十分沒有正當性的結構，身在裡面的人則冷嘲熱諷。黨是個現實，你必須應付，但已沒有人對之尚存奉獻之忱。「革命」淪於不是無可逆轉的，原因就在黨當權以後的性質。有心摧毀共產政權的人，其主要目標就是在一旦世界情勢改變而有機可乘時，丟掉這樣一個黨。

* 為了從資本主義走向共產主義，必須經過一個稱為無產階級專政的階段，亦即，將權力完全交由勞工階級獨掌。

兩個關鍵字，**專政與無產階級**，都有問題。「專政」無論原來是什麼意思，其實際意思是這些政權否定「自由主義」國家的議會民主所創造（至少局部創造）的一切所謂資產階級民權。任何不受黨控制的組織，不但被剝奪言論自由，甚至沒有存在的權利。任何想獨立於黨的思想活動也都如此。

公共辯論是獨白，未必表示沒有政治討論或不同意思。然而實情是辯論嚴限於私人之間，限於少數個人。人民偶爾大聲牢騷（有時候也給決策帶來一些限制），是僅有的公共表達形式。

專政自稱有正當性，理由是國家與黨「代表」勞工階級。現實卻是如何？當然，許多領導人年輕時代曾是勞工，這種領

導人的數目無疑也比世界體系裡的其他國家多。然而這些人一旦成爲統治階級成員，就「資產階級化」，成爲惡名昭彰的黨官。

在一般人民之間，熟練工人所得無疑相當於，甚至多於學校教員或一般的「思想工作」。這就把通常的薪資等級顛倒過來了，但把薪資等級顛倒過來，並不等於廢除薪資等級。

在工作場所，工人對管理階層也無法行使工會權利。事實上，工人提出要求的機會還比非社會主義國家少。工人有個很大的補償：社會安全（尤其工作保障），以及其中隱含的低生產力權利。然而這種社會優勢實際上依靠國家歲入補貼，一旦國家財政陷入嚴重困難——部分由生產力低引起——社會安全網就不安全。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時不復能實現其承諾，於是發生社會危機。由此危機，生出（波蘭）團結工聯及其後一切演變。

儘管官方口說如此，卻幾乎沒有誰相信自己真正生活在一個工人國家裡。至多至多，他們相信自己生活在一個尋求改善工人生活條件的政權之下——換句話說，住在一個改革主義的國家裡。這些國家提供的些許好處減少之後，其政權也失去社會基礎。

* 社會主義國家構成普遍、正確的進步道路上的一個必然階段，走向共產主義烏托邦。

這是列寧主義版（更精確地說，史大林主義版）的進步理論，這進步理論又是馬克思主義（及自由主義）傳自啓蒙運動的

東西，啓蒙運動又是經過「揚棄」（去蕪存菁的揚升）（*Aufhebung, sublation*）而產生的世俗版基督教末世論。

階段論的基礎，是對進步抱著一股不可動搖的信念。這種理論使一切作爲都能自圓其說。這理論肯定黨（顛撲不破的進步擔保者）的一切作爲都正確，因而不但爲前三項命題提供了道德與理性支持，也爲偏離馬克思主義傳統的一切道路提供了道德與理性支持。

既然各階段都依循社會進化規則而來，理論上就不可能有倒退可言。此外，由於這些階段是由黨指定，各個黨員在定義上都成爲進步的使徒。最後，既然工人已經當權，國家不可能做不到顛撲不破地進步。進步理論容許，應該說規定，新進的革命國家要受比較先進的革命國家保護——由元老級國家在馬列主義國家（甚至一切進步國家）的大家庭裡發號施令。有人稱之爲帝國主義，有人稱之爲自然義務。只要輿論有理由相信進步是現實，這種強者的權利看起來還沒什麼太大不了。然而經濟停滯加劇了潛在的衝突，也引起對蘇聯的反帝國主義情緒，不但導致馬列主義國家紛擾脫序，也導致社會主義國家「世界」崩潰，這個地緣政治觀念也自此瓦解。

* 為了完成從社會主義階段（由黨當權的階段）到共產主義階段的過渡，必須「建設社會主義」，亦即追求國家發展。

共產黨都是在擁有主權的、獨立（但受困）的國家上台掌權。馬克思預言第一波革命將發生於科技最先進的國家，實際

的一連串奪權卻發生在世界經濟的邊陲與半邊陲地區。於是，「建設社會主義」經歷了一場大變形，成為半邊陲（甚至邊陲）國家用來趕上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核心地區的過程。這個過程有三個基本要素。

第一個是計畫，計畫需要沈重的官僚結構。在「原始累積」階段，這些結構成效不錯，但基本設施愈來愈現代之後，負責計畫的組織必須負起複雜得多的工作，卻受制於黨的角色。最後，計畫實際上變成經濟頭目(Caid)之間的一種談判過程，他們不斷往回修正計畫，使計畫和實際結果一致。這分明是一套失敗的公式。

社會主義建設裡的第二要素是全面工業化，盡量自給自足。這目標忽視工業化不只是製造工廠機器而已——工業化涉及獲利能力的考慮，後面這一點又取決於科技在全世界的不斷傳播，事實上，隨著科技進步不斷在全世界散布（本身受到「社會主義建設」相當大的促進），社會主義國家的競爭力日益降低，也愈來愈無助於趕上先進國家。

第三個要素是商品化。這商品化毫無限制，十分諷刺，因為它和共產社會的理想完全相反。不過，為了支應計畫與工業化，勞動與其他一切還是必須依循市場交易，即使這些交易由中央嚴格控制。

起初，國家發展似乎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大成就。成長率高，處處一派樂觀主義。但是，1970年代與1980年代的經濟停滯，證明這些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一樣是邊陲或半邊陲的。這些國家遭到一次大失望，他們本來誇口國家發展那麼快速。

總而言之，黨的馬克思主義（現實存在的馬克思主義）的五個命題，最後一一被原先支持這些政權的人懷疑。他們擺脫了馬列主義，以為擺脫了馬克思。然而沒有這麼容易。馬克思被從前門攆走，卻從後門溜進。馬克思的政治意義，或他的思想潛力，都尚未涸竭（正好相反）。現在，我們來談這一點。馬克思的思想中包含了四個關鍵觀念（是馬克思式的但不是馬氏獨有的），這四個關鍵對我來說，用來分析現代世界體系似乎還是有用（甚至是必要的），儘管，在20世紀中，馬列主義及其國家有一些負面經驗，這些觀念還是描繪出我們要去作的政治選擇。

階級鬥爭

「十分清楚的是，馬克思主義之為馬克思主義，完全取決於其對階級與階級鬥爭之分析的定義、含意與效力。無此分析，即無馬克思主義……」（Balibar, 1991:156）。

首先我們不可忘記，列寧黨國家在其內部受到的反對，有相當大部分是階級衝突的表達，就是一般工人對資產階級的新變體，即黨官黨幹的衝突。（馬克思如果分析1980-81年波蘭情勢中的黨官黨幹，會和他分析1848到1851年法國的階級鬥爭一樣得心應手）。

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甚至彼此敵對的利益，並不是馬克思發明的觀念。這觀念在1750年到1850年西歐所有重要的討論中已到處瀰漫。它原來甚至不是個左翼觀念，由馬克思與恩格斯

在《共產黨宣言》中給它一個名稱，從此成為工人運動的定義觀念。

對這個觀念，歷來有兩大反對看法。第一個是道德上，即政治性的反對。其說如下：沒錯，階級衝突處處可見，但階級衝突既非無可避免，亦非可欲之事。這等於說階級鬥爭不過是一種政治選擇（因此是自願的選擇），所以，其道德與理性是個尚待辯論的問題。提出這種論點的人（通常是政治左派），實質上是向勞工階級宣揚一種協商、和解、合謀的政策。

這樣的政策無論多麼有效，其建議都不合馬克思主義分析。無可否認，馬克思行文有某種獨特的說教腔調，但馬克思一向否認自己是傳道者或先知。他以分析家自居，科學的分析家，因此，凡想反駁馬克思的人，都必須置身於同樣的分析層次。馬克思沒有號召工人（或任何人）發動階級鬥爭；他觀察到他們正在從事階級鬥爭，而往往沒有充分意識到自己正在階級鬥爭。

馬克思以兩個廣被接受（雖非普遍接受）的前提為其論點的基礎。其一是凡人都尋求改善其物質條件，因此而鬥爭、反對剝削他們或用他們的困境來得利的人。這項主張很有力，難以否認。被剝削者事實上可能真的薄弱、認命、恐懼，很少堅強、果決、大膽，但這只說明了階級鬥爭的戰術可能性，並非反駁階級鬥爭之存在。

馬克思論點所根據的第二個前提是，客觀上處境相似的人，其行動方式亦相類似，因此而有群體反應（在這裡是階級反應），雖然從來沒有任何群體是完全同質或統一的。此外，拒絕

分析社會群體的行動，就不可能解釋社會現實。在這裡，馬克思也只是強調階級鬥爭的歷史現實。我們如果要反駁這項前提，就必須經驗地顯示這些鬥爭不存在，而這當然非常困難。或者，你可以採取另一個論點，說階級鬥爭的這種觀察是正確的，但失之誇大。據此看法，階級鬥爭不如馬克思主義者所言那麼重要，因為其他形式的鬥爭看起來更大。這是對馬克思論點的一個常見異議，而且不只出於右派之口。世界各地，分析家都強調民族主義、種族、族裔、宗教及性別鬥爭之重要。這些鬥爭顯然存在，而且重要，馬克思主義者（包括馬克思自己）長期一直冷落、詆誹、忽視甚至譴責這些鬥爭。他們如此看待這些鬥爭，理由很簡單：他們一心只以勞工階級分裂為憂，於是想盡辦法克服這些分裂。這造成他們處心積慮低估階級鬥爭以外其他任何社會分裂的理論重要性。

馬克思主義對民族主義、種族、族裔、性別鬥爭的分析有所不足，至少已被廣泛提出20年——亦即在1989年共產主義崩潰前很久就已廣被指出。但是，我們是否因此就要下個結論，說這一切社會鬥爭都同等重要？馬克思自己就在《霧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裡說明，小農地主的鬥爭最後可以視為一種工人階級的鬥爭。

其他形式的鬥爭的爆發，根本不足以證明階級鬥爭不是必然且根本的，因為我們永遠可以論證前者表面底下其實是後者（見Wallerstein, 1991a, 1991b）。的確，只要我們能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論證許多階級鬥爭都在「民族」之間的鬥爭的名稱之下進行，馬克思的立場就會大為強化。當然，我們必須評論何以如

此。一旦做到這一點，我們對近代歷史的興衰起落就有更堅實的了解。不用說，如此之後，要稱頌一個以定於一尊、包攬一切為組織原則的黨，也不可能了。

兩極化

馬克思十分重視兩極化現象。這有兩個意思。其一，馬克思極言經濟兩極化、貧窮化的趨勢，他意思是說窮人益窮，富者益富。其二，他分析一種社會兩極化，社會兩極化指人人不是變成資產階級，就是變成無產階級，所有中間及難以界定的群體都消失。

貧窮化理論很早就遇到反對。反對者說，至少一個世紀以來，工業化國家工人階級的實質所得一直在上升。結論是，沒有絕對的兩極化，而且由於福利國家實施的重分配，甚至相對的貧窮化也已減少。所以，馬克思相當錯誤。

工人階級(更精確地說，熟練工人)的實質所得不斷上升，當然是實情，社會因此並未發生資產階級一極、無產階級一極的絕對兩極化(雖然相對貧窮化的真相如何，並不是那麼清楚)。不過，我們將工業化國家各個分開來看待，犯了馬克思主義者和古典自由主義者都犯的理論錯誤。現實上，這些國家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一部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內部發生了馬克思所描述的過程。我們一旦以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作為分析單位，就看出兩件事來。

第一，貧窮化在世界經濟層次是持續不斷的。不只是相對

的貧窮化(連世界銀行也承認這一點)，還有絕對的貧窮化(邊陲地區愈來愈無力為其人口提供足夠的基本食物，就是例證)。

第二，工業化國家勞工階級實質所得上升之見，由於視角過窄，失之扭曲。我們每每忘了，所有這些國家(起初主要是美國，今天所有這些國家)都是移民國家，收納從邊陲地區源源流入的移民，而這些移民並沒有受益於這些不斷上升的實質所得。這也提醒我們注意階級鬥爭與「民族」鬥爭之間的關係，前文已經提過。

實質所得上升的「勞工階級」，成分主要是當地「原住」或居於支配地位的族群。以下的階層，基本上是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對這些階層，經濟兩極化是現實。他們不是本地出身，往往在種族或族裔的旗幟下從事階級鬥爭。我們否認社會兩極化的唯一方法，是使用極為狹隘的定義來界定誰才是真正的資產階級及無產階級(反映19世紀的社會狀況)。我們如果使用一種比較有用的定義——基本上靠目前兩極化所得過活的——那麼，我們就看出馬克思所見甚當。世界上有更大比例的人口屬於這些範疇之一。他們不是靠財產或租息為生，而是靠他們置身於現實經濟過程中而得到的收入過活。

意識型態

馬克思是唯物主義者。他相信觀念不是憑空冒出來的，也不純是思想之士思考的產物。他說，我們的觀念，我們的學問反映著我們生活的社會現實，就此而言，我們的一切觀念都導

源於某種特定的意識型態氣候。很多人樂得指出這套邏輯也適用於馬克思自己，馬克思視為特殊範疇，也就是被他視為具有普遍性的工人階級，也一樣。這批評當然可以成立，但這批評只有擴大馬克思論點的適用範圍。

今天，整個19世紀的歷史與社會科學思想傳統都被重新打開來討論。在這個時候，對我們的觀念與思想家的社會基礎加以思考，似乎更有必要。社會決定觀念之說顯然不是馬克思的發明，但已被和他的世界觀連在一起，現在一般都視為馬克思命題。因此，我們既沒有理由低估對意識型態(包括馬克思主義)的分析的重要性，也沒有理由低估馬克思對此分析的貢獻的重要性。

異化

異化觀念比起其他觀念，大家沒有那麼熟悉，因為馬克思自己比較不那麼常用這個觀念。有些分析家因此只將這個觀念歸源於「青年馬克思」而棄置之。這十分不智，因為我認為這觀念在馬克思的思想裡相當重要。

馬克思認為異化是資本主義文明之罪惡的化身，其死亡將是未來共產社會的最大成就。因為，據馬克思所見，異化之病的主要化身——財產——破壞人性人格的完整。對異化的鬥爭，是恢復人的尊嚴的鬥爭。

反駁此說的唯一辦法，是主張異化是一種無可避免之惡(一種原罪)，我們除了長久設法減少其表現形式，此外無能為力。

不過，我們還是很難否認，我們這時代的巨大的社會憤怒，根本原因就是異化。

馬克思提供我們想像另一種社會秩序的可能性。他經常被指責沒有詳細勾畫他的烏托邦。果然如此的話，這課題就落在我們身上。他的思想就在那裡。完全視若無睹，得利者誰？

第十三章

自由主義的崩潰

—

1989-1991年標識著當代歷史上一個決定性的轉捩點。這個說法，似乎人人同意。不過，從什麼轉向什麼？1989年是所謂共產主義的所謂結束。1990-91年是所謂波斯灣戰爭的起迄界線。

這兩個事件密切相連，性質卻完全不同。共產主義的結束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波斯灣戰爭標著一個時代的開始。一個關起，一個打開。一個需要重新評價，一個需要評價。一個是希望破滅的故事，一個是恐懼尚未成真的故事。

然而，如布勞岱爾(Braudel)所言，「事件是塵土」，大事件也是。事件沒有意義，除非我們能將之擺進環境狀況

(*conjunctures*)與「長時間」(*longue durée*)的節奏裡觀察。但這事說來容易做來難，因為我們必須先決定哪些環境狀況和那些結構最重要。

我們就從共產主義的結束著手。我稱之為一個時代的結束。哪個時代？是1945-1989年的戰後時代，或1917-1989年的共產主義時代，或1789-1989年法國大革命時代，或現代世界體系上升的時代，即1450-1989年？以上皆可。

我暫且將最後一個放在一旁，先分析1789-1989年時代。這時代有兩次關鍵性的世界革命運動，即1848和1968年。請注意，不是1917年。這段時期，我們可以如何來形容？工業革命時期？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政治生活民主化時期？現代性的時期？這些詮釋都是老生常談，也都有些(甚至有很大的)可信性。

這些主題有個變奏或許精確一點，就是稱1789-1989年為自由主義意識型態勝利與支配的時代。這樣的話，1989年，也就是所謂共產主義結束的這一年，其實標誌了自由主義作為意識型態的傾覆。你說這看法沒道理，也不可信，對自由市場的信心，對人權重要性的信心不是已經重振了嗎？不盡然。不過，要看看我的論點有無道理，必須話說從頭。

1789年，法國發生了一場政治巨變，我們稱之為法國大革命。這個政治事件經過許多階段，初期不確定，然後一片大亂，然後是雅各賓階段，然後有政務委員會(Directory)，接著是拿破崙得勢。政體形式可以說在1830、1848、1870，甚至二次世界大戰的地下抗德期間，都繼續反覆變化。歷經這些變換，唯一不變的是「自由、平等、博愛」這個口號——這是現代世界

一句曖昧之至的口號。

以法國本身而論，法國大革命的得失損益非常不均勻。有些無可逆轉的改變是真實的改變，許多改變看來像改變，實則沒有任何改變。舊制有些事物透過革命過程持續下來，這一點托克維爾早已說之甚明，有些地方則和過去作了決定性的割捨。法國大革命在法國的成績，此處不擬深論。大革命二百周年及其慶祝的陳腔濫調已經過去。

我希望探討的，是法國大革命(廣泛的詮釋)對整個世界體系的衝擊。法國大革命改變人的心態，樹立「現代性」為現代世界的世界觀。所謂現代性，是意識到新是好的，因為可欲，因為我們在每一個層面都生活於一個進步的世界。在政治領域，現代性意指接受改變為「正常」，相對於將改變視為只是一時的「異常」。最後，一種與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結構共鳴的氣質濡染一切，即使不喜歡這氣質者，在公開的論述中也必須將之納入考慮。

問題因此變成要如何處理以「改變」為「正常」的心態，因為離開權力的人每每不情願放棄。關於如何處理以變為常，有各種不同的觀點，這些觀點就構成現代世界的「意識型態」。第一個出現的意識型態是「保守主義」，亦即改變應該盡可能延阻，其範圍應該盡可能限制。但是請注意，並不曾有任何一位嚴肅的保守主義者主張完全不動，這樣的立場，從前才有可能。

對「保守主義」的回應，就是「自由主義」，認為與舊制的決斷是明確的政治決斷，是「不正當」特權的結束。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的政治綱領，是要進一步「改革」各種建制，使現代

世界臻於完美。

最後出現的意識型態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拒斥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的個人主義，堅持單單將個人從習俗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無法達成社會和諧。社會和諧必須以社會手段來建構，有些社會主義還認為，只有經過進一步的歷史發展以及一場社會大戰，即「革命」，才可能建構社會和諧。

三個意識型態在1848年都已就位，並且從那時以來，經19世紀，以至20世紀，一直在彼此嘈雜爭戰。政黨到處成立，在反映這些意識型態立場。三個意識型態當然都從來不曾有一個不受爭議的定義版本，三者之間界線何在，也有相當的混淆。不過，在學術圈、在一般人的討論裡，論者都同意有三個意識型態存在，它們代表三種不同的「調性」，三種因為對「改變」的立場有別而形成的不同政治風格；一個主謹慎，一個主不斷的政治改革，一個主加速轉化。有時候，我們稱之為右派、中間、左派。

關於1848年以後的這些意識型態，有三點值得提出。我說1848年，因為1848年的世界革命——結合了首度出現的有意識的勞工政治運動與「人民的春天」——奠定了其後一個半世紀的政治議程。另一方面，1848年的革命「失敗」，卻清楚確定政治改變不可能像加速派希望的那麼迅速，但也不會像謹慎派希望的那麼緩慢。最可信的預測（預測——而不是願望）是不斷的理性改革。於是，在世界經濟的核心地區，自由主義的中間路線勝利了。

然而誰來落實這些改革？這是第一個反常。在意識型態盛

放之初，即1789至1848年之間，三個意識型態在國家—社會的二律背反裡都是堅定反國家的。這二律背反在政治思想中位居核心，也是法國大革命的一個後果。保守主義者譴責法國大革命企圖利用國家來破壞並否定社會根本必需的那些建制：家庭、共同體、教會、君主制度、封建秩序。自由主義者則譴責國家這東西妨阻每個個人——他們說個人是社會的根本——追求他或她依照邊沁(Bentham)「快樂與痛苦的計算法」而認為適當的利益。社會主義也指責國家，說國家反映特權者的意志，而不是反映社會的普遍意志。所以，三個意識型態都熱烈存望於「國家萎謝」這個理想。

然而——這是上面所指的「反常」——三個意識型態儘管在理論上對國家一致抱持這樣負面的看法，實際上(尤其1848年以後)三個意識型態的鼓吹者卻都以種種方法強化國家結構。保守主義者視國家為一種替代機制，用來遏止他們說的道德解體，因為傳統建制已不再有此能力，或者，沒有警察機關協助則無此能力。自由主義認為，要使改革的步調維持穩定，並將改革導向正確方面，國家是唯一有效率，唯一理性的機制。1848年以後，社會主義者覺得，不取得國家權力，他們永遠沒有能力克服障礙，達成根本轉化社會的目標。

第二個反常是，雖然人人都說世上有三種彼此相異的意識型態，但在政治實踐上，各個意識型態卻試圖將政壇化約成二元局勢，也就是聲稱另外兩個意識型態基本上相似。保守主義者認為，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是「進步」的信徒，希望利用國家來操縱社會的有機結構。社會主義者認為，保守主義者

與自由主義者演雙簧維護現狀與上層階級(舊貴族與新資產階級結合而成)的特權。自由主義者認為,保守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是威權主義者,反對自由主義理想,即個人潛力淋漓盡致的發揮。將三個意識型態化約成兩個(三種不同的二元版本),部分無疑是一時的政治詞藻。但更根本而言,其中反映了政治聯合的不斷重建。無論如何,過去150年裡,三元一再化約成兩元,造成了相當多的政治混亂,三個標籤的意義尤其混淆。

然而,最大的反常是,1848年後120年裡——也就是說,至少直到1968年——表面上三個意識型態彼此衝突,實則只有一個,就是占壓倒性支配地位的自由主義意識型態。要了解這一點,我們必須看看,這整個時期裡爭辯的具體議題是什麼。這議題是一個需要解決的根本社會問題。

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政治上如果想要維持穩定,必須作一重大「改革」,這改革就是將勞工階級整合於政治體制之中,從而將一個只以權力與財富為基礎的支配轉化為一種以被支配者之同意為基礎的支配。這個改革過程有兩大支柱。其一是賦予人民選舉權,但作法是雖然人人投票,結果制度上卻只出現相當少的改變。第二是將全球剩餘價值的一部分轉移給勞工階級,但其作法使最大部分的剩餘價值留在支配階級手中,而且資本累積的體系安居其位。

這些社會「整合」最迫切的地理區域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核心國家——主要是大不列顛與法國,但美國、西歐其他國家及白人屯殖的國家亦然。我們知道,這轉化在1848到1914年這段時期穩定落實,到了一次世界大戰,普遍選舉權(大多數地

方只是男子)與福利國家的模式已經就緒,雖然並非在所有這些國家裡都已充分實現。

我們可以單純說自由主義意識型態已實現其目標,就此打住。不過,單提此點,有所不足,我們還必須注意保守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在這過程裡發生的變化。重要的保守主義政客搖身一變為「開明的保守主義者」,也就是說,他們和自由派政客比賽整合勞工階級。狄斯雷里、俾斯麥,甚至拿破崙三世,都是這種新版保守主義的好例子,稱之為「自由主義式保守主義」可也。

同時,工業化國家的社會主義運動,包括其中最強硬者,如德國社會民主黨,進入國會,成為號召實現自由主義改革的先鋒。社會主義者透過其政黨與工會,發揮「人民」的壓力來達成自由主義之所欲,亦即馴服勞工階級。不但伯恩斯坦(Bernstein),連考茨基(Kautsky)、裘黑(Jaurés)與格思德(Guesde),都變成「自由主義式社會主義者」,費邊社更不用提了。

到1914年,工業化國家的政壇大致不歸「自由主義式保守主義者」,即歸「自由主義式社會主義者」。在這過程之中,純自由主義政黨開始消失,但這是因為所有值得一提的政黨事實上都已是自由主義政黨。在意識型態衝突的面具後面,是意識型態的共識。

一次世界大戰沒有打破這共識,反而加強並延伸它。1917這個年代就是自由主義共識延伸的象徵。一次大戰的始因,是世界經濟一個邊陲地區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Bosnia-Herzegovina)

的一件行刺案。核心國家本來的目標只是整合自己國內的勞工階級，這時已經必須超越這比較狹窄的目標，考慮整合世界勞工階級的更大部分，就是世界體系邊陲與半邊陲地區的勞工階級。用今天的語言來說就是，現在的課題是要以馴服核心地區內部勞工階級的方式，來整合南方。

北南議題之解決，有兩個版本。一個由在世界規模上振興自由主義的先鋒威爾遜提出。威爾遜要美國加入一次世界大戰，使世界成為民主制度安全的世界。戰爭結束之後，他號召「民族自決」。

威爾遜指哪些民族而言？顯然不是指核心地區的國家。建構有效且具正當性的國家機制的過程，在法國與大不列顛，甚至在比利時與義大利，都早已完成。威爾遜指的，當然是當時正在瓦解的三大帝國裡的民族：俄羅斯、奧匈及鄂圖曼——這三者構成世界經濟的邊陲與半邊陲區。簡而言之，他指的是今天我們說的南方。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民族自決的原則延伸到所有剩下的殖民地——非洲、亞洲、大洋洲及加勒比海。

民族自決原則是國內普遍選舉權原則在世界層次上的結構對應物。正如每個個人被視為政治上平等，一人一票，民族也要有主權，政治上平等，一國一票（這個原則，今天體現於聯合國大會）。

威爾遜的自由主義並不到此而止。國家層次的普遍選舉之後，下一步是福利國家，也就是透過政府的所得轉移，將剩餘價值的一部分加以重新分配。在世界層次，民族自決之後，下一步是「國家（經濟）發展」，由羅斯福、杜魯門及其繼任者在二

次世界大戰之後推出。

不消說，對威爾遜全球改革的號召，保守主義勢力的反應是他們一貫的謹慎與憎惡。也不消說，經過二次世界大戰的擾攘之後，保守主義者開始看出自由主義方案的好處，於是，1965年以後，威爾遜的自由主義實際上成為一種自由主義／保守主義主題。

但是，1917年當然有第二層意義。那是俄國大革命之年。威爾遜主義一誕生，就面對一個意識型態大敵，即列寧主義。列寧與布爾什維克出現在政治上，基本上是抗議社會主義意識型態變成我所說的自由主義式社會主義（此和伯恩斯坦的修正主義是一回事，列寧認為考茨基也是這一路）。因此，列寧主義是在修正主義之外另走一條路，先反對工人參加一次世界大戰，然後由布爾什維克黨在俄國奪取國家權力。

我們知道，在1917年，各地的——包括俄國的——社會主義者預期德國發生第一場社會主義革命；有好幾年之久，布爾什維克等待德國發生革命，作為他們自己的革命的實現。我們知道，德國的革命沒有發生，布爾什維克只好決定自己想辦法。

他們採取了雙重決定。一方面，他們決定建設「一國社會主義」。他們於是走上一條道路，在這條道路上，這個蘇維埃國家對世界體系的要求是在政治上整合於世界體系之中，並且經由迅速工業化而整合於世界體系的經濟發展之中。這是史大林的方案，也是赫魯雪夫、布里茲涅夫及戈巴契夫的方案。所以，在實踐上，這方案是蘇聯要求在上世界上享有「平等的權利」。

世界革命怎麼辦？列寧當初成立第三國際，話說是為了以

強硬手段實現第二國際放棄的工作。但第三國際不久就變成不過是蘇聯外交政策的一個附屬物。第三國際從來不曾著手的一件事，是刺激勞工階級真正造反。第三國際的活動焦點轉移了，從1921年在巴庫舉行的東方民族大會開始轉移。這場大會，列寧不但邀請共產黨，也邀請各色各樣的民族主義運動與民族解放運動參加。

從巴庫浮現，並且實際上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所宗奉的綱領，是反帝國主義綱領。然而什麼是反帝國主義？反帝國主義就是將威爾遜的民族自決綱領化成比較積極、比較不耐煩的語言。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時期，這些民族解放運動一個接一個上台掌權之後，推出了什麼綱領？民族（經濟）發展綱領，但通常改貼「社會主義發展」的標籤。列寧主義本來是民族層次自由主義式社會主義的大敵，如今在世界層次上看來愈來愈像自由主義式社會主義。

在1868-1914年時期，自由主義綱領是透過普遍選舉權與福利國家來馴化勞工階級。社會主義的鬥性，結合保守主義的老練機敏，落實了這套綱領。在1917-1989年階段，世界層次的自由主義綱領則是馴化南方，落實之道也是結合社會主義的鬥性，和保守主義的老練機敏。

1968年的第二次世界革命，一如1848年的第一場世界革命，轉化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意識型態戰略。但1848年的革命透過其成功與失敗，確保了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的勝利，以及它兩個勁敵——保守主義與社會主義——被轉化成它的附屬物，1968年的革命，透過其成功與失敗，卻破解了自由主義共

識。1968年的革命者發動了左派的抗議，抗議這共識，最主要的，抗議社會主義、甚至列寧的社會主義，轉化成自由主義式社會主義。這抗議採取的形式是各種無政府主義的主題再度振興，也許最重要的是毛派信仰復振。

世界性的自由主義共識被所謂新左打破之後，保守主義意識型態也自1848年以來首度重振，而且在政治上再度變成攻勢十足，而不是守勢。有人稱之為新保守主義，有人稱之為新自由主義，反映了一個事實，亦即它的綱領的基本設計用意是要撤除對市場的束縛。

我們要如何解釋1968年的世界革命及其對意識型態策略的影響？就整個世界體系的結構而論，我們可以說，自由主義政治——透過普遍選舉權／主權與福利國家／民族發展來馴化世界勞工階級——已經造達其極限。進一步增加政治權利及經濟上進一步重新配置，將會危及資本累積制度本身。但是，不等世界勞工階級全都獲得雖少而可觀的利益，自由主義政治就已到達其極限了。

邊陲與半邊陲地區大多數人口仍然被排除於體系運作之外。但核心地區人口裡相當可觀的少數也被排除，就是所謂的第三世界。此外，世界的婦女也意識到，她們不分階級，一直都被排斥於真正的政治權利之外，而且大多被排除於平等的經濟報酬之外。

因此，1968年代表的，是世界支配階級1848年以來極力創造並加強的文化霸權開始碰到逆轉。從1968到1989年，自由主義共識的殘跡逐漸崩潰。右派方面，保守主義者愈來愈試圖摧

毀自由主義中心。尼克森說「現在我們都是凱恩斯主義者」，布希1988年的競選主題則是打倒「L」（L代表自由派）。英國保守黨也形同發生內部政變：英國保守黨的「開明保守主義」傳統可以上推到狄斯雷里，以至1840年代拜相的皮爾爵士(Robert Peel)，這個傳統至柴契爾夫人而告終。

自由主義共識之式微，在左派更甚。最明顯的是自由主義社會主義政權紛紛解體。在邊陲與半邊陲地區，連最「進步」，最常使用鬥爭詞藻的政權也無法大幅達成民族發展，結果，這些擁有一段光榮民族解放鬥爭歷史的政權一個接一個喪失人民支持的正當性。這個過程的高潮，則是共產主義的所謂崩潰——蘇聯出現戈巴契夫主義，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現「經濟特區」，以及東歐所有國家的共黨一黨專政體制傾覆。

1968年，受挫於自由主義共識的人以無政府主義與／或毛主義之名反擊自由主義式社會主義意識型態。1989年，受挫於自由主義共識的人以市場之名反擊自由主義社會主義意識型態的道地支持者，即蘇維埃式政權。然而上述兩種反擊者所走的道路都不能當真。1968年的反擊者所走的路子很快就證明沒有意義，1989年的反擊者所走的道路亦然。不過，1968到1989年之間，自由主義共識，以及其所提，世界勞工階級處境將能逐漸改善的希望，都遭到嚴重破壞。既然如此，就談不上要馴化勞工階級了。

共產主義崩潰的真諦，是自由主義作為霸權意識型態的終於崩潰。它的承諾如果不能獲得相當信徒，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就不可能有持久的正當性。最後一批認真相信自由主義的承諾

的人，是前共產集團裡那些老式的共產黨。沒有他們繼續主張自由主義的承諾，世界的支配階級除了使用武力，已經沒有控制世界勞工階級的可能性。同意已經一去不返，同意所以一去不返，是因為賄賂不再。單用武力的話，我們至少從馬基維利以來就已知道，徒有武力，政治結構不可能存活很久。

二

在這裡，我們就看出波斯灣戰爭的意義來了：它是一個新紀元的開始。在這個紀元裡，支配勢力的唯一武器逐漸變成就是武力。波斯灣戰爭和20世紀其他所有南北對抗都不一樣。波斯灣戰爭是純粹現實政治(realpolitik)的操演。海珊以現實政治之道發動戰爭，美國聯合其友邦以現實政治回應。

先前的衝突裡，當然不是沒有現實政治。1921年的巴庫大會，以及中國共產黨1949年抵達上海，都有現實政治的內涵。1955年的萬隆宣言、越戰，以及1962年古巴與美國對峙，現實政治都是要素。反體制運動的戰略裡，現實政治向來是不可或缺的元素——毛的名言「槍桿子出政權」就是例證。但武力向來只是反體制意識型態核心組織主題動機的一個附屬物。南方、邊陲地區、世界的勞工階級，一直是在轉化與希望的意識型態大旗下奮鬥，這意識型態的一項要義很清楚是訴諸人民的力量。

前文說過，世界反體制運動的意識型態鬥爭，其所採取的形式看起來好戰，或聲稱鬥性堅強，其實不然。我們指出，世

界上的反體制力量其實都在——大致上是無心的——追求這一種自由主義將他們整合於體系之中的同質化目標。不過，他們這麼做的時候，至少曾提供希望，甚至是誇大其實的希望，並且根據這些希望與承諾而招引追隨者。這些承諾後來未能實現而被識破的時候，先是引起暴動（1968），然後是幻滅之怒（1989）。這些暴動與幻滅之怒的反對對象，直接指向據稱是反體制的自由主義式社會主義者，而不是純粹老牌的自由主義者。不過沒關係，因為自由主義者已透過這些自由主義式社會主義者（當然，還有自由主義式保守主義者）達成其目標，而且向來都無法獨力成事。

由自由主義意識型態外殼的這場崩潰，海珊得到教訓。他斷定「民族發展」是個誘餌，即使對伊拉克這樣富藏石油的國家，也是一條不可能走通的路。他判定，改變世界權力階級結構的唯一途徑，是在南方建構巨大的軍事強權。他自視為營造一個泛阿拉伯國家的俾斯麥。入侵科威特是這過程的第一步，附帶效益則是立即化解伊拉克的外債危機（消滅一個主要的債權國，加上平日掠奪到手的資金）。

如果這是純粹現實政治的一次操演，我們就必須細看他的算計是什麼。海珊必定是如何評估他的風險以及他成功的機率？我不相信他失算了。我相信他是這樣推理的：伊拉克短程將有五十五十的贏面（如果美國反應遲疑），但如果伊拉克有動作，美國將陷入一種沒有贏面的處境，其中程失利的機率是百分之百。對一個現實政治的玩家，這是不錯的勝率。

海珊賭五十五十的贏面，結果輸了。美國拿出了它最大的

軍事力量，於是當然打不敗。伊拉克經過這次戰爭，相當削弱，只是並不像美國所想的那般嚴重。中東的政治情勢比1989年並沒有什麼根本改變，唯一變化是美國的政治責任大幅增加，其解除緊張局面的能力卻沒有任何可觀的增加。無論短程演變如何，美國在世界體系內的中程政治角色都會繼續腐蝕：在世界市場上，美國相對於日本與歐洲共同體的競爭地位一直在持續腐蝕。

中程的問題不在於北方會發生何種演變，因為這一點相當容易預測。世界經濟下一次出現長期上升的時候，可能的強極將有兩個：一個是日美軸，附上中國，一個是泛歐軸，附上俄國。在新的擴張以及核心強權之間的新競爭裡，各極都盡力發展其主要邊陲地帶（日美軸發展中國，泛歐軸發展俄國或經過重整的蘇聯），南方將會被進一步邊陲化，一些零星的被包領土除外。

新一波經濟擴張的政治結果，將是緊繃的南北衝突。不過，如果北方已失去用意識型態控制大局的武器，反體系的力量——南方，以及別處支持南方的力量（用老一點的語言來說，就是勞工階級）——能不能為他們的鬥爭再造一個意識型態層次呢？

去年的意識型態主題——以社會主義與反帝國主義為化身的那些主題——已經用老之後，已有三個主要的鬥爭模式浮現出來，各個模式都立即令世界體系的支配階級難以應付，但其中沒有一個能造成根本的意識型態挑戰。第一個，我稱為新俾斯麥式挑戰，海珊是一個例子。第二個是根本拒斥啓蒙運動世界觀，何梅尼領導的力量是例子。第三個是個人的社會、地理

流動，主要表現是大量、未經許可、持續不斷的由南向北移民。

關於這三種鬥爭形式，有兩點值得提出。第一點是，各個形式在未來50年都可能增加許多倍，而且將會吸住我們的集體政治注意力。第二點是，對這三種鬥爭形式，世界上的左派知識分子的反應都極為曖昧。只要三種形式是針對世界體系的支配階級而發，並且能造成後者不安，左派知識分子就願意支持這些鬥爭。但是，只要各個形式都缺乏意識型態內容，因而在中程政治結果上是反動而非進步的，左派知識分子就和這些鬥爭保持距離，甚至可觀的距離。

問題是左派勢力有何選擇。如果1989年代表一個從1789到1989年的文化紀元的結束，那麼，當前紀元將會有，將可能有，什麼樣的新的意識型態主題？容我建議一個可能的分析途徑。現代性的主題，亦即剛過去的那個紀元的主題，是「新就是好」，以及「政治變遷是正常的」。前文說過，這些主題穩定地、邏輯地導致自由主義作為意識型態的勝利，也就是導致有意識的、理性的改革這套政治策略的勝利，其預期則是政治將無可避免地臻於完美。由於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架構之內，政治的完美程度有其（未曾被認知的）內在局限，這套意識型態就到達了它的極限（1968與1989年），現在終於失去其效用。

我們現在進入了一個新紀元，我稱之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解體的紀元。一切創造「世界新秩序」之說，全是空談，無人相信，而且不可能實現。

如果我們面臨的是解體的前景（而不是正常的進步的前景），那麼，什麼意識型態能夠存在？自由主義的主人公，即個

人，不會扮演任何值得一提的角色，因為個人一個解體的結構裡無法長期存活。作為主體，我們的唯一選擇是形成群體，這群體要大，大到足以占取有力量、能作為庇護之處的角落。「群體認同」的主題在現代世界體系裡從來不曾像今天這麼重要，殊非偶然。

如果群體是主體，那麼，這些群體實際數目是很多的，而且形成非常複雜的重疊。我們都是好多個群體的成員（甚至活躍的成員）。不過，單指出主體是群體，並不足夠。在1789到1989年那段時期，保守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都試圖——只是不大成功——確定群體的社會優位性。保守主義者標榜某些傳統群體，社會主義者標榜（人民的）集體性。我們必須推出一種以群體為行動者的意識型態（即政治綱領）。

我認為，可能建構的意識型態只有兩個，雖然目前為止兩個都尚未充分建構。我們可以提出「最適群體」才能生存之論。我們從新種族主義主題的鼓吹者那種新的侵略性裡，就可以聽見這個主題。新種族主義的主題經常披著才能政治的外衣，而不是種族純粹論的外衣。這些新聲稱不再必然以舊有的狹隘分群方式為根據（諸如民族，甚至膚色），而是以強者的權利為基礎，說強者有權利保有其掠奪物，並且在其堡壘地區保護這掠奪物。

南方這些新俾斯麥與啓蒙運動的問題是，他們最後往往還是傾向與他們在北方的對等勢力妥協，從而變成只是強者的又一個堡壘。過去十五年來的中東政治，可以明見此點。面對何梅尼所代表的威脅，海珊獲得世界所有支配階級支持並強化，

但海珊一旦動手想撈走太大部分戰利品，這些勢力就反過來與他作對，何梅尼的接班人則樂得重新加入支配集團。聯盟關係的這種輕易轉換，說明了支配階級的政治（以及他們口口聲聲關懷人權的偽善），但也說明了何梅尼及其集團，以及海珊底下的復興黨的本質。

由解體時代的群體優位出發，在「最適群體」生存的意識型態之外，還有一條路，就是承認所有群體在一個經過重新建構的世界體系裡享有平等權利，同時承認群體並不彼此排斥。群體之網是複雜交錯的。有些黑人是女性，但並非黑人皆女性；有些回教徒是黑人，但並非回教徒皆黑人；有些知識分子是回教徒，但並非知識分子皆回教徒。真正的群體空間意指群內空間。一切群體代表的都是部分身分認同。群體之間互設防禦，結果往往是在群體內部製造階級。不過，沒有防禦，群體當然也無法存在。

這，就是我們的課題——在歷史體系解體的時代創造一種新的左派意識型態。這件事不容易，也不可能一夕完成。後1789時代的那些意識型態是經過許多許多十年才建構而成的。

成敗的賭注很大，因為體系解體的時候，最後一定有個東西取代它們。我們知道，在體系分叉裡，其轉化可能朝根本分歧的方向發展，因為這時少量的輸入可能產生重大的結果（有別於相對穩定的時代，相對穩定的時代，例如現代世界體系大約從1500年到最近，大量輸入而結果有限）。從歷史資本主義過渡而出之後，例如在2050年，我們可能會轉化成高度不平等、甚具階級性的一套（或多套）體系，也可能出現一套大致民主且平

等主義的體系。結果如何，全看喜歡後者的人能不能拿出一套有意義的政治轉變策略來。

現在，我們可以轉過來談這個問題：誰排斥了誰？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裡，這套體系排斥多數（於福利之外），方式是以一套層次分明的階級結構，將世界所有潛在的勞工納入工作體系。這套透過納入而排斥的體系，在19世紀由於登上支配地位的自由主義意識型態到處散布而被無限強化。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為透過納入而排斥的方式設詞圖說，甚至有辦法控馭世界上的反體制力量，使之從事這件工作。那個時代幸好結束了。

現在，我們必須看看我們能不能創造一種非常不同於前的世界體系，將人人納入來享受其福益，就是在建構自覺的群體之際，這些群體承認彼此是互相交織的。

在一個解體時代明確形成一套清楚的反體系戰略，至少要20年。我們此刻能做的，是提出一些可能進入這麼一套戰略的要素；不過，我們無法確定各項要素將會如何相互搭合，也無法確定我們列出的要素很完備。

其中一個要素，當然應該是明確斷棄過去那種以取得國家權力來達成社會轉化的策略。取得政府權威可能有用，卻幾乎從來沒有轉化之功。取得國家權力應該視為一種防禦戰術，在必要時，也就是在特殊情況下使用，以抵抗極右派的壓制力量。然而必須認清，國家權力這種最後的手段往往有使現有世界秩序重新獲得正當性之虞。我一直在分析說自由主義意識型態已經崩潰，然而儘管如此，與自由主義意識型態一刀兩斷，仍將是反體系力量最困難的一步。

與過去一刀兩斷，意思就是完全不願意為其體系處理困局。反體系力量的功能，不在於解決體系愈來愈尖銳的矛盾所加給支配階級的政治困局。人民力量之自助，應該十分有別於談判如何改革體系的結構；在自由主義意識型態時代，幾乎所有反體制力量，包括鬥性最強的那些力量，都被引入這個陷阱。

反體系力量的心力不應投入這裡，而應該集中於在共同體層次擴張各種各樣真實的社會群體，而且在較高層次上以非統一的方式從事群體形成(及不斷的再形成)。在前面一個時代，反體系力量的根本錯誤就是相信結構愈統一，愈有效。當然，那時候的戰略由於以征服國家權力為首務，這種統一政策乃是邏輯之必然，而且乍看成果豐富，然而這種政策也將社會主義意識型態變成自由主義式社會主義意識型態。今後反體系力量最不需要的，就是民主集中制。眾多真實的群體，其在較高層次上(國家、區域、世界)的團結基礎必須更細緻、更有彈性及更有機。反體系力量的大家庭必須以許多不同的速度行動，不斷重新形成戰術上的本末次序。

反體系力量要構成這麼一個連貫而不定於一尊的家庭，條件是其中各個群體本身就是一個複雜、民主的結構，而要做到這項條件，我們必須在集體層次上認知，這場鬥爭在戰略上並無本末先後的考慮。一個群體的一套權利，並不比另一群體的另一套權利重要。什麼是本、什麼是末的爭辯，會使我們力量減弱，產生偏差，走向既為群體則必統一的歧途，最後，多樣化的許多群體被打揉成統一於一尊的單一運動。轉化的戰役，只有在四面八方的陣線上同時追擊，才會成功。

由各個本身複雜且民主的許多群體構成的這種多陣線戰略，將能運用一種可能使維護現狀的勢力無法招架的戰術武器。這武器就是把舊有的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當真，要求其普遍實現。例如，面對由南而北大量移民的情況，適用的戰術就是要求落實無限自由市場的原則——開放邊界，來者不拒。面臨這樣的要求，自由主義意識型態家只有放下他們的人權高調，承認他們其實不主張人有外移的自由，因為他們不承認外人移入的自由。

同理，我們可以在每個陣線上要求增加決策上的民主化，以及要求消除所有非正式的、未經承認的特權。我的主要意思是，壓垮體系，支配勢力並不希望世人將其有口無心的聲稱當真，但我們把它們當真，要求他們名副其實做到。這種戰術，和幫助體系處理困難正好相反。

這些就夠了嗎？很難說，而且單靠這些作法本身，大概是不夠，但這些作法將會愈來愈將支配勢力逼入政治牆角，也因此將會逼得它們拿出救命的反戰術來。結果不容易確定，除非反體系力量能發展其烏托邦學——對他們希望建立的民主、平等主義秩序的真正困境加以反思與辯析。在前一階段，大家對烏托邦學不以為然，認為烏托邦學使人分心，先使人無法專注於取得國家權力的當務之急，然後使人無法專志追求民族發展。不講烏托邦學的總結果，是搞出以浪漫幻想為基礎的運動，以及憤怒的幻滅。烏托邦學不是烏托邦幻想，而是清醒地預期困境，以及開放地想像建制結構的選擇途徑。烏托邦學會被視為有分裂作用，然而反體系力量要做到複雜而不定於一尊，就

必須思考各種走向可能的未來的途徑。

1989年代表了一個時代充滿痛苦的終結。反體系力量的所謂失敗，其實是一個大解放。它拿掉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式自圓之詞，代表了支配性的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的崩潰。

但是，我們已經進入的新時代還要更加險惡。我們正在航行於海圖未載的水上。我們對過去的失誤所知，多於我們對最近的未來所知。要花費巨大的集體努力，才能發展出一套清明的轉化戰略來。同時，體系解體自在快速進行，階級與特權的維護者也分秒不浪費，趕著尋找一切皆變為一切不變的解決之道與結果。（記住，藍皮杜斯〔Lampedus〕以這句話評斷加里波底革命。）

樂觀或悲觀都沒有理由。一切都可能，一切也都尚未確定。我們必須忘掉我們的舊戰略。我們必須忘掉我們舊有的分析。舊戰略與舊分析都帶著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支配意識型態的徵記。我們無疑必須以有機知識分子的角度重新思考，以一個由許多本身複雜的群體構成的非統一世界家庭的角度思考。

第十四章

自由主義的痛苦： 進步有什麼希望？¹

我們碰到三件事的周年：京都精華大學1968年創校的25周年；1968年世界革命25周年；日本轟炸珍珠港剛好滿52周年（至少，按照美國日曆，今天正好52周年），一開頭，我先說明我認為這三個周年各個代表什麼。

京都精華大學創校，是世界體系歷史上一個重大發展的象徵。這重大的發展，就是大學結構在1950年代與1960年代非常大量的擴張。²在某一層次上，啓蒙運動寄望透過教育來獲致進

1 1993年12月7日，京都精華大學創校25周年，在京都國際會議廳演講（東京《朝日新聞》共同主辦）。

2 John W. Meyer等著〈世界教育革命，1950-1970〉（The World Educational Revolution, 1950-1970），收於《國家發展與世界體系：教育、經濟及政治改

步，這希望在本時期達於極點。這件事本身是美妙的，我們今天也在這裡慶祝。但是，和許多美妙的事物一樣，這件美好的事情有其複雜的牽扯，也有其代價。其中一項牽扯是，高等教育擴張，產生了為數甚多的畢業生，這些畢業生堅持和他們身分相當的工作與所得，而要滿足這些要求，有些困難，至少很難那麼快速、那麼充分滿足。成本，則是擴大高等教育的社會成本，而這只是為世界體系中巨幅擴張的中層階級提供福利的成本的一部分。這些增加的社會福利成本將會開始為國庫造成沉重負擔。1993年，全世界都在談國家的財政危機。

接下來談1968年世界革命周年。這場革命在大多數國家（並非全部國家）都從大學內部開始。這場大火火種議題裡，有一項無疑是即將畢業的學生想到就業前途而突然生出的焦慮。不過，這狹隘的自利因素當然不是革命爆發的主要焦點，而是整個問題的又一徵候而已。真正的問題是啓蒙運動所寫的進步劇本裡包含承諾。表面上，這整套承諾好像在1945年以後的階段終於實現了。

接下來談第三個周年，也就是日本襲擊珍珠港。這場襲擊將美國帶進二次世界大戰，成為正式的參戰國。事實上，二次世界大戰基本上並不是日本和美國之間的戰爭。恕我這麼說，在這齣世界戲劇裡，日本是一個二流演員，其襲擊珍珠港是一

變，1950-1970》(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World System: Education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1950-1970), J.W. Meyer與M. T. Hannan編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79), 頁37-55。

場長期鬥爭裡的插曲事件。二次世界大戰基本上是德國和美國之間的戰爭，而且事實上從1914年持續而來，兩國爭相繼承大不列顛的世界體系霸權地位，進行了這場「30年戰爭」。我們知道，美國贏了這場戰爭，成為霸權，主持啓蒙運動各項承諾在全世界的表面勝利。

因此，我將以這組主題來發表我的見解。這組主題，我們是用三件事的周年來標識的。我首先將討論1789到1945年這個階段，也就是為啓蒙運動的理想而懷抱希望並鬥爭追求這些理想的時代。其次，我要分析1945到1989年這個階段，就是啓蒙運動的希望獲得實現——假實現——的時代。第三，我要討論當前階段，即「黑色時期」，這個時期始於1989年，可能會持續半世紀之久。最後，我將討論我們面臨的抉擇——現在，以及很快就會面臨的抉擇。

啓蒙運動及其種種曖昧含意的第一場重大政治表現，當然就是法國大革命。法國大革命所為何事，已經成為我們這時代的重大曖昧之一。1989年的法國大革命兩百周年，在法國出現一項非常重大的企圖，要用一種新的詮釋取代長期居於支配地位，但如今已被視為過時的「社會詮釋」。³

法國大革命本身是一個漫長過程的終點，不但在法國如此，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這個歷史體系亦然。到1789年，

3 法國思想界有關大革命二百周年的辯論，見Steven Kaplan, 《再見89》(Adieu 89); Paris: Fayard, 1993), 精采且詳細。

地球有相當大部分已被定位於這個歷史體系之內三百年。在那三百年裡，其大多數關鍵建制已經樹立並鞏固：軸心式勞動分工，剩餘價值已相當從邊陲地區移向核心地區；基本上，利益報酬歸於從事無限資本累積者；所謂主權國家構成一個邦際體系，這些國家雖具主權，其實為此邦際體系的架構與「規則」所束縛；世界體系日益加劇兩極化，不但經濟上兩極化，社會上也是，而且人口學上也瀕臨兩極化。

這套歷史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還缺少一個東西，就是使之具有正當性的地緣文化。其基本學說，在18世紀（以及更早一點）逐漸由啓蒙運動的理論家打造，但到法國大革命才成為社會建制。法國大革命使大眾支持，甚至使大眾吵著接受兩個新世界觀：一是政治變革是正常而非例外，二是主權在民而不在最高統治者。1815年，拿破崙——法國大革命的傳人兼世界宣揚者——戰敗，法國出現「王政復辟」（舊制曾被罷黜的所有地方都出現王政復辟）。但王政復辟並未真正——不再能真正——打掉人們對這些世界觀的普遍接受。爲了因應這種新局面，19世紀的三位一體意識型態——保守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誕生了，也提供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內部後來所有政治辯論的語言。

三個意識型態之中，勝利而出的是自由主義，其勝出之時，是這套體系的第一場世界革命，亦即1848年。⁴自由主義最能爲

4 自由主義進據舞台中心，把保守主義與社會主義這兩個競爭者變成附屬品而不是敵手的過程，見本書〈意識型態：三個還是一個？現代性的偽戰爭〉

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提供一種可以存活的地緣文化，這地緣文化使其他建制具有正當性，不僅在體系幹部眼中有正當性，在大量人口眼中，也就是在所謂一般人眼中，也有相當可觀的正當性。

一旦人民認爲政治變化是正常事，以及他們原則是主權所在（亦即他們是政治決定者），則沒有什麼事是不可能的。這當然就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架構裡的權力者與特權者面臨的問題。他們恐懼的立即焦點，是尙屬小群，但不斷增長的城市工業勞工。但是，法國大革命充分證明，從權力者之特權者的角度視之，農村的非工業勞工也會變得同樣麻煩或可怕：到底要如何防止這些「危險階級」將這些新規範太過當真，以至破壞體系的基本結構而干擾資本累積的過程？這是統治階級在19世紀上半葉面臨的政治困局。

一個不思即知的答案是壓制。不過，1848年世界革命的教訓，正是單純的壓制終究不是十分有效，只會刺激危險階級，使他們更加憤怒，而不是安撫他們。統治階級領悟到，壓制想要有效，必須和讓步兩相配合。另一方面，19世紀上半葉那些革命者也學到一個教訓，就是自發的起事並不是非常有效，因爲多多少少很容易就被收平。人民叛亂的威脅如果要加速促成大幅度的變革，必須和有意識的長程政治組織兩相配合。

實質上，自由主義爲右派和左派的政治困局提供了立即的化解之道。它向右派宣揚讓步之重要，向左派宣揚政治組織工

作之重要。它向左右雙方宣揚耐心：長期而言，中間路線的收穫將會比較多。自由主義是中間路線的化身，它唱的歌也很吸引人，因為它宣揚的並不只是一種消極的中間主義，而是一種主動的戰略。自由主義信仰啓蒙運動思想的一個關鍵前提：理性的思想與行動是人類得救之路，也就是獲致進步之路。人（很少包括女人）天生是理性的，潛在是理性的，終究是理性的。

由此推知，「正常的政治變革」應該循最理性的人指出的道路進行——最理性意指受過最多教育、最有技巧，因此也最明智。這些人能設計最好的政治變革之路，也就是說，這些人能指示必要的改革以供實施。理性的改革主義是自由主義的組織觀念，並以此指定個人與國家之間看起來難以確定的關係。自由主義者能主張個人不應該受制於國家（集體）指令，同時又主張國家行動是必要的，以便將對個人所受的不義減到最小。因此，自由主義者能支持放任主義，兼又支持工廠法，原因是自由主義者重視的並非放任主義或工廠法本身，而是要以有節制的進步，走向良好的社會，說達成良好社會的最佳途徑，也許是僅有的途徑，是透過理性的改革。

理性的改革主義實踐起來極具吸引力，似乎能滿足一切人的需求。在保守主義傾向的人看來，理性的保守主義好像正是抑制危險階級的革命本能的不二法門。一點選舉權，一點福利國家條款，加上用民族主義認同來統一所有階級——凡此種種加起來，在19世紀末葉變成一套公式，既能安撫勞工階級，又能維持資本主義體系的基本要素。權力者與特權者沒有喪失他們認為要緊的任何東西，夜裡高枕無憂（窗外少一點革命黨）。

對激進傾向的人，理性的改革主義似乎提供了一種有用的中途之家。理性的改革主義在眼前提供一些根本的變革，不會斷絕未來出現更多根本變革的希望與預期。最重要的是，它為這些人有生之年提供了一些東西。這些人夜裡也高枕無憂（窗外少了一點警察）。

我並沒小看持續了將近150年上下的政治鬥爭——其中有些使用暴力，有的十分熱情，大多數有其重要性，幾乎所有都嚴肅。但是，我想把這場鬥爭擺在適當的視角裡觀察。歸根究柢而言，這鬥爭是在自由主義意識型態樹立的規則內進行的。法西斯主義者根本拒斥那些規則，但他們被平定並消滅——平定起來無疑不容易，但他們被平定了。

關於自由主義，有一點一定要提出來。我們已認定自由主義並非根本反國家，因為它認為理性的改革主義是一切之本。然而，自由主義縱非反國家，它根本上卻是反民主的。自由主義向來就是一種貴族學說，宣揚「最好的人統治」。當然，自由主義者說的「最好」，定義並不是說出身地位最好，而是就教育程度而言。「最好的人」因此不是世襲貴族，而是才能政治的受益者。然而，「最好的人」向來總是比整體少一點的一群人。自由主義者主張「最好的人統治」——貴族政治——目的不折不扣就是不要整體統治——不要民主。民主是激進主義者的目標，不是自由主義者的目標；或者，至少而言，是真正激進者、真正反體制者的目標。自由主義意識型態之問世，就是為了防止這群人得勢。保守主義傾向的人抗拒改革的時候，自由主義者和他們說話，言必稱只有理性的改革主義能擋住民主的到

來。這個論點，所有聰明的保守主義者聽在耳裡，都起共鳴。

最後，我們必須指出19世紀下半葉和20世紀上半葉之間一項重大的差異。19世紀下半葉，為危險階級伸張其要求的主角，仍然是歐洲與北美的城市勞工階級。自由主義的議程用在他們身上，極具成效，向他們提供普遍(男性)選舉權、福利國家的初步，以及民族認同。然而有民族認同，就有非我族類。誰是非我族類？當然，鄰國，但更重要的是非白人世界。自由主義者在「理性的改革主義」外衣下向歐洲／北美勞工階級提供的包裹裡，帝國主義和種族主義是兩個要項。

但是同時，非歐洲世界(non-European)的「危險階級」在政治上紛起波動——從墨西哥到阿富汗，從埃及到中國，從波斯到印度。日本1905年擊敗俄羅斯，在整個區域被視為歐洲擴張主義開始被「倒捲」。那是個很大聲的警告訊號，告訴自由主義者——主要當然是歐洲人和北美人——說，全世界民族，不只是歐洲勞工階級，如今都在提出「政治變革是正常之事」和「主權」兩大主張。

於是，自由主義者轉而致力將理性改革主義的觀念延伸到整個世界體系層次。威爾遜及其「民族自決」說，意思在此——民族自決是國內普遍選舉權的全球版。小羅斯福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宣布為戰爭目標的「四個自由」，意思在此；「四個自由」後來由杜魯門總統翻譯成「四點」，是為1945年以後「低度開發國家的經濟發展」方案的嚆矢——「低度開發國家的經濟發展」

就是福利國家的全球版。⁵

然而，自由主義的目標和民主的目標是彼此衝突的。在19世紀，自由主義宣稱的普遍主義變成與種族主義可以兼容，方法是將種族主義的對象「外部化」(將他們置於「國族」邊界之外)，同時將普遍理想的事實上的受益者——即「公民」——「內部化」。問題是，20世紀的全球自由主義圍堵所謂第三世界或南方的「危險階級」，能不能像歐洲與北美自由主義在國內層次圍堵他們的「危險階級」那麼成功。難題當然是，在世界層次，種族主義沒有可以「外部化」的餘地。自由主義終於無所逃其自我矛盾。

不過，在1945年，這一點還很不明顯。同盟國對軸心國的勝利看起來是自由主義(與蘇聯聯手)戰勝了法西斯主義的挑戰。戰爭最後一幕是美國向日本這個唯一非白人的軸心強權丟了兩枚原子彈，這件事，美國(和歐洲)很少人討論說或許反映了自由主義的某種矛盾。不消說，日本人的反思不一樣，但日本輸了戰爭，它的聲音也就沒有被認真看待。

這時候，美國是世界經濟裡最強大的經濟力量。此外，雖然蘇聯武裝部隊規模巨大，但美國擁有原子彈，也成為最強大的軍事力量。在五年之內，美國以一套四合一的方案，為世界體系理出政治秩序來：(a).與蘇聯達成一種安排，讓蘇聯控制世

5 自由主義在世界層次所作承諾的本質，以及列寧主義對全球自由主義的曖昧反應，請看本書〈國家發展的觀念，1917-1989：輓歌與安魂曲〉一文。

界一個角落，換取蘇聯安分於世界一角（當然不是說說而已，而是現實政策也安分）；(b).與西歐和日本構成聯盟體系，以促進軍事、經濟、政治及宣傳目標；(c).以一套節制、溫和的方案達成殖民帝國「去殖民化」；(d).在美國內部實施一套整合方案，擴大真實「公民身分」的範疇，以反共為統一國內的意識型態。

這套四合一方案發揮了作用，而且效果奇佳，垂25年左右，亦即一直到我們說的1968年這個轉捩點。那麼，我們要如何來評價1945—1968那些非常的年代？那是個進步的時期，自由主義價值勝利的時期嗎？答案只可能是：很是，也很不是。最明顯的「進步」指標是物質指標。世界經濟的經濟擴張非常之大，是資本主義體系歷史上最大的一次。而且這擴張似乎處處皆然——西方與東方、北方與南方都一樣。當然，北方受益大於南方，差距（絕對的與相對的差距）在大多數例子裡不斷增長。⁶不過，由於大多數地方都出現實質成長與高就業率，這個時代散發著一片光彩。更光彩的是，成長之餘，福利支出大幅增加，前面提過，教育與衛生方面的支出增加特別多。

其次，歐洲又有了和平。當然，是歐洲和平，而不是亞洲，亞洲打了兩場漫長又累人的戰爭，就是韓戰和中南半島。非歐洲世界許多地方當然也沒有和平。不過，發生在韓國和越南的

6 這方面的資料述要，可看John T. Passe-Smith,〈鴻溝之持續：後二次世界大戰時代經濟成長之思考〉(The Persistence of the Gap: Taking Stock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Post-World War II Era),收於《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equality》, M.A. Sceligson與J.T. Passe-Smith編(Boulder, CO: Lynne Reiner, 1993), pp. 15-30.

衝突並不一樣。韓國的衝突和柏林封鎖應該並觀，兩者其實是彼此相連的。德國和韓國是1945年的兩大分裂。兩國都是一半落在美國的軍事／政治勢力範圍內，另一半落在蘇聯勢力範圍裡。依照雅爾達的精神，分裂線必須維持不變，不管德國人和韓國人的民族主義(和意識型態)情緒。

在1945-52年時期，這些分裂線受到考驗。經過相當多緊張(在韓國是重大生命損失)，結果是分界現狀多多少少維持不變。因此，在實質意義上，柏林封鎖與韓戰完成了雅爾達的制度化過程。這些衝突的第二個結果是各個陣營進一步社會整合，這整合由兩個強大的聯盟體系之成立而完成制度化：一邊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及美日協防條約，一邊是華沙公約及蘇中締約。此外，上述兩場衝突直接刺激了世界經濟的一波重大擴張，因為這擴張的一個重大助力是軍事支出。歐洲的復元和日本的成長，是這波擴張的兩大直接受益者。

越戰是和韓戰相當不同類型的戰爭。越戰是非歐洲世界的民族解放運動鬥爭的主要象徵(但不是唯一象徵)。韓戰與柏林封鎖是冷戰世界體制的一部分，越南人的鬥爭(就像阿爾及利亞人和其他許多民族的鬥爭)是對這冷戰世界體制所加給他們的限制和結構的抗議。因此，在這層基本且直接的意義上，它們是反體系運動的產物。這大大不同於德國和韓國的鬥爭；這兩個地方，雙方從無和平，只有休戰；也就是說，在各方來說，和平是一種將就。民族解放戰爭則相反，是片面的戰爭。民族解放運動沒有一個希望和歐洲／北美打仗；他們只想要別人少管閒事，讓他們走他們的路。歐洲／北美不願意放過他們，最

後迫不得已才罷手。所以，民族解放運動是對權力者的抗議，但他們的抗議，是爲了實現自由主義的民族自決及未開發國家的經濟發展論。

接下來，是1945-1968那些年代的第三項特出成就：反體制力量在全世界勝利。美國在世界體系的霸權達於極盛，自由主義在全球獲得正當性，但非常弔詭的是，1848-1945年間形成而結構與戰略上反體制的那些運動，也在同一時期上台執政掌權。所謂「老左」的三個歷史變體——共產黨、社會民主黨及民族解放運動——紛紛在不同的地理區域取得國家權力。共產黨執政，自易北河到鴨綠江，占世界三分之一之地。民族解放運動在亞洲、非洲及加勒比海大多數地方掌權（性質相當的運動也在拉丁美洲與中東大多數地方執政）。社會民主運動（及與之相等的運動）則在西歐、北美及澳大拉西亞大多數地方掌權（至少輪流執政）。老左全球勝利，日本或許是唯一重要的例外。

這裡面是不是有個弔詭？這是對社會進步的崇拜，人民力量必然勝利的結果？還是人民的力量被大規模收編？思想上和政治上有沒有辦法來分辨是勝利還是被收編？這些問題，在1960年代開始引起不安。經濟擴張（全世界的生活水準明顯受益）、世界大部區域相對和平，以及人民的運動似乎處處勝利，都使人對世界發展作成正面、樂觀的評價，然而仔細審視現實情況，就可以看出重大的負面現象來。

冷戰的世界體制並沒有擴張人類自由，反而是所有國家都在進行巨大的內部壓制，所據理由是說有人精心製造嚴重的地緣政治緊張。共產世界有整肅審判、勞改營和鐵幕。第三世界

是一黨體制，將異議者下獄或流放。麥卡錫主義（及其在「經濟合作開發組織」〔OECD〕會員國裡的對等物），殘酷程度雖然沒有那麼明顯，在必要的時候強制全國一致和毀人事業前途，卻一樣有效。在一切地方，公共論述都只准在清楚劃定的界限內進行。反體制運動則雖然反抗舊有的種種不平等，卻不吝於創造新的不平等。第三世界，和OECD國家裡的社會民主體制，都有共產政權的黨官黨幹翻版。

此外，這些新的不平等不是隨便分配的，而是和身分群體彼此配合（無論這些群體叫做種族、宗教或族裔），而且這種配合，在世界層次或各國國內皆然。這些不平等，當然也和性別、年齡群掛在一起，也和另外一些社會身分的屬性掛在一起。簡而言之，這些群體許許多多沒有受到平等對待，他們總加起來遠遠超過世界人口一半以上。

因此，人類長久抱持的希望，在1945-1968年間獲得實現，但後來被看出是虛假的實現。這是1968年世界革命的基礎與原因，革命的首要對象，是整個歷史體系——作爲此一體系之霸權的美國，以及構成體系支柱的那些經濟與軍事結構。但是，革命也針對老左而發，雖然針對的程度稍次；針對反體制運動，因爲它們有反應不足之嫌；針對蘇聯，因爲蘇聯話說是美國意識型態之敵，其實和美國勾串；針對工會及其他工人組織，認爲這些工會和工人組織自限於狹隘的經濟層面，流於維護特定社會群體的利益。

同時，現有體系的維護者譴責1968年的革命者搞反理性主義。然而，自由主義意識型態其實損人不利己。他們一個世紀

以來堅持社會科學的功能在於推進理性分析的範圍(作為理性改革主義的先決條件)，結果成功過了頭。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指出：

當代哲學理論……相當多用力於大幅擴張我們所說的理性的或有意義的行為。我的感覺是，特別是在心理分析廣布之後，以及「他性」(Otherness)在一個日益縮小的地球和一個媒體充塞的社會裡逐漸蒸發之後，可用「非理性」的舊義「不可能」來形容的東西已經非常少。在與理性相反的非理性已經縮小到幾乎不存在的情況裡，這麼一個巨幅擴大的理性觀念還有什麼規範價值，是另一個有意思的問題。⁷

如果一切都已是「理性的」，那麼，啓蒙運動社會科學的那些特定典範還有什麼正當性？支配精英的那些政治典範還有什麼特別的優點？最嚴重的是，專家還擁有一般人民所沒有的特殊能力，支配群體還有被壓迫群體所沒有的東西。1968年的革命分子看出自由主義意識型態家(以及其沒有那麼大差別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型態)防禦甲冑上的這個邏輯漏洞，鳴鼓而攻。

作為政治運動，1968年的革命不過是一場灌木叢火災，猛烈燃燒一陣，然後(在三年之內)被撲滅。其餘燼——許多彼此

競爭的偽馬克思主義宗派——繼續撐了三年到五年，但到1970年代結束時，已盡成湮滅不聞的歷史註腳。不過，1968年的地緣文化衝擊留下了決定性的衝擊，因為1968年革命標誌了一個紀元的終結，自由主義自動被視為中心的時代的終結；自由主義曾是支配世界的意識型態，也是唯一能自稱始終理性，因此具備科學正當性的意識型態。它這種地位，至此結束。1968年世界革命將自由主義撥返其在1815至1848年那段時期的地位，只是好幾個彼此競爭的政治戰略中的一個。保守主義與激進主義／社會主義在1848到1968年之間一直被拘限於自由主義磁場，至此也獲得脫身。

自由主義從作為地緣文化的規範，被降級為只是全球市場裡又一個競爭者，這個降級過程在1968年以後的20年裡完成。在已經開始的漫長孔德拉季耶夫B階段下降裡，1945-1968年階級的物質擴張光彩消失了。並不是說受害的程度人人相等。第三世界國家首先受害，而且程度最重。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石油漲價，是試圖限制損害的第一個模式。世界剩餘價值有相當大部分透過產油國流入OECD銀行手裡。直接的獲益者是三群國家：抽取油田租金的產油國；接受OECD銀行貸款來維持國際收支平衡的國家(第三世界與共產世界)；藉此而能繼續維持出口的OECD國家。這第一招控損企圖在1980年崩潰，就是外債危機。第二招控損企圖，是雷根的軍事凱因斯主義，造成美國1980年代的投機熱潮。這一招在1980年代末期崩潰，也拖垮蘇聯。第三招是日本的作法，加上東亞小龍及周圍一些國家，在孔德拉季耶夫B階段必然的生產轉移中獲益。1990年代初

7 《後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NC: Duke Univ. Press, 1991)頁268。

期，我們正在目睹這一招的局限。

25年經濟鬥爭的總結果，是全世界對發展主義諾言的幻滅，而發展主義是全球自由主義語言的基石。目前為止，東南亞沒有遭到這股幻滅感，但可能只是時差的關係。然而別的地方，後果很嚴重，對老左尤其負面——首先是民族解放運動，其次是共產黨（導致東歐共產政權在1989年崩潰），然後是社會民主政黨。自由主義者看見這些情形，自稱勝利。其實這是自由主義的墳場。自由主義者退回到了1848年以前面對急迫要求民主的情況，這回遠遠不只是要求議會制度、多黨制度、基本民主這些有限的包裹，而是來真的，要求真正平等的權力分享。這一向是自由主義最害怕的事。爲了抵消這要求，自由主義提出一套包裹：有限的妥協，加上誘人的未來樂觀主義。今天，人們對透過國家行動而作的理性改革主義已不再遐邇相信；以此而言，自由主義對危險階級已經喪失其政治／文化上的防衛。

我們這就來到了當前這個紀元。這個紀元，我稱爲「黑色時期」(Black Period)。這時期象徵性地開始於1989年(1968年的持續⁸)，而且將會持續至少25到50年。

我一直強調支配勢力用一種意識型態之盾抵擋「危險階級」1789年以後堅持提出的要求。我說這盾就是自由主義意識型態，這意識型態有時直接運用，有時比較陰險，透過一種加了

8 見第5章註13。

甜味的社會主義／進步主義變體，使反體制者放棄其反體制本質，改取一種有限價值的替代品。我最後主張，這張意識型態之盾大致已被1968年的世界革命摧毀，1989年共產主義崩潰是那場革命的最後一幕。

那麼，這張意識型態之盾爲什麼在那麼有效運用150年之後崩毀？答案不在於被壓迫者突然洞見意識型態說法的虛偽。自由主義之虛偽，自始已被得知，經19與20世紀並且經常被有力指責，但社會主義傳統裡那些運動雖能批判自由主義，行事卻與那些批判不一致，絕大多數都不一致！

理由不難找到。這些運動的社會基礎——這些運動全都堂皇聲稱以人類大眾之名發言——其實是世界人口裡的一小帶，是——例如——1750年到1950年世界經濟結構中的「現代主義」部門裡那個比較不富有的部分。這些人包括熟練與半熟練的都市化勞工階級、世界的知識階層，以及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作用比較明顯的農村地區裡技術較爲熟練、教育程度較高的群體。這些加起來數目可觀，但還完全不到世界人口多數。

老左是一個由少數人支持的世界運動，一個有力的少數，被壓迫的少數，但在數目上就是世界人口中的少數。這人口上的現實即限制了它現實上能有的政治選擇。在此條件下，它做了它能做的僅有一件事。它只能像一根馬刺一樣，催促理性主義的改革主義加速落實其自由主義綱領，而且相當奏效。此計帶給這少數人的利益雖然片面，卻是真實的。然而，正如1968年革命者宣告的，許多人被排斥在外。老左頗言普遍主義，實際上卻淪爲特殊主義政治。

虛假普遍主義的這些意識型態眼罩在1968/1989年被丟掉，原因是基本的社會現實已經改變。資本主義世界經濟貫徹其不斷累積資本的邏輯，毫無鬆懈，因而逐漸接近其理論上的理想，也就是把一切商品化。這一點，反映於許多新興的社會現實之中：生產高度機械化；商品與資訊交換上的空間限制消除殆盡；世界去農業化；生態系統將近涸竭；工作過程高度貨幣化；以及消費主義（亦即消費大幅商品化）。⁹

以上種種發展都已為大家所熟知，也是全世界不斷討論的主題。不過，不妨從資本無盡累積的觀點來考慮這些事情的意涵。第一個意涵是，資本累積的速率有其重大限制。理由基本上是社會政治性的理由。主要因素有三個。第一個因素，分析家早已認知，但如今才正在了解。世界的都市化，以及教育與通訊的增加，已使全世界的政治意識達到一個程度，一方面造成政治動員輕而易舉，一方面造成很難再掩飾社會經濟的懸殊情況，以及政府在這些懸殊情況的維持上所扮演的角色。一切非理性的權威來源都失去正當性，也強化了這股政治意識。簡而言之，愈來愈多人要求報酬平等化，拒絕再容忍資本累積的一項基本條件，即勞力的偏低報酬。全世界的「歷史」工資水平大幅上升，以及要求政府重新分配基本福利（尤其教育與衛生）與確保所得穩定的聲浪高漲且不斷增長，就是明證。

第二項因素是，政府透過營造基本設施來補助利潤，同時允許企業將成本外部化的作法，成本已大幅增加。這就是新聞

界所說的生態危機、衛生成本上升的危機、大型科學成本偏高的危機等等。政府無法繼續既擴大對私有企業的津貼補助，同時又擴大對公民的福利承諾。兩者之中必須有一個大幅縮減。在公民意識增加之下，這場本質上屬於階級鬥爭之爭勢必巨大。

第三項因素是政治意識如今已是全球性的意識。全球層次的差距與國內層次的差距都有其種族／族裔／宗教分布。因此，政治意識與國家財政危機結合的結果，將是一場巨大的鬥爭，在全球與國家層次，這鬥爭都將會以內戰的形式出現。

諸項因素齊壓於體系之上，第一個遭殃的將是國家結構的正當性，以及——因此——國家維持秩序的能力。國家結構失去這項能力，將會付出安全上與經濟上的代價，這些代價反過來又會加劇壓力，從而進一步削弱國家結構的正當性。這不是未來——當前就是如此。我們現在已經看到不安全感大量增加——各方擔心犯罪，擔心胡亂發生的暴力，擔心法院體系無法伸張正義，擔心警察力量殘酷——這些擔心，在過去十年裡增加了許多倍。我並不是主張這些現象是新現象，也不是主張這些現象早已有之，於今為烈。但大多數人都感覺到這些是新現象，或者是愈來愈糟的現象，而且的確比先前更遠更廣泛。這些感覺的主要結果，就是國家結構被去正當化。

這種逐漸升高、自我強化的失序不會永遠持續，但可能持續25到50年。這是體系內部的一種混亂，起因是體系的安全閥已經竭盡其用，或者，換個說法：體系的矛盾已經到達一個程度，到此程度，恢復體系正常功能的所有機制已經沒有一個能夠繼續有效作用。

9 詳見本書〈和平、穩定與正當性，1990-2025/2050〉一文。

由此渾沌，將會生出一個新秩序，我們也就此談到最後一個問題：我們面臨的抉擇——當下，而且立即。渾沌時期，並不表示今後25到50年裡不會再看到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主要基本過程的運作。人們與企業將會繼續尋求以種種熟悉的方式累積資本。資本家將會尋求國家結構支持，一如他們過去所為，國家將會彼此競爭成為資本累積的中心。世界經濟大概會再進入一個新的擴張階段，進一步將經濟過程商品化，進一步將實質所得分配兩極化。

下一個25到50年裡，不一樣的遠遠不是世界市場的運作，而是世界政治與文化結構的運作。基本而言，國家將會一路喪失其正當性，因而難以確保最起碼的安全，在國內與國際皆然。在地緣文化場景上，不會再有一個支配性的共同論述，甚至文化辯論的形式也將成為爭辯的主題。何謂理性的或可接受的行為，將會莫衷一是。不過，渾沌並不表示不會有目的性的行為。會有很多群體尋求清楚、有限的目標，但其中許多群體將會陷入尖銳的直接衝突。一些群體對如何建構新的社會秩序可能有其清晰的長程觀念，即使這些觀念事實上極少有機會成為有用的，具備啟發性的行動指南。簡而言之，人人行動都將會有些盲目，即使他們不認為如此。

然而我們也命定非行動不可。因此，我們首先必須清楚我們的現代世界體系有何不足，是什麼使這麼大百分比的世界人口憤怒或至少對其社會愛恨交雜。我認為很清楚，主要問題在於這體系有重大的不平等，亦即缺乏民主。資本主義世界體系

以前的所有體系無疑也都如此。資本主義不同之處在於，它在物質生產上的成功，似乎應該除掉造成不平等的所有藉口，無論這不平等是表現於物質、政治或社會方面。這些不平等尤其不能成立的理由是，它們不是只使一小群人與世相隔，而是使多達五分之一或七分之一的世界人口與其餘人口隔絕。使被排斥的人憤憤不平的就是這兩項事實：整體物質福利增加，以及能過好日子的人不只是一小撮人，但遠遠未達多數。

對我們的世界體系的這場末期渾沌，我們無法貢獻任何可取的解決辦法，除非我們非常清楚說明，唯一可取的體系是一個相對平等、充分民主的歷史體系。我們必須具體地、主動地，立即在好幾個陣線上行動。其中一項，是積極打破濡染了地緣文化至少兩百年的歐洲中心主義。歐洲人對我們共同的人類事業有過重大的文化貢獻，但是說，過去一萬年來他們的貢獻比別的文明大很多，卻非實情，我們也沒有理由認定，在未來千年裡，擁有集體智慧的地方將會減少。我們要積極以一種更清醒、更平衡的歷史意識與文化評價來取代當前歐洲中心主義的偏見，但這件事需要尖銳、持續不斷的政治與文化鬥爭。這件事需要的不是狂熱主義，而是集體與個人的扎實思想工作。

此外，我們必須將人權觀念非常當真，平等落實於「我們」和「他們」，落實於公民和外人。共同體保障其文化傳統的權利，決不是保障其特權的權利。一個主要的戰場，將是移民們的權利。我預見未來25年到50年，北美、歐洲及——沒錯——日本的居民之中，事實上將有個非常巨大的少數是這些移民（無論他們是否合法移民）或其子女。如果我的預見沒錯，那麼，我們必

須鬥爭確保這些移民在其移入地區真正平等享受經濟、社會及政治權利。我知道，有人將會根據文化純粹性和累積的財產權等理由，在政治上強力抵制這件事。北方的政治家的大致論點是說，北方不能扛全世界的經濟擔子。爲什麼不能？北方的財富有很大一部分是剩餘價值從南方轉移而來的結果。導致體系危機的，就是這個幾百年來的事實。這不是慈善救濟，而是理性的重新建構。

這些戰鬥將會是政治戰鬥，但未必是國家層次的戰鬥。國家被去正當化的結果，這些戰鬥很多（也許大多數）將會在地方層次，進行於我們正在重組而形成的群體之間。由於這些戰鬥將會是地方性的，在許多群體之間複雜進行的，一套複雜而有彈性的聯盟戰略就不可或缺，但這套戰略行得通的條件是，我們必須謹記我們的平等主義目標。

最後，這場鬥爭將是一場思想鬥爭，用於重新構思我們的科學正典，尋求更整體、更精密的方法論，以及努力擺脫我們虔信但虛妄的科學思想價值中立論。理性本身就是一種價值判斷。除非使用最廣的、包括性最大的人類社會組織觀念架構，否則沒有什麼是理性的，沒有什麼能是理性的。

各位或許認爲，我爲未來20到50年勾勒的公正社會與政治行動綱領太過模糊。不過，在漩渦之中，這是可能的最具體的綱領。關於漩渦之中的生活，我上面談的基本上有兩件事。第一，要知道自己想往哪個岸上游。第二，要確定你的近程努力似乎是往那個方向走。要說得比這更精確，是做不到的。而且你會在尋找那更大的精確時滅頂。

索引

B

Brebner, Bartlett J. 87, 102

C

COMECON（東歐經濟合作組織） 6

E

EFTA（歐洲自由貿易協會） 26

H

Halévy, Elie 82, 83, 84, 88

I

IMF（國際貨幣基金） iii, 56, 58, 124

O

OECD（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vi, 117, 123, 124, 176, 199, 283, 285

OPEC（石油輸出國家組織） 9, 11, 51, 52, 54, 55, 122, 199, 201, 203, 285

S

Simon, Walter M. 86

Sir W. Ivor Jennings 113

T

Tudesq, André Jean 79, 86, 99

Schapiro, J. Salwyn 104

二劃

七姊妹（Seven Sisters） 53

人權 x, 60, 80, 85, 151, 153, 157, 158,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206, 207, 215, 250, 266, 269, 291

三劃

《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 44
工黨 101, 226

現代名著譯叢
自由主義之後

2001年6月初版
2002年1月初版第二刷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定價：新臺幣280元

著者 Immanuel
Wallerstein
譯者 彭淮棟
發行人 劉國瑞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台北發行所地址：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
電話：(02)26418661
台北新生門市地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話：(02)23620308
台中門市地址：台中市健行路321號B1
台中分公司電話：(04)22312023
高雄辦事處地址：高雄市成功一路363號B1
電話：(07)2412802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26418662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責任編輯 李國維
特約編輯 張建華
封面設計 王振宇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
聯經網址 <http://www.udngroup.com.tw/linkingp>
信箱 e-mail: linkingp@ms9.hinet.net

ISBN 957-08-2235-X (平裝)

After Liberalism

© 1995 by Immanuel Wallerstein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1 by Linking Publishing Company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New Press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自由主義之後 / Immanuel Wallerstein 著 .

彭淮棟譯 . -- 初版 . -- 臺北市 : 聯經 , 2001年
318面 ; 14.8×21公分 . -- (現代名著譯叢)

譯自 : After Liberalism

ISBN 957-08-2235-X(平裝)

[2002年1月初版第二刷]

I. 自由主義

570.112

90008184

推薦單位	人文風香書屋
購 價	210
股 號	91-269
入館日期	92.6.24

現代名著譯叢

●本書目定價若有調整，以再版新書版權頁上之定價為準●

極權主義	蔡英文譯	250
法律的理念	張茂柏譯	250
自然法——法律哲學導論	李日章譯	150
人文科學的邏輯	關子尹譯	180
論康德與黑格爾	關子尹譯	180
六大觀念：真、善、美、自由、平等、正義	蔡坤鴻譯	250
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導讀	李明輝譯	180
黑格爾與現代社會	徐文瑞譯	250
論小說與小說家	瞿世鏡譯	200
倫理學原理	蔡坤鴻譯	250
托馬斯·摩爾	梁懷德譯	280
制憲風雲——美國立憲奇蹟	孫北堂譯	300
法國1968：終結的開始	趙剛譯註	200
西方政治傳統：近代自由主義之發展	李豐斌譯	250
論民主	李柏光、 林猛譯	280
後現代性的起源	王晶譯	200
共同體的基礎理論	于嘉雲譯	180
倫理與經濟	劉楚俊譯	180
宇宙與歷史	楊儒賓譯	200
超越左派右派：激進政治的未來	李惠斌、 楊雪冬譯	300
星空中的普魯斯特	廖月娟譯	280
馬丹·蓋赫返鄉記	江政寬譯	200
重返政治	孫善豪譯	350
國族主義	李金梅譯	180
金錢 性別 現代生活風格	顧仁明譯	280

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



C0174725

After Liberalism

柏林圍牆拆毀，以及蘇聯隨後瓦解，有人稱之為共產主義的顛覆，以及馬列主義作為近代世界一種意識型態力量的顛覆。此見無疑是正確的。有人又稱之為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型態之終於勝利，此見卻是對現實的一種完全誤解。實情是，上述事件其實更標識了自由主義的崩潰，以及我們明確進入「後自由主義」世界。

本書主旨，就是要闡釋這個主題，訴說這一段重大的意識型態混亂時期，這一種廣泛、天真、初期的樂觀主義開始消退，換成對逐漸出現的世界失序的憂懼。

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



C0174725

ISBN



9 789570 822359

聯經